

姚金果 著

陈独秀与莫斯科

的恩恩怨怨

携友制藏

福建人民出版社

携友制藏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姚金果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211-04948-0

I. 陈... II. 姚... III. 陈独秀 (1880~1942) — 人物研究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355 号

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CHEN DUXIU YU MOSIKE DE ENENYUANYUAN

著 者: 姚金果

责任编辑: 李天兵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

插 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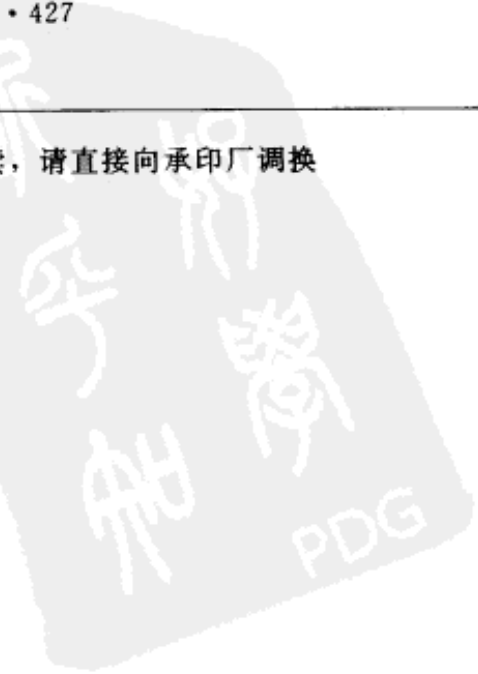
字 数: 47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1-04948-0/D·427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 莫斯科初识陈独秀	1
	维经斯基结交陈独秀	1
	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4
	点燃共产主义运动之火	9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	12
2	从“独立革命”到“党外联合”： 曲折的心路历程	15
	陈独秀婉拒马林	15
	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平等合作	25
	利金对中共的“褒”与“贬”	31
	来自马林的警告	34
3	从“党外联合”到“党内合作”： 痛苦而无奈的选择	39
	马林得到莫斯科支持	39
	陈独秀在莫斯科挨批	45
	国际命令：“党内合作”	54
	争论迭起	63
	陈独秀与马林联手	73

4	被迫上了国民党的马车： 失望与希望并存	82
	中共中央寄人篱下	82
	满怀失望离开广州	89
	陈独秀用心良苦	94
	在鲍罗廷指导下与国民党牵手	101
5	直面国民党内排共浪潮： 质疑无条件支持国民党	107
	国民党右派宣称陈独秀别有用心	107
	真诚合作谈何易	113
	维经斯基纠偏	117
	陈独秀身背重负	121
6	与鲍罗廷的合作与分歧： 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129
	鲍罗廷反对退出国民党	129
	“国际联络委员会”引发分歧	135
	陈独秀“状告”鲍罗廷	140
	对孙中山北上的不同态度	148
7	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认识领导权	155
	陈独秀：无产阶级要做一个督战者	155
	鲍罗廷在上海指手画脚	159
	五卅运动显英雄本色	164
	陈独秀骑虎难下，莫斯科使出高招	167
8	同国民党新老右派交锋：进与退的变奏	169
	多变的国际指示令陈独秀无所适从	169
	陈独秀责问戴季陶	173

	维经斯基：准备退出国民党	180
	莫斯科运作反奉倒段	187
	陈独秀勇挑反右大旗	192
9	国民党二大：第一次大让步之真相	196
	鲍罗廷给陈独秀泼了冷水	196
	国际命令：不要争领导地位	200
	维经斯基促成上海会谈	202
	是谁把蒋介石推上了台	206
	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错误判断	209
10	中山舰事件：第二次大让步之真相	215
	布勃诺夫主张向蒋介石让步	215
	布勃诺夫影响下的中共广东区委	225
	陈独秀对事变的态度	226
	不能反击，岂能全面退却	230
11	整理党务案：第三次大让步之真相	235
	莫斯科制定妥协政策	235
	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协议	241
	陈独秀愤而要求退出国民党	244
	是谁蒙受了损失	249
12	谁对北伐持消极态度：难言之隐	254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支持北伐	254
	莫斯科强烈要求：暂缓北伐	258
	维经斯基苦劝陈独秀	262
	一篇文章招来的谴责	265
	陈独秀：警惕新军阀	270
13	在国际远东局指导下：所得与所失	277

	陈独秀身边有了“婆婆”	277
	远东局指导下的中共中央	282
	维经斯基：鲍罗廷同志在这里发号施令	290
	在三次起义的烽火之中	295
	维经斯基败在鲍罗廷之手	304
14	漩涡之中的抉择：难题重重	308
	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	308
	如何处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	312
	为左派寻找主心骨	320
	“苦力观”与“在野党”	324
15	限共与限蒋的较量：危机初显	330
	蒋介石要求迁都暗藏阴谋	330
	陈独秀：鲍罗廷又做了一件大错	333
	蒋介石不买莫斯科的账	335
	陈独秀质问蒋介石	346
16	将革命推入血泊之中：莫斯科的失策	352
	蒋介石开了杀戒	352
	陈独秀向莫斯科告急	355
	在汪精卫身上下功夫	359
	斯大林看好蒋介石	364
17	争取汪精卫：莫斯科推出新政策	368
	发起讨蒋运动	368
	托洛茨基质疑斯大林	371
	鲍罗廷舌战罗易	375
	瞿秋白批评陈独秀	381
	鲍罗廷：惟一的出路是让步	385

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PDG

18	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危机加深	391
	莫斯科纸上谈“进攻”	391
	“马日事变”令鲍罗廷乱了方寸	394
	陈独秀的应急措施	396
	冯玉祥变卦，斯大林翻脸	399
	罗易指责陈独秀	403
19	寻找挽救危机之策：回天无力	407
	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407
	罗易轻信汪精卫	409
	陈独秀：莫斯科的指示无法执行	413
	斯大林开出挽救中国革命的“药方”	415
20	诱过于人：莫斯科编织“机会主义”	420
	陈独秀：在左右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420
	莫斯科舍不得“国民党”的旗帜	426
	斯大林找到“替罪羊”	427
	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	433
21	卸任总书记的苦与愁：莫斯科没有忘记	435
	罗米纳兹挥舞惩罚大棒	435
	“撒翁”没有撒手	442
	莫斯科：陈独秀会另组党吗？	452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	459
	没有陈独秀的中共六大	465
22	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挑战莫斯科	471
	向苏联发难的“中东路事件”	471
	共产国际要求“拥护苏联”	474
	陈独秀提醒中央：宣传要有针对性	476

	远东局：陈独秀表达了反革命的观点	483
23	与莫斯科决裂：投向反对派	488
	中国出现托派组织	488
	陈独秀找到了“知音”	496
	向中共中央进言	499
	米夫要求陈独秀最后表态	504
	中共中央：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决议	507
24	开除与挽救：道是无情亦有情	511
	陈独秀亮出“反对派”大旗	511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515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523
	“八十一人”政治意见书	529
	共产国际：给陈独秀一个申诉期限	533
	中共中央闹到共产国际	539
25	批判陈独秀：从“机会主义”到“投降主义”	552
	莫斯科批判“陈独秀主义”	552
	张国焘：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555
	瞿秋白：陈独秀始终是孟什维克	560
	中共党内的批陈之风	565
	陈独秀攻击红军	568
	从“机会主义”到“投降主义”	573
	爱国者被诬为汉奸：	
26	莫斯科“反托”之冲击波	579
	陈独秀：我何罪之有！	579
	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586
	中共中央与陈独秀探寻合作之路	590

	王明：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592
	陈独秀是汉奸吗？	595
27	孤叶飘落鹤山坪：恩怨何时了	605
	悲苦的落难士，执著的爱国者	605
	与托派决裂	611
	探讨斯大林问题	619
	风灭孤烛了残年	623
	主要参考文献	627
	后记	631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 莫斯科初识陈独秀

维经斯基结交陈独秀

那是1920年4月初的一天，和煦的微风夹带着春天的气息，使阴霾笼罩的北京城有了几分生机。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更是春意浓浓。原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代表维经斯基^①（化名吴廷康）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等，正与李大钊开怀畅谈。

^① 维经斯基，1893年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1913年因家贫去美国谋生。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次年，维经斯基回到国内，加入俄共（布）。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从事地下工作，不幸于1919年5月在海参崴被高尔察克白匪逮捕，流放到库页岛服苦役。后来他领导岛上的政治犯举行暴动，最终获得自由。1920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工作。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并通晓英语，被派到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来中国之前，维经斯基仅仅听说过李大钊的名字。到中国后，他通过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俄共（布）党员柏列伟结识了李大钊。经过交谈，维经斯基才知道，李大钊等人不仅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十分向往，而且早在几年前已接受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与李大钊交谈的过程中，维经斯基还了解到有关陈独秀的一些情况。

维经斯基得知，陈独秀是中国青年最喜爱的杂志——《新青年》的创刊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散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传单而被捕，后被李大钊等人营救出狱。就在维经斯基来华前两个月，陈独秀为了避免再次被捕的厄运，由李大钊亲自护送出京，途经天津到上海。在前往天津的途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约定，两人分别在上海和北京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维经斯基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因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正是他此次来华的使命之一。

经过与李大钊多次交谈，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于是他向李大钊表示，他可以利用在华工作期间的便利条件，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建立起共产党组织。李大钊遂介绍他们到上海后去找陈独秀，以便筹划建党的具体事宜。

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并且很快与陈独秀取得了联系。初步了解到的情况使维经斯基甚为欣慰。原来，此时陈独秀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酝酿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便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准备条件。

初步与陈独秀接触之后，维经斯基便对这位年长自己十

多岁的人产生了敬意。他看到，虽然陈独秀在中国知识界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学者，但在其身上却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活力，一种开创新事业的勇气和魄力。他相信，有陈独秀这样的人来协助，他来华的使命一定能够圆满完成。

更令维经斯基感到惊奇的是，陈独秀几乎与上海所有的政治团体都有联系，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的年轻人都对陈独秀十分尊敬，甚至一些国民党要人也与陈独秀来往密切。

通过陈独秀，维经斯基很快便结识了当时在上海比较活跃的一些政治人物，如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等。他经常找他们座谈，一方面了解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状况，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当时，陈独秀正在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维经斯基到上海之时，陈独秀正在紧张地筹备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

为了以纪念五一劳动节为契机，发动中国工人阶级，陈独秀决定《新青年》杂志发行“劳动节纪念专号”。他还亲自写信给一些地方的青年人，要求他们深入工厂搞调查，将调查情况写成文章在纪念专号上发表。由陈独秀精心组织和编辑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上，既有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又有反映中国工人劳动状况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还有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第一次以刊物的形式，公开面向广大的劳动群众，反映劳动群众的疾苦。

五一节前夕，陈独秀联系了上海工业会、船务栈房工界

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共同发起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陈独秀被推为筹备大会的顾问。五一节那天，大会遭到军警破坏，不得不几次转移会场，但到会的仍有几千人。大会通过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和抗议军警镇压的《上海工人宣言》。

五一节过后，陈独秀经常深入工人之中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积极筹建工会组织。他所倡导和组织的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第一个工人组织。

走出了书斋的陈独秀，经过与工人阶级的接触，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而迅速完成了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心路历程。

陈独秀在政治上的迅速进步和实际工作情况使维经斯基坚信，要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陈独秀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陈独秀是一个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奠定了他在青年人心目中的领袖地位，所以，他在社会上的威望是一般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正因为如此，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正吸引和影响着一大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紧随着他的步伐前进。

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如果说，维经斯基在上海的活动，对于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起了重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的话，那么，对于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维经斯基来说，结识陈独秀对于他也同样具有重大的作用，这就是保证了他的赴华使命的顺利完成。实际上，他们互相从对方那里得到了鼓励、鞭策和

帮助。

维经斯基到上海不足一个月，即完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他办的事情——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不仅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这个机构，而且在其中设立了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在陈独秀的协助下，东亚书记处成立之初，即有的放矢地确定了中国科的任务，这就是：（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这些其实都是陈独秀等人正在进行的工作。显然，中国科任务的确定是建立在陈独秀等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

1920年6月，维经斯基在给其上级的报告中，已经很有把握地认为：东亚书记处现在已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尤其是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书记处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

当然，陈独秀的建党活动也得益于维经斯基的指导。这年6月，陈独秀在自己的寓所里召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参加者有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筹备成立共产主义的政党。会上讨论了党纲、党章、党的纪律等，并且一致推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人。

陈独秀等人的建党活动，促使维经斯基产生了尽快将各地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的想法。这一想法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

个组织的活动，应该先召开一次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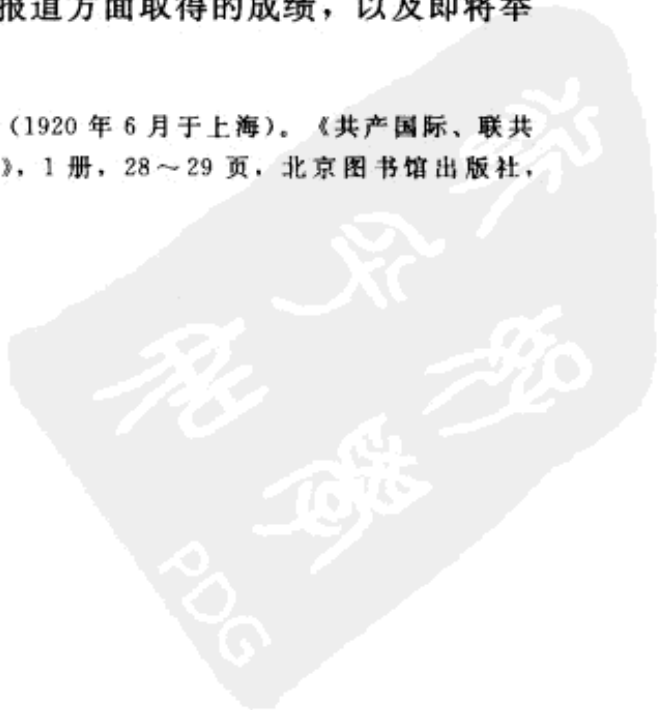
维经斯基的想法得到了陈独秀的赞成。因为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即这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天津时，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柏列伟等人即决定成立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个同盟成立后，在上海、北京、广州均建立了组织，参加人员以无政府主义者居多。作为发起人，陈独秀与这些组织都有联系。当维经斯基提议召开会议后，陈独秀即向维经斯基提议，由他亲自写信通知各地，以确定会议的有关事项。

对于陈独秀的这一建议，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人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①

正当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之际，7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带着他的助手从海参崴来到北京。

7月5日至7日，在维连斯基主持下，俄国在华工作人员在北京举行了会议。与会者向维连斯基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尤其是出版和宣传报道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即将举

^①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28～2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有关情况。

维连斯基对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人的工作十分赞赏。回国后，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现已迁址北京）等。^①

7月19日，被称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在维经斯基主持下举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次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会后不久，这年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宣告正式成立，其成员共8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

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伊始，即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党的组织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努力下，上海共产党小组与维经斯基领导的东亚书记处密切合作，很快成立起出版部、宣传报告部，以及发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组织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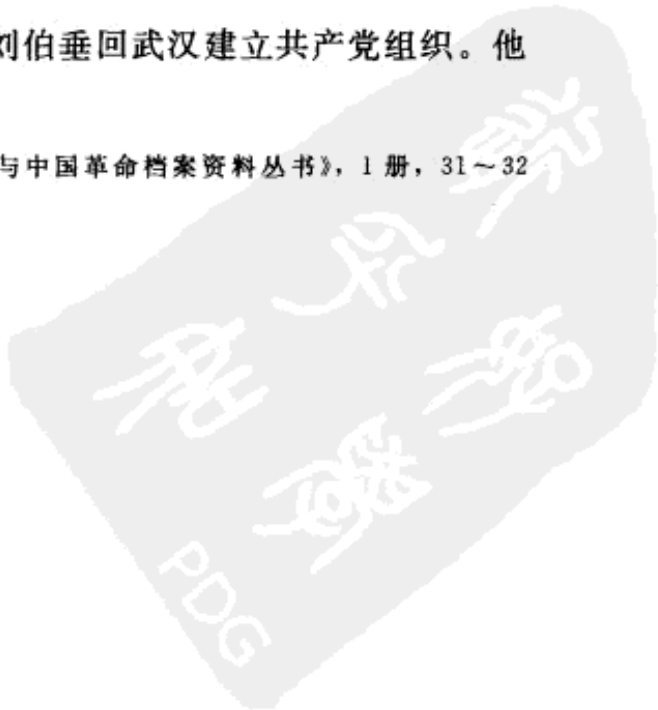
^①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40~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维经斯基经常出席上海共产党小组会议，指导陈独秀等人开展工作。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合作是愉快的，他们都十分投入地工作着，到8月中旬即取得了初步成绩。维经斯基很为这些成绩骄傲。8月17日，他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汇报说：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须知》（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种报纸提供消息。我们通讯社发出的材料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和我们自己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苏俄日历上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也被全文刊用了。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这一周，我们组织部要召开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代表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我用英文给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已由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该决议已译成中文，其提纲现在是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①

维经斯基这封信发出不久，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宣告成立。

这期间，陈独秀派遣刘伯垂回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他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31～3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还分别致信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广州的陈公博、长沙的毛泽东及在法国的张申府、日本的施存统，要他们尽快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的工作使维经斯基相信：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已经为期不远。^①

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陈独秀与小组成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工作中。维经斯基对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指导。他还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机会，在《劳动界》第13号刊登了署名为“吴廷康”的文章——《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文章介绍了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鼓励中国工人和农民互相联合起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1920年的上海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与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互相帮助、共同协作是分不开的。

点燃共产主义运动之火

维经斯基及其助手在上海取得初步成绩后，便设法将工作扩展到其他地区。然而，他们毕竟在中国呆的时间太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尤其是政治思想状况，了解得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时，就遇到了问题。

^① 参见《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于上海）；《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于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32～35、5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920年8月，维经斯基为了尽快在广州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便派遣当时正在天津工作的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化名米诺尔）前往广州。^①

斯托扬诺维奇接受任务后，先到北京会同别斯林，然后两人一起前往广州。正是在北京，他们认识了北京大学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或许知道黄凌霜信仰无政府主义，但他们所重视的，是黄凌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他在广州的关系。为了完成在广州创建共产党的任务，他们邀黄凌霜一起南下。

在广州，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以苏俄政府代表的身份，建立了俄华通讯社，以此作为公开活动的基地。经过黄凌霜的引荐，他们结识了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等无产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师承刘师复，长期在广州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工作。这样一来，米诺尔和别斯林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②

10月，拥护孙中山的陈炯明率粤军打败了控制广东军政府的桂军，使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建立政府。11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遂以广东省省长的名义，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接到陈炯明的邀请之后，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很想借这个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

^①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说：“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下面暂设两个部，即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3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② 参见《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他将这个想法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回信表示赞成。

12月17日，陈独秀将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交给李汉俊和李达负责，离沪赴粤。不久，维经斯基也与柏烈伟一起来到广州。

就这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在广州再次携起手来。

陈独秀所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对斯托扬诺维奇、别斯林和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小组进行改造。他多次与区声白等人谈话，说服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但区声白等人表示，宁愿不参加共产党小组，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便依靠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几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比较进步的学生，来开展工作。

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小组宣告成立。其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以及斯托扬诺维奇、别斯林等人。小组以陈独秀为书记（不久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负责组织工作，陈公博负责宣传工作。小组以《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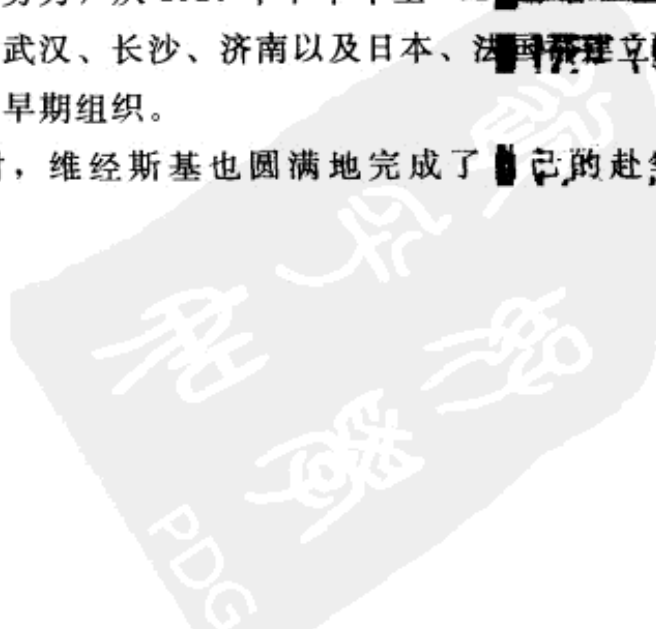
在陈独秀创建广州共产党小组的过程中，维经斯基利用在广州的机会，多次与小组成员进行座谈，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建设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畅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

就这样，在维经斯基的热心指导下，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法国~~建立起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维经斯基也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赴华使

1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莫斯科初识陈独秀



命。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返俄之前，鉴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建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应迅速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进而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

1921年4月21日，受俄共（布）中央的派遣，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①给俄共（布）领导人写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②

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他自己是否赞成人们称

^①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这是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人都不熟悉其名的俄共（布）党员。如果不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了一大批当年的档案资料，这个名字或许永远不会被中国人所知。正是从这批档案中，笔者发现了此人写给俄共（布）领导人的一份绝密报告，从而得知：1919年至1921年间，此人曾受俄共（布）中央的派遣，来到中国从事地下工作。在华期间，他不仅接触过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也关注过陈独秀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陈独秀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但他对陈独秀的建党活动显然是了解的。

索科洛夫在华活动期间，正是陈独秀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伴随着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陈独秀在建党时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政治敏锐性和前沿意识。

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裹挟着清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气息，为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增添了新的活力。从1920年秋开始，陈独秀为代表的上海共产党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尝试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在这两场论战中，陈独秀以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阐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积极投入论战的过程中，陈独秀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开始发生深层次的变化。代表他当时思想认识最高水平的，即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谈政治》。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观点出发，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的观点，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这一观点的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在文章的最后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①

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还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经常参加上海工人团体的聚会和活动，向工人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陈独秀带动下，上

^① 《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

海共产党小组成员纷纷走进工厂，向工人群众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和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为争取自由和权利而斗争。

当时正在上海的索科洛夫，固然没有像维经斯基那样直接参加陈独秀等人的活动，但他所耳濡目染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对人们对陈独秀的赞誉应该是认可的。

从“独立革命”到“党外联合”： 曲折的心路历程

陈独秀婉拒马林

1921年6月初，一个荷兰人从莫斯科来到中国上海。

这个人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他是荷兰一个著名的革命者。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被派往荷属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成长为一个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职业革命家，其丰富的革命经历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0年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为了利用他在殖民地工作的经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他留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

共产国际二大后，斯内夫利特接受了一项光荣使命，这

就是研究远东各国，尤其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与之建立联系，同时为共产国际能否在中国建立一个办事处进行考察。肩负着这一重要而光荣的使命，斯内夫利特离开莫斯科，踏上了赴华之途。

尽管斯内夫利特的这次行动十分隐密，但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丹尼尔斯还是得到了有关他行程的消息，上海工部局也做好了准备，以便监视他的所有活动。斯内夫利特也非常清楚，从离开俄罗斯领土的那一刻起，他的行踪就受到了各国警察的监视。所以，当他到达上海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躲开上海工部局侦探的监视，即化名为“马林”。

由于马林是绕道来华的，所以当他到达上海时，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另一代表尼柯尔斯基已经先于他到达。

马林、尼柯尔斯基与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联系后，即向李达等人建议，召集各地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到上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李达遂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当时，陈独秀仍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广州大学预科校长。接到李达的信后，陈独秀考虑到自己正在争取一派款子修建预科学校的校舍，这一走恐怕款子难以争取到手，便决定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出席会议。

争取一笔款子与成立一个政党，而且是最后掌握了中国政权的党相比，孰轻孰重，不说也明白。但陈独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召开的上海会议将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想到它将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未能亲自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对于陈独秀

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选他作党的第一任领导人——中央局书记，因为他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贡献，是与会者有目共睹的。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谈到陈独秀时所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①，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

^① 普列汉诺夫（1856—1918），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新学社
PDG

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挑起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重担。

陈独秀回到上海的当天，其他两名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即向他汇报了中共一大后马林指导他们工作的情况。初步了解到的情况，令陈独秀对未曾谋面的马林产生了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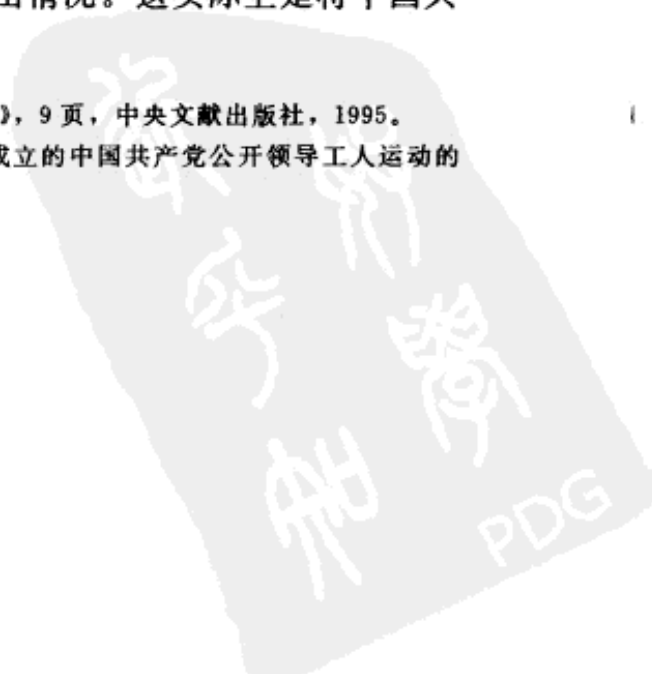
原来，中共一大闭幕后，由于陈独秀尚在广州，中央局工作暂由李达、张国焘负责。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多方指导，同时也发生了越俎代庖的事情。

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莫斯科回来后，交给马林一个通知，通知说，共产国际准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要马林设法组织中国、日本派代表团参加大会。马林看到通知后，没有征询李达和张国焘的意见，便擅自派张太雷前往日本，去寻求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以组成日本代表团。

陈独秀还了解到，马林要求张国焘拟定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②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以及党的工作人员每月应领取的薪水，然后报告给共产国际。马林称：由共产国际来负担中共的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的薪水，而中共中央的义务是定期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经费支出情况。这实际上是将中国共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② 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一大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全国性组织，主任为张国焘。



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来看待。

陈独秀以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的一个政党，一切都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负责。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干革命，没有必要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陈独秀也不赞成从事革命工作的人领取薪水，他把领取薪水称为“雇佣革命”，认为一个人既然献身于革命工作，就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

这样，在未谋面之前，陈独秀就对马林产生了不满。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陈独秀即与马林进行了会谈。果然，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双方在中国共产党是否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是否在共产国际统一指导下进行工作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最后只得不欢而散。这次会谈之后，他们虽然又进行过几次接触，但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对于陈独秀与马林的分歧，作为翻译的张太雷自然十分清楚，也很着急。张太雷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家庭，才能站得住脚。于是，他决定劝劝陈独秀。

一天，张太雷因事来见陈独秀，顺便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产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也不能例外……”话还没说完，陈独秀便“啪”地一拍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①

^① 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263～26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事后，陈独秀将李达、张国焘和上海的一些党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①

陈独秀拒绝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拒绝使用共产国际的经费，一心要独立地干革命。但他根本没想到，一场逮捕却使他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位使用共产国际经费的人。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突然包围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将陈独秀及其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的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一并逮捕。在陈家搜出的《新青年》，成了陈独秀的“罪证”。

陈独秀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都为营救陈独秀而多方联系。孙中山在接到李达和张太雷的电报后，也给法租界的领事发了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

马林得知陈独秀被捕后，立即行动起来，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马林，凭着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的关系，找到了法国律师巴和，请他为陈独秀等人打官司。他还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用于拉关系，最后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10月26日，会审公堂宣判陈独秀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陈独秀被捕一案至此了结。

陈独秀本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次被捕之后马林鼎力营救，使他大为感动，无形中对马林产生了好感。被释放后的第二天，陈独秀便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召集了中央

^① 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114页，重庆出版社，1987。

会议。

所有的与会者都看得出来，经过这样一场变故，陈独秀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不仅热情地过问工会工作和宣传工作，还引导大家对以下三个问题统一了认识：（1）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经赤色职工国际批准后实施。（3）中共中央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从此，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坦诚以见。陈独秀随时征询马林对党的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局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马林则毫无保留地向中共中央局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供参考。

陈独秀还介绍马林认识了国民党在上海的代表张继等人，从而促成了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的会面和与国民党要人在广州的接洽。

1921年12月10日，马林化名为“西蒙博士”，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乘坐怡和公司的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桂林。途中，马林和张太雷分别在武汉和长沙作了短暂停留，会见了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成员。12月下旬，马林和张太雷到达桂林。

在桂林，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通过谈话，马林初步了解到孙中山个人的思想状况和国民党的状况，从而向孙中山提出了组织革命军队、与苏俄建立联系等建议。

1922年1月10日，马林离开桂林前往广州。此行给了他进一步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机会。马林在广州逗留期间，正遇香港海员为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



大罢工。他了解到，国民党人是罢工的指导者，他们与罢工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还得知，在罢工前后，广州、香港、汕头的海员中约有 1.2 万人加入了国民党，有 5000 名工人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工人们情绪激昂地倾听国民党领袖所作的反对外国列强、争取中国独立的演讲。

马林认为：通过此次大罢工，国民党与工人运动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使年轻的工人运动成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广州共产党小组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但马林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以至于后来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竟说共产党与此次罢工没有任何联系。

1921 年冬至 1922 年春的南方之行使马林大为振奋。他承认，这是他在中国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他对人说：在上海所看到的情形曾使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前途感到悲观，而南方之行却使他坚信，在那里能够为民族革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南方之行无疑使马林对国民党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断言，国民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四部分人组成的政党，其中知识分子起主导作用，而国民党的纲领则为不同派别的人加入国民党提供了可能性。马林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一个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的小党，难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如果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内，他们便有了可以公开活动的阵地，同时国民党所进行的国民革命也可以在他们的参与下得以发展。

马林这个想法，源于他在荷兰的实际工作经验。1914 年 5 月，在马林的帮助下，爪哇建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前身)。从1916年开始，马林开始做统一战线工作。当时爪哇有一个建于1911年的群众组织，叫伊斯兰教联盟。这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集经济、社会 and 宗教于一体，其斗争的锋芒直指欧洲资本家对爪哇人的剥削和爪哇的反动政府。伊斯兰教联盟中有一个比较进步的左翼，马林指导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与其实现了合作。两者的合作是一种“党内合作”形式：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可以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但不放弃自己原来的党员身份；伊斯兰教联盟成员也可以在保留自己盟籍的情况下，加入东印度民主同盟。与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合为社会民主同盟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不仅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而且动员了广大的工人阶级，这使得他们很快便取得了对爪哇工人运动的领导权。^①

马林将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与伊斯兰教联盟做了比较，认为两者的性质相同，既然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可以利用伊斯兰教联盟开展工作，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来开展工作。马林还把中国的形势与爪哇、印度和土耳其的形势做过一番对比，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这些国家落后。中国的现代工人，也包括其家属在内，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而且其中在纺织业做工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这些现代工人保留着极为顽固的旧传统，他们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所以，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他们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而他们却可以参加国

^① 参见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254～25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PDF
PDG

民革命。因此，他决定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联合各革命阶层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从广州回到上海后，马林建议陈独秀召开中央局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虽然马林的本意是通过国共合作将中国共产党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即“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这个提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

在陈独秀等人看来，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基本上丧失了革命性，其对内联络军阀，对外联络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一条单纯依赖于军事的道路。而且，国民党号称有 30 万党员，但已毫无生气，更无严密的组织纪律，所以，这个政党不是可以联合的对象。

陈独秀等人拒绝了马林的建议。但考虑到马林可能会向共产国际报告有关情况，1922 年 4 月 6 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反对马林提议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即：（1）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2）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3）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4）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5）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6）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

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①

尽管马林作出了许多努力，但未能说服陈独秀等几位党的领导人。这使马林大为失望。

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寻求支持去了。

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平等合作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主持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同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对国共合作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关注。

会议之后，张国焘等人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列宁对国共合作的关心，引起了陈独秀极大的震动。

4月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来到广州，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两个大会，陈独秀召开了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各地负责人和广州部分党员共20余人。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来华的达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共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31～3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讨论了党对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同时也讨论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

在会上，达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根据远东会议的精神，谈了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向陈独秀等人建议，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加入国民党，但条件是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

就这样，一开始就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作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共产国际、列宁、马林、达林一步步拉回到现实中来。陈独秀终于认识到：与资产阶级战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现在要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这样两条路：要么与孙中山国民党携起手来，共同进行民主革命；要么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共产党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经过痛苦的思考，陈独秀终于实现了由排斥国民党到决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标志，就是1922年6月17日由陈独秀起草，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当时流行的“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废督裁兵”等政治主张进行了批判，提出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奋斗目标共11条，其中包括：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等。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

设民主政治为止。”通过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对比，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宣布：中共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①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作为当前的行动目标。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认识到，不能将苏俄革命经验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中国的社会性质与俄国不同，中国革命也不能完全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进行，而应该另外探索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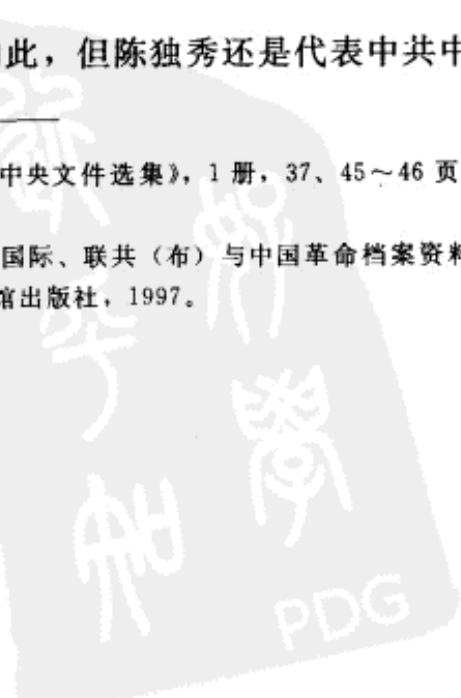
十分凑巧的是，就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印行的前一天，6月16日，早与孙中山有矛盾的陈炯明，在广州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命令军队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在卫士保护下化装脱险，在永丰舰上指挥军队与叛军对抗。

对于陈炯明与孙中山均有所了解的陈独秀，这时对孙、陈对抗的前景以及国共合作的前景，均深感担忧。6月30日，他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②

尽管如此，但陈独秀还是代表中共中央局与在上海的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37、45～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303～30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陈炯明已经背叛革命，中共立即与其断绝关系并公开对其进行声讨。陈独秀还将刚刚刊印成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送给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共同组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中共中央局的名义致函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支持孙中山。原来，谭平山这几个人由于长期同陈炯明的合作关系，对陈炯明的政治态度很是赞同，而对孙中山则多有指责。

谭平山等人未能认真对待中央的来信，仍未改变偏袒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态度。当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陈独秀提出质询。陈独秀感到颇为尴尬，他只得向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声明：中国共产党不会因孙中山暂时受挫而改变与其合作的政策，中共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言论和行动。为了表示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陈独秀提出：请孙中山先生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

7月初，中共中央局致函广东区委负责人，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错误态度，对陈公博、谭植棠二人提出严重警告，指出他们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对于区委书记谭平山，中央也给予了批评，警告他如果再优容放纵陈、谭二人，将受到同样的处分。不料，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央的指示仍然置若罔闻。后经中央讨论，决定撤销谭平山区委书记职务，调离广东；开除谭植棠党籍；给陈公博以严重警告处分。

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又同是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陈独秀之所以“挥泪斩马谡”，给他们那么严重的处分，就是为了消除孙中山等人的顾虑，以便尽快实现与国民党的联合。

1922年7月16日至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延续了中共一大的提法，宣布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根据最低纲领的要求，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同时鲜明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各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而只能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无产阶级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计划是：（1）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2）动员倾向于共产主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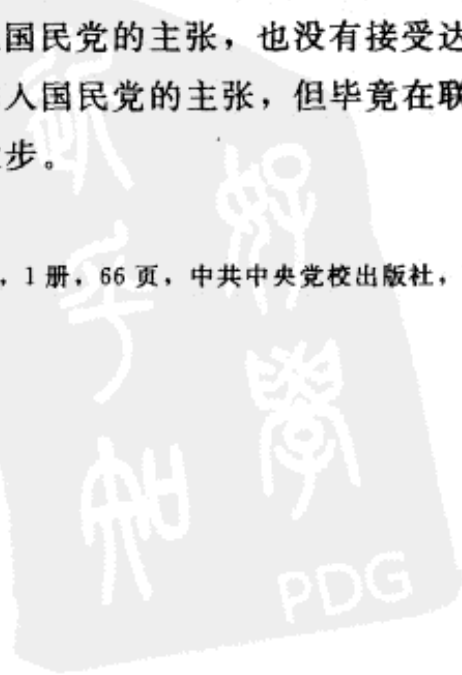
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成民主主义的左派联盟。(3) 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①

毫无疑问，陈独秀等人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设想，是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有关精神提出的，但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照抄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实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即：建立与国民党等进步政党、团体以及倾向于进步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建立工农商学妇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下层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思想既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精神，又不违背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为党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很明显，陈独秀等人所设想的与国民党等党派的合作方式，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方式，即“党外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选择的合作方式。

从中共一大拒绝与其他党派合作，到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这一飞跃的产生，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精神的吸收、理解有关，同马林、达林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共没有接受马林的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也没有接受达林的共产党以政党形式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毕竟在联合国民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议案》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意味着，从此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

其实，在中共二大确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之前，陈独秀就已经开始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了。会议通过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只是一个形式。

目前发现的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最早的一份工作报告，写于1922年6月30日。在这份报告里，陈独秀汇报了自中共一大以来党员发展、经费支出、政治宣传品的出版以及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并且提出了将来的工作计划。与这份报告同时寄出的，还有当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利金对中共的“褒”与“贬”

1922年5月20日，在收到陈独秀的报告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收到了利金提供的另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利金是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遣，于1921年10月动身来华的。他先后在上海、广州工作过。

利金在报告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进行的工作。他承认，中共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在组织方面，中央局建立和发展了一些青年团组织，仅在广州，团员就已达800多名。在出版和宣传方面，仅利金在上海逗留期间，中共中央局出版了大约16种翻译的小册子和两本由党员自己编写的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并就华盛顿会议、纪念李卜克内西、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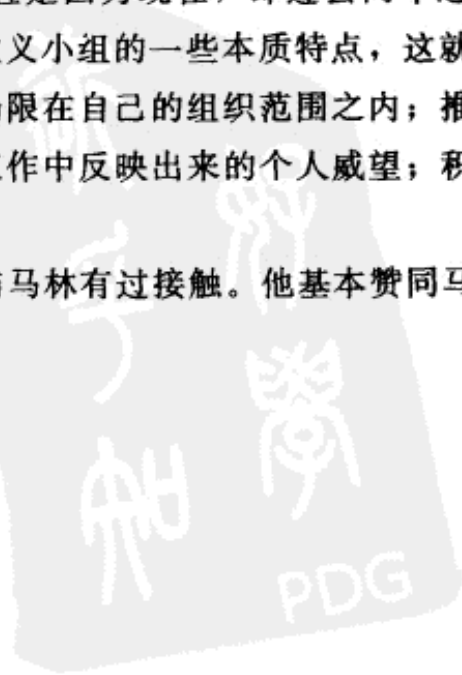
港罢工和反基督教运动等事件散发了成千上万的传单。这些还不包括各地党组织的出版宣传活动。另外，中共中央局还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其规模波及全国许多省市。

利金在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了评价，认为他们是“从事共产主义工作的支柱”。他还提出了今后在中国工作的重点。他写道：在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组成人员中，有许多同志，如李守常（即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李启汉等。他们不仅是忠诚的革命者，而且也是颇有影响的工作者。因此，归根到底必然承认，在中国，我们有从事共产主义工作的支柱，今后的工作应归为两个基本方面：必须使这些支柱同中国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以便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夺取工人群众；必须争取使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首领。

利金不同于马林，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然而，在谈到中共的不足时，他的腔调几乎与马林一模一样。

在利金的报告中，他始终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而是同马林一样，将已经成立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这并不是他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标准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不仅是因为这些组织的人数微不足道（所有小组成员总数不超过200人），而且是因为现在，即过去两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本质特点，这就是：脱离群众；试图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推崇小组个别成员在小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威望；积极活动能力较差。

利金在华期间，与马林有过接触。他基本赞同马林对国



共两党状况的看法。当利金从马林那里听说，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只有国民党同工人有联系后，便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没有联系。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其组成部分是清一色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通常都是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的。试图借助我们成立的工会来争夺对工人的影响的做法，并未收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在中国成立的工人局脱离群众。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在香港大罢工期间显得很突出，对于这次罢工，我们的小组不仅袖手旁观，而且也未能采取援助措施。据罢工期间正在广州的马林同志证明，当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一直未支持罢工。因此，需要指出，现在我们的组确实与中国工人运动格格不入，与其没有联系。

同马林一样，利金对于陈独秀等人在与国民党联合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豫态度，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脱离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没有联系。他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中央曾几次根据我们的主张作出关于在一些场合必须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但都未得到贯彻执行。^①

^① 利金报告的内容参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86～9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情况来看，利金在报告中所谈到的上述内容，显然有失真的地方。

来自马林的警告

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途经新加坡、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地，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

7月11日，马林写成了长逾万字的《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7月17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汇报了他的远东之行。

在谈到中国情况时，马林十分明显地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轻视和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赞扬。马林对中国共产党情况的介绍是轻描淡写的。他说：

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陈同志在广州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

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他于8月底来到上海，他在广州的教育工作经历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有些困难来自国民党

人方面。……因为共产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它同华南的国民运动没有保持联系。我们同这个小组经常保持紧密联系。尼柯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而且也未出现过困难。

马林也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出版宣传工作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情况，但极其简略。

至于孙中山国民党的情况，马林则用了很长时间作了一番十分详细的介绍。他汇报了与孙中山、陈炯明等人会谈的情况，以及他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国民党人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的作用。他说，孙中山与工人已经建立了长期联系，孙中山等人倾注全力争取对工人的影响，支持广州的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在广州有不同行业的工会组织，有工人夜校，教学计划中规定要讲授社会主义理论，等等。

马林在报告中还分析了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和纲领。他说：

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

1. 起主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这些领导人中有不少在日本或法国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孙中山也属于这一类，他曾亲自跟我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孙中山的3名助手组成的一个小组，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出版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月刊，只是在组织北伐以后，

这个月刊才停办。同我联系的军官中有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组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2. 华侨，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帮助工人政党改善经济状况，并希望党统一中国，建立秩序和安定，消除军阀混战的影响，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的这部分资产阶级侨居异乡，直到最近才在中国建立了资本主义企业。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个群体的需要。

3. 南军中的士兵。这些没有社会地位，处境恶劣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尽管将领们反对士兵加入政党。身为国民党员的年轻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就连孙中山本人，在到达桂林以后，也多次在集会上谈到国民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强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

4. 工人。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指导着罢工的全过程。罢工工人参加了这个党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资助都来自国民党方面。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同罢工海员完全没有联系，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罢工，因为那里的党认为只能进行秘密工作。国民党同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

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其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奉行的是以反对外来统治，主张民主，让国民的人格受到尊重，过上幸福生活为内容的三民主义。

毫无疑问，马林在报告中对国民党的介绍有一些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说，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他们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他在这里完全忽视了国民党内还存在着封建官僚和军阀分子等反动成分。

他说，孙中山国民党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并支持工人运动，国民党领袖的大多数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等等，这显然有夸大的成分。

他说，香港罢工完全是由国民党人组织和支持的，指责广州的共产党人对罢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在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中共广东支部对罢工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所有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参加了接待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他们走上街头，对群众演讲，向市民散发传单。同时，他们还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对返回广州的工人进行安置，做工人的坚强后盾。2月9日，在海员代表与香港当局谈判的关键时刻，党组织公开以“共产党广东支部”的名义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中共广东支部还利用宣讲员养成所作为海员罢工的联络通讯处，负责收转国内外“香港海员后援会”的捐款和信件。

马林在广州只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便对广东地方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妄下结论，这显然有失偏颇。更为严重的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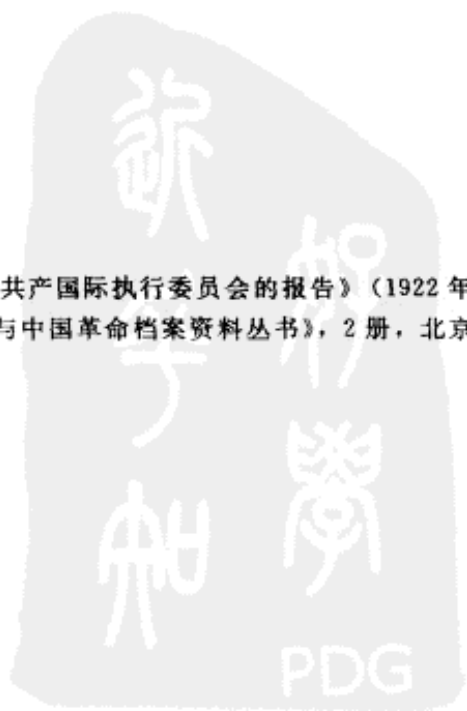
一结论不仅仅只停留在一个简单的结论上，而是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在报告的最后，马林建议“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同时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马林忧虑地谈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前景“暗淡”。马林还提议，应该将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到广州去，因为在那里可以公开活动。^①

马林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与会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说，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听到的一个最为详细的关于中国国共两党情况的报告。

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只能靠驻华代表的有关报告来决定对华政策。而其驻华代表的失真报告，则必然会误导决策人。就马林的报告而言，其中虽然不乏真实之处，但失真的成分也不少。可想而知，听了他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会对国共两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

^① 马林的报告内容参见《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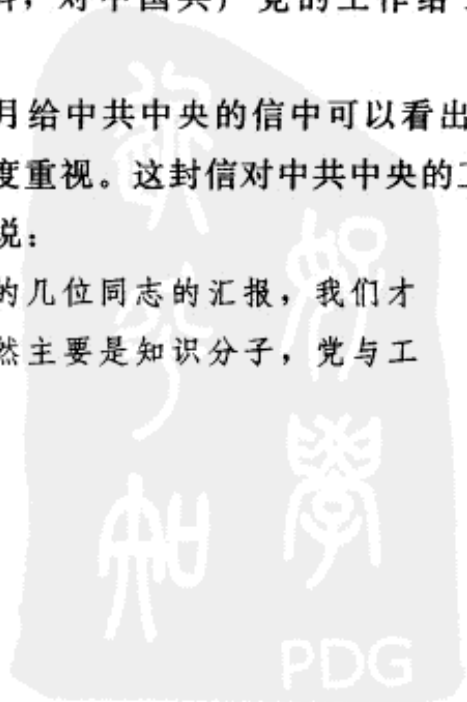
从“党外联合”到“党内合作”： 痛苦而无奈的选择

马林得到莫斯科支持

1922年7月，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面前的，有三份关于中国情况的材料：一份是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一份是利金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还有一份就是马林的报告。共产国际要根据这三份材料，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指导。

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当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出，利金和马林的报告受到了高度重视。这封信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流露出明显的不满。信中说：

据最近从中国回来的几位同志的汇报，我们才明白，你们党的成分依然主要是知识分子，党与工



人没有什么重要联系。

虽然也印刷了一些宣传品，但是向群众发表宣言口气不恳切，听不出有联系群众的意愿。工人的疾苦在这个宣传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在海员大罢工的日子里，你们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但是在广州，没有任何理由隐瞒我们组织的存在。我们能够谅解，党在中国华北是秘密工作的。但是，秘密工作绝不意味着可以持消极态度，让工人群众全然不知共产党的存在这回事。

信中训令中共中央：一方面，要通过对罢工的支持和参加示威游行，发表宣言、号召，让工人了解共产党，强调只有在党懂得如何建立工人组织的时候，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另一方面，要在反帝斗争中与民族革命的政党国民党“携手合作”，力争对迄今一直与民族运动有联系的有组织的工人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在妇女和青年中进行工作。^①

为了指导中共中央今后的工作，共产国际决定再派马林到中国来。马林虽然对此决定没有异议，但对中国共产党人能否接受他的领导还是担心的，其中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马林与陈独秀交往时间并不长，然而陈独秀独特的个性、倔强的脾气，他还是有所了解的。如果得不到陈独秀的支持，他到中国的使命就很难完成。

或许是马林将自己的难处讲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当马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311～31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林第二次启程来华前，共产国际决定让马林带给中共中央一个命令，以正式宣布马林有代表共产国际之权，要中共中央听从马林的指导。为了确保这个命令能让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他们还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办法：将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绸衬衣上。这个命令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浦^①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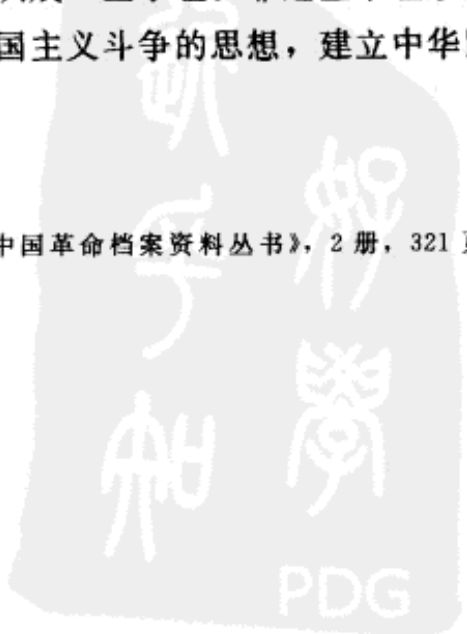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党内合作”一词，但要求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则说明他们是支持马林的。至此，马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他已取得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

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马林于8月初再次来到上海。

当然，使马林对促成国共合作感到胸有成竹的，不仅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命令，他随身还携带着一份十分重要的秘密文件，这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即命令中所说的“7月18日决定”。这个指令规范了国际代表在中国的全部活动，其中马林最感兴趣的内容是：“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靠这些小组形成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建立中华民

^① 即马林。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32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国和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①

马林到达上海后，便吃惊地发现，在他离开中国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共的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共已经以北京为中心，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了起来；在上海的共产党人也与工人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一切迹象表明，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正在逐渐加强。

然而，当马林看到中共二大的文件后，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等人所设想的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计划，即“党外合作”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左”倾幼稚的表现。因为，共产党力量太弱小，根本没有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的条件。

马林向陈独秀出示了打印在他衬衣上的共产国际的命令，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要求陈独秀马上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

根据马林的提议，陈独秀约集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高君宇，准备到杭州西湖去开会。

出发去杭州之前，马林会见了因陈炯明叛变而逃亡到上海的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在上海的代表张继，与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可能就是在这几会谈中，双方敲定以“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

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32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国民党问题。

马林虽然持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但他起初并不准备以势压人，而是试图说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他向与会者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五个理由：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人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①

马林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响。陈独秀后来回忆当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册，241～24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时的情景时说：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即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就否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如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只能引起两党间的矛盾，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

张国焘和蔡和森更是强烈反对马林的提议。

马林见说服不了与会者，便祭出共产国际的大旗，问陈独秀等人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陈独秀知道，中共二大刚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而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作为其支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既然“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只有服从之。于是，他对马林说：“如果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表示服从。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孙中山，并且，孙中山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可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

见陈独秀的态度有所改变，李大钊也表示：虽然大家主张“党外合作”有一定的道理，但党成立后活动余地狭窄也是事实。如果参加到国民党内，既实现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要求，又能为党的活动找到更加宽阔的领域。所以，有条件的加入还是可行的。^①

^① 关于西湖会议的情况，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35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张国焘：《我的回忆》，1册，242～243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就这样，与会者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西湖会议的决议虽然没有形成文字材料，但事实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决议，从此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陈独秀在莫斯科挨批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与李大钊、马林等人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他们正式向孙中山提出：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党内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孙中山欣然同意。

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跨党党员。

与一年前相比，此时的陈独秀由于受马林的影响，对国民党的认识已有了重大变化。一年前，他认为国民党是争权夺利的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决无与国民党合作的余地。而现在他提出，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它的党纲所要求的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在国民党员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①有了这样的认识，陈独秀对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就多了几分热心。

在马林和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孙中山于1922年9月

^① 参见只眼：《国民党是什么》（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210页，三联书店，1984。“只眼”是陈独秀的笔名。

4日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员会议，讨论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被邀请参加会议。9月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

陈独秀满腔热情地希望国民党通过改组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所以，他很快地向改组委员会提交了由他起草的国民党纲领和组织机构草案，他的草案的宗旨是让国民党彻底改头换面。

然而，陈独秀没有料到，他的行动引起了改组委员会中一些国民党人的怀疑。他们认为，陈独秀等人加入国民党是别有用心的，而陈独秀提交的草案，显然是要把国民党一向所坚持的原则全部抛弃。于是，他们将陈独秀的草案搁置一边，另外搞了一个草案，其内容与陈独秀的期望相去甚远。为了征得孙中山的支持，陈独秀将自己的草案交给了孙中山，但从孙中山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这是在改组委员会内发生的事。

在改组委员会之外，国民党人则发表文章，对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行动表示了忧虑和担心，其中陈独秀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国民党人放言说，陈独秀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受了陈炯明的指使，其目的是来破坏国民党的。还有人则担心，陈独秀参加国民党后，会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于是，一场小小的反陈运动在上海兴起。

陈独秀没有想到，与国民党的合作才刚刚起步就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但他还是抱着精诚合作的态度和希望。为了冰释误会，陈独秀等人与在上海的国民党人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陈独秀驳斥了对他的污蔑，并解释了共产党的策略。

对于陈独秀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马林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年10月，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告中，汇报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以及陈独秀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认为，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改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在报告中写道：在国民党问题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改组，加强政治宣传。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国民党直到现在仍未认识到深入民众的必要性。陈独秀抱怨自己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为国民党内正缺少一个有威信的人来实现这场极其必要的巨大变革。我想在这儿提一下，陈独秀越快回来越好。李大钊是联合孙中山和吴佩孚的最佳人选，而领导我们的同志开展政治宣传，则非陈独秀莫属。^①

陈独秀对改组国民党是积极的。但从中共的整个工作来看，国共合作虽然被提上双方的议事日程，但除了几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合作并没有进一步展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国民党方面。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虽然接纳了陈独秀等人入党，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国共合作的开始，而认为这是吸收青年人加入国民党，与以前接纳新的成员没有多大区别。再则，他此时关注的重点不在国共合作，而是另外两件重要的事情上：一是如何打败陈炯明，一是如何争取到苏俄的援助。此时他正在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书信往来，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苏俄对广州的援助问题进行商谈。

^① 参见《马林就1922年9月2日至10月13日工作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告》（1922年10月13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33。

陈独秀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前提，是必须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现在，由于孙中山对改组国民党并不十分热心，陈独秀便担心在中共内部积极推进国共合作步伐是否有积极意义。由于有这种忧虑，所以尽管西湖会议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但中共中央并没有明令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除了北京等少数地区的同志开始帮助国民党改组外，大多数地区的党员仍在观望等待。

国共合作无法向前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最热心于这项工作的马林，被越飞拉进了他的外交事务之中。马林不仅充当了越飞与孙中山之间的信使，而且还受越飞委托，专程到奉天会见了张作霖。从这一时期马林的来往电信中可以看出，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越飞所指派的工作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国共合作问题。为了尽快实现苏俄援助孙中山的计划，马林还与越飞共同起草了《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越飞和斯内夫利特的提纲》，并且亲自带着这个提纲返回莫斯科，以便将提纲尽快呈交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讨论。

在这个提纲里，他们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绝对不能单纯进行共产国际的工作，因为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尚未到达这种地步，单纯进行党的工作是不适宜的，必须把它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他们提议，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所以，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① 提纲的主旨是要求苏俄，包括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04～40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给予援助。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不了解，对孙中山的态度不了解，甚至对马林充当苏俄外交工具一事也不了解。他们只是看到自1922年秋以来，国共合作的工作没有明显进展，便迁怒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这一点，陈独秀是在这年冬天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才知晓的。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由于路途曲折，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王俊在大会召开后的第4天，即11月8日才到达莫斯科。这是陈独秀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在此之前，尽管他曾有过来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商讨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打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不懂俄语的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遇到的最大问题自然是语言障碍。本来，他应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但由于不通俄语，只好换了另一个代表刘仁静。不过可以肯定，刘仁静的报告是按照陈独秀的意见起草的。

报告在介绍国民党情况时指出：国民党多年来一直醉心于通过武力征服各省，以便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它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它企图单纯通过武力达到目的。但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武力统一中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为了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组织群众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切不可单纯依靠武力。

报告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说：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其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以达到

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群众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①

这个报告代表了陈独秀当时对国共合作的理解，说明陈独秀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已经从思想上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形式，并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和工人运动。

然而，令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在发言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以教训的口吻说：

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

^① 刘仁静的报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350～35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①

拉狄克辟头盖脸的一顿教训，使陈独秀十分难堪。诚然，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但它绝不是如拉狄克所批评的那样，不懂得与工人群众相结合。依照陈独秀的脾气，他是应该对拉狄克的话进行反驳的，然而，客观情况却无法使他如愿。这对陈独秀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也许，这正是陈独秀在有生之年几乎不提他这次莫斯科之行的主要原因吧！

受到批评的陈独秀，要向拉狄克以及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表明，他不是一个小学生，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个毫无作为的政党。所以，在参加会议之余，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包括“政治问题”、“劳动运动”、“农民问题”三部分内容，其中既有陈独秀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也有比较具体的计划。这一文件被译成英、俄两种文字，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陈独秀将“政治问题”分为六个方面。从其内容可以看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出，在中国的政治和政党问题上，陈独秀在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共产国际的要求，并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但他并不是一味地盲从，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认识和计划。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目前斗争的目标，是消除中华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问题的态度是：

尽管国民党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惟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为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

可以看出，陈独秀已经领会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但他在强调合作的同时，也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要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去进行工作，二是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两点在后来都没能完全做到。

“政治问题”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蒙古问题。当时，

中苏建交谈判正在进行，其中双方争议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中东铁路的归属问题，另一个就是外蒙独立问题。由于苏俄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独立问题上追求私利，双方的谈判多次陷入僵局。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中，对外蒙古问题表示了以下态度：

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取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主之客观的可能。^①

陈独秀对于外蒙问题的态度，显然是迎合了苏俄外交的利益。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者，陈独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番表示，这其中可能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从客观原因来看，置身于莫斯科的陈独秀，不能不对外蒙古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又不能提出与苏俄意向相悖的观点来，所以，只能牵强地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方面追寻外蒙独立的根据。从主观原因来看，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陈独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121～1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秀在感情上是同情社会主义的国家苏俄的。这使得他将意识形态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对外蒙独立表示了赞同的态度。陈独秀是如此，当时众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何尝不是如此？

陈独秀在“劳动运动”和“农民问题”两个部分中，分别提出了几点具体行动计划。从内容可以看出，“劳动运动”的计划基本上是可行的，如组织铁路工人运动、统一全国工会组织等。而“农民问题”的几点计划，则不是一个在野党所能进行的，如“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改良水利”等。

大会期间，陈独秀还参加了《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的起草工作。

国际命令：“党内合作”

自从马林向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内部就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维经斯基、萨法罗夫^①等人为首的负责远东事务的一批人，不同意马林的“党内合作”主张，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人运动，以加速将共产党发展成群众性的政党。

或许是同陈独秀有过密切的交往，或许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是他培养之下形成的，总之，维经斯基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感情。与马林相比，维经斯基更侧重于共产党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扩大，他对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和马林

^① 萨法罗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主席团委员、东方部部长。

的压力而不得不走“党内合作”这条路甚为同情。

1922年8月，当共产国际根据利金和马林的报告，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时，维经斯基却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充满感情和鼓励的信。他在信中说：“总的来说，你们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不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还是在组织问题上，你们都贴近中国年轻无产阶级的需要，这表明，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你们发表的宣言^①和告国内民主人士书，我们认为是很成功的。我们认为，你们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民主统一战线思想。”

维经斯基在信中语重心长地鼓励陈独秀等人，要他们一面正确地参与政治斗争，一面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组织。至于国共合作问题，他指出：“你们还是应该根据条约原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你们要通过与该党领导人一起开会和直接向出身于劳动群众的该党普通党员发出呼吁的办法，打破该党领导人坚持不与你们达成协议的顽固态度。”

针对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应将驻地迁往广州的决定，维经斯基在信中表示，中共不应立即迁去。他提醒中共中央，应该等到中国的政治局势明朗之后，尤其是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斗争所引起的南方政治局势明朗之后，再将中央驻地迁至广州。^②

^① 指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117～11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维经斯基此信的主旨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他对中共到国民党内去发展是有顾虑的，甚至是有抵触情绪的。因为在他看来，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并不一定会达到马林和共产国际所期望的目的。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内，同情维经斯基这一看法的人并不在少数。于是，这些人在共产国际四大上起草了一个决议，作为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的补充决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①

与在同一时期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完全不同，这个决议通篇只谈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工作，没有一处提到“国共合作”问题。不仅如此，它对孙中山的评价也不高。请看这个决议的关键内容：

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这些集团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在为政权而相互争斗，都与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保持联系，并企图利用它们，实际上，常常屈从于它们的反动影响。如果说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引起中国所有民族革命分子对他的敌视，那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昔日南方民主政府的首脑——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

^①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虽在前些年已被人译成英文发表过，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才从俄罗斯解密的档案中看到它。

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还应该记住，吴佩孚同美国帝国主义也有联系，对他的任何支持也就是对在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行同惟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独立自主政策而斗争，应该在这些集团的相互角逐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在缺少这种保证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坚决反对军阀集团的任何军事主张，以一支能够联合民主主义因素的力量姿态开展活动，而民主主义因素的成长可以保证不是通过一个军阀集团战胜其他军阀集团，而是靠下层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他们应该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激情，从中挑选最宝贵的坚定的革命分子，用来组织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①

显然，这个决议的主旨是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发展自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161～16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己的阶级力量。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不久，马林与12月23日回到莫斯科。也就是说，马林未能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或许正因为如此，上述由维经斯基等人提出的决议才得以通过。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很快就发现一种不利于他的气氛：在他离开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内部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人已经占了上风。而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决议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要求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申明自己的观点。

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马林汇报了他从7月底离开莫斯科后在中国工作的情况。他在发言的开头即强调：他在几个月前离开莫斯科时，带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同时主动进行独立的工人运动。那么，他是怎样在中国落实这项工作的呢？他汇报说：

“我们着手召开我们团体的中央扩大会议^①，会上讨论了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

“主要问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个运动的特点是它的领袖们不得不诉诸工人；中国的资产阶级至今还在物质上支持这个运动，它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其大部分是生活在印度洋群岛的各个殖民地。

“因此，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组织内进行工作，有可能进行自己的宣传。此外，近年来的经验表明，国民党的领袖

^① 指西湖会议。

们早晚会意识到必须支持罢工运动。

“在我们同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央讨论了进行自己的宣传工作的可能性之后，我们的中央表示赞成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

“在我们党内，关于加入孙逸仙党的决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被通过。依我看，从那时起不仅我们共产主义团体的工作条件有了改善，而且实践表明，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的力量得到最好的发展。”

马林还告诉与会者，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已经同国民党领导建立了新的友好关系，他们在自己的刊物上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反对孙中山与张作霖之间的联系，都没有引起国民党的反感。

马林在这里显然是隐瞒了一些实情，比如，他说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在中共内部“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这肯定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说孙中山等人不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也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事。不久以后，正是马林自己承认，孙中山反对对国民党的批评。这是后话。

马林在会上之所以隐瞒实情，以使人信服他的“党内合作”政策在中国得到了顺利实行，其目的在于批评维经斯基等对国共合作持消极态度的人。果然，他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道：“那些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有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我认为，这个团体完全有理由说，共产主义团体的活

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

马林的汇报显然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重视。为了能够正确地作出决策，会议当即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委员会，将两方面意见的人都吸收进去。经过讨论，最后由科拉罗夫、布哈林、马林、维经斯基、麦克马努斯、艾伯莱因、沙茨金和一名工会国际代表共同组成一个“中国委员会”。^①

会后，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在共产国际内部再次展开争论。布哈林根据争论的结果，起草了一个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的提纲。提纲坚持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意见，同时也强调共产党要发展工人运动，在与国民党联合行动时要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

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布哈林起草的提纲。马林在会上极力强调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坚决反对共产国际改变已经决定的政策。他认为，共产党除了与国民党合作外，没有别的出路。马林还当场宣读了布哈林起草的提纲。他对提纲的内容表示赞同。

与马林相反，维经斯基并不完全同意提纲的内容。他强调说，在提纲中应该着重指出三点：第一，必须要求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第二，共产党应该注重自己独立的工作，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开展工会工作；第三，共产党应该利用各团体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

继维经斯基的意见得到了另一位与会者许勒尔的支持。许勒尔认为，维经斯基的修正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采

^① 会议的内容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179～18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纳吸收。

布哈林也认为，在保持“最重要的”任务是民族革命的同时，应接受维经斯基的意见，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他们“特殊重要的”任务是将自己发展成工人阶级的政党。当马林提出应该去掉“特殊重要的”这个词时，布哈林拒绝接受。

会议最后根据布哈林的提议，决定以布哈林起草的决议草案为基础，由马林和维经斯基共同对草案进行修改。^①

让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共同对草案进行修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明智的决定！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由布哈林起草、经马林和维经斯基共同修改过的决议，这就是在国共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

^① 会议的内容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188～19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舟
舟
PDG

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①

从《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矛盾双方互相调和的产物。一方面，它强调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提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特殊的工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前提，是国民党必须实行正确的政策，即使如此，也不能与其合并。它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如果国民党实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36～43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行错误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不应当支持它。

至此，经过马林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讨论、维经斯基修改的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策略正式形成。在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它成为共产国际指导国共合作的原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准则。无论共产党人对这一合作方式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只能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

争论迭起

共产国际四大闭幕后，陈独秀启程回国，于1923年1月10日抵达北京。陈独秀在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驻地引起了法租界的注意。为了避免可能遇到的危险，中共中央遂将驻地迁到北京。

从1922年8月起，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即与孙中山进行密切联系。在陈独秀抵达北京后不久，1923年1月17日，越飞即南下上海，与孙中山进行面对面的接触。1月26日，双方在数次会谈的基础上，用英文发表了会谈纪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联盟的实现。

长期以来，国内许多研究者一直对《宣言》津津乐道，认为它体现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它意味着孙中山思想的进步和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实际上，这个宣言是双方互相利用的实用主义的产物。

在苏俄方面，从短期利益看，是为了得到孙中山在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对其私利的支持；从长远利益看，是为了将孙中山国民党培养成亲苏势力，使这一势力控制中国政权，从而使中国未来的政府成为亲苏的政府。为此，越飞认

可了孙中山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宣言》的第一条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在孙中山方面，从短期利益看，是为了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以尽快消灭陈炯明，夺回广州政权；从长远利益看，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打败吴佩孚，实现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为此，孙中山不惜接受越飞的条件，承认中东路“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状”，认为“苏俄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①

《宣言》中流露出来的对已经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的藐视，既是莫斯科方面轻视中国共产党的自然反映，也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唯我独尊的心理表白。从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时起，孙中山始终不同意两党进行平等的合作。他瞧不起年轻的共产党，认为它只是一些先进青年的团体组织，他们要革命，就只能加入他的国民党。所以，他的政策不是“联共”，而是“容共”。

或许是苏俄领导人意识到《宣言》第一条的内容有悖于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有伤害中国共产党人感情之可能，所以《宣言》在《真理报》发表时，删去了这部分内容。

苏俄与孙中山结盟后，促使国共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就成为共产国际、俄共（布）及其驻华代表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时发生的一场大屠杀，则使完成这一任务变得容易了许多。因为，通过这场大屠杀，基本改变了陈独秀等人对“党

^① 关于《宣言》的内容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09～4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内合作”的抵触情绪。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会议遭到军警的阻挠和破坏，造成重大冲突。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在总工会领导下，举行全线总罢工。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2万多名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52人惨死、300多人受伤、400多人被捕的惨案。

二七惨案的发生，使陈独秀等人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是悲观地等待时机的重新来临，还是积极创造条件，寻找再度发展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一段痛苦的思索。透过血雾，他们看清了：反动统治阶级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在反动势力非常强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孤身奋斗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只有同一切革命的阶级组成统一战线，才能打倒强大的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除少数一些人仍然反对加入国民党外，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于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基本采取了认同的态度。

二七惨案以后，北方形势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机关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只得再次迁往上海。2月20日，陈独秀回到了上海。

在共产党受到打击的同时，孙中山的处境却在逐渐好转。1923年1月，支持孙中山的军队打败了陈炯明，使孙中山得以重新回到广州。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自任大元帅。

急于使自己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在中国开花结果的马林，此时非常迫切地希望国共尽快实现合作。他认为，孙中山在广州掌握政权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国共合作完全可

以迅速进行。于是，他从上海致电维经斯基^①，提出尽快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到广州。因为只有到了广州，陈独秀等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与马林的想法不同，维经斯基则认为，现在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是不妥当的。不过，维经斯基知道，马林现在虽然属于他领导，但由于两人在中国问题上意见相左，如果由他出面反对中共中央迁往广州，可能会使两人的关系搞僵，对今后工作不利。于是，他便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出面干预。

3月8日，维经斯基致信萨法罗夫，讲了他反对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的理由。他写道：

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

^① 共产国际四大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23年1月10日决定成立共产国际远东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即海参崴局，负责领导中国、日本、朝鲜的工作。维经斯基任局长，其成员有马林、片山潜。

持。然而，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可以丢掉一些东西的条件了，他的声望在工人群众的眼里是完全清白的。当然，应当利用在南方合法工作的机会，但不应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搬到那里，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那里去。为了使党能够利用真正的批评自由，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在广州孙逸仙的鼻子底下，至少应在上海的某个地方。

维经斯基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也不赞成。他指出，二七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没有利用这次事件进行政治宣传，没有吸引广大劳动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的斗争，因为，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只注重军事上的成功。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更不能支持他与张作霖的军事联盟。^①

3月27日，维经斯基又致电萨法罗夫，要他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中山提出以下进行合作的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②

在维经斯基的一再提醒下，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下达指示时，基本上采纳了维经斯基起草的指示内容。这个指示共13条，其中

^{①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228～229、23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和实行土地革命。

第二，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就是它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

第三，共产党要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在国民党内部要极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要不断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①

当马林得知，维经斯基等人仍然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希望将共产党发展成群众性政党时，便嘲笑他们是想入非非。然而，马林也明白，自己在东方部基本上是孤立的，包括领导人萨法罗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倾向于维经斯基的。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想法、苦恼和对维经斯基的抱怨倾诉给他的老朋友、荷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夫斯坦。2月16日，马林给拉夫斯坦写信说：

某些人想入非非，认定一个“群众性的党”必然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这样一来，独立于国民党的政策就成了最理想的政策。特别是“莫霍瓦亚的远东”^②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586～5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指位于莫霍瓦亚大街上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

炮制了这种梦想——这样一种先验图式很难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今后许多年内都只能是一种幻想，而独立于现存的尚待改进的国民党之外的想法则使所谓的共产党人干脆孤立并陷入宗派主义。就是这个伍廷康^①认为必须建立群众性的党。^②

隔了一个多月，马林又给拉夫斯坦写信，再次表示了对维经斯基的不满。他写道：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远东局发现，从一个大约有 250 名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独立的政治运动中，可以孕育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这就要求修正 4 个月前制定的共产党人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政策。……我坚决反对改变政策。如果在要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注意，这是马林一向对中国共产党的藐称——引者）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我们当然希望遵照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但是，有的人轻率地提出意见，这很容易引出荒谬的结论。^③

① 即吴廷康，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化名。

②③ 《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 年 2 月 26 日于上海）。《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31、146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923年春夏之间，就在马林与维经斯基为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也因此事发生了不小的矛盾。

从1922年春马林提出国共合作，到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整整一年时间，共产国际在一步步地推动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之路。作为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只能接受共产国际的命令。

为了向全党解释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必要性，统一全党思想，同时也为了从理论上搞清共产党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合作，陈独秀进行了长时间的苦苦思索。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抗拒的。而现时的中国，“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应该得到资产阶级的援助，否则“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所以，国民党如果排斥资产阶级，则是“左”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应该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争取中立的中小资产阶级，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不过，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微弱，尚不足以打倒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要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就无产阶级而言，只有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

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根据以上分析，陈独秀提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①

陈独秀的文章透露出，他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认识还有缺陷，如他提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

不过，总体上看，这篇文章代表了陈独秀当时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关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他在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从经济基础出发，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非革命的”三类，并对它们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初步分析。从对资产阶级各部分的分析出发，陈独秀论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遗憾的是，陈独秀当时只是机械地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并且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看成是任何一个国家必经的阶段。因此他认为，中国必须经过一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参加这个革命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权力，这个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步奋斗，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他没有认识到，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参加者，而且还可能成为领导者。他也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无产阶级的参加，可能改变其运行的轨迹。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579～58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以，他提出应该由国民党来“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

陈独秀的文章既向共产党人也向国民党人指出了两党实行联合的必要性，试图打消人们当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疑虑。从这一点来看，陈独秀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的诠释。

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像陈独秀这样，能够理解或者强迫自己去理解共产国际指示的深刻含义。陈独秀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自己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之后，便开始在党内进行工作，找对实行“党内合作”仍有异议的党员谈话，力图尽快扫除一切思想障碍，保证与国民党合作的顺利进行。但他的努力并非总是有效。

李达是与陈独秀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对于国共“党内合作”，他是持反对意见的。为了说服李达改变态度，陈独秀多次找他谈话。不料，陈独秀非但没能达到目的，反而因态度不当引起了李达的反感。

一次，陈独秀再次找李达谈话时，李达表示：“共产党与国民党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的政党，各自的奋斗目标不同，怎么可能联合起来？即使现在联合起来了，将来也势必会有分手的一天。与其这样，还不如搞个党外合作，或者共产党可以选一些政治上强有力的人加入国民党工作，而不要号召全体党员都加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陈独秀听罢大发雷霆，摔了手里的茶碗，还拍了桌子，并怒气冲冲地指着李达说：“这是共产国际的主张，也是党的主张！你要违反党的主张，我就有权开除你！”

李达与陈独秀打交道时间长了，知道陈独秀的脾气。但李达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本不想发火，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便倔强地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说完，他就起身朝外走去。当走到门口时，他回过头来对着仍然气哼哼的陈独秀补了一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①

经过这场争吵之后，李达便消极起来，这年9月，李达脱离了共产党。^② 这场争吵反映出，当时党内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抵触情绪还是不小的，而陈独秀为落实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

陈独秀与马林联手

1923年3月，在马林催促下，陈独秀启程前往广州，

^① 参见王会悟：《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77~78页，人民出版社，1980。

^② 许多年后，李达在回忆起脱党时的思想动态时说：我当时脱离组织的动机，不外下列几点：一、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灭裂的草寇式的作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大会以前，他所发表的东西，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文章。他和张东荪论战的文章中，对于张东荪主张中国要有资本的话，作了如下的反驳，说：“蠢材，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见《新青年》第6期）。说这样话的人，配做共产党的领袖么？至于他在第二次大会以后所发表的东西，主要的是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代笔的，他自己并无主见，以蔡、张、彭等人的意见为意见，他只是领着所谓“老头子”的头衔而已。二、不满意于张国焘的阴谋诡诈的伎俩。三、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四、不愿意做国民党员。五、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它务。六、当时我患着肺病（直到四十岁才转好）。七、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八、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归纳起来，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厚，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组织的总原因。参见《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与孙中山建立联系。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到达广州，《向导》周报也移至广州编辑出版。这样一来，马林终于如愿以偿，将中共中央驻地迁到了广州。早在一年前，他就提出将中央驻地迁往广州的建议，然而由于维经斯基坚决反对，才拖延至今。尽管如此，马林还是很高兴的。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央驻地的改变问题，而是意味着他在与维经斯基的斗争中谁胜谁负的问题。

与马林的好心情不同，陈独秀到广州后却一直郁闷不乐。因为他发现，广州的形势并不像他事先想象的那样好。

从表面上看来，孙中山又夺取了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但事实上，当时的广州依然危机四伏。陈炯明虽被逐出广州，但实力犹存，并且对广州虎视眈眈。孙中山所依靠的各军，多是骄兵悍将，并无革命的决心，其将领多是反复无常、唯利是图之辈。靠这样的军队能统一全国吗？即便统一了全国，建立的政权会是工农政权吗？陈独秀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

为彻底击溃陈炯明余部，孙中山于5月间命滇军、桂军向叛军发起进攻，并多次亲赴前线督战。而滇军、桂军中流行的口号是：“有一分钱，打一分仗”。当时，广州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孙中山着急之余，只能气愤地指责滇军将领杨希闵：“你戴了国民党的帽子，却不服从党的命令！”

对于西南各省，孙中山原本是采取联合的态度，为此特推举唐继尧为大本营陆海军副元帅。不料唐继尧却对此职务不屑一顾，根本不去广州就职。不仅如此，他还下令枪杀了孙中山派回云南筹办党务的马骧、鄢世周等5人。结果，孙中山联合西南的企图失败，广州陷于孤立无援的

境地。

为了稳定政权，孙中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军事方面。对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再也无暇顾及。马林和陈独秀多次找到孙中山，与他谈改组国民党和开展政治宣传的必要性，然而孙中山总是说：“等解决了广东问题之后，我们就能着手进行了。”孙中山还流露出，他的目的不是在占领广东，而是准备向北洋军阀发起一次快速反击，他要坐飞机去北京，然后在那里建立一个“好政府”。

陈独秀深知，如果孙中山不放弃无休止的军事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而从目前孙中山的状况来看，要他放弃军事斗争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景甚为担忧。

一向对孙中山国民党极为推崇的马林，此时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对孙中山国民党的看法似乎过于乐观，甚至有点幼稚。因为马林发现，要说服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要孙中山放弃重视军事的偏向，认识政治宣传和联系工农群众的重要性，并非如他事前想象的那么容易。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30多人，除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山东、浙江等省的代表外，还有满洲和莫斯科的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然是出席会议的重要成员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

在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有一部分人对进行国共“党内合作”仍有顾虑。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会引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共产党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是为了国民党的发展，共产党究竟要与之合作到什么程

度；三是共产党可以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①他们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顾虑，提出如果共产国际的决定不可改变，那么至少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马林对与会代表进行了说服工作。对他的观点提出强烈反驳意见的，仍然是在西湖会议上与他唇枪舌剑的张国焘。在马林关于中共三大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张国焘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

“如果国民运动允许无产阶级存在，我们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参加国民革命。

“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

“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即使得不到英美的援助，也是如此。

“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

“如陈（独秀）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有140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党在北方工人中占有主导地位。农民至少有1600万，他们是消极的。他们反对战争，组织了自卫队。

^① 参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8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要注意农民。虽然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的精神力量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强大。

“至少小资产阶级，我们促使他们组织起来。”

“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

“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运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们就能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

“我们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李（大钊）教授在北京的工作证明把国民党老党员容纳在区党支部内是很困难的。”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①

马林对张国焘的发言给予了驳斥。他指责张国焘有“左”倾思想，是将党的策略建立在梦幻的基础上，是不切实际的。张国焘反唇相讥，攻击马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当互相争执不下时，马林就搬出了共产国际。张国焘回忆说：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241～24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①

当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陈独秀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他虽然对孙中山拖延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有意见，但仍然对共产党人未来在国民党内工作持乐观的态度。再则，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只能服从这一决定。于是，陈独秀明确表态：支持马林。

陈独秀的表态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张国焘等人认为，陈独秀是想与马林一道葬送共产党；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对陈独秀和马林的观点持赞成态度。

据蔡和森说，这次大会上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入国民党后，是否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而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以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也应保存党的独立。二是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马林以为职工运动都应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做，陈独秀等人也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而张国焘等人则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1册，291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以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①

经过激烈争论，马林和陈独秀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最后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这是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通过长期的思想斗争而形成的决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主要内容是：

(1) 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2)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3)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4)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5)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

^① 参见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中共党史报告选编》，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议决案还指出了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注意的事：（1）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提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议决案基本上反映了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在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强调了保持党的独立性原则。

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方式是勉强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国际纪律的约束。这一点也可从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得到证实。陈独秀在报告中说：“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

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①

这里，陈独秀用了“说服”和“劝说”两个词，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无奈情绪反映了出来。

马林自己也承认，自1922年8月以来，中国共产党是被迫去帮助国民党从事国民运动的。他透露，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是20票赞成、16票反对，仅以4票的优势得以通过的。马林把这个结果归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小组织至今仍多么不成熟”^②。

包惠僧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的原因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中共是服从第三国际的，地方是服从中央的，个人是服从组织的，第一次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是从上而下决定下来的，虽然有不少同志，对这一政策有不同的意见，经过了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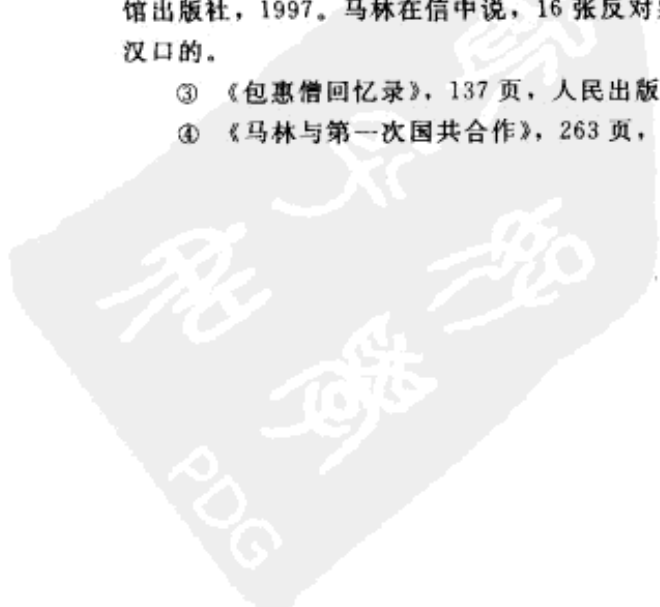
中共三大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关系，使马林如愿以偿。他深知，他在会上能够击败张国焘等人，会议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决议，都与陈独秀对他的支持分不开。会议结束的当天，马林怀着喜悦的心情给越飞和苏联驻华代表处参赞达夫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④

^①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全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16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参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81～48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马林在信中说，16张反对票中，有10张是湖南的，6张是汉口的。

^③ 《包惠僧回忆录》，137页，人民出版社，1983。

^④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26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被迫上了国民党的马车： 失望与希望并存

中共中央寄人篱下

在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有一封中共三大闭幕后不久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时间是1923年7月1日。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陈独秀向他的“上司”写的第一份最完整地表达他关于国共合作思想的报告。他在信中写道：

民族革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革命都是必要的。根据经济条件和中国的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懂得开展国民运动的必要。

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强烈反对中国军阀的统治，在这个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倾向。大部分工人还是老式手工业作坊中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尽管在这些工人中政治觉悟开始发展，但他们的要求充其量只是直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本组织的自由。如果我们想要同他们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就会害怕而离开我们。只有极少数人加入我们的党，即使这样也是通过友好关系。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人则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建立革命力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这只能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只能使工人离开我们，站到敌人的一边。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只会是非常严肃的、强有力的小团体。我们不能允许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敌人妥协并向右转。

中国国民党当然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党，因为在这个党里还存在着许多旧思想，但这个党已有多年历史；其中有许多革命人士。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做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不与他们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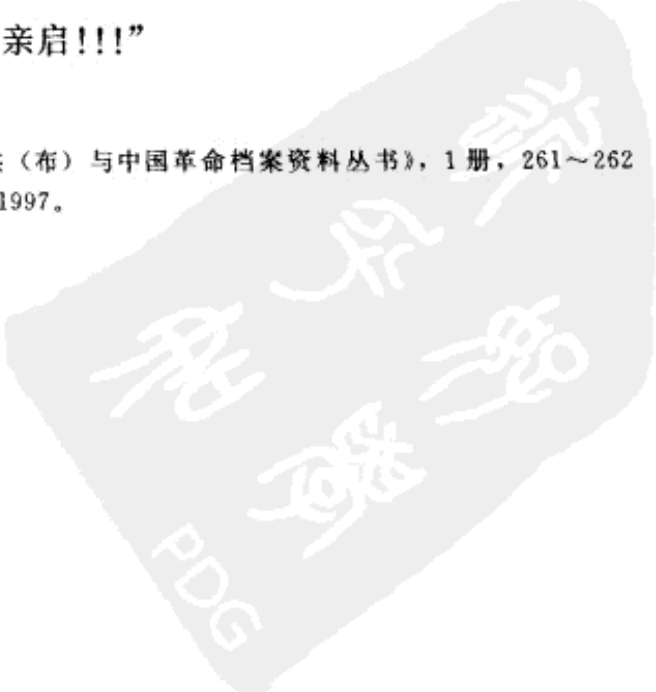
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在许多城市，恰恰是我们能够组织国民党的地方团体并把它们掌握在我们手里。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

只有在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阶级分化明朗后，我们共产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①

奇怪的是，陈独秀的信中还有这样两种话：“既然共产党第三次会议表示赞同这一主张，我希望您也同意这一点。我们将利用这一策略，对国民革命施加巨大的影响。”很显然，陈独秀是在以党的全体会议赞同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和他对这一合作充满乐观的态度，来奉劝和影响他的上司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并接受已经形成的现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愿望，还是受了马林的指使，不得而知。不过很明显的事实是，马林很清楚萨法罗夫与维经斯基的态度是一致的，陈独秀未必了解其中的内幕。如此看来，陈独秀在信中特意写上这句话，或许是奉了马林的旨意。

中共三大后，马林特意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汇报有关情况。并在正文前特意表明：“复印件交萨法罗夫亲启!!!”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261～26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马林在信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并不乐观。信的一开始他即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告结束。事实证明，党现有党员 420 名，其中工人 160 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 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 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 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4. 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党是个早产儿（1920 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陈独秀同志致闭幕词时就已经指出，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

马林将中国共产党称为“早产儿”，说它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显然是在攻击维经斯基。因为，正是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

马林在信中汇报了中共三大上的争论。他说：“同志们认为陈独秀和我想葬送党，这种看法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人轻率地把幻想当成现实。经过激烈争论，这个观点被彻底否定了。”马林认为，中共三大实现了共产国际的要求，他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绝对不要改变从 1922 年 8 月以来在中国所遵循的方针。他写道：如果没有国民党，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好的、所有立志于革命斗争的人都可以加入的国民党。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始终发挥某种作用的国民党。为了它的现代化，我们的同志必须在国民党内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能尽快地从工、农、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国民革命运动。到

4

被迫上了国民党的马车：失望与希望并存

那时，我们就可以防止把俄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上。^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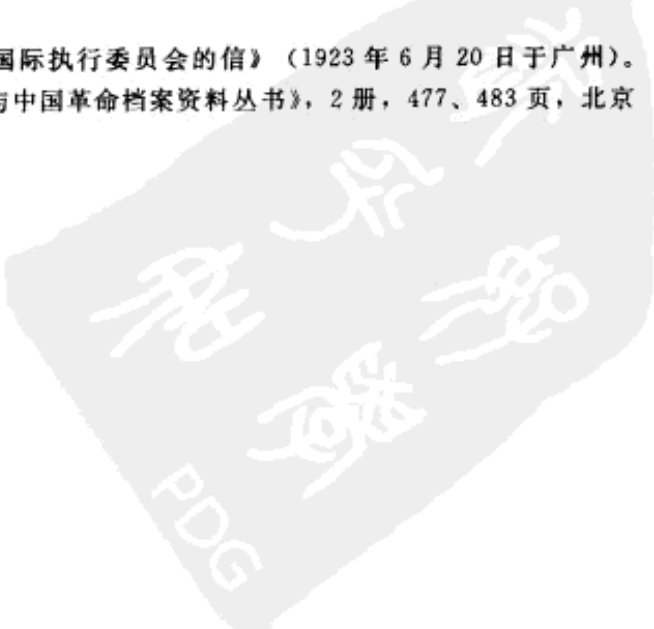
中共三大闭幕后，与会代表们陆续返回工作岗位。新一届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则同马林一起留在广州，准备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具体商议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在他们看来，既然国共两党都同意了“党内合作”的方式，孙中山就应该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以便早日实现国共合作，使两党携起手来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

马林自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设想时起，就始终强调两点：一是共产党人必须加入国民党；一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改造国民党、批评国民党错误的权利。陈独秀等人到广州后，对孙中山国民党的缺点和不足看得更加真切，这更坚定了他们的这样一种想法：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批评孙中山国民党的错误，期望国民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为了帮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改正其固有的缺点，陈独秀等人坚决地拿起了批评的武器。从1923年5月起，他们在《向导》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对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注重军事行动而忽视宣传和组织工农的缺点，进行了批评。

陈独秀在《向导》第21期以《怎样打倒军阀》为题，批评孙中山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忽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只注重联络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政策。他提醒孙中山，要求得国家统一，国民党应做到以下几点：必须做

^①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77、48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必须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必须做民主革命势力集中的运动；必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主要部分。在陈独秀的带动下，其他共产党人也对国民党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批评。

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批评是善意的，但有时也是尖锐的。张太雷以《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为题，批评国民党脱离劳动群众，而只知道与军人政客“交际”的错误。中共三大宣言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诫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去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于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①

根据马林的要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向他提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165～1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两点建议：第一，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第二，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方针，只能用新的手段，采取新方针，联合商、学、农、工广大群众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从人民中建立新的军队。

在马林的催促下，陈独秀等人于7月中旬又找到孙中山，要他改变只醉心于军事行动，而对政治漠然置之的态度。然而孙中山说：“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陈独秀向孙中山提议，国民党应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以将广大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孙中山却表示：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帮助国民运动的开展，但国民党不能介入，因为召开国民会议不可能是一场严肃的运动。同时党不能介入抵制日本的运动，只有党员个人可以这么做。因为也许以后党不得不与日本合作，以对抗英国和美国。^①

孙中山不仅对陈独秀等人的劝说不予重视，而且对共产党人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国民党甚为恼火。他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②

^① 参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7月1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28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35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一次，孙中山在与马林、廖仲恺等讨论其他问题时，突然想起了共产党人在报刊上批评国民党一事，他便将话锋一转，无不冲动地用英语大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马林见孙中山如此激动，便为陈独秀等人辩护。他告诉孙中山：陈独秀所写的文章虽然语言尖刻，但确实出于好意。他也以“孙铎”的化名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过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但这绝不含有恶意。至于说到援助问题，这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①

满怀失望离开广州

孙中山尽管对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很恼火，但顾虑到国共两党团结的大局，没有采取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极端措施。不过，在国共两党未正式合作之前，即出现如此不愉快的事，这对于满怀热情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他们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还是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满腔热情。从此，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少了，声音小了。为了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共产党人不得不放下了批评的武器。

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令马林甚为失望。他认为，如

^① 参见《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2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果孙中山不改组国民党，那么苏联援助国民党就是援助了军阀。基于这样的考虑，马林在7月18日写信给越飞和达夫谦，倾诉了自己和陈独秀等人的苦恼，同时提醒苏联对孙中山的援助应该慎重。他在信中说：“现在，我对他（指孙中山——引者）毫无办法。……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①

7月20日，马林又致信越飞和达夫谦，再次对孙中山表示了失望。他写道：“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在这里，他关心的惟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那些钱都白白扔掉了。事实上，只要孙中山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只要他不请共产党人工作，就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进行反帝宣传。”^②

此时，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马林，都感到在广州再也呆不下去了。一方面，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批评引起孙中山的反感。广州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放出风来，说陈独秀等人在广州不受欢迎，因为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分裂的事。另一方面，陈独秀和马林感到在广州根本无法进行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他们终于认识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

^{①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24、42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鉴于中共中央在广州的处境，为了决定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中共中央于7月19日晚召开了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与国民党决裂是违反共产国际决定的，但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不进行批评，也不符合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本意。所以，对国民党仍要进行批评，但要避免使用激烈言辞。会议决定，在孙中山国民党不重视宣传工作的情况下，只能由共产党人来承担国民党的宣传任务。鉴于进行工作在国民党内遇到阻力，同时鉴于争取孙中山放弃军事行动是白费力气，而且可能把国共两党关系搞僵，所以中共中央必须离开广州，重回上海。

曾对国民党充满信心的马林，此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当初对国民党的看法确实有失偏颇，因此他不仅同意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回上海，而且他自己也想尽快抽身而去。在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马林透露出了自己想法。他写道：“我们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对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驻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①

仔细读马林信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这是马林第一次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27～42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强烈要求俄方给中国共产党以资助。这表明，马林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显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7月下旬，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陆续离开广州，《向导》周报编辑部也再次迁回上海。

马林在即将离开广州的前夕，给廖仲恺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自己对国民党的意见和建议。他在信中回顾了初次接触国民党人时对他留下的良好印象，并说这是促使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之一。但现在他看到：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主义化。虽然党纲规定党应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动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参加国民运动，但实际上党只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他在信中痛心地说道：国民党难以控制某些地区，从这个事实上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组织体制上的缺陷和策略错误的不良后果。违犯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贪婪的军官将公共财产窃为己有；借贷政策把自然资料置于外国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苦力的遭遇有如奴隶；某些公民权被取消。在对列强的关系方面，革命的国民党人想靠外国的帮助和干预求得生存。利用北方的土匪提出不承认北方政府的要求，虽然同时南方土匪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对待南方的领导人。这样做产生的不良后果是，国民党今天的所作所为使其领导人的辉煌历史大为失色，也败坏了那些为主义而献身者的荣誉。

马林在信中告诫廖仲恺，不能一味地对孙中山采取妥协和服从的态度。他启发廖仲恺说：必须清除服从个人和朋友义气的旧观点。真正的革命者决不做违背革命信念的事情。友谊决不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友谊只应是平等相待的。如果明明看到事态正朝错误方向发展并常有违背党义之事发

生，却还去盲目追随，则肯定也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是为那些识时务的党员寻找第三种可能性的时候了。这就是拒绝履行那些违背党义的义务，担负起改组党的任务，进入政治宣传的领域。时机已经成熟，长期等待决非上策。

在信的结尾，马林断言：“关于党的策略，只有领导人相信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队将领（采取与他们在北方的武人相同的封建方式），就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那么，党的前途就肯定是暗淡的。新中国，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的诞生，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的现代化政党的不懈的革命斗争。”^①

马林回到上海后，于当年8月离开了中国。毫无疑问，他是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的。当初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抱着极大希望的马林，此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离开之后的变化当中。

1935年8月19日，一个名叫伊罗生^②的人拜访了马林，这使得马林再次回忆起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在回忆中，马林这样评价孙中山：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

马林还对由他一手促成的国共“党内合作”的结局表示了遗憾。但他把这个结局的产生归咎于别人。他说：

在我知道越飞要离开，加拉罕和鲍罗廷到来之前，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记

^① 马林给廖仲恺的信，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428～43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② 伊罗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政治教授，曾在中国工作过，任《中国论坛》主编，著有《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一书。

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时，我就离开了。在哈尔滨遇到了正来华的鲍罗廷。工作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航向。此后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尽管提供了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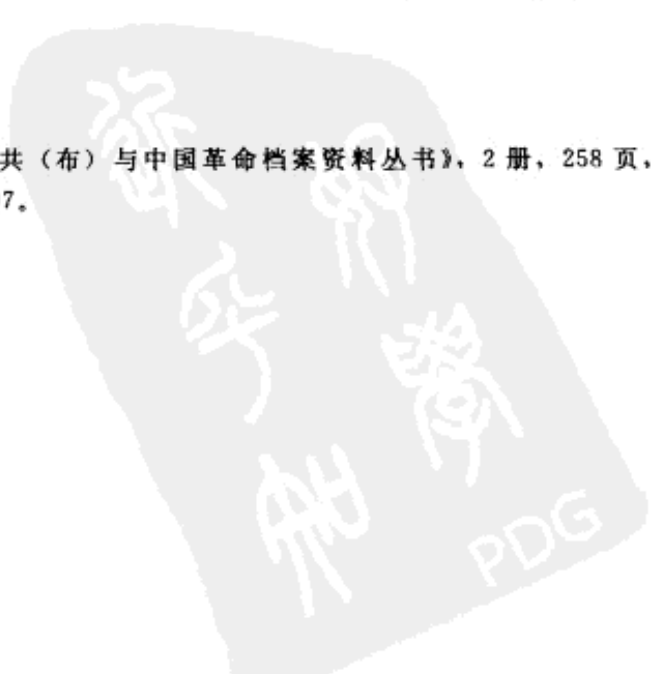
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业已证明对发展工人运动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下，为开展群众宣传所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①

马林在责备别人的时候，不知是否想到他自己正是“党内合作”的始作俑者。如果他不是在1923年8月离开中国，那么等待他的会是一个什么结局？难道会比鲍罗廷等人更好？！

陈独秀用心良苦

马林离开了中国，然而被他驱赶到与国民党“党内合作”道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得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中国共产党将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何方，不仅陈独秀有点茫然，就是来自莫斯科的人也未必清楚。当时正在北京工作的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斯列帕克，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十分忧虑。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25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斯列帕克曾在1922年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他与维经斯基一样，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感情，而对于马林的“党内合作”策略很是不满。他看到，北京的共产党人由于随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党的正常工作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出于对党负责的态度，他不愿再保持沉默了。1923年8月25日，斯列帕克提笔给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北京方面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近来在党内由此发生了重大的争吵。情况确实变得难以忍受。……党的路线变得摇摆不定、曲曲折折，因此工作也就没有成效。应当彻底消除党是为外交人民委员会部^①服务的观点。当霍多罗夫或马林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俄罗斯应当面向他们时，他们就把党拉向这方面，并竭尽一切努力使党纳入这一轨道，大家也都作了努力。后来，当实际生活抛弃了对吴佩孚的这些幻想时，党又采取了另一条路线。人们开始把党拴在孙逸仙的马车上，要把孙从他“可爱的”拥护者所设置的冒险泥潭中拖出来。

明天如果有人喜欢张作霖，并认为必须面向他，那么又是：伙计们，到那里去吧！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

^① 此处是指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会部。



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会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会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①

斯列帕克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被莫斯科方面作为外交工具来使用的。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此时却不这样看。他一心扑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上，并为改组国民党和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迟迟没有大的起色而焦虑。他分析了国共两党的现实情况，认为两党的合作不像起初设想的那样顺利，主要原因是：首先，一部分党员对于同国民党合作多少有些疑虑，担心与国民党合作后丧失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其次，国民党由于长期处于松散的状态，故而党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办事拖延，不敏决；再次，由于政治观念不同，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之间，存在着互相猜疑的现象；最后，中共中央没有足够的活动经费，不能满足党员开展工作的需要。^②

陈独秀在这里疏忽了另一个原因，这就是马林的离去。马林在回到上海不久，即于这年8月启程赴莫斯科，从而结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26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18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束了他的赴华使命。马林走后，一时间再也没有人在国共两党之间起“粘合”作用，尽管陈独秀等人对合作之事尚且热心，而孙中山方面却因忙于军事事务，无暇关心别的事情。

当国共两党的合作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时，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①从莫斯科到达广州。

鲍罗廷这次来中国，不是奉共产国际之命，而是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派，正式身份是苏联政府派给孙中山的政治顾问。

委派鲍罗廷以苏联政府代表的身份到广州，是斯大林的提议，后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俄罗斯秘密档案中，有一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委派鲍罗廷来华的决定。决定是由斯大林签署的，时间是1923年8月2日，其内容是：

（1）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星期四与加拉罕同志一起赴任。

（2）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3）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

^① 鲍罗廷，1884年生于俄国。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代表该党里加委员会出席于1905年12月在芬兰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和1906年4月至5月在瑞典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不久即被反动当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国。1908年定居美国芝加哥。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7月回国。1919年参与创立共产国际的工作，随后作为俄共（布）的工作人员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4) 责成鲍罗廷同志定期向莫斯科送交工作报告（尽可能每月一次）。^①

决定中的三个“责成”，明确规定了鲍罗廷在中国的行为准则和义务，是鲍罗廷在华工作期间不可逾越的三个框框。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责成”，指出鲍罗廷在中国工作的中心是扶助孙中山国民党，而不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看来，鲍罗廷到中国后许多令陈独秀和共产党人不解和愤怒的作为，大多都是囿于这个规定不得已而为之。

鲍罗廷果然身手不凡。他来华后，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以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很快就打动了孙中山，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其中有谭平山、李大钊两名共产党人。

陈独秀重新振奋起来了！他带领中共中央一班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之中。为了更加有力地指导各地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1月24日至25日召开了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议案》对今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即：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关于中共与国民党之关系，《决议案》指出：（1）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2）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能时，断不宜强行之。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265～26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 我们的同志倘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其经费受诸国民党者，应公开的支配，其账目只报告国民党；受诸本党者则对本党负责。

《决议案》还提出，国民党的组织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之上，所以，共产党要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建立和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工会组织，“工会的组织应与党的组织并重，对于近代产业工人，更应发展其阶级的意识”^①。

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之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问题提出以来在国共两党内部以及社会上所引发的一系列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写成《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于1923年12月1日发表在《前鋒》第2期上。与同年3月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相比较，这篇文章表明，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有了明显进步。

陈独秀已经看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也称国民革命，是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陈独秀在文章中分析了国民革命中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他认为：资产阶级固然幼稚，但它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小资产阶级由于对现状不满，也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但散漫、保守，一旦将他们组织起来，乃成为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因为产业幼稚的中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200～20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由于中国各阶级一体幼稚，所以中国目前只能进行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

陈独秀对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却陷入到教条、僵化的泥坑之中。他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两个阶级，忽视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目前虽然弱小，但由于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坚定性，这必将使其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并最终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按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的展望是与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但陈独秀却不然。他虽然承认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但他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中国民主革命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特殊形式中，隐约看到了民主革命成功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前途。他指出：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为了表明自己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陈独秀还举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不过，陈独秀认为这还是未来的事情，现在没有预计的可能与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

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力量比无产阶级强大，国民革命成功后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方面又提出只要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努力发展，上述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可见，陈独秀当时对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太清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甚至矛盾性。

陈独秀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是当时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所共有的。产生这种局限性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短，理论水平不高，理论分析能力有限，而又面临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进行着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完全不能的国民革命，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这个革命。所以，他们在理论和认识上的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来领导。陈独秀虽然看到了中国革命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也考虑到这种不同可能带来前途上的差异，但他囿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不能以创新的精神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所以也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这也是陈独秀的认识产生自相矛盾的原因所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探讨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他虽然在1923年春有“二次革命论”的提法，但到1923年冬在认识上已经有所突破。而且，他并没有止步于这样的认识水平。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独秀也在不断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不断修正自己原有的观点。所以，即使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更没有贯穿于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全过程。

在鲍罗廷指导下与国民党牵手

在鲍罗廷积极推动下，国民党改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从1923年11月开始，各地共产党人，如北京李大钊，直隶韩麟符、于方舟，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李立三、廖乾五，山东王尽美，浙江宣中华等，都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在欧洲，1923年6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即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执行部内大部分重要部门多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如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郭隆真为妇女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该支部在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切迹象表明，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国共合作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此时陈独秀所考虑的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协调好同国民党的关系。为了部署全党的统一行动，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十三号，对各地共产党人作出以下指示：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 Y.（即青年团——引者）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D) 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会议决一致的主张。”^①

1924年1月1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在国民党中的工作问题。正在上海的鲍罗廷出席会议并作了报告。鲍罗廷在报告中强调：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发展，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国民党把国民革命运动真正建立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这样不仅不会削弱自己的党，而且会使它变得越来越强大。

陈独秀接下来发了言。他指出，虽然中共三大决定帮助国民党发展，但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这是因为党内对此有分歧，而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到11月底，党内分歧消除了。在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上，大家对以下几点达成一致意见：第一，尚未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应该立即加入。第二，只要有可能全体党员都要在各地帮助国民党发展。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党是国民党内部一个不合法的支部。第四，全体同志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2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第五，共产党员不仅在帮助国民党发展，而且还要帮助全国各种社会组织，以扩大国民党的影响。

在鲍罗廷指导下，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①

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共未正式建立合作关系之前，对于共产党员是否谋求国民党的领导职位就已经定了调子。虽然不能确定这项决议是否出自陈独秀等人的自愿，但可以肯定，这项决议是参考了鲍罗廷的意见，或者说，这可能正是鲍罗廷提出来的。因为斯大林在向鲍罗廷交代来华任务时，就责成他不要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势力。根据这条原则，他当然不会同意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岗位。

会后，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从《意见》的内容来看，陈独秀等人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细节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意见》中详细分析了可能与国民党产生冲突的原因，并决定了共产党员的态度。其中指出：“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我们确实有在国民党内竭诚的和国民党合作之必要。在原则上，当此时期我们与国民党并无主义上政策上冲突之实质；在事实上，或因国民党未能了解国民主义的实质，或因彼此感情的疏隔而有所冲突。于前者（特于对外恢复国权，对内民众的政治宣传及为人民利益奋斗的

^① 关于会议的情况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441～44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表示)我们决不能让步,但须依据其党纲与主义以委婉诚恳的态度出之,尽量避免使其恐怖或疑忌的态度与术语。于后者,我们须抑制一切感情并抛弃鄙视国民党之旧观念,努力深入其群众,以期达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之目的。”^①

鉴于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意见》还规范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的统一言行。其内容是:

一、对于党纲草案,我们大致赞同;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

二、对于章程草案,亦大致赞同;惟对于实际的地方组织,我们主张应就当地选人,不得由旅粤或旅沪党人遥领。

三、对于政纲议案,我们宜拥护国际代表的八条意见(即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之政纲——引者注)。

四、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案,我们同选谭平山同志。

五、对于宣传事业,我们应主张于党的主义政策外,须兼及关于人民利害的每个实际问题。

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议,以便对于上列五项及其他意见,主张一致;更须注意联络国民党之进步分子,使之表同情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215~21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于我们的主张。

至此，共产党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去迎接标志着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式合作的盛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尽管遇到了种种矛盾和争论，但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为了相同的反帝反封建的目标，终于走到了一起，即将实践一次伟大而艰难的合作！

直面国民党内排共浪潮： 质疑无条件支持国民党

国民党右派宣称陈独秀别有用心

自从孙中山决定采取联俄联共的政策之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尤其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老党员，就不时向孙中山进言，提出反对意见。孙中山为此虽然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但反对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

1923年11月18日、29日，国民党上海本部的谢持、张继等人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会上，众人纷纷发表意见，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表示不满。谢持宣称：“党中不可有党。”彭素民担心：“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精神，未必可以完全服从于我党。”

孙中山深知，国民党上海本部这些人对改组国民党和联

共政策的反感，会影响到联俄联共政策的实施。为了尽快打通这些人的思想，他派出自己得力的助手、拥护联俄联共政策的廖仲恺，前往上海去做解释。

孙中山的改组国民党和联共的举动，不仅在上海有反对之声，在广州也有人表示不满。1923年11月29日，即在孙中山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之后不久，曾经在海外给了孙中山不少经济支持，时任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邓泽如，就与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州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国共合作，并“弹劾”陈独秀和共产党。他们凭着自己的猜测和想象，对陈独秀等人与国民党联合的意图进行了攻击。孙中山在他们的呈文上作了批示。呈文表现了邓泽如等人反对共产党的原因所在，而批示又反映出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真实态度。呈文及批示如下：

窃以本党改组，其动机虽出自我总理之乾刚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然此表面文章，尚无大害，惟探闻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孙中山批：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参与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陈与苏俄，本有密切之关系，其所组织之共产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此回改组，陈独秀因粤人对伊感情太坏，乃避去。而以其党徒谭平山出而任事，陈独秀则在暗中牵线，内里隐藏阴谋，经为其党徒范体仁因争权利而冲突，遂向国会议员徐清和详细陈述。兹谨转述



徐议员之言，及他方面探得者，密报于我总理，以免令外人弄我如傀儡。此为党员等天职所在，势难容已，非敢反对此回改组也。党员等自问爱党爱国，断不减于陈独秀，亦当为总理信其无他也。

(一) 此回共产党与我党合作之动机。此动机发生于木司寇（即莫斯科——引者）第三国际大会之后，其表面宣布者，则谓对于资本主义成熟之国家，则鼓吹阶级斗争，促成社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幼稚之国家，则主张联合工农及中产阶级，以完成民主革命。近东则协助土耳其，远东则协助我国。果然如此，亦未尝非友邦之好意。（孙中山批：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初，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及后与列强奋斗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实为对于民族主义。）不虞陈独秀之共产党，则利用此机会，而利用我党矣。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知其别有怀抱。党员等致疑者久矣。今已探得其利用方法。（二）陈独秀的共产党利用我党之阴谋。陈独秀此次之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当未加入之先曾在北方某地（似是海参崴）开大会，议决利用我党之方法，其大前提则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甲）

则使我党从国际之仇怨。(乙)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乃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夫此二标语实堂堂正正无可非议者，然运用之制为具体的政纲(如政纲草案之一二两条即阴谋所在)，宣示世界，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更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我党对于军阀之攻击，只限定于曹锟、吴佩孚。今陈独秀派替我党立言，则连及于张作霖、段祺瑞；务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其他种种诡谲行为，实不胜数。查陈独秀受苏俄给养，组织共产党之后，自知其共产党人少力散，不能活动。其初乃依附吴佩孚，日颂吴佩孚之功德，指吴为社会主义实行家，无耻之言为国人所共闻。至今年二月京汉工潮发生，吴佩孚残杀工人之惨剧出现。陈独秀利用吴佩孚之假面具乃遭揭破，因此转而利用我党益急，入寇亦益深。故此回改组，陈独秀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党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又党章草案定总理一职为选举职，窃恐事实随环境变迁，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党员等不予承认则有违党章，若予以承认则辱及全党。我党无形消减，即在此时思之，实为寒心。至苏俄政府之协助我党改组，与陈独秀是否同一鼻孔出气，党员等未敢断定之。惟陈独秀利用我党改组而施其阴谋，则凡党员皆能共见矣。(孙中山批：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



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听其操纵。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革命党皆属有党团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同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可为我晓谕之，谓之民为救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如不觉悟，陈独秀等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表同情，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彼亦得志矣。)抑尤有进者：本党向用委任之制，各局部首领之智愚贤不肖由总理审定而剔择之。以大公无我之心，有提拔其材之效。今一变而为普通选举之制，尝见本党人数众多，而良莠不一。选举运用，偶有不明，即易为奸人所利用，即如此次组织区分部，陈独秀之党徒谭平山等预先收买去年请大总统下野之逆徒，使之改名，介绍入党，派至区分部，且选举之先乃预约其徒辈选为委员。有此事实的证明，可知本党试行选举制之初期即发生为奸人利用选举之弊病。推其流弊之所至，他日选举，一省之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亦何难再施其伎俩以愚弄党人。党员等思之再三，以为我党即采用选举制亦宜加以限制，拟请复选举法，如选举一

省之执行委员，先由各县分部选出初选当选人。经以初选当选人之名单送呈总理审定之，以该名单中若干人为候选员，然后再由众于候选员中选出一省之执行委员。其他中央委员之选举及各部之选举，亦皆仿此办法，庶几经过一度之审查，而奸人乃无术施其运动。此党员等所以主张限制选举也。（孙中山批：民权主义发踪于选举，若因嗜废食岂不自反其主义乎？！若怕流弊，则当人人竭力奋斗，不可放弃责任，严为监视。如察觉有弊端，应为提出。以后我每两礼拜与各人会集一次，如遇有问题，可以公开解决之。因一人所见有限，故不得不付诸公举。亦自觉所任常存不当之处，故不得不改革。种种方法有不善者，自当随时改良，方期进步。吾党自革命以后则日日退步，必有其故则不图进步改良也。）要之奸人谋毁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党员等心所谓危，不得不揭发其诡谋，密陈于钧座之前。冒昧陈词，伏维鉴察。^①

以往人们有这样的看法，即孙中山是坚决主张联共的，他对国民党右派的排共言行是坚决反对的。从孙中山的这几段批示可以看出，上述说法显然是过于绝对化了。首先，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批评国民党，指出国民党的缺点，是为了“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听其操纵。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其次，他认为

^① 邓泽如等人的呈文及孙中山的批示均见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下册，1585~1586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4。

共产党人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苏俄施压的结果。再次，他认为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就要服从国民党，否则将与之断绝关系。这表明，孙中山一方面对于共产党抱有轻蔑之态度，认为随时可以弃之；一方面又怀有戒备之心理，认为他们揭国民党的短是为了阻止苏俄与国民党结盟，从而独得俄国的援助。

这种轻蔑和防嫌戒备之心不仅大多数国民党人有之，而且孙中山也有之，这就注定了国共合作坎坷曲折的命运。

真诚合作谈何易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鲍罗廷就给共产党今后的工作定下了基调。1924年1月18日，鲍罗廷召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代表开会，并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报告。在谈到共产党的任务时，他说：“我们总的任务是从组织上扶植国民党，帮助它制订党的纪律，以便使它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①

鲍罗廷给共产党规定了“扶植国民党”的任务，但陈独秀对于如何“扶植国民党”感到困惑。根据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以前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工作的经验，他深知，要“扶植国民党”而不至于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要与国民党人一起开展工作而不致发生矛盾，对于没有什么政治斗争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在一些

^①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460～46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国民党人并不愿意让共产党“扶植”、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情况下，要做好工作就更加困难。

不过，陈独秀也知道，既然共产国际决定了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目前让其更改政策是不可能的，而且共产党人既然已走到了这一步，畏难退缩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无论有多难也必须开展工作，并尽可能做好工作。陈独秀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或许会发生变化。

为了保证与国民党合作得愉快，陈独秀在1924年2月底召开了中共中央执委会会议，讨论如何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问題。会议最后作出《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案》反映出陈独秀等人当时与国民党合作的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决议案》从以下四个方面强调了这一总的指导思想：

第一，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努力扶持国民党员，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于没有完全改变以往状态的人，只能徐为掖进，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以免惹起他们的反感。即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于不愿接近共产党或曾反对过共产党的人，不可认为他们都是所谓“右派”，因为这样会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

第二，为了表示与国民党真诚合作的态度，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均应努力，尽职尽责；而对于国民党不努力的分子，于诱导无效之时，既不可有嫌恶藐视的态度，也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以免引起他们的反感。

第三，中国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

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的，仍作为共产党独立的活动。

第四，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国民党精神之所在。共产党员应站在国民党的站脚点上，努力向国民党内外进行宣传，以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主义的党。

《决议案》虽然强调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共产党组织的发展也不能停止，但又指出，“介绍新分子加入共产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对于共产党的主义、策略及党的纪律没有明确的了解和不愿全心全意为共产党服务的人，不必轻率许其加入。因为轻率加入多数不健全分子，不仅使国民党误会共产党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而且会使党的组织松懈紊乱”。^① 按照这一规定，实际上不可能使党得到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陈独秀确实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与国民党合作之中了。他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国民党员的每一个进步都十分关注。他看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筹备处发出的党员登记通告中提出，此次凡登记的国民党员必须了解、赞成和接受第一次大会的宣言，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等规定时，便欣喜地指出，这“充分表现出他们服从和牺牲的精神”。他还希望各省的党部都能照浙江的办法去做，认为“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真的新生命，才不致使全国大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案仅仅是白纸黑字的决议案”。^②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222～22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陈独秀：《国民党之模范的改造》。《向导》，56期，1924年2月27日。

陈独秀希望能够与国民党真诚的合作下去，为此特别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小心谨慎，生怕因共产党人的言行不慎而与国民党产生纠纷。然而，国民党方面又怎么样呢？

对于国民党人来说，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当年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工作时，就实际参与了国民党的事务。再者，在上海的国共两党党员，有许多活动也是共同参与的。不过，这与让大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还不是一回事。一些真正接受了国民党一大精神的国民党人，愿意与共产党人精诚合作；而国民党内对共产党人带有成见和偏见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愿意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更不愿看到共产党人占据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对于共产党人所参与的工作，要么抵制，要么横挑鼻子竖挑眼。

更为严重的是，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逐渐聚集起来，结成团伙，如北京的石瑛，汉口的刘成禺、谭理鸣和张秋白，上海的谢持、茅祖权、叶楚伦和张继，广州的邓泽如、冯自由、孙科、方瑞麟、吴铁城、蒋翊武和马超俊等，开始进行从国民党内排斥共产党人的活动。他们不仅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传他们的排共思想，而且煽动侨居国外的国民党员的过激情绪，让他们起来共同反对共产党人。他们还到其他地区进行串联，甚至派出自己的追随者和亲信跟踪共产党人，搜集可以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材料。

于是，一些针对共产党人的所谓“检举案”不断被炮制出来。

最先抛出反对共产党人提案的，是冯自由、刘成禺、谢

英伯等人。他们制造出《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力图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

在上海，国民党一大后，陈独秀根据负责筹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胡汉民的请求，选派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其中有邵力子、毛泽东、王荷波、恽代英、罗章龙、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等人。不料叶楚伦、谢持、茅祖权等却对共产党人的工作进行刁难，并且对邵力子大打出手。

这样，到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式合作才三个多月，已发生了许多争执和不快。在如何开展国民革命工作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总不免产生意见分歧。加之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挑剔和责难，使共产党人对与国民党继续合作产生了畏难情绪。

维经斯基纠偏

对于中共中央全力投入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负责人既感到高兴，又产生了忧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起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建设国民党的工作之中后，党自身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影响。因为，东方部近来没有收到陈独秀关于党内工作情况以及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工作情况的通报。

有鉴于此，东方部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应在上海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

题的决议》，阐明中国国民运动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在会上讨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组织问题及党内工作、宣传和鼓动工作等。^①

根据东方部的提议，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决定：建议中国共产党于5月召开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讨论加强国民党左派、加强工会工作、加强宣传工作，并且在今后三个月内要开展一次扩大党员数量的运动。^②

为了指导即将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维经斯基由海参崴启程前往上海。途中，他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对北京共产党人的情况作了大致了解，其结果令他深为担忧。他感到，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现在所面临的确实太复杂了，以致有些任务不能很顺利地完成。

维经斯基看到，北京的共产党人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仅仅几个月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1300多人。而共产党人越是同国民党人打交道，就越是感到在思想上与国民党人格格不入。所以，尽管为国民党做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工作，但他们像是在履行必要的义务。共产党人对国共“党内合作”的理解是：既然需要在国民党内做工作，那么就要通过对各国民党集团领导人的规劝和开导，成功地把国民党的形形色色分子联合起来。假如联合失败了，就是违反了党的纪律，就是没有把工作做好。

对于北京共产党人的这种思想状况，维经斯基甚为不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4年1月1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399～40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49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安。他断定，是鲍罗廷向共产党人作过这样一种解释，即要把国民党建立成群众性的组织，而且非建立不可，这是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然而鲍罗廷没有考虑他这样解释的后果，他并没有想到，共产党人为了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为此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开展工人运动。维经斯基不同意鲍罗廷这样对共产党人进行指导。他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同国民党共事，但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应该从发展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出发，确定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国民党做工作，而不是把所有的工作都拿到国民党内去做。^①

为了及时纠正共产党人工作上的偏差，维经斯基提醒李大钊等人：在铁路工人和矿工中进行工作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时还要加强党组织的发展，注意工人运动。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关于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在会内会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对于共产党实际上被融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立即与国民党决裂。而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要解决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矛盾，最好是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当时陈独秀是什么态度呢？据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回忆：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

^① 参见《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49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之决定的意味。

由此陈独秀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维经斯基的态度也很明确，他对陈独秀和张国焘说：“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针，重点是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独立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①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与会者经过争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通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这一决议案表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派别和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重点有了进一步认识：

第一，国民党的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其左派是孙中山为首的一派和共产党人，其中共产党人是左派的基本队伍。所以，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之争。共产党人应该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右翼势力。

第二，共产党人在注意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同时，不应忽视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在军队中的宣传，只有通过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1册，326～32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宣传才能使国民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三，中国共产党应该帮助国民党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

这次会议令人瞩目的一个变化，是改变了要求全体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会议提出，工人阶级要组织自己的产业工会，在国民党外帮助国民党，而不是加入其中帮助国民党。在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议决案》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在工会运动方面并不是帮助他设立国民党的铁路工会及矿工工会，或者使已成的工会全体加入国民党，这可以使工会沉溺在国民党里而失去阶级的性质；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却是先组织纯粹的斗争的工会，于每次用得着的时候，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①

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陈独秀对“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偏向已经有所反思和纠正。扩大会议后，党的各项工作基本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尽管遇到相当多的困难和阻力，中国共产党还是决定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发展，以共同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

陈独秀身背重负

从1924年春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汉口不断出现国民党人检举共产党人“违纪”的事情，后来竟发展成几百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237～23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人联合署名、共同向国民党中央提交反对共产党“跨党”案。到1924年8月，提案已达20多件，署名党员达2000余人。

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排共”的呼声很高。国民党人不仅发表文章对共产党大加攻击，而且在短短几个月内即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9个反共提案。其中有：上海大学毕业生程永言等16人《请取缔共产党案》，何治溉等51人《请开除跨党分子案》，南方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学生党人《请斥逐所有跨党祸党共产分子案》，旅沪国民党员施承谟等55人上书孙中山《请斥退共产党案》，任重等8人《请摈斥共产党案》，邓嘉缙等7人《检举共产党案》，曾贯五、石克士等人《检举共产党案》，何世楨等20人《检举共产党案》，何子培、杨峻峰等《检举共产党案》。

在汉口，1924年4月28日成立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执行部成员中，共产党员为数不少，有林祖涵、李能邨（立三）、许伯昊、林育南、项德隆（英）、于若愚、廖乾五、刘芬、李慎广等人。从执行部成立的那一天起，其中的国民党人就对共产党人抱着戒备和防范心理。不久，国民党人覃振即以“武汉国民党员”的名义写了一封检举书，送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检举书中说：“顷据此间调查所得，刘芬、李能邨、廖乾五三人，均系江（亢虎）陈（独秀）党徒……凭借吾党名称，实行彼党计划，例如陈氏嫡系项德隆（英）辈，自称中央特派员，公然滥发传单（项德隆签字之油印传单一纸附呈），擅委本党干事，同人等对于传单上中央名义，百思莫得其解。谓为陈党中央乎？则陈辈现入本党，自不应另立团体，败我纪律。谓为本党中央乎？则本党中央委员并无其人，惟器与名，何可以假；以此借名招摇，涛张为幻，如以大者例之，则视我总理为克伦斯基，而自视为列宁；如

以小者论之，则是蓄意操纵本党，结小群以遂其把持之私，务虚声以行其煽惑之实。揆之我总理筭路经营中兴本党之苦衷，当不愿其有此。”^①

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是个短命的机构。成立才刚刚一个月，刘芬、杨德甫、许白昊等人就被湖北督军萧耀南逮捕，林祖涵为躲避危险去了广州，汉口执行部几近瘫痪。7月7日，国民党中央决议：“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

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撤销后，在武汉的一些国民党人并没有停止对共产党的“检举”。这年8月，一个名叫张德惠的国民党人从汉口跑到广州，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对共产党的“控诉”。他以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代表委员会的名义，列举了共产党人在京汉铁路工人中的种种“罪恶”，并请国民党“驱除恶魔”。

这个弹劾共产党的呈文报到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后，邓泽如、谢持等人如获至宝，当即写出审查报告，并报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报告说：“综核本案情节，实系共产党员欺压劳工，劳工对之既失信仰，转而向本党呼吁。今共产党员既跨本党党籍，其为各级党部职员者又不乏人，乃握本党之权而努力于共产党之宣传与组织，其为害于本党之发达生存，至为重大。况本党主义及政纲以保障及扶持劳工为要素。今既有此现象，则劳工虽表同情于本党，亦将为此跨党之伪党员破坏无余。本党前途，宁无失望！故本会对于京汉路劳工对于本党之关系，认为有注意之价值，而非将与共产党有关系之本党党员（既不忠实于本党且为京汉路劳工所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285页，1987。

愤恨之党员) 严加惩戒, 不能适生存, 谋发达, 而且不能实举扶植劳工之效。”^①

本来对工人运动并不十分关心的国民党人, 此时为了从国民党内挤走共产党人, 竟把一直热心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污蔑为摧残工人运动的罪魁, 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在国民党人的排共活动中, 闹得最凶的, 还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

这年6月, 邓泽如等不知通过什么关系, 获取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刊印的一些材料, 其中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团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从这些材料中, 他们找到了一些自认为对国民党不利的材料, 便开始大做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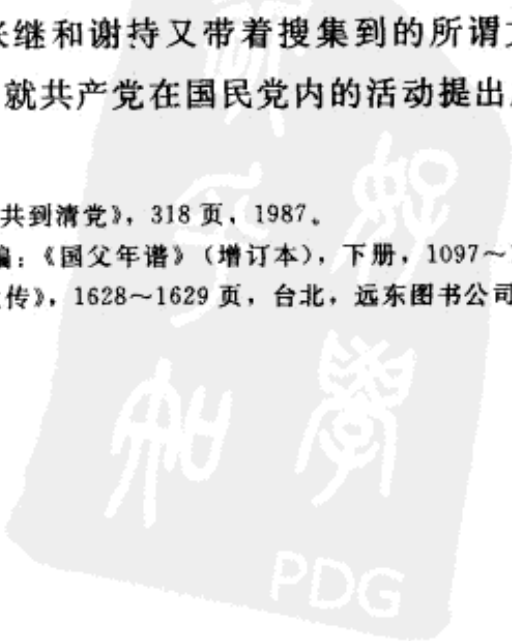
6月18日, 邓泽如、张继、谢持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 联名上书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指责共产党员“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 违反党义、破坏党德, 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 有重大妨害”。上书中列举了所谓有文字证明的“事实”, 将其视为共产党的“重大阴谋”。^②

谢持等人把搜集到的所有材料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由于对这些材料的意见不一, 张继和谢持在会上与廖仲恺发生了激烈争执, 会议不欢而散。

6月25日, 张继和谢持又带着搜集到的所谓文字“罪证”找到鲍罗廷, 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提出质疑。他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318页, 1987。

^② 参见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 下册, 1097~1098页; 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 1628~1629页,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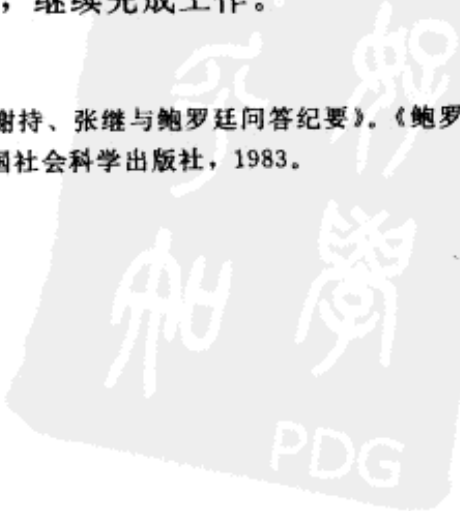
们提出：共产党既然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就不应该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鲍罗廷对他们的质问进行了解释和有利的驳斥。^①

鉴于同鲍罗廷的交涉没有达到目的，张继和谢持又借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召开之际，将他们弹劾共产党人的提案呈交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张继与共产党人谭平山发生了激烈争论，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其一，是否同意孙中山的提议，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张继介绍了他和谢持在6月25日与鲍罗廷谈话的情况，提出：“鲍罗廷无论如何不能当我们党的顾问，因为他说国民党已经死亡。”接下来他又列举出了一些所谓事实，认为“鲍罗廷的行为并不高尚”。谭平山驳斥了张继的说法，指出：“鲍罗廷是革命者，他的行为符合革命党关于高尚的概念。……鲍罗廷实际上在帮助中国，帮助革命。我们怎么能够说鲍罗廷不对呢。”

其二，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继以土耳其共和党枪杀了几十名共产党人为例，提出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联合。谭平山则驳斥说：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人，土耳其才成为共和国。如果共和党人枪杀了共产党人，那么他们就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就不考虑自己的后果。他还表示：“如果国民党突然不满意，比如把我抓起来，枪毙我，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知道，我的同志们会按照我们的政策，继续完成工作。”

^① 此次谈话内容参见《谢持、张继与鲍罗廷问答纪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1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其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是否对国民党有害。张继认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将来会控制国民党的事业和行动。谭平山反驳说：共产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和孙中山的认可加入国民党的。在最近几个月内，共产党员的活动只是给国民党带来了好处。自国民党改组以来，每个有共产党员工作的区党部，很快成立了委员会，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和正确无误。而没有共产党员的地方，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什么任务都没有完成。如在湖南、浙江、吉林、安徽、山东等地，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在广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等省，没有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员在那里工作，你们给他们提供了资金和其他帮助，但至今委员会还没有成立起来。

经过辩论，与会者的天平显然倾向于谭平山一边。汪精卫批评张继说了许多多余的话，认为张继所讲的话对鲍罗廷是很不公正的。廖仲恺则指出：“国民党”这个词已经死亡。如果党员不努力工作，不服从党规，这就意味着这个党已死亡。甚至一向与张继意见相同的林森，此时也表示：如果共产党遵守国民党的宣言和原则，那么国民党就不应该搞分裂。柏文蔚则举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的种种好处，如加强了国民党政权，使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真正联系，等等，认为与共产党合作并没有什么害处。

为了对张继等人的提案作出答复，会议当即决定三条办法：（一）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以统一全党认识；（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进一步认真的讨论；（三）呈请总理孙中山作决定。

会议还作出如下说明：“以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凡入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三民主义之诚意者，

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以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同时并请总理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办法。”会议推定汪精卫、邵元冲主持起草宣言。^①

7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汪精卫、邵元冲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其主要内容是申明联共之原则。其中指出：“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②

《宣言》是发表了，但并没有遏止国民党内的排共浪潮。为了彻底解决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孙中山决定在8月再次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

处于国民党排共浪潮压力之下的陈独秀，此时已十分清楚地看出，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都不希望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而孙中山虽然不会马上抛弃共产党人，但对于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攻击制止不力。这种情况使陈独秀感到很为难：如果共产党提出退出国民党，既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旨意，又背上了分裂革命势力的罪名。为了维护联合战线，共产党只能尽量忍耐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如果容忍国民党内的排共情绪发展下去，那么共产党员很难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更谈不上保持独立性。

7月13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报告了国民党中央

^① 关于会议情况参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497~50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7月20日。

舟 夢

PDG

执行委员会即将在8月召开会议的消息，以及孙中山对国民党右派的态度。他还不无沉重地谈到了共产党人的处境和自己的忧虑：

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过是左翼理论家），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苏倾向。如果以后还以这种精神（援助反动派）给以支持，那么这就会对远东的革命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①

陈独秀在信中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政策。陈独秀的意思很明确：既然国民党已经被右派所掌握，那么与其将国共两党绑在一起，致使矛盾升级激化，还不如改变国共合作方式，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与鲍罗廷的合作与分歧： 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鲍罗廷反对退出国民党

从1923年10月来华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鲍罗廷与孙中山国民党打交道不到4个月时间，就已经对国民党的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与他来华前对国民党的印象相比，所了解到的情况令他很不乐观。1924年2月，鲍罗廷综合他几个月来对国民党的观察和与孙中山等人接触的情况，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民党人分为三类：一类是优秀的国民党人，但他们思想认识上很混乱；另一类人愿意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但前提是他們要弄清中国面临的问题；最后一类人是毫无革命气息的人，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只是企图攫取党内的

肥缺。

第二，国民党并不是完全反对帝国主义的，它缺乏足够的民族主义色彩，缺乏彻底的反帝精神，因此它并不真正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因为，它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该被视为民族眼中钉的租界，实际上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是一些应该仿效的模范城镇。

第三，国民党不是任何一个阶级利益的代表，更不是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国民党逐渐失去了在其反对专制统治斗争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意义，因此它不能不成为“空中楼阁”。

综合以上三点，鲍罗廷认为：国民党不仅不是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为此就应该以群众为基础），而且即使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捍卫中国利益的民族主义的政党。因此，鲍罗廷断言：中国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团结的和有纪律的国民党。

对于鲍罗廷来说，认识到国民党的这个现状，他的心情肯定是很沉重的。而孙中山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和他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使鲍罗廷对未来工作充满忧虑。在一份关于国民党的札记里，鲍罗廷这样写道：

在他（指孙中山——引者）身上，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样，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央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他忽而激烈抨击帝国主义者，忽而又对美国大使舒尔

曼说，美国人应当干预中国事务，从而背叛了自己国家的真正的民族利益。

他忽而致电俄罗斯，指出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学说的影响下召开的，忽而又向麦克唐纳作出这种献媚的保证：协约国应当像他们恢复土耳其(!)的主权一样恢复中国的主权。他忽而向蒙古人(例如向蒙古党主席丹增)声明，国民党将纠正满洲人干出的各种不公正的事情，也就是说，国民党将赋予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忽而又向同一个麦克唐纳夸耀中国的历史是东方的导师和征服者的历史。他忽而完全同意国民党同工农群众建立联系，在纲领中保证支持他们的经济组织，忽而又反对就野蛮杀害稻米生产工人领袖的问题作出决议。

在孙的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要摆脱这些矛盾对他来说极为困难。在这方面，孙是小资产阶级的中国所充满的那些矛盾的反映。

鲍罗廷认为，孙中山对国民党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任何要求，他只是将他的三民主义加在这个“最色彩斑斓”、“最五花八门”的国民党身上，让其成员自己随便加以理解。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改组国民党不可缺少的人物。鲍罗廷相信，只要“拯救”了孙中山，就可以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来号召国民党内真正的革命分子投入到实际生活中，无条件地团结在国民党左派周围。

不过，鲍罗廷对能否“拯救”孙中山并无可靠的把握。尽管他在各种场合温和地批评了孙中山那些相互矛盾的和完

全不恰当的斗争方法，同时又向孙说明了新的斗争方法、新的方针的前途。但鲍罗廷发现效果并不明显。

虽然鲍罗廷看到了孙中山国民党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由于肩负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使命，所以他也只能尽自己的所能对孙中山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国民党尽快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使命。

1924年7月，鲍罗廷得知，陈独秀因为国民党内排共浪潮的压力过大，提出要改变国共合作的方式。这个消息令他甚为不安。尽管鲍罗廷与陈独秀一样，对反击右派分子有畏难情绪，但他决不同意改变国共合作方式。因为国共合作方式的改变，即意味着他在中国工作的失败，意味着他违背了斯大林要他全力扶持民族主义运动的旨意。

鲍罗廷决心要筑起一道防止陈独秀的想法继续蔓延的坚固长城。他非常清楚，与陈独秀相比较，他对近在身边的广东共产党人更具有影响力。所以，他决定利用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将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广州地委）一班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在鲍罗廷要求下，7月15日，中共广州地委召开了会议。会上，鲍罗廷谈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看法和对南方形势的估计，并且对陈独秀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会议对鲍罗廷提到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通过一个关于鲍罗廷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两点：第一，鲍罗廷对中国南方政治局势的估计和他拟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鲍罗廷就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决议反对陈独秀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明确指出：“会议认为，迄今为止国民党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还没有完全放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现在还可以利用合法的

方式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深化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工农潮流，因此共产党人不应该退出国民党。会议认为，在准备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应起的作用。”会议指出：“坚持把广州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①

陈独秀虽然对鲍罗廷直接操纵中共广州地委不满，但对他们的意见还是重视的。而且他也考虑到，国共合作才刚刚起步，此时退出国民党确实为时尚早。这样，他便暂时放弃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确定了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而不是退出国民党的策略。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专门就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作出指示。《通告》分析了1924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以来国共合作的状况，指出：“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

然而，为了国民革命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非革命的右倾政策，不能不加以纠正。为此，《通告》要求各

^①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08～50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地党组织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行动起来：（1）以共产党影响下的团体和国民党党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右派的严重错误；（2）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右派展开辩论；（3）凡不是左倾分子，以后不再介绍加入国民党；（4）牢牢掌握群众团体的领导权，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5）各地迅速组织“国民对外协会”，这个团体是独立于国民党之外的群众团体，加入者必须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主张为重要标准。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形成反帝统一战线之中坚，一方面形成国民党左派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基础。^①

陈独秀选择了斗争而不是退却，从此他又拿起了批评的武器。他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斥责国民党右派分裂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言词激烈地指出：

我们因为有促进中国国民党的必要，而以个人的资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似乎于国民党革命的倾向只有进无退，然而正因此惹起了党中一部分党员之误会，攻击。他们不但口里攻击，还用白纸黑字写出……根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指责国民党任何党员，开除国民党任何党员，这是正当应有之事；乃并不依据国民党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条某项，具体的指责国民党党员某某个人，而竟抽象的笼统攻击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并且由此攻击到国民党之外的共产党，这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282～28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若主张不肯脱离共产党的人便不许加入国民党，则虽另再召集一次国民党全国大会，取消前次大会准许共产党党员跨党的决议便得，何苦以有用的光阴与经费，发行许多印刷品，不是攻击帝国主义与军阀而是攻击我们！^①

陈独秀的最后一句话看似气话，但很难说这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没有共产国际的许可，没有鲍罗廷的同意，陈独秀要解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国民党开大会决定不再与共产党合作，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陈独秀可能期望着后一种情况发生。

“国际联络委员会”引发分歧

1924年8月15日至30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国共两党委员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所引起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

以张继为首的一批人，事先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举出了搜集到的所谓证据，指责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不仅在国民党外保留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在国民党内还设立了

^① 陈独秀：《我们的回答》，《向导》，83期，1924年9月17日。

“党团”。他们指出，这显然有悖于诚挚合作的精神，与其如此，共产党员还不如友好地退出国民党。

出席会议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反驳说：如果国民党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党，即革命的、反帝的党，那么共产党员无需在党内建立党团；然而现在国民党中确有那么一些不愿意进行革命和反帝斗争的分子，那么这种使国民党革命化的共产党员党团的存在，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况且，即使从形式上看，共产党党团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孙先生在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就同意保持共产党存在的独立性。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国共合作的政策不能改变。但孙中山等人提出，既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尤其是他们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引起两党纠纷的主要原因，那么就应该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特殊的组织，以便国民党能随时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并能经常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指示。

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得到了鲍罗廷的赞成，他提议这个特殊的组织可以叫“国际联络委员会”。在孙中山等人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就这样，会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①下，成立一个由鲍罗廷以及国民党、共产党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成立于1924年7月11日，其成员有：孙中山、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邵元冲、瞿秋白。鲍罗廷被聘为顾问。

会议最后通过《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强调了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必要性。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颁发了《关于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其中指出：

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①谬极矣，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

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之关系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会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系委员会。其职务之一，即在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如是则本党之最高党部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负保守其秘密之义务；一方面对于本党党员负了解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之义务。党内之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形消释，而党员之对于共产派亦无所其猜忌。此本会为解决纠纷计，所愿自进而负此全责者也。

自经此决议之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凡我党员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

^① 原文如此，应为“至”字。

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本会对于党员，不胜厚望。

于此犹有当为党员告者：党内共产派同志平日无论言论著作，往往有意的或无意的于国民革命之主张不免参差，因而被其他党员之指摘，以为于参加国民革命之初衷，得毋刺谬，甚且有认为无诚意者。而诸党员对于共产派问题，又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所谓意气用事。本会于此不能不申以告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诸党员对于道义上，应有此觉悟；对于同志间关系，尤应有此忏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其各留神省察。^①

会议形成的决议案和训令虽然照顾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情绪，但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对会议的结果仍不满意。这些人认为，他们如此这般地闹腾了一番，掀起了一阵排共大浪，但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的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由此，他们对孙中山也产生了不满情绪，认为正是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庇护，才使他们难以达到目的。但慑于孙中山的威望，他们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向孙中山提出抗议。于是他们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在会后纷纷离开广州，有的到了上海，有的到了北京，开始在广州以外的地方组织排共、反共

^① 荣梦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73~7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的力量。

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召开前，陈独秀就开始做对付国民党右派的准备。他知道这次会议将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而且预感到国民党右派将在会上发难。所以，他在事前即让人拟出关于反帝运动计划、关于工人运动的原则、关于惩罚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为等三个提案，要求出席会议的瞿秋白提交大会讨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击措施。陈独秀已经估计到，在会上彻底打垮国民党右派是不现实的，但仍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对右派的反共活动有所抑止。

不料，在会议召开期间，陈独秀就从瞿秋白的来信中得知：事先准备的三个提案没有提交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而鲍罗廷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同意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独秀非常气愤。他立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并于8月27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强硬规定：“（1）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会议上发言；（2）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3）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①

但是，这个电报已无法改变会议的形势。

8月底，陈独秀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全会已通过了关于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这一消息使他愤怒至极。党的其他领导人对鲍罗廷的做法也表示不满。蔡和森甚至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及其所实行的妥协路线。

^①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

陈独秀“状告”鲍罗廷

“国际联络委员会”只是一个导火索。实际上，鲍罗廷自恃是莫斯科的代表，认为有权决定中共中央的一切事务，所以，在决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有关问题时，他往往越俎代庖，不向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打招呼。他还利用身处广州的有利条件，越过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中共广州地委，根本无视中共中央对广州地委的领导。

对于鲍罗廷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陈独秀早就有所不满。从陈独秀的个性来看，他是不能容忍鲍罗廷这种工作方法的。但由于鲍罗廷的特殊身份，而且又在广州，所以陈独秀即使有意见，但由于两地不便交流，处理不好会搞僵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所以他只能隐忍不发。

现在，鲍罗廷将中共中央的意图撇在一边，置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于不顾，擅自同意孙中山等人的要求，赞同在国民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这说明他根本无视中共的权力，根本无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宁愿将中共的所有活动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监督之下。陈独秀认为，鲍罗廷的做法太过分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是否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要不要中共独立与权力的问题！

于是，陈独秀特派高君宇赶往广州，向中共广州地委传达中共中央如下指示：第一，宣布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第二，坚决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鲍罗廷无权领导广州地委的工作；第三，瞿秋白立即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情况。

9月7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报告了国民党中央全

会的情况，对鲍罗廷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

在远东的工作中，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①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28～52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不久，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回到上海，向陈独秀等人详细报告了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情况。

10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瞿秋白的汇报，专门作出《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

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期间，国民党中派根本没有打算同我们闹分裂，而只是想利用右派来威胁我们，使我们屈从于它，不对他们拟定的干涉共产党事务的计划提出异议。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的鲍罗廷同志和中国同志（指瞿秋白——引者），未看清这个实际情况，也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中派哄骗右派。他们放弃了我们对于右派和中派必须采取的立场，走上了向中派让步的道路。这样一来，同中派达成了妥协，采取了防御立场，因此落入了中派设置的圈套……

《决议》认为，由于鲍罗廷和瞿秋白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结果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遭到两大失败：第一，我们对反动派镇压措施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为的是不造成紧张的示威气氛，结果我们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反右斗士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声不响地回避对右派镇压措施的问题，很顺利地对我们发起攻势，并向会议提出预先准备好的干涉中共事务的决议案。第二，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是国民党中派很早的想法，是由

孙逸仙博士在会前直接提出来的，现在采取了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形式。鲍罗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的第四条，并让它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

《决议》对鲍罗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在军事政治上对国民党的支持，实际上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他向孙中山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在广东不镇压反动派，同意停止反英斗争，甚至不反对孙中山离开广州去进行那毫无胜利指望的所谓北伐，等等。不仅如此，鲍罗廷在对国民党的认识上，在处理与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决议》明确指出：

执委会认为，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中派的作用并同它达成了妥协，还有在实行自上而下对国民党的改造政策时犯的的错误。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问题在于，目前不仅国民党中的许多右派分子是反动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虽然具有模糊的革命愿望，但在他们头脑中国民党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难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目前国民党中有许多反动的右派分子，而中派摇摆不定，又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清一色来自反动右派的指挥员，没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数量的革命分子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和对它施加影响，所以国民党根本不能采取革命的军事行动。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支援国民

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会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①

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对来自莫斯科的代表，而且还是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进行指责和批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陈独秀担任党的领导人期间惟的一次。

当年陈独秀对马林的工作方法不满，也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搞过什么决议。他不同意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主张，也只是给维经斯基写了封信，申明了中共的理由而已。然而，当陈独秀面临中共将被取消独立地位，将被剥夺应有的权力时，他不能再容忍了。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召集了中共中央执委会会议，专门作出决定，来谴责和阻止鲍罗廷错误的做法。

继给维经斯基写信和作出上述决议之后，陈独秀于10月10日在向共产国际远东部汇报工作时，对鲍罗廷的行为再次提出了批评。他在信中写道：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不晚于1924年10月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32～53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坚持另一种意见，他为孙中山的军事行动制订了计划并支持这样的观点：占领广东省无论对于对内政策还是对于对外政策都具有很大意义。在如此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给广东同志造成了混乱，他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无法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也面临很大威胁，所以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①

陈独秀接连发信对鲍罗廷提出批评意见，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极大重视。尽管鲍罗廷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②，但鲍罗廷与共产国际代表一样，执行的都是来自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政策。所以，鲍罗廷与中共中央的矛盾，同样会影响到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落实。从共产国际方面来说，它虽然没有指挥鲍罗廷的权力，但由于鲍罗廷的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解决鲍罗廷与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就是共产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3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② 将鲍罗廷说成是共产国际代表是陈独秀的误会。

国际义不容辞的责任。

考虑到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共产国际决定委派他来华，具体解决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

11月，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维经斯基正式致信中共中央，并要求中共中央将此信转送鲍罗廷。信中说：

我在上海了解到你们在代表大会之前的中央几次会议上向我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你们同鲍罗廷同志，同国民党中央和其地方组织的关系问题，现在我可以向你们答复如下：

1. 像以前一样，你们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过去的许多误解都已过去，主要是因为鲍罗廷同志没有实际可能同你们保持接触，而在过去的半年间中国的复杂局势要求保持这种接触。

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

(1) 在广州成立的由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组成的监察委员会^①，不具有国际性质，也就是说它不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不（在亚太范围内）进行国际性工作，而

^① 原文如此。指“国际联络委员会”。

渐渐成为调解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人之间某些冲突或误解的机构。

(2) 你们给各地国民党工作提出的预算，将提交专门成立的有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志参加的预算委员会研究，这样，基层工作的问题就会被提出来。^①

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当然不会说鲍罗廷的所作所为是轻视中共中央的表现，他只能找一些客观理由来搪塞。陈独秀虽然没有从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但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他也只好到此为止。

由于陈独秀的坚决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后来未能像维经斯基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调解机构，而是自行消亡了。

现在看来，陈独秀与鲍罗廷之所以发生严重分歧，是因为他们两人所关注的重点不同。陈独秀关心的是中共的独立性问题。他认为，鲍罗廷应该尊重中共中央，在处理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应该与中共中央取得一致意见，而不应该自作主张，更不应该在决定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时忽视中共的独立性。而鲍罗廷所关心的，则是如何使国民党真正成为能够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政党。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纠正国民党错误倾向的同时，必须全力扶助国民党。这样，他认为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纳入到国民党这个中心内进行，这就必然造成忽视中共独立性的倾向。至于鲍罗廷的

^①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1925年2月15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78～57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心目中没有“老子党”的情结，认为他有权包揽中共的一切事务，没有可靠的文字证据。

对孙中山北上的不同态度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10月23日，冯玉祥等人发出主和通电。孙中山在报纸上看到通电后，喜出望外，于10月27日致电冯玉祥等，祝贺政变成功，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①。冯玉祥等于11月1日复电孙中山，请他早日北来，共商国是。^②

此时，北方政局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虽暂时控制着北京局势，但在张作霖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根本不敢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段祺瑞与张作霖暗中勾结，他们虽在中央政权问题上有分歧，但在独揽权柄而拒孙中山于中枢之外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帝国主义各国也借北京政变之机，积极准备支持各自的走狗，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孙中山是否应该北上的问题，在国共两党内引发了讨论。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陈独秀的基本态度是不希望孙中山北上。他认为，冯玉祥只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另一工具，即将举行的天津会议也不过是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孙中山的首要任务，是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的政策，巩固自己的根据地，而不是参加所谓和平

^① 《孙中山全集》，11卷，252页，中华书局，1986。

^② 参见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3日。

会议。^①

蔡和森也反对孙中山北上。他指出：和平会议是军阀会议，也是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会议，孙中山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而且在积极方面要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的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蔡和森还告诫孙中山：不可轻信军阀，小心上当受骗，希望孙中山发表宣言反对所谓和平会议。^②

陈独秀和蔡和森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不赞成孙中山北上，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担心孙中山此行会对国民党产生不良影响。他们认为，孙中山北上必然与张作霖、段祺瑞等人为北京政权的归属而展开斗争，这就意味着国民党又要重新陷入军阀们争夺权利的漩涡之中。这样一来，就会加强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因为张作霖、段祺瑞等人一直在觊觎军阀政府中的职位。如果真是如此，那必然会导致国民党的瓦解。再者，冯玉祥等人虽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但并未改变由北洋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表现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进步的军人，只是一个投机的军阀。所以孙中山若北上，就是与军阀妥协。

蔡和森后来在回忆中更加清楚在表明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上述态度。他回忆道，中共中央领导层之所以反对孙中山北上，是因为“一方面不相信冯玉祥，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孙中山，认为他北上的目的是想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① 陈独秀：《肃清内部》、《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1924年10月29日）。《向导》，89期。

^② 蔡和森：《北京政变与国民党》（1924年10月29日）。《向导》，89期。

因为这时他在广东已高唱联日论调，此外，北上之前要到日本去一趟；同时，他与段祺瑞和张作霖没有断绝联系”^①。

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也有一些人反对孙中山北上。反对者认为：国民党要捍卫自己曾经发表过的所有激进的宣言和纲领，就不能同北京政变的胜利者进行合作，因为后者当然不会同意国民党的激进纲领；而孙中山如果与北方可能的盟友进行谈判以组织政权，这就意味着国民党抛弃了自己激进的宣言和纲领，重复了过去所犯过的老错误，使革命运动为军阀服务。

当俄共（布）领导人斯大林等得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后，真是又喜又忧。冯玉祥这个名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都不陌生。早在1923年春，他们就相继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报告中，得知在中国的北京地区，部署着“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的两万精锐部队。加拉罕接任驻华全权代表后，出于同北京政府谈判建交和在北方寻找可以合作的力量的需要，对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也十分关注，并开始有步骤地做冯玉祥的工作。这样，斯大林等人对冯玉祥便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也仅仅是初步了解而已，他们对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并不真正清楚。所以，当他们得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时，他们认为中国北方的形势将出现转机，这是喜的一面。而对于孙中山北上问题，他们又很忧虑。一方面，他们担心孙中山的安全，恐怕孙中山此次北上会遭遇不测；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疑冯玉祥等人邀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请孙中山北上的诚意，认为这些人邀孙北上，只是为了败坏孙中山的名誉。基于上述考虑，他们总的看法是不同意孙中山北上。

然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顾问鲍罗廷对孙中山北上却持另一种态度。他们认为，应该支持孙中山北上。他们的理由是：北京政变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如不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从策略上看是错误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党受到削弱。他们认为，反对孙中山北上是不对的，是错误地估计了战胜吴佩孚的意义，是没有看到新的形势为深入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创造的条件。所以，中共不仅要大力支持孙中山北上，而且还要积极利用孙中山北上的时机，扩大有利于革命的宣传。他们还认为，孙中山在北上之前，应该发表宣言，重申国民党在各个问题上的立场，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口号，其中主要有：反对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①

这样，在孙中山北上问题上就存在着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反对孙中山北上，消极等待时局的变化；一种态度是赞成孙中山北上，主张国民党积极参与决策并使时局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经过权衡，持前一种态度的人，包括共产党人，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陈独秀等人虽然接受了加拉罕和鲍罗廷的意见，不反对孙中山北上，但对孙中山能否坚持国民党一大纲领还是有顾

^① 参见《鲍罗廷（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1925年1月24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65～56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虑的。这一点，从11月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就可以看得出来。《通告》这样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①

11月14日^②，孙中山从广州启程北上。行前，他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了“反对不平等条件”和“召开国民会议”两大口号。

陈独秀在报上看到《北上宣言》后，对孙中山此次北上所持的立场产生了怀疑。当孙中山到上海后，陈独秀再次向全党发出通告说：“我们对于孙中山到北方出席军阀会议，不根本反对，只督促其在赴会前根据彼党政纲，发表政治主张，在会议中代表人民要求利益，此项政策，前函业已通知，各地谅已收到。此时孙中山已到上海，日内即赴津京，其宣言已在各报上发表。此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

为了督促孙中山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以孙中山北上为契机掀起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陈独秀要求全党积极行动起来，在各地组织游行演讲，向民众宣传，同时与国民党派往各省的宣传员相配合，做好国民会议运动的有关工作。^③

11月19日，陈独秀在《向导》第92期发表《中国共产

^{①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300、301～30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另一说为11月13日。

党对于时局之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会议运动的坚决态度，同时希望国民党领袖努力号召全国人民团体，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

其实，对于孙中山北上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共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11月下旬，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后，就发现党内有一股同国民党决裂的潮流。主张与国民党分手的人认为，孙中山北上实际上是支持了那些想在军阀政府中谋个职位的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国民党由于参加重新形成的夺权集团很容易被瓦解。维经斯基认为，共产党人的这种态度是错误地评估了战胜直隶集团的意义，没有看到新的形势为深入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创造的条件。

于是，维经斯基向陈独秀等人明确表示：孙中山参加天津会议，是在政治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自中国革命以来，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孙中山不仅仅在一个广东省可以起政治作用的局面。维经斯基指出，北京政变使孙中山为自己的活动赢得了广大的政治舞台。孙中山应该利用这个舞台，要向中国广大民众表明，目前他在为国家的统一，为反对外国的压迫而斗争，而不是在争夺总统职位，不是在为国民党一党争夺政权。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不应该被动地反对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而应该利用业已形成的局面，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剥夺军阀集团的代表资格。^①

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于12月联合发出通告，号召各地利用孙中山北上的机会，迅速开展国民

^① 参见《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4年11月底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55～55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会议运动，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等，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以形成一个全国民众参与政治运动的局面。^① 这样，从1924年底到1925年春，以孙中山北上为契机，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

孙中山到天津后，已经重病缠身。曾经热情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冯玉祥，也已经远去西北。张作霖和段祺瑞本来就无诚意，哪里还会与孙中山讨论国是。孙中山惟一能够做的，只是同段祺瑞在召开国民会议还是善后会议问题上进行较量。

不料，孙中山因重病很快在北京逝世。从孙中山北上的结局来看，国民会议运动和国民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成了其惟一的收获。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北上，是希望他实践北上宣言，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平等条约，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但从孙中山本人来看，其北上的真正目的是否如他在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一些共产党人对此始终抱有怀疑态度。曾经反对过孙中山北上的蔡和森后来这样说：“如果孙中山不死，则很难说他会做出什么其他事情，是否会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此外，这个北上的策略不是以人民群众力量的发展为基础，而是建筑在利用军阀分化过程上，建筑在政治变革上。离开广大工农革命群众已经奋起的广东北上，值得详细讨论。”^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孙中山北上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深以为然。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309～3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8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认识领导权

陈独秀：无产阶级要做一个督战者

早在1924年9月，陈独秀就开始考虑召开中共四大的问题。因为自从这年5月中央扩大全会以后，党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党走上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组织得到扩大和加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日益发展。尤其是以孙中山北上为契机而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已经形成全国范围的反段运动，既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更锻炼了共产党人。为了进一步推进工作的开展，需要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党在与国民党的合作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从1924年1月国共正式建立合作关系起，国民党内的排共浪潮愈演愈烈，直至这年8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约束共产党人的行动，说明国民党上下对共

产党人在其党内的活动存有疑虑。国民党内的排共情绪令许多共产党人无所适从，遂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共产党究竟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也需要全党统一思想。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希望他能来参加中共四大^①。11月底，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开始进行。在维经斯基的建议和指导下，陈独秀确定会议的中心议题有二：其一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其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在起草会议文件的过程中，陈独秀得到了维经斯基的启迪和帮助，从而对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将反思的结果写成《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的教训》一文，于12月20日在《新青年》发表。陈独秀在文章中回顾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根源，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概况，总结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教训，最后指出：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2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国帝国主义者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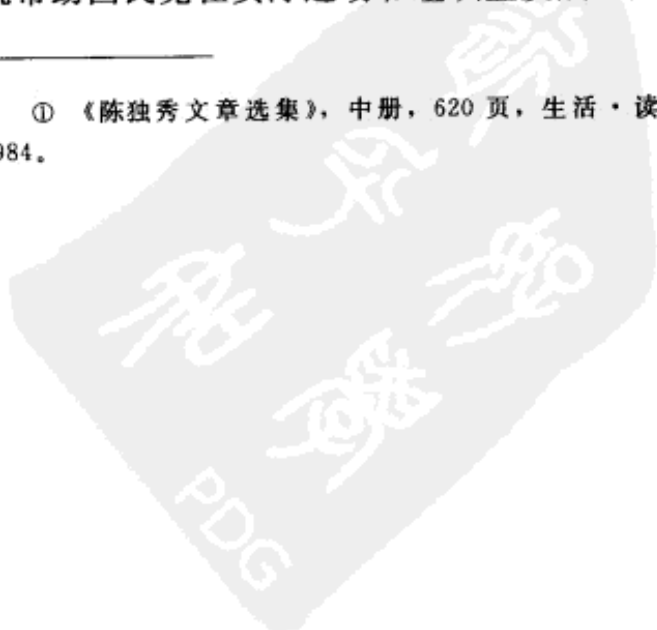
与一年前陈独秀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相比，这篇文章表明，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步。他已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变化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维经斯基出席会议并讲了话。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瞿秋白等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通过《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集中解决了此次会议的两个中心问题：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问题。《议决案》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是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第二，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议决案》指出，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已经分化为左、中、右派。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应该是：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

^① 《陈独秀文章选集》，中册，62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将这个决议案与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的教训》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四大上这个最关键的决议案，正是陈独秀起草的。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决议案。

中共四大闭幕后，瞿秋白在给鲍罗廷的信中兴奋地写到：

在讨论国民革命问题时，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陈独秀同志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谴责。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反对陈独秀同志的提纲。他们作出某种类似“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总的来说，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①

中共四大后，工人运动开始逐渐活跃起来。中共中央在组织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明显感到力量的不足，一方面缺少工作人员，一方面缺少经费。

^①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7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925年3月20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尽量多派一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工作；一是为中共中央追加资助的款项。按以前批准的预算，共产国际执委会每月向中共中央资助2250中国元，但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这些钱用于各地党的活动是不够的，所以陈独秀要求每月再追加1400元。^①

鲍罗廷在上海指手画脚

还在中共四大召开期间，孙中山病重的消息就传到上海。陈独秀明白，如果孙中山逝世，国共合作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当时正在上海的维经斯基，给了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及时的指导。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维经斯基指出：“为防备孙中山去世，你们需要起草一个宣言，不仅是给一般群众的宣言，而且也是给国民党中央的宣言，号召在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至于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维经斯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坚持加强国民党左派（中派）的方针，因为右派正在加紧组织起来，并把国民党以外的反民族分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会可能迫使我们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要掌握表明右派

^① 参见《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9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背叛的各种材料，说明他们背离了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而后来又又在孙逸仙近半年发表的宣言中作了阐述的基本原则和策略。”^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根据维经斯基的要求，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反应。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表示悲悼，同时希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能够遵照孙中山的遗嘱，继承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事业。唁电隐约道出了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未来的担心，其中说：

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山先生的肉体虽然死了，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和他手创的国民党决不会如一般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们的预料，随着中山之死而濒于危殆。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有力。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须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这种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须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

^①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1925年2月15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7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①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郑重指出：

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然而这也不成大的问题。因为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仍旧存在；这个党，尤其是其中革命分子，必然遵守大会宣言，必然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中山先生的主张与战略——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帝国主义——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中山先生时无异。^②

中国共产党向世人明确表示：虽然孙中山先生去世了，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决不变更自己已有的政策。要与国民党共同奋斗，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

陈独秀深知，孙中山的逝世必然会对国民党产生重大影响，共产党仅靠在报刊上督促国民党继续坚持孙中山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3月20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孙中山逝世在国民党内产生的影响，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他写道：“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1）捍卫对革命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继续执行和党的团结一致；（2）利用各地悼念孙中山的会议，在广大群众中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02~403、40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掀起国民革命运动，吸引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左派力量；（3）准备迎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①

根据以上政策，4月4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告第十九号，提出孙中山逝世后党的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借追悼孙中山做广大的宣传工作，尤其要大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以扩大反帝、废约运动。二是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公开征求党员，扩大左派力量。必要时，可在工人区域发起国民党组织，占据机关，不使右派侵入。

5月5日，陈独秀和张太雷分别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共同向党内和团内发出通告，提出全面发展国民党左派和向右派反击的计划和实施方法，其主要之点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号召人民加入国民党；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加强政治宣传，批驳右派的反动行为。

在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工人运动也在发展。这年2月，上海、青岛两地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至2月18日，仅上海一地已有22家工厂、4万多工人参加到罢工的行列。2月底至3月底，重庆、镇江、北京、杭州、淮阴等地也出现了工人罢工斗争。进入4月，斗争在继续发展，湖北、广西、济南、青岛、安庆、无锡等省市和正太、粤汉铁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有的罢工已不仅仅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而且转变为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反抗资

^① 参见《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9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本家压迫的政治斗争。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劳动总工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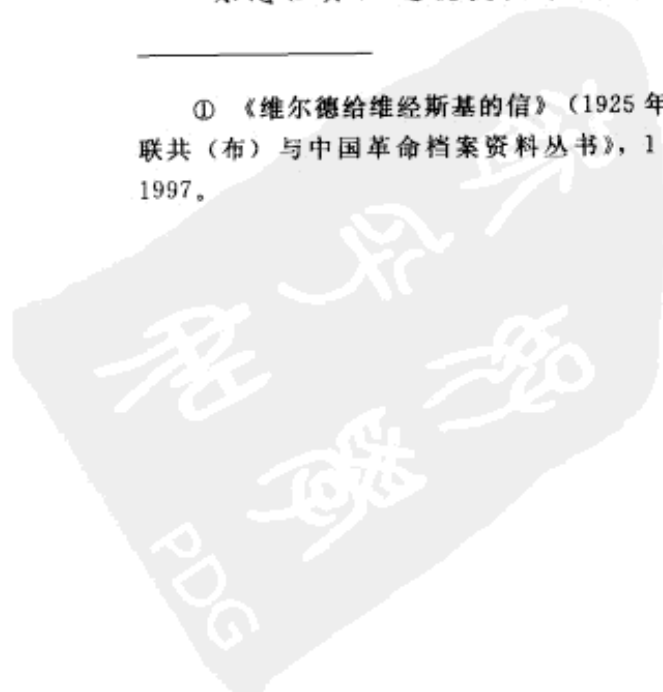
可以想见，当时不足1000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要指导各地的罢工斗争和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需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更何况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等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从事经常性工作，有70名共产党员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另外，还要派35名共产党员到冯玉祥国民军从事政治工作，派70名共产党员到河南国民军的军校。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后，对党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全力进行工作深表同情，他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中共中央确实尽了一切可能来领导全党从事国民革命运动。^①

然而，鲍罗廷对中共中央的工作并不满意。1924年11月，鲍罗廷随孙中山北上后，一直呆在北京。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才于1925年5月初启程返回广州。途经上海时，他与陈独秀等人进行了接触。在并不完全了解中共中央工作的情况下，鲍罗廷就对陈独秀等人指手画脚，批评他们的工作不得力。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鲍罗廷流露出了对中共中央的不满。他说：

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
紧急任务，这就提出了成立由两名中央委员和两名

^①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1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其他积极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重点地区的必要性问题。中央委员会也是不很愿意这样做的。该委员会应当立即从事吸引工农群众参加保卫广州政府的斗争的工作。广东局势一稳定，委员会就转到北方去。^①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人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中共中央急需领导人才的时候，鲍罗廷却要求陈独秀派人去广州组织群众，以保卫广州政府，陈独秀自然很不愿意。

五卅运动显英雄本色

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又恨又怕，尤其在上海有着重大经济利益的日本资本家更是如此。他们一方面联络中国官方，要求取缔工会组织，一方面积极设法破坏工人运动。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七厂宣布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领工资，结果遭到日本人的枪击和屠打，顾正红伤重身亡。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陈独秀即向全党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工人运动。其具体要求是：（1）由各团体发表宣言

^① 参见《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12～61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2) 由各团体发起募捐，援助上海纱厂工人；(3) 以各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民之事实，造成抵制日货行动；(4) 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5月19日，陈独秀再次通告全党，要求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积极行动起来，与青年团组织相配合，联合各地民众团体，组织游行演讲队、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发动群众，掀起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在中共中央号召下，上海学生最先行动起来。他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宣传，发起支援受难工人的募捐。帝国主义为制止学生的反帝活动，派出巡捕拘禁了部分学生，并且准备在5月30日进行审讯。消息传来，引起广大学生的公愤。

为了推动反帝运动全面展开，陈独秀在5月28日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人出席。陈独秀在会上指出，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成立一个有工农联合的组织，如此才能取得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上的初步胜利。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动员工人、学生于5月30日举行反帝示威游行。

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的马路上开展反帝宣传、讲演、示威游行，结果又有100多人被捕，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下午，英国巡捕向聚集在老闸捕房的群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40多人，造成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同时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以便将分散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第二天，上海实现了“三罢”。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宣告成立。当晚，中共中央决定以上海总工会为核心，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成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同时决定将斗争扩展到全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长沙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一时间成为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遍及各地，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没有国际代表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独立领导的规模宏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配合下，在运动的发轫和发展阶段精心策划，部署正确，策略得当，将运动不断推向高潮。

陈独秀始终关注运动的发展走向，并随时予以引导。从6月至9月，他在《向导》发表了11篇与五卅运动有关的文章，阐明运动的性质，提出斗争的口号和策略，揭露帝国主义的造谣污蔑，批评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充分发挥了指挥者的作用。

在领导五卅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在香港和广州组织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之久，不仅声援了五卅运动，

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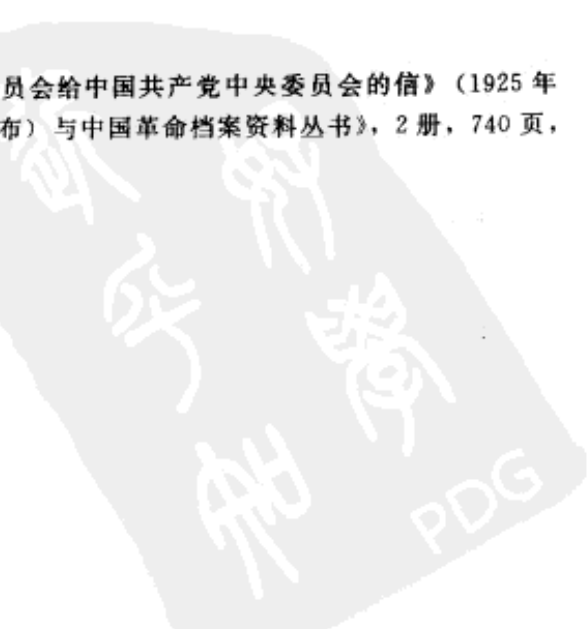
一个仅有 2000 多人的党，一个尚处于秘密状态的党，能够在遭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掀起翻天覆地的反帝革命运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叹。共产国际领导人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也破天荒地第一次承认：最近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实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①

陈独秀骑虎难下，莫斯科使出高招

五卅运动进行了不到一个月，上海即开始出现不利于运动发展的局面。6月26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无条件结束罢工。小资产阶级受民族资产阶级影响，斗争情绪也开始低落。从7月初开始，大、中学校陆续放假，大部分学生离校回家。这样，工人的斗争逐渐陷于孤立境地。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疯狂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每天都有血案发生。

始终关注运动走向的陈独秀，此时虽然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反帝联合战线已经发生分化，但他并没有采取“收兵”策略。为了继续发展运动，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陈独秀提出两点措施：第一，宣传群众，使广大群众明白，他们斗争的目的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不是上层资产阶级提出的“速了”、“缩小范围”和“局部交涉”。第二，建立一个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以集中领导革命

^①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25年7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74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民众的势力。^①

从未领导过如此规模宏大的革命运动，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并不知道在反动势力实行高压，联合战线已经破裂，群众力量已经涣散，无产阶级已经陷于孤军作战的情况下，再继续坚持斗争和扩大斗争，非但保护不了工人运动，而且会招来更大的挫折和失败，不可能将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此时惟有收束运动，结束罢工，保存力量，才能避免更大损失，有利于今后的斗争。

倒是俄共（布）中央领导人从来自中国的报告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形势，认为此时是中国共产党应该有组织地实行退却的时候了。7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运动正在走向低潮，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把结束罢工和准备进一步斗争联系起来。^②

与陈独秀的策略相比较，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策略无疑是正确而现实的。

为了落实莫斯科方面关于适时结束罢工的决定，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中国。他帮助中共中央制定了对罢工运动实行“刹车”的具体措施。这样，至9月中旬，上海工人在争取到资本家一定让步后，陆续复工。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28～4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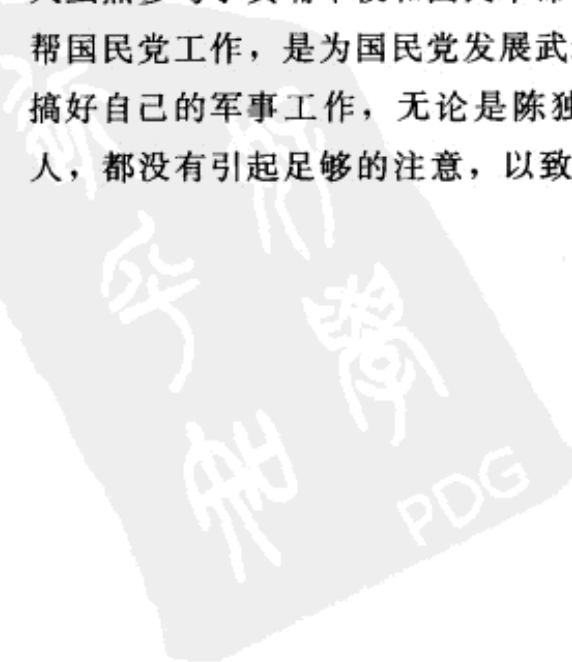
^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1925年7月2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4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同国民党新老右派交锋： 进与退的变奏

多变的国际指示令陈独秀无所适从

1925年7月，当五卅运动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至关重要的信。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等对孙中山国民党重视武力、忽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发动进行过许多批评和抨击，而陈独秀等人却恰恰对军事工作重视不够。共产党人虽然参与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工作，但却认为是在帮国民党工作，是为国民党发展武装。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搞好自己的军事工作，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以致在连续四届中央机构中，



都没有设立军事部。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与陈独秀等人认识上的缺陷有关，也与莫斯科方面一味支持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不重视发展中共的军事工作有很大关系。

瓦西里耶夫的重要来信，谈的正是中共的军事工作问题。可以想象，当陈独秀接到这封信时，心情一定十分复杂，因为这是自从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以来，共产国际领导人第一次正式以书信的形式向中共中央谈军事工作！

瓦西里耶夫在信中指出，五卅运动走向低潮意味着将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会有更加顽强的武装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以特别认真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组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工人部队和农民部队。他具体指出：“工人部队是革命军队最可靠的核心，是它的基本干部来源，革命军队的军政干部都将从工人队伍中选拔。最好按企业组织工人部队，以便使每个企业都拥有独立完整的战斗单位。在城区和市内，应当把部队联合成更大的由秘密信号、动员计划等联系起来的战斗单位。”

瓦西里耶夫还强调：工人部队的核心是共产党员，指挥人员应当从特别可靠的人中，当然最好是从共产党员中挑选。

在信中，瓦西里耶夫将农民武装问题也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农民在当前的武装搏斗中站在哪一边。所以，建立农民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方面最重要的任务。信中就组织农民部队的有关问题，如对农军的训练、与工人纠察队的联系、部队的管理等，向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一系列指导。^①

^① 《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1925年7月21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39～6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陈独秀接到这封信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又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指示》基本以瓦西里耶夫的信为蓝本，只是将其更系统化了，而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项非常重要而现实的任务，这就是：组织军事部。《指示》强调说：“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特别军事部。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在党的经常不断的和非常警惕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指示》对于军事部的组织结构、军事部的职能等都作了严格规定。^①

毫无疑问，瓦西里耶夫的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指示对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震动是巨大的。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之后，这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从此，中国共产党正式将军事工作纳入中央工作之中。

然而，陈独秀根本没有料到，在7月还主张共产党大力发展工农武装的瓦西里耶夫，到了9月21日，竟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了一封与上封信态度完全相反的信。瓦西里耶夫在信中说，根据加拉罕和维经斯基的汇报，他对中国的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正在形成（部分已经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和孕育着极其危险后果的相互关系。

第二，这种相互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中共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和中共的当前任务缺乏明确的认识所致，有产生“左”倾的危险，而且我们的军事人员尤其会患这种病症。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57～66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第三，此外，有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中国领导同志十分用心研究军事和外交问题，以致因此在吸引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工作中蒙受了重大损失。

瓦西里耶夫在阐述了上述问题后，还在信中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有：（1）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2）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细心地接受指导。（3）我们的军事人员应当专门在这方面接受指导。^①

对于瓦西里耶夫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显然很重视。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瓦西里耶夫的建议，正式决定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其中强调：

建议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

^① 参见《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78～67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共产党的) 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5) 同时中共中央应当经常仔细地研究国民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和军阀中的社会重新组合。^①

由要求中共中央重视军事工作，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力量，到不主张共产党人占据国民党领导位置，批评中国共产党过于重视军事问题。在短短两个月内，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自从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情绪日益增长，“戴季陶主义”出笼，国共关系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为了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只能要求中国共产党全面向国民党让步。这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共产党人是否在新成立的政府中担任职务，这个问题就提上了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为了不引起国民党人的怀疑，打消国民党人的顾虑，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这一指示对陈独秀“在野党”观点的形成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陈独秀责问戴季陶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9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居。1925年春，戴季陶在北京、广州等地发表演说，反对国共合作，同时也反对“阶级斗争”的提法。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季陶向全会正式提出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后，戴季陶发表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宣传三民主义的哲学是民生哲学。6月，戴季陶又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他提出仁爱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民、工人努力，所以压迫与被压迫不是截然对立的。

为了不受广州国共合作气氛的影响，戴季陶来到上海。此时，上海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如火如荼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戴季陶看到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长，便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了，又写下《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一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说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饰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一面又批评左派分子只讲空话，不问实际效用。他的意见是：“我们今天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为农民工人而奋斗，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所应取的途径。”在谈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时，他更是露骨地说：“大家所以要进中国国民党的缘故，我想最少总不必一定希望闹完了中国国民革命，就算是达到革命的目的。既然这样，就要脚踏实地，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上做工夫。如果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不把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团结，作为自己的

责任，只是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内，扩张 C. P.（即共产党——引者）或 C. Y.（即青年团——引者）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 C. P. 非 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一定会使实际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反对和盲动两种势力，摩擦鼓荡。……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就是老实做信奉三民主义，老实以国民革命为目的。”

戴季陶还在他的小册子里罗列了共产党人的种种“罪状”，说共产党是借国民党的躯壳，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个小册子公开发行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人，对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拍手叫好。有人称：“戴某的几本小册子是很忠实的研究成绩，是一个深切而正确的叙述。”还有人说：“《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一部书里面所叙述的，句句都是我想说的话，至今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① 国民党右派把戴季陶的小册子奉为反俄反共的《圣经》，一时间反共气焰甚嚣尘上。

戴季陶主义一出笼，陈独秀就认识到其对国共合作的危害性和反对共产党的实质所在。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时，专门讨论了对戴季陶主义的认识问题。会议指出：“中国最近四个月来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动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戴季陶等）在国民党内，假借

^① 邵元冲：《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1925年7月。

‘真正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及共产党。这一派人形成了国民党的右派，一天天的明显出来；虽然他们竭力自别于买办军阀派的国民党俱乐部及辛亥俱乐部等类的分子，然而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客观上便同样的是帮助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①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国民党新右派理论的形成。陈独秀对此非常重视。1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五号通告，要求全体党员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在宣传上要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来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思想。^②

为了反击戴季陶主义，清除其错误思想的影响，《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连续发表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

陈独秀在《向导》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文中以大量铁的事实，对戴季陶攻击共产党的言论进行了一一批驳。其中写道：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 C. P. 或 C. Y. 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 C. P. 非 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

^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52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 和 C.Y. 之发展，须有以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斗争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像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 C.P. 和 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 C.P. 的很少很少，比较 C.P. 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 C.P. 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 C.P. 发展，还是 C.P. 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 C.P. 非 C.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 C.P. 非 C.Y. 的国民党员，得着或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①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像要想一举便把非 C.P. 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种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 C.P. 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

^① 指国民党省党部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东以外，我们不知道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 C. P. 同受压迫，并且对于 C. P. 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即许崇智——引者）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纓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

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他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陈独秀的公开信可说是义正辞严，有理有据。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真面目。一时间，戴季陶主义成为过街的老鼠，在国民党内也发出了反对之声，连戴季陶本人也觉得灰溜溜的。

大革命失败后，当《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重刊时，戴季陶在序言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产党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因而国民党当中许多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使得戴季陶主义的同情者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因此，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们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

戴季陶的哀叹说明，陈独秀等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确实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维经斯基：准备退出国民党

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发生了一起血案。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客击中，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停止呼吸。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优秀领导人廖仲恺先生，就这样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一切。

廖仲恺先生积极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对于一部分国民党老党员反对国共合作、与军阀勾结的行为深恶痛绝。当得知反对国民党改组的一帮人企图加害于他时，他对妻子何香凝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假使我有三年的工夫，我敢决定国民革命一定成功。那些反对改组的人并不为国民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闹意气，不必管他。我决心要支持孙先生改组，不必计较这些利害的。”

廖仲恺竭力促成并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热情歌颂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列宁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奋斗。他亲切地接待来自苏联的军事、政治顾问，诚恳地与他们合作共事。他也同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挺身为共产党人排遣一切不利的障碍。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拥护三大政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积极支持广东的工农运动，设法为参与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们提供食宿；并且积极与共产党人相配合，同英帝国主义进行强硬的外交对话。

廖仲恺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反动势力的不满和恐惧。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大上分析廖仲恺被害的原因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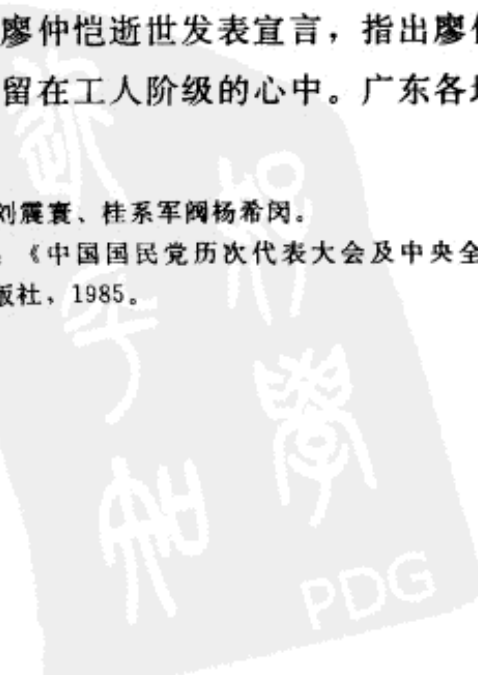
廖先生之遇害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内的；一是对外的。现在我先说对内的。廖先生是要谋党的发展、政治的发展、革命的发展，所以在驱逐刘、杨^①以后，便极力谋求军政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统一，并积极扩大党军。这是正中了好官污吏、无聊政客、不法军人的嫉忌，先便诬蔑廖先生是共产、是赤化，后来还下了忍心将廖先生杀害。对外呢，便是帝国主义者怀恨廖先生主张联俄、联合弱小民族及援助罢工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便愿以二百万金接济反革命派推倒广东革命政府，便先要除去廖先生，减少革命政府的势力。^②

廖仲恺先生的被害说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势力为了反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不惜以枪弹相见了！

廖仲恺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讣告，通令各机关团体下半旗志哀三天。国民政府通令发给1万元为廖仲恺举行国葬。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廖仲恺逝世发表宣言，指出廖仲恺的反帝国主义精神将永远留在工人阶级的心中。广东各地工农群众纷

① 指滇系军阀刘震寰、桂系军阀杨希闵。

② 荣梦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19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纷举行追悼会。苏联、印度、波斯、德国、摩洛哥、土耳其、保加利亚、叙利亚等国派出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追悼会；暹罗（泰国）等国发来唁电。

为悼唁廖仲恺先生，中共中央专门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廖仲恺的逝世，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希望国民党中央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①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廖仲恺被害，以及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右派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辛亥同志俱乐部——的猖狂活动，一切迹象表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不但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共产党，而且还联络国内外反动势力，希图消灭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

形势的变化使陈独秀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为了研究对国民党的政策问题，陈独秀决定再次召开中央全会。

当时，由于奉系军阀在上海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已经形成恐怖局面。为了确保安全，陈独秀经过与维经斯基商议，决定将会议移往北京召开。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维经斯基给予了陈独秀有力的指导。

1925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检讨了中央在认识国民党派别上的失误。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

以前在我们的同志中，在国民党党员中，分析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48～4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把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列到中派，这不但在理论上不正确，而且在策略上也不适当。第一个缺点是我们的同志不知不觉的忽略了自己的地位，而完全成了一个左派的国民党党员；第二个缺点是使国民党内左倾的分子误以为左派即共产党派之别名，凡未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都以中派自居，把一切国民党应有的左倾政策，都看做共产党的政策，而不肯赞同；第三个缺点是使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如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目反动派为右派而以中派自居。并且在事实上从前的所谓右派已公然反动，已公然离开国民党了。从前的所谓中派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可是所谓左派，单是一时的论调左倾是不够的，必须是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实际的政治主张上，不但和反动派不同，并且确与右派不同，尤其是与共产派亲密结合这一点，是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左派之特征。

为了使全体党员能够分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反动派，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对这三个派别作出以下界定：

左派：1.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底；2. 为革命而赞助工农运动；3. 为民主政治而反对军阀；4. 联络苏俄与共产党；5. 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右派：1. 反对一派帝国主义且因工农奋进而与帝国主义妥协；2. 主张劳资妥协；3. 为保育政

治（指所谓仁政和贤人政治）而反对军阀；4. 联络苏俄排斥共产党；5. 保存反动势力抵抗左派。

反动派：1. 勾结帝国主义；2. 摧残工农运动；3. 勾结军阀；4. 反对苏俄与共产党；5. 自身即是反动势力。

通过对国民党派别的分析，会议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政策，这就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如何实行这一政策呢？会议还制定了相应的方法：“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我们的党应当积极的跑到政治舞台上去，到处实行我们自己的思想斗争和策略。”具体说来就是：“（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二）工农群众之获得；（三）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①

会议决定共产党人不在国民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显然是受了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他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也说，他在会上提出应该及时准备退出

^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89～4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但他的意见受到了维经斯基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照一般的理解，应该说这次会议拒绝了退出国民党的建议。

然而，决议透露出了这样一个意思：所谓不占国民党领导地位，正是为了随时退出国民党，这一点可以从俄共（布）秘密档案中保存的一份维经斯基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告中得到印证。

1925年9月28日，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谈筹备这次中央扩大全会的情况。在报告中，维经斯基分析了国共之间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认为共产党人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时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没有政治舞台上充分显示自己的面目，在革命形势允许的情况下没有大力发展自己的组织，因而造成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之间关系的不明确。二是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结果不仅引起了左派的怀疑，而且给右派攻击共产党人提出了口实。维经斯基在报告中透露：

在由陈独秀同志起草的关于国民党关系的专门提纲中（尚未翻译），将提出一些协调这种关系的实际措施。其中的主要措施是：1. 不一定要进入领导机构，而要更多地做群众工作，当然仍留在工农部和军队的政治部；2. 不让所有新入党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3. 在国民党群众中做广泛解释工作，说明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说，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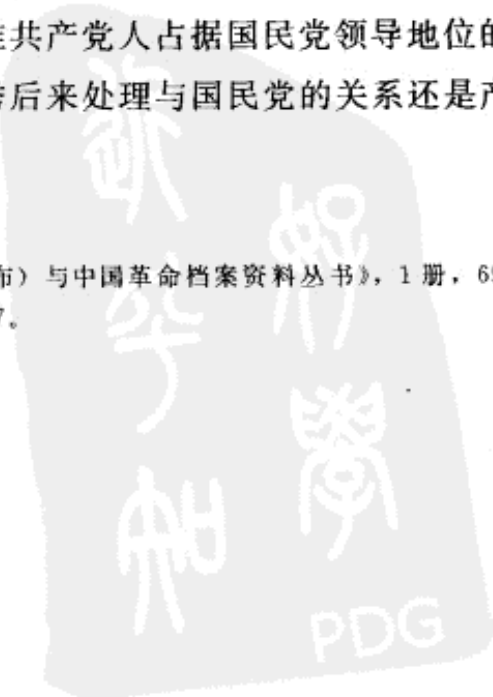
国民党的关系中，要从联盟转向联合。我们现在不打算通过发表某种声明或作出正式决定来完成这种过渡。但是现在就需要采取这种过渡方针。^①

陈独秀与维经斯基都有退出国民党的打算。他们都认为，目前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开始束缚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手脚。他们的不同在于：陈独秀是主张采取急进的方式，立即退出国民党，以彻底实现共产党的独立性。而维经斯基则主张采取缓进的方式，在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提下，另外寻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方式，最好是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还能扩大这一联盟。即从现在开始，准备由党内合作向党外合作过渡，而不是立即退出。

也许，维经斯基在全会上批评陈独秀立即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时，可能并没有将自己的实际想法讲出来，所以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反对退出国民党。但在他指导下形成的决议，实际上已经贯彻了他的意图。这就是：不占据国民党的领导职位，以便为最终退出国民党做准备。

无论是陈独秀的急进方式，还是维经斯基的缓进方式，都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然而，准备退出国民党的想法，连同共产国际不准共产党人占据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命令结合地一起，对陈独秀后来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是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92～69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莫斯科运作反奉倒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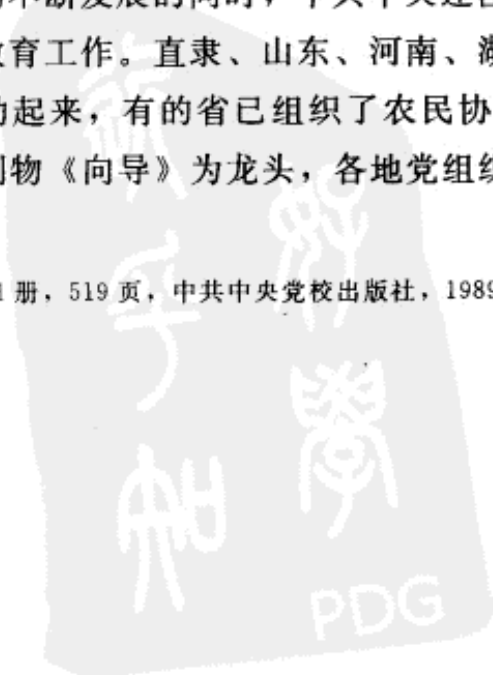
奉系军阀对五卅运动的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25年夏秋之交，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一场反奉倒段运动在全国兴起，并且有不断高涨的势头。

这年10月，受反奉倒段运动影响，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了反对张作霖在军事上的不断扩张，发起反奉战争。反奉战争打击的是奉系军阀势力，客观上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反奉倒段斗争，因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军阀孙传芳反奉的目的是为了与张作霖争夺地盘，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与共产党的反奉倒段目的是大不相同的。

为了使反奉战争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宣言》指出：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全国的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乃是从释放爱国运动中的政治犯，启封爱国机关，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装，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一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①

在推动反奉倒段运动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注重开展农民运动和宣传、教育工作。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省的农民开始逐渐发动起来，有的省已组织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以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为龙头，各地党组织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5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出版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报刊，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还在北京成立了党校，培养党的干部。总之，尽管客观的政治条件非常恶劣，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仍在竭力推进党的工作。

对于扩大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工作，维经斯基是很满意的。11月11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扩大全会后，党和共青团在不断发展，我们党和共青团无疑作出了很大成绩。^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奉倒段运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奉军将领郭松龄停止进攻国民军，于1925年11月23日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并率部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

郭松龄的倒戈使反奉倒段运动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在北京的加拉罕和维经斯基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将运动引向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以国民党人为核心的国民政府的方向。在他们的指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发动一场“首都革命”，联合国民军共同倒段。为完成此任务，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由赵世炎负总责。

11月25日，在反奉倒段运动的打击下，段祺瑞政府的财政、外交、内政、陆军、海军、教育等部总长李思浩、沈瑞麟、龚心湛、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等宣布全体总辞职，内阁立时陷于瘫痪状态。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取得国民军的支持，于11月28日发动一场革命，目标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73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是夺取段政府的重要机关，打乱其指挥系统，迫使段祺瑞下野，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时国民政府，然后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产生正式的国民政府。

很显然，这是一次模仿俄国革命模式，企图通过城市暴动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的运动。11月28日上午，“首都革命”爆发。但由于国民军将领临时改变态度，不支持推翻段政府，反而将段祺瑞保护了起来，致使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首都革命”的失败虽然与国民军将领改变态度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反动势力异常强大的中国，靠和平请愿运动来达到推翻军阀政府的目的，显然是不现实的。

“首都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陈独秀对推翻段祺瑞政府的斗争目标失去信心。因为他看到，郭松龄的军队仍在进击之中，张作霖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推翻军阀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契机并未失去。他的这一想法反映在12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其中指出：

今后的政权归诸人民呢，还是仍旧落在重新结合的军阀之手，现在已经到了紧急的难关了。要打破此难关，只有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并且要力使国民军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够解除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剥夺人民自由的军阀武装，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①

这段文字表明，陈独秀当时认为，在段祺瑞政府被推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5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后，应该建立以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政府。他的主张与在北京的加拉罕和维经斯基的主张是一致的。但他们的主张却违背了莫斯科的意愿，因为斯大林等人是希望吴佩孚参与政府的。

斯大林等人为什么对吴佩孚如此看重？原来，继孙传芳向奉军宣战之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的吴佩孚也开始积极活动，并于10月21日通电全国，声称已组织14省讨贼联军，准备向张作霖宣战。

在莫斯科，以伏龙芝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在分析了中国的形势之后，认定吴佩孚对奉系军阀的宣战为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带来了希望。10月底，伏龙芝在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称：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伏龙芝认为，吴佩孚的反奉举动可以造成对苏联和中国革命有利的局面，所以必须加以利用。为此，反奉各方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以推翻段祺瑞执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有直隶人（即吴佩孚）、北方国民党人（即冯玉祥）和华南（即广州政府）的代表参加的中国政府。^①

斯大林等人接受了伏龙芝的建议，于12月3日作出如下决定：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730～73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认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①

这里所说的“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就是指加拉罕和维经斯基希望建立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民主政府的主张。

12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致信维经斯基，转达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前一天的决定。他在信中谈到了斯大林等人对维经斯基的看法，说：“总的一致的印象是您是否太左了，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and 影响，而过低估计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以外势力的力量和作用……政府只能是有直隶参加的联合政府，不急于搞政变，要千方百计加强在群众中的工作，巩固广州”^②。

然而，无论是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加拉罕提出的建立民主政府的计划，还是斯大林等人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计划，都被郭松龄战败身亡和奉直联合“反赤”的行动所粉碎。

事实证明，两个计划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前一个计划是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而后一个计划则是过高估计了吴佩孚的革命性。其实，早在1923年，斯大林等人就因为高估吴佩孚的革命性，曾经上过一回当^③。尽管当时他们对吴佩孚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没有真正从中吸取教训。这一次，他们又被吴佩孚“反对奉系”的口头表示所迷

^{①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742、743~74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③ 当时苏俄方面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进步人士，极力促使他与孙中山联手建立中国新政府。然而，吴佩孚却制造了屠杀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二七惨案，暴露了其封建军阀的真面目。

惑，对其再次抱有幻想，认为吴佩孚是反奉倒段斗争的力量之一，是组建未来中国新政府时必不可少的一员。不过，这一次，吴佩孚不是以屠杀和逮捕几十个共产党员来“报答”斯大林们，而是以与张作霖联手，共同发起“反赤”战争对他们作了回答！

陈独秀勇挑反右大旗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身亡后，蒋介石、汪精卫在鲍罗廷指导下，将胡汉民和许崇智赶出了广州。当时在广州的一些老国民党人邹鲁、林森等人便有“兔死狐悲”之感，遂对鲍罗廷生出许多不满来。

这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以林森为主席、邹鲁为秘书长，率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北上，揭露沙基惨案^①的真相，争取北京政府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林森、邹鲁却认为这是鲍罗廷的“阴谋”，是要把他们也像胡汉民、许崇智一样，赶出广州去。于是，他们对鲍罗廷的不满转变为仇恨。当代表团北上行至上海后，他们即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叶楚傖、谢持、邵元冲、戴季陶等人商议，决心发起反共运动。为了网罗更多的人参加反共会议，他们还决定先以谢持由津浦路人京做准备，林森、邹鲁则到江西、

^① 1925年6月，为声援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省港大罢工。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余万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密集的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致使50余人被打死，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这就是“沙基惨案”。

九江、武汉等地联络反共分子。

10月14日，林森、邹鲁等到达北京。10月16日，林森、张继、谢持、邹鲁、石瑛、茅祖权、傅汝霖来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要求由北京执行部出面发出通告，邀请在京各中央委员连同上海执行部各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国民党中央一届四中全会，以决定对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由于林森等人的要求不符合组织原则，遂遭到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于树德等的拒绝。

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林森、谢持等人早已深恶痛绝。由于执行部由李大钊负责，许多共产党人参与其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给予了坚决抵制，故他们早就把北京执行部当作眼中钉。这次遭到拒绝后，他们便于10月25日率四五十名打手冲进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捣毁了许多设施。第二天又指挥二三十人，手持铁杖，准备强占执行部。由于当时许多党员在执行部集会，这些人未敢动手，只好悻悻离去。

由于北京执行部的抵制，林森等人以北京执行部的名义发起反共会议的意图没有得逞。于是，他们只得另谋其道。经过一番计议，他们认为到远离北京的张家口去开会更为合适。当他们将计划通知了冯玉祥以后，却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不再顾忌北京执行部是否反对，决定仍在北京召开会议。为了使此次会议名正言顺，他们称其为“国民党一届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11月16日，聚集在北京的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伦、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稚晖、傅汝霖等人，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出“铣电”，要求上海执行部转在沪各委员，“于本月梗（二十三）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

员会全体会议”。他们还致函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力陈“反共”之必要，要求国民党中央与他们一致行动。^①

11月23日，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坚决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中央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叶楚伦、邹鲁等。列席会议的有监察委员谢持、张继。林森任会议主席。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共开会22次，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多项提案。会议还选举了所谓“中央领导机构”：以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后，他们便在上海环龙路44号设立了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且创办了《江南晚报》，作为其宣传喉舌。他们派人到各地活动，扩张势力。

从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牌，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由西山会议派把持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借着“国民党中央名义”，向各地发号施令。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员受到他们的蛊惑，便跟着他们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作对，攻击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一直注意着国民党右派的新动向。在得知西山会议召开后，陈独秀立即于11月25日通告全党，要求各地以国民党党部名义通电反对西山会议，号召国民党员团结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周围；同时严促广州国民党中央迅速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决定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12月2

^①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9日。

日、9日，陈独秀又接连两次通告全党，要求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宣布西山会议无效。

西山会议派的出现，使国共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对付西山会议派，需要陈独秀拿出明确的态度。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出现，说明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人物已经背离了国民党的党纲和奋斗目标，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国民党，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所以，共产党就不能以对待国民党内的派别来对待他们。据维经斯基后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说，当时中共中央对西山会议派的认识和对国民党的策略是：当资产阶级开始离开工人运动，离开统一战线时，自然在国民党身上也有反映。在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动摇。这期间，在国民党内就形成了右派，是由那些从1911年革命时起就加入国民党的分子组成的。他们同旧贵族、旧官僚有联系，同外国企业主有联系。国民党的这部分人不单是离开，而且是在争夺党内大多数、争夺机关。基于这种情况，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发生了争斗。共产党对整个国民党采取的方针是：设法孤立右派，不指责整个党，而要揭露国民党右派当中的那些不仅要脱离国民党而且企图分裂党的分子。我们要在不使党感到难堪的情况下把这些分子开除出党。^①

从事情发展的结果来看，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孤立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基本上得到落实。在国民党二大上，西山会议派受到严厉的谴责和处分。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国民党二大：第一次大让步之真相

鲍罗廷给陈独秀泼了冷水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陈独秀即认识到：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对国民党内的右派尚有一定钳制作用的话，那么没有了孙中山的国民党，其右派的活动会更加猖狂。所以，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先进分子，尤其是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力量。

从这年4月起，陈独秀便开始考虑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在以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要占据主动地位，要多选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以便结合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给全党的通告中，陈独秀要求各地应尽力扩大国民党左派，并且解释说：“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

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此时我们在国民党内还是极少数，倘不能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不独第二次选举要失败，即平时亦无法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①

5月1日，陈独秀召集了中共中央局临时会议。针对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即将于5月18日至25日召开，会议就国民党二大及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决议：

(1)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宜在广州。非广州失守不能主张在河南开会。

(2) 大会代表以有党部组织者始有选派代表权，反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任何人代表无党派之省份出席大会。

(3) 大会时间，可在八月中。

(4) 此次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我们的同志宜首先提出开除反对分子（如加入北京国民党俱乐部）案，及政治宣言案（宣言草案录后）^②，此二案，我们须对中派极力坚持，不能让步。

(5) 在此次国民党中央委全体会议中，我们的党团书记，中局指定平山^③同志担任，粤区书记，亦应参加此党团会议。

(6) 我们即时通告各地同志，以国校^④名义对此次国校中委会议发表开除反动分子及政治宣言的主张，尤其是粤地

^①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0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指陈独秀为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继承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强调国民党将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③ 指谭平山。

^④ 指国民党。

同志们应运动当地国校各级党部包围此次中委会议，使之实现我们的主张——开除反动分子，及采用我们所拟出的宣言。

(7) 此次会议后即应由国校的政治委员会提议扩大在北京政委的职权和人数。^①

5月5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第三十号，具体部署加强国民党工作的计划，要求各地切实做好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二大上与右派、中派竞争。为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通告要求，从现在起就应扩大国民党左派队伍，同时掌握国民党内部训练大权，在国民党地方组织内揭露右派的真面目，开展反对右派的斗争。^②

然而，陈独秀压根儿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政策却遭到了鲍罗廷的否定。

随孙中山北上的鲍罗廷，在孙中山逝世后于5月初从北京启程返回广州。在途经上海时，他与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了几次会议，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孙中山去世后的国共两党合作问题。

据熟知会议进展情况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事后说：“会议进程、交换意见情况和相互关系都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觉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③

正是在这几次会议中，涉及国民党二大的有关问题，其

^① 《关于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08～4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册，412～41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③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1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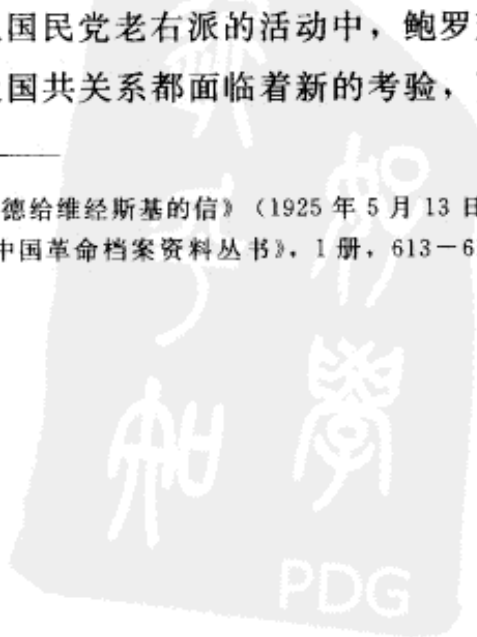
中包括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执委会的人数。鲍罗廷在会后委托维尔德给加拉罕发去一电，谈到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不同意见。电报说：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最后一致同意最低限额——4人，其余的根据代表大会期间中国整个局势而定。

很明显，最早不同意多选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的，不是陈独秀，而是鲍罗廷。

不仅如此，据鲍罗廷说，他还与中共中央一起得出以下结论：“应当把胡汉民政府看做是向较为革命的政府过渡形式，因此，现在不必同它做斗争。主要任务是为将来同过渡形式不可避免要进行的斗争准备军事政治力量”；而对于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宣言中不会直接攻击右派”。^① 这些结论与鲍罗廷到上海前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国民党的政策是完全不一致的。可以肯定，陈独秀等人是在鲍罗廷的影响下，或者说是在他的高压下，才改变态度的。

人们不仅要问，鲍罗廷为什么要陈独秀认可明显右倾的胡汉民政府，为什么不主张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占优势，又为什么不主张攻击右派呢？关于这些问题，鲍罗廷没有直接的回答。但从鲍罗廷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孙中山逝世后，从国民党老右派的活动，鲍罗廷切实感到国民党的团结以及国共关系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而他对后孙中山时

^①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613—61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代的广州政府和国民党能否顺利地战胜右派，能否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存有疑虑。所以，他希望维持胡汉民对广州的领导，以便顺利实现向左派政权的过渡。与此相关，他不主张在形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直接提出反对右派的口号；也不赞成共产党员多占国民党的领导位置，以免引起国民党的反感，为右派分裂国民党制造新的借口。而且，为了保证国民党的团结和统一，他甚至准备让共产党人完全放弃国民党领导地位。关于这一点，他在报告中写得十分清楚：如果国民党右派能破坏党的组织性，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对他们来说就完全不可怕了。这里我们无法回避分裂。我们甚至准备在共产党员问题上向他们让步。例如，如果共产党员在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内使右派感到厌烦，我们准备召回他们。在中央机构中没有共产党员我们也可以做好工作。但是在保持党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有组织的、团结的领导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也不应该让步。^①

很清楚，为了保证国民党的团结统一，鲍罗廷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既然他已准备放弃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他不同意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多占名额，也就毫不奇怪了。

国际命令：不要争领导地位

鲍罗廷不让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二大中央委员会中多占名额，对于陈独秀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鲍罗廷的意见

^①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1925年2月14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57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与他的计划正好相反。他虽然与鲍罗廷进行了争论，但最终还是尊重了鲍罗廷的意见。他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中国共产党受着莫斯科的领导，而鲍罗廷又是莫斯科派来的代表。

这以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如火如荼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经历了反帝运动被镇压、工人阶级孤军作战的艰难时期，反击了国民党老右派的进攻，批判了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戴季陶主义”，见证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反对势力刺杀的事实……

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国共两党之间摩擦的日益加剧，使得政治经验并不丰富的陈独秀一时感到难以应付。他非常希望共产国际能够给他以帮助。

然而，陈独秀等来的，却是共产国际不让在国民党内争领导地位的指示。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由瓦西里耶夫提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向中共中央发出的9月28日指示，其中对陈独秀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这一指示的核心就是要共产党收缩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不要争领导权，不要占国民党的领导职位，以减少国共之间的矛盾。

可见，不在国民党中央争领导地位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这一政策同上述鲍罗廷的主张是一致的。根据这个指示，这年10月，维经斯基指导中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除必要时共产党人不再进入国民党领导岗位。

从5月鲍罗廷反对多选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到9月共产国际指示不要在国民党内争领导职务，再到10月

和 学

PDG

维经斯基提出共产党人不再占据国民党领导岗位，这接二连三的命令和决定，无疑对陈独秀产生了巨大影响。

可以说，陈独秀由主张在国民党二大争领导权转变为同意共产党人只占到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国际、鲍罗廷以及维经斯基都有着重大责任。陈独秀正是被他们推着一步步后退的。

维经斯基促成上海会谈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全会结束后，维经斯基仍留在北京，等候加拉罕从莫斯科返回，以便接受新的指示。

11月中旬，加拉罕回到北京。不久，北京便接连发生了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活动和“首都革命”失败两件大事。维经斯基认为，中国革命正面临着国民党右翼和反动势力“南北呼应，同时并进”的局面，一旦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会使广东革命局面毁于一旦。^①为了制止这种情况发生，维经斯基与加拉罕共同制定了瓦解西山会议派的策略。

维经斯基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立即开始着手贯彻上述策略。这时，西山会议派已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而且开始到处制造舆论，反对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大。在西山会议派的蛊惑和拉拢下，江浙等地的一些国民党人开始向西山会议派靠拢。这种情况使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担心：国民党中央能否顶住西山会议派的破坏活动，顺利召开国民党二大。

^①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1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维经斯基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亲自出马做分化西山会议派的工作。12月23日晚，维经斯基找到与西山会议派有联系的孙科，提议孙科约集西山会议派中人邵元冲、叶楚伦，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一谈。

当晚，孙科即同邵元冲、叶楚伦一起来会维经斯基。在会谈中，维经斯基得知孙科等人仍然承认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他认为这是可以分化西山会议派的大前提，于是提出次日约陈独秀等与他们三人共同讨论有关问题^①。

正在布置全党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击的陈独秀，接到维经斯基要他与孙科等人进行会谈的通知后，感到非常突然，但他还是服从了维经斯基的要求。

12月24日上午11时左右，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孙科、邵元冲、叶楚伦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进行了会谈，维经斯基亦在场。

陈独秀等人是仓促上阵，而孙科等人事前却进行了充分准备，并拟好了会谈提纲。于是，会谈只能根据孙科等人的提纲进行。根据这个提纲，双方讨论了党务、宣传、国共关系以及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

会谈进行得并不顺利。陈独秀等人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但还是据理力争。根据维经斯基、瞿秋白和邵元冲的有关记述，在会谈中，陈独秀等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鲍罗廷离开广州回国等要求，建议孙科等与广州国民

^① 瞿秋白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几句话可为佐证。瞿秋白在谈到1925年冬中共中央的情况时说：“国际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在他回国上船之前忽召集我们（独秀、国焘、秋白）和孙科、邵元冲、叶楚伦一次谈话。说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上，决不要三分之一以上之中央委员等等。”参见《瞿秋白文集》，5卷，552页，人民出版社，1995。

党中央言归于好，共同反对右派；同时又根据对方的提议，同意停止攻击西山会议派的宣传，同意在新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中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双方最后决定，分别由维经斯基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致电谭平山、孙科等致电汪精卫，要求延期召开国民党二大，以待孙科等人返回广州。^①

这次会谈及其达成的协议，是否就意味着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作了一次“政治上的大让步”呢？

如上所述，陈独秀在会谈前，一直主张对西山会议派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而维经斯基安排的这次会谈，则是对西山会议派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陈独秀的斗争方针和维经斯基的瓦解策略，从根本上讲并不矛盾，其目的都是为了打击西山会议派。在西山会议派另立国民党中央，并在江浙一带大肆活动的情况下，为了拉住与西山会议派有联系的国民党员，使他们不被西山会议派所利用，同时为了使国民党二大能够顺利召开，采取分化和瓦解西山会议派的策略，并无不妥之处。所以，维经斯基促成这次会谈，以及陈独秀等人参加这次会谈，当是无可指摘的。再从会谈达成的几项协议来看，陈独秀等人接受了对对方提出的一些条件，有退让的一面，但并没有完成接受他们的条件，也有斗争和争取的一

^① 关于这次会谈达成的协议，目前有四条和七条之说，这都是后人归纳的。本文的内容是根据当事人的记述综合而来。参见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51～45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2.《邵元冲日记》，223～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3.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瞿秋白文集》，5卷，387页，人民出版社，1995。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34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面。最后从会谈的实际效果来看。孙科回到广州后，未与西山会议派沆瀣一气，并多次在讲话中申明团结一致，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说明这次会谈“对右派队伍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① 所以，完全否定这次会谈是不妥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并没有因为这次会谈而放弃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方针，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决议案，正是在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下才提出和通过的。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是国民党二大通过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决议案。决议宣布西山会议为违法，是国民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决议根据西山会议派分子的不同情况，对其作出如下处分：

(1) 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

(2) 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伦、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 12 人，附和谢持、邹鲁，除张知本外，均参加西山会议，实属违背纪律。由大会用书面向上列 12 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错误，责其改正，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此 12 人中有一人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执行纪律。

(3) 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但他参加西山会议筹备会，但未参加正式会议，离京之日且表示悔悟。念其为党奋斗有年，应由大会给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5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予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①

是谁把蒋介石推上了台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这是国共合作的又一次盛会，在出席会议的25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100人。会议是在鲍罗廷的指导下进行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党务、军事、外交、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商人等决议案。

大会议决接受孙中山遗嘱和国民党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封建军阀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罪恶，指出中国的出路是：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

大会决定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强调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国民党既抱定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故对于苏俄，当以诚意与之合作；国民党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151～15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大会选举 36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二大过后不久，蒋介石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并在北伐过程中挑起了迁都之争，最终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于是有人认为，国民党二大不应该选蒋介石进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蒋介石之所以当选，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退让的结果。

其实，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孙中山在世时，对蒋介石就十分信任。1923 年，孙中山在确定联俄政策之后，将与苏联领导人进一步接触，争取苏联军事援助，以及考察苏联军队建设的任务交给蒋介石，要他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

蒋介石从苏联回国后，孙中山又委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将培养革命军人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蒋介石在筹备黄埔军校的过程中，擅离职守而去，孙中山非但没有撤他的职，还与廖仲恺一起苦劝蒋介石尽快回粤。蒋介石后来在黄埔军校的建设以及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等统一广东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1925 年 8 月廖仲恺遇刺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密切配合，在鲍罗廷指导下共同担负维持广州局势的重任，共同处理廖案，并将与廖案有涉且不拥护三大政策的胡汉民、许崇智赶出广州，因而得到鲍罗廷的充分信任。鲍罗廷在向来华考察的布勃诺夫率领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报告时说，蒋介石等人是“完全可靠的”、“无可非议”的，可以同他们“一起完成一项大的工作”。他认为：“随着许崇智的离去，梁鸿楷被解除武装和胡汉民被流放到海参崴，我们在广州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

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①

另外，蒋介石当时在公开场合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是积极支持的。西山会议派出现后，他严厉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反苏反共言论，指出：“要革命成功，须联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总理手创之三民主义，诚不同于共产主义，而其为革命的主义则同。总理深知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针对国民党人中对鲍罗廷的责难，蒋介石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②在对黄埔军校学员和东征军的讲话中，蒋介石多次强调要爱护民众，要为人民而战，要把军队建设成革命的、人民的军队，等等。

就这样，蒋介石为自己树起了一个“左派军人”的形象。到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蒋介石一身兼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校校长数职，已成为在国民党内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国民党二大期间，蒋介石于1月6日下午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当时出席的代表达196人。据《政治周报》

^①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16、140~1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3~10页，中央图书局，1927。

载：“蒋介石同志报告军事，述组织党军，击破杨、刘、梁、魏诸逆军及协同其他革命军讨伐诸逆、戡定内乱的经过。蒋同志并详述国民政府下之武力与邻省兵力之比较和攻守之大计。报告毕，全场欢呼。某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①

1月16日下午，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出席者共253人，蒋介石以248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与得票最多的汪精卫仅1票之差。这说明，蒋介石进入中央执委会与陈独秀的退让没有关系。从当时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贡献来看，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左派，都没有理由反对他进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错误判断

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上究竟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二大被看做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次大退让，所以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评价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的得失，不能仅仅从有多少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这一点来看，而应从整个国民革命大局和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的实际作用来看。

首先，从国民革命的大局来看。

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等，都预计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必然分裂，广州政府必然倒台，他们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195～19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用尽一切的阴谋，挑拨和支持国民党中的右派进行捣乱，资助反动势力向广州政府进攻。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之后，他们认为国民党二大已没有召开的希望了，即令有可能开，也一定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不知要闹出多少风潮来。

面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西山会议派的猖狂进攻，国民党内有相当一些人，甚至包括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都对会议能否如期举行表示怀疑。所以，当时国共两党面临的任任务，是稳定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的人心，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成功地举行国民党二大，以粉碎反动势力的破坏和攻击。

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大不仅顺利召开，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陈独秀对此非常满意。会后，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全党对于国民党二大的成功，应努力宣传，因为“这个成功是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是证明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因中山之死不因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勾结党中右派反动派捣乱而消灭”^①。蔡和森也为国民党二大叫好，认为“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成功，就是工人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战线的表现，因为这次大会更加确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说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的关系”^②。

对于国民党二大的成就，共产国际也是认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决议评价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了西山会议派，肯定了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人

^① 《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7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结成战斗联盟，从而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革命活动方针，使国民党保证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①

陈独秀、蔡和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所以对国民党二大作出如此积极的评价，不是因为其右倾，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国民党二大对于稳定革命大局和稳定国民党人心方面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国民党二大的主要内容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二大所发挥的作用来看。

国民党二大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坚持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打击国民党右派、保障工农革命运动的决议。国民党二大是在国民党右派，尤其是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对广州国民党中央造成重大压力的情况下召开的。会前，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扬言要在国民党二大上抛出反共提案，并在会议期间举行反共的示威游行。然而，由于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董必武、林祖涵、张太雷、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会议不仅粉碎了反动分子的阴谋，而且打击了西山会议派，通过一系列支持工、农、青、妇运动的决议案。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体现了国共两党多数党员团结合作的精神，达到了中共中央所期望的目的。

与国民党一大相比，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二大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权。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和议案的起草、审查等，主要是由国民党人负责，国民党二大的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党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辑，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人主持或参与下进行的。1925年12月，吴玉章率四川代表团到广州时，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尚未开始，甚至一些省还未选出代表。吴玉章当即向汪精卫提议，必须尽快开始工作。吴玉章被推为大会的秘书长后，在一批共产党人的鼎力支持下，积极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

大会期间，主席台上时时活跃着共产党人的身影：林祖涵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工作报告，董必武作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吴玉章作大会秘书处筹备工作报告。谭平山、刘尔崧、毛泽东、邓颖超（代何香凝）分别作了党务、工会运动、宣传工作、妇女运动的报告；于树德作北京政治情况报告；董必武、吴玉章、刘伯垂、夏曦、宣中华、韩麟符分别作湖北、四川、汉口、湖南、浙江、内蒙古党务报告；高语罕、许甦魂分别作旅欧、旅缅党务报告；杨匏安作关于廖案清查情况的报告。其他如张国焘、恽代英等都在会上发了言。大会各个报告的审查委员会，也都有共产党人参加：包惠僧、侯绍裘、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张国焘、黄平、许甦魂、黄学增、杨匏安参加党务报告审查委员会；黄平、刘尔崧、刘伯垂等参加工人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黄学增、易礼容参加农民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邓颖超参加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邵力子、毛泽东、范鸿劼参加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侯绍裘、夏曦参加青年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杨章甫参加商民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

总之，共产党人在筹备和举行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较高的理论水平，为大会取得积极的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好评。

在新的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权力比以

前有所增大。人们一般认为，国民党二大选出的 36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 7 人，未占到三分之一，这就是陈独秀退让的结果。只要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的职务作一具体了解，就会看出，与国民党一大相比，共产党员的权力实际上是增大了。

先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大后担任职务的情况：在 3 名中央常务委员中，有谭平山 1 人。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的中央党部（1 处 8 部）中：秘书处共 3 人，有谭平山 1 人；在 8 个部中，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

再看国民党二大后共产党员的任职情况：在 9 名中央常务委员中，有谭平山、吴玉章、杨匏安 3 人。中央党部中，绝大部分领导职务由共产党员担任。秘书处 4 人，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是谭平山、林祖涵、刘伯垂、杨匏安。在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商业、妇女、外事 8 个部中，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杨匏安、沈雁冰、黄日葵、冯菊坡、许甦魂、邓颖超、彭湃和罗绮园等分别为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外事、妇女、农民部秘书。

《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九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执行职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① 按照这个规定，共产党员虽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中所占比例未超过三分之一，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影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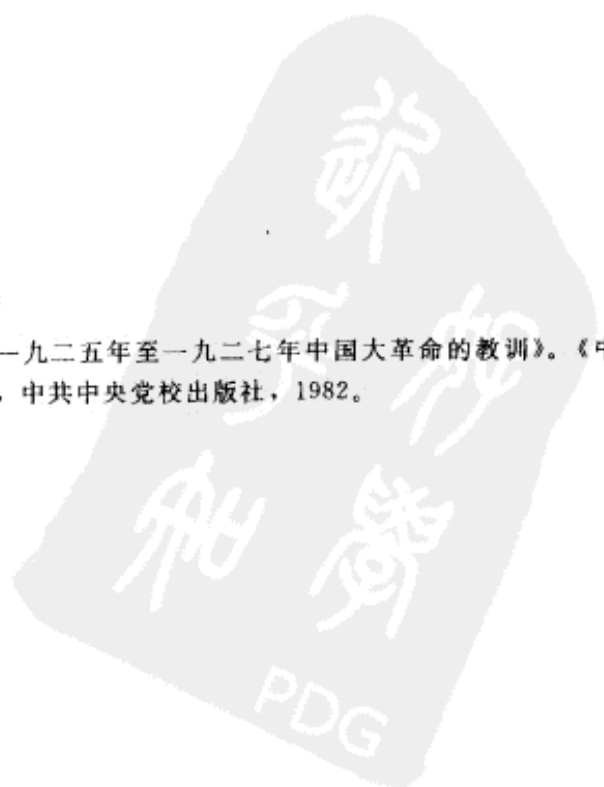
^① 荣梦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158~159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挥作用。相反，由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主要部门由共产党员负责或参加，这更有利于共产党对国民党施加积极的影响。

正是因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人数增加，影响扩大，才引起了国民党新右派分子的疑虑和恐慌，成为他们处心积虑地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抛出“整理党务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立三所说：“三月二十号事变是由于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表现更左倾，这当然使资产阶级更加恐惧而要压迫无产阶级。”^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说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上对国民党右派作出了一次大让步，显然与史实不符，判断有误。

^① 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共党史报告选编》，2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中山舰事件：第二次大让步之真相

布勃诺夫主张向蒋介石让步

1926年2月初，一群俄国人踏上了中国的领土。他们先是到中国的哈尔滨，尔后到达北京，很快又到张家口、包头、上海，最后落脚在广州。不了解其真相的人，以为他们是寻找闲情逸致的旅游者。实际上，他们都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的成员，肩负以下任务：“（1）弄清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2）同加拉罕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3）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工作人员的工作；（4）检查向中国正确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和如何指导他们的

船
史

PDG

工作。”^①

这个使团的领导人，名为布勃诺夫，时为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使团成员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原书记隆格瓦（任使团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谢等。习惯上，人们将这个使团称为“布勃诺夫使团”。

布勃诺夫使团是在哈尔滨了解了中东铁路的情况，在北京听取了加拉罕、鲍罗廷以及其他几位苏联驻华军事、政治顾问的汇报，又到张家口和包头考察了冯玉祥国民军的情况后，于3月初到达上海的。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是使团此次上海之行的重要任务。于是，陈独秀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一个访华代表团举行会谈。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代表团进行接触。

在会谈中，陈独秀向布勃诺夫等人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后，并谈到自己对未来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未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反革命势力成功的希望大于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是革命力量最困难的时期。

布勃诺夫问陈独秀，为什么坚持把中共中央驻地设在上海，而不是在别的地方。陈独秀说出两点理由：第一，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集中在上海；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讯联络设备。不知道为什么，陈独秀没有说出其中另一个理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号（特字第2号）记录》（1926年1月14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1~2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由，这就是为了保持中共中央的独立决策权，同时避免与国民党中央发生纠纷。

3月10日^①，布勃诺夫使团一行抵达广州。此时，广州的政治正处于动荡不安之际。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活动频繁，反蒋传单不断出现，“共产党要倒蒋”、“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去俄国”等谣言正在流传。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发现蒋介石神色异常，且与孙文主义分子学会来往密切，便将此情况告诉了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当布勃诺夫等人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时，张太雷在报告中特意指出：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看来右派准备采取行动了。然而他的话未能引起布勃诺夫应有的重视。周恩来后来不无遗憾地说：“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作小问题，儿戏对之。”^②

就这样，在布勃诺夫使团的眼皮底下，蒋介石制造了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四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

^① 这个时间是根据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推测的。布勃诺夫在信中有“我们在广州逗留这14天”等语。因使团是3月24日离开广州的，由此推断它到达广州的日期是3月10日。参见《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于汕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8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120页，人民出版社，1980。

舟
 史
 PDG

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并派兵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对于布勃诺夫来说，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完全是意想不到的。这位久经沙场的苏联将军虽有处乱不惊的胆量，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软禁，而且电话也打不通，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苦恼的事。他知道，此时一切措施都是多余的，只有与蒋介石“短兵相接”，摸清他的意图才好办事。

当包围东山苏联顾问住处的士兵撤退后，布勃诺夫即令拉兹贡^①去找蒋介石，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傍晚6时许，拉兹贡见到了蒋介石。他发现蒋介石与平时大不一样，表情非常沮丧。当拉兹贡问蒋介石，为什么要派兵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宅，并缴了卫兵的枪时，蒋介石说：“我要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处分，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我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我要下令对第五团团长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调查。”

当拉兹贡将蒋介石的情况告诉布勃诺夫后，布勃诺夫决定与拉兹贡一起去见蒋介石。晚上8时左右，他们到了蒋介石的住处。蒋介石又把他对拉兹贡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补充说：我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我行刺。我还收到海军局李之龙的信，信中要我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

谈话中，他们约定第二天上午由蒋介石到布勃诺夫的住

^① 时任苏联驻广州顾问团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

处去更认真深入地交换意见。但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却没有露面，而是让人捎话给布勃诺夫：他来不了。同时在广州又出现了这样的传闻：蒋介石公开声明他不愿再同俄国顾问共事。当天晚上，布勃诺夫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继续进行他已经发动的事件。

这个消息使布勃诺夫顿觉情况严重。他立即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议对策。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州市内的力量对比对俄国人和共产党不利，而省内力量对比则相对有利，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为了国民革命运动，无论如何要留住蒋介石。为此，会议决定采取让步措施，下决心撤掉俄国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①

事件发生后，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就是一些国民党人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苏联顾问的住处道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拜访了季山嘉，认为蒋介石此为反革命之举，提议严厉惩罚。甚至一向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纷纷表示出亲善的态度。孙科设宴招待了苏联顾问们；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也首次访问苏联顾问们的居住地，并设午宴招待第五军中的苏联顾问。

^① 参见《布勃诺夫在广州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7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季山嘉为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罗加乔夫为副团长。

在一片讨蒋声中，布勃诺夫却有自己的主意。作为一名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深谙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核心，也了解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他知道，此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这样一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就会彻底破产。这不仅给托洛茨基等人提供了攻击斯大林的口实，更重要的还在于可能影响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变化。因此，国共关系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尽快使广州回复到事变前的状态之中。所以，不能对蒋介石下手，以避免革命队伍自相残杀。

3月22日上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索洛维约夫受布勃诺夫派遣去拜访蒋介石。谈话中他问蒋介石：发动突然事变是对人还是对俄？蒋介石想尽快缩小事态以求自保，便答：对人不对俄。索洛维约夫当即表示：已决定召回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人。

布勃诺夫向蒋介石作出让步，使得广州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大为失望，这个人就是汪精卫。汪精卫本来指望布勃诺夫会作出打击蒋介石的决定，不料，布氏不仅毫无反抗的表示，反而同意召回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季山嘉。这一决定使得汪精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所以他负气不与苏联顾问进行商议，也不对任何人打招呼，便称病不起，拒绝进行任何认真的交谈。他的心里充满了怨气，认为蒋介石的翻脸与布勃诺夫的退让都使他丢尽了脸面。

与此同时，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布勃诺夫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制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办法，均表赞成，以致蒋介石在3月2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事前反对此举动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

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

将事态化解到最小程度后，布勃诺夫对事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3月24日上午，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布勃诺夫整整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他从国民党左派、广州的工会、中国共产党、香港罢工、北伐、军事工作等方面指出了苏联顾问团工作的失误和应该采取的工作方针。他认为，苏联顾问团最大的失误是在军事方面。他指出：三月行动无非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①的小规模准暴动。由于顾问们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大错误，而将原来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了。顾问们犯了什么错误呢？布勃诺夫指出以下四点：（1）没有预见到国民政府内可能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在军队中有反映；（2）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程度；（3）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三月行动中暴露得很明显；（4）军队集中管理（设司令部、后勤部和政治部）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在暗中反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发了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所特有的做法。

布勃诺夫用了很形象的比喻来批评顾问们。他说：在安排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国民革命军军阀的习惯和性质。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我们给中国将领脖子上套了五条锁链：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五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是你们却想用这五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往往还带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应该考虑

^① 指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



到这种情况：将领是中国的，顾问是俄国的。你们以为中国将领没有感觉到顾问是俄国的吗？他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都有，那么最独立自主的中国将领也会有这种感觉：他是中国人，而顾问是俄国人，对他‘十分专横’。”

说到这里，布勃诺夫一连用了三个“不要”来对顾问们的工作加以限制，他说：“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

布勃诺夫告诫顾问们应该明白自己的任务和身份，行动一定要有分寸。他说：我们应当在国民革命进程中保证这次革命取得全面而彻底的胜利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来直接实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务。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为都会：（1）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和总起来更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看不到这种危险，就不能从三月行动的经验中汲取任何实际教训。^①

同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苏联顾问斯捷潘诺夫拜会了蒋介石。谈话间，斯捷潘诺夫告诉蒋介石，布勃诺夫和使团其他成员要离开广州回国，而鲍罗廷不知何时才能返回。蒋介石这才表示，愿意到布勃诺夫的住处同布勃诺夫好好

^①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68～1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谈谈。

当天下午，蒋介石拜访了布勃诺夫。在谈话中，他指出了苏联顾问们的许多错误，最后又表现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对布勃诺夫说：革命以农工为基础，以党与政府之强固为要点，又以干部意志一致为首务。革命势力应当集中，革命更应时时进取，不宜取保守态度。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这种形势，非速定北伐大计不可。凡是革命的障碍，都应迅速扫除。

当天傍晚，布勃诺夫一行带着离职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 10 余人，乘船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谭延闿、宋子文前往送行，蒋介石没有露面。

3 月 27 日，布勃诺夫给正在回广州途中的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使团对广州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六点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关于第一点，布勃诺夫写道：

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内部组织性、对群众的影响和与群众的联系方面还很薄弱。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上层组织。需要采取各种措施，通过不断做工作来帮助国民党加强其（学生、青年、城市商业手工业资产阶级等）基层组织。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国民党作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帮助它加强内部的组织性和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在领导国民革命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

当作助手和领导者。^①

布勃诺夫的信对鲍罗廷产生了重要影响。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即继续执行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这是后话。

布勃诺夫之所以对蒋介石采取软弱妥协的态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时联共（布）中央正积极支持国民党发展军事力量，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必然引起广州的混乱，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这显然与联共（布）中央的大政方针相悖。

第二，布勃诺夫在北京听取苏联顾问的汇报时，得知蒋介石是左派。当时熟知国民党情况的鲍罗廷肯定地对布勃诺夫说：“在6个军和6个军长当中，可以认为有4个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的蒋介石、谭延闿、吴铁城和朱培德无可非议。可以同这些军长一起完成一项大的工作。”而蒋介石则是“极左派信徒”。^②既然蒋介石是左派，那么对其反击显然会损害左派力量。

第三，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团对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有重大责任，是它在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除上述几个原因外，事件发生得突然，结束得又极迅速，加之布勃诺夫对广州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作出细致的判断和完善的处理。

中山舰事件只是蒋介石的一次试探性进攻。由于布勃诺

^① 《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于汕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8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40~141、11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夫的退让，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

布勃诺夫影响下的中共广东区委

无论是什么原因促使布勃诺夫作出向蒋介石让步的决定，他总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给鲍罗廷的信中所说，就是“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①。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他给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方针是：以“巩固革命势力的统一”相号召，尽快弥合此次事件在国共两党间造成的裂痕，稳定广州局势。

受布勃诺夫就近指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便自行决定了自己的态度。3月30日，中共广东区委致信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公开表白：“共产党因为把国民党认为是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才决定他的党员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担任领导国民革命的党。所以共产党是要国民党团结的，是要国民党在强固的革命领导之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帝国主义者以及国民党已经开除的反革命分子，最是恨毒共产党，所以对于共产党造谣诬蔑，以谋分裂国民党及排除党内革命分子。……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是现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因此共产党率领工人农民竭力帮助使国民政府巩固与发展。”信中指出，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

^①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于广州“纪念列宁”号轮船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77～17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群众起来打倒敌人此种阴谋”^①。

同一天，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在他主编的《人民周刊》上发表评论指出：“反革命势力进攻我们最厉害的方法就是离间我们的内部；我们内部团结稍不巩固或我们的革命领袖稍存疑虑，反革命势力立刻就乘机进攻；所以我们要严密我们的团结，我们的领袖要稳定而一致，才能防备敌人的阴谋。”^②

显然，中共广东区委是遵照布勃诺夫的指示，认蒋介石为“革命领袖”，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结到反革命势力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上，强调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

陈独秀对事变的态度

1926年的3月下旬，对于陈独秀来说，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他整天心神不定，如坐针毡，心中充满了疑惑和矛盾。他不相信报纸上的报道是实事，他宁愿相信这是有意造谣。然而报纸上说得有鼻子有眼：什么中山舰图谋不轨啦；什么蒋介石动用军队扣留俄国顾问，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甚至苏联人的住宅也被包围啦；什么周恩来和邓中夏已经被捕啦；什么广州军队开始杀人啦……搞得陈独秀心急如焚。

直至3月底布勃诺夫一行回国途中在上海逗留时，陈独秀等人才从布勃诺夫的谈话中得以了解事件的有关情况。布勃诺夫告诉陈独秀：广州确实发生了事变。事变发生时，军

①② 《人民周刊》，7期，1926年3月30日。

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的住宅等，这都是事实。不过，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目前蒋介石已经明白共产党并没有搞什么阴谋，广州局势已经归于平静。^①

受布勃诺夫的影响，陈独秀相信事件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蓄意制造的，蒋介石只是上了他们的当。3月2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指出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他是受了右派的挑拨，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②

4月3日和4月6日，《向导》第148期和《人民周刊》第8期分别刊登出陈独秀的署名文章《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和广州事变》。他在文章中指出：

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之应用。他们宣传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们：

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

^① 参见致中：《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148期，1926年4月3日。“致中”为陈独秀的笔名。

^② 《毛泽东年谱》，上卷，16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①、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②

同中共广东区委一样，陈独秀亦根据布勃诺夫定的调子，在文章中呼吁：“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一齐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

为了配合陈独秀的宣传，张太雷又发表《怎样巩固革命基础》一文。文中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领袖应该深深的明白，他在中国及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及他对于中国民众的责任之重大。我们广东现在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是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③

中山舰事件后如何对待蒋介石，如何正确处理国共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需要中央慎重考虑，拿出决策，然后再在全党统一贯彻。但由于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就决定了布勃诺

① 即李济深。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144～1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③ 《人民周刊》，8期，1926年4月6日。

夫的特殊身份。在当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和指导者，而无论是中共广东区委，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对他的地位提出任何异议。这样，他们先是被动地认可布勃诺夫对事件所作的处理，接着又按照他所确定的调子向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表态和呼吁。

然而，布勃诺夫对陈独秀的影响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4月中旬，中共中央收到陈延年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这才对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和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真正目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改变了以退让求团结的态度。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如下决定：（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孤立蒋介石；（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领导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陈独秀特派彭述之赴广州，同先期到广州的张国焘^①以及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组成特别委员会，与鲍罗廷共同商讨实现这些计划的步骤。但由于鲍罗廷的反对，这些计划最终成了空谈。^②

^① 据张国焘说，中共中央派他到广州，是为了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妥协政策；而彭述之却说，派张国焘去广州是了解事件真相。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99~100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5页，前卫出版社，1972。

^② 参见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5~6页，前卫出版社，1972。郑超麟：《陈独秀与鲍罗廷》。《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0期。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可见，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后对蒋介石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先是根据布勃诺夫的意见，认为应该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后来得知事件的详情后，又决定准备力量同蒋介石进行斗争。

不能反击，岂能全面退却

指责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上对蒋介石让步的人，认为当时如果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是有可能取胜的。其理由是：（1）第一军中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政治工作，士兵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同时，第二师、第三师的各级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绝大部分，蒋介石并不能完全控制第一军。（2）省港罢工工人有20多万，还有一支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3）海、陆丰有组织的农会会员达20多万。（4）正在举办的第六届农运讲习所有一批进步青年，也是可以靠得住的力量。（5）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掌握部分实权。还有苏联顾问的支持。（6）国民革命军其他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都表示对蒋介石不满。基于以上几方面考虑，如果中共当时能够集中武装力量，利用国民革命军各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彻底孤立蒋介石，就完全有可能把他驱逐出第一军，乃至剥夺他的所有权力。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就一定是胜券在握了。其实，他们只看到对共产党有利的一面，并且把一些“可能”成为有利条件的因素当成“必然”有利的条件，忽视了可能性与必然性之间质的区别。另外，他们没有考虑到对共产党不利的一面。

中山舰事件后，要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有三种选择，一

是事变之后立即反击；二是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力，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各军，进行反击；三是先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反击。

先看第一种选择，即事变后立即反击。事变之时，蒋介石掌握的兵力在第一军中有刘峙的第二师、王柏龄的第二十师和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所辖的武装警察，而共产党当时能够指挥的正规武装只有叶挺独立团，且尚在肇庆。共产党在第一军的力量最强，但在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十师正是蒋介石发动事变的主力，第二师中的40多名共产党员在事变之时已被监禁。而其他各师当时还驻扎在潮汕，即使他们有反蒋之心，也不可能即刻行动。省港罢工工人有20多万，但会集广州的约有13万^①。到了1926年3月，已有许多人因各种原因离开广州。假使这些工人全部在广州，不要说立即将他们组织起来不容易，即使组织起来了，赤手空拳的工人又能有多大反击力。真正具有反击力的工人纠察队有2000多人，为了实现对香港的封锁，当时这支纠察队正奉命驻守于东至汕头，西至北海，蜿蜒千里的防线上。海丰、陆丰是有20多万农会会员，且不说其战斗力如何，就是其远离广州这一点，也不可能成为立即反击蒋介石的力量。

至于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几个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固然对事件反应强烈，但他们抱怨蒋介石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动用军队与蒋介石作战，就是另一回事了。首

^① 集结在广州的罢工工人人数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约有13万。参见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2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一说是六七万。参见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上册，304页，人民出版社，1990。本文采用前一种说法。

先，这些人本来就是地方军阀，他们的革命性并不比蒋介石多，对他们有利的事就干，不利的事就不干。他们不满蒋介石的做法，但也不赞成共产党的工农政策。两相比较，他们更倾向于蒋介石。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立即联合起来反蒋，是不现实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在广州市内武装力量的对比上，蒋介石的力量是占优势的，共产党根本无力立即组织反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提出：“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①

再看第二种选择，即毛泽东提出的先到肇庆，再进行反击。同中山舰事件突然爆发又突然结束一样，当时与事件有关的人的情绪也在很短时间内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变化过程。事件刚发生时，广州的党政军大多数领导人由惊愕、困惑转而谴责蒋介石，但很快他们就在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作出了选择。3月22日，“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②会议决议：季山嘉等人被撤职回国；撤回第二师的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当天下午，谭延闿、李济深等各军长在与蒋介石谈话中，对蒋介石制裁俄国顾问及共产党，均表赞成。23日，蒋介石向军事委员会呈文，表示：“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

^① 转引自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② 周恩来：《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121页，人民出版社，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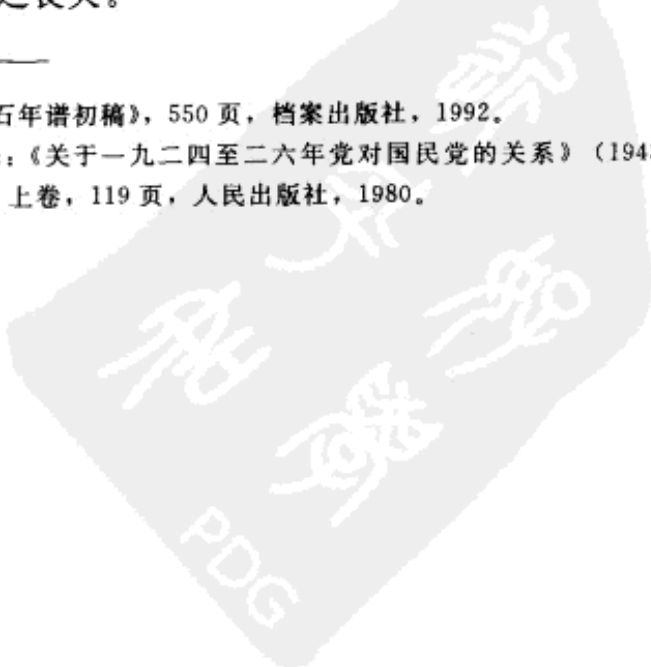
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① 这样中山舰事件造成的紧张空气迅速缓和下来。由于谭延闿等军长已经与蒋介石站在了一起，不可能支持反蒋，这样，抛开蒋介石，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② 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外，共产党员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内虽然占有一定比例，但国民党的委员们能否跟共产党到肇庆，是难以确定的问题。即使他们去了，是否会将自己同共产党人绑在一起，同意反蒋，也是不可预料的。共产党能够靠得住的力量只有叶挺独立团和工人纠察队以及海陆丰的农民，而用这些力量去反击蒋介石，即使已经同情蒋介石的其他各军保持中立，也是不可能取胜的。

最后看第三种选择。与在事变后立即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或在短期内实现反击的意见不同，这种选择是强调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准备，主要是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反击。毫无疑问，实现这种选择的关键条件是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然而，掌握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鲍罗廷不赞成对蒋介石进行打击，也不准备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山舰事件后，正好有一批苏联武器到达广州。当时陈独秀曾提出，从这批武器中拨出 5000 枝枪来武装广东的农民，遭到了鲍罗廷的拒绝。相反，鲍罗廷却继续用自己口袋里的“草”来扩大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这样，实现第三种选择的关键条件随之丧失。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550 页，档案出版社，1992。

^②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 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119 页，人民出版社，198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将中山舰事件后对蒋介石退让的全部责任归到陈独秀身上是不妥的。主张对蒋介石退让的是布勃诺夫，陈独秀对蒋介石的态度有一个由退让到反击的变化过程。但无论是立即反击、短期内反击，还是待机反击，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而当时并不具备能够进行反击的条件。

不过，不能进行反击并不意味着只能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答应他的所有要求。布勃诺夫完全可以利用当时对蒋不利的因素，联合广州所有的（包括一时的）反蒋力量，对蒋介石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揭露他的阴谋，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将共产党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整理党务案：第三次大让步之真相

莫斯科制定妥协政策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活动更加猖獗，国共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种种矛盾和困难，陈独秀再次提出改变国共合作的方式，即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共两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上海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和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令一个名叫维尔德的俄国人甚为担忧。维尔德虽然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但他与维经斯基的关系很密切。在中国的政治事务中，他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于是，4月23日，维尔德给维经斯基发去电报，报告了他在上海所得知的一些情况。他在电报中说：“获悉右派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部分左

派，达成了妥协，目的在于同左派实行联合。孙科从广州来到上海。孙科公开宣称他此行之目的，还称蒋介石同意他这样做。5月15日将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全会，会上将对共产党人发动强大的攻势。您有必要来一趟，党没有采取很明确的立场。我们可能动摇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现在掀起了疯狂的反共反苏俄运动。必须给予有力而巧妙的反击。”^①

尚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收到维尔德的电报后，当即给陈独秀写去一封充满信心和鼓舞士气的信。他在信中说，虽然北方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但这只不过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暂时失败，它不会对工人运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产生深远影响。应该看到，直奉两个营垒的联盟只是暂时的，他们之间的摩擦会日益加剧，并产生冲突。

维经斯基认为，共产党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铁路工人、矿工中进行工作，组织工会；同时要开展农民运动，使之成为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的促进因素；还要在军阀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瓦解奉直军阀的军队。

至于共产党人在广州的工作，维经斯基特别强调：“我们在广州需要有强大的共产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应当同它保持密切的联系，更直接地领导它，首先要坚持把更多的工人、先进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到我们广州的党组织中来。现在我们还应该明白，我们不能满足于仅在广州有一个组织，在汕头、厦门和其他港口也应该有党的组织。”

维经斯基尤其关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指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0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出，国民党右派是中山舰事件的“鼓舞者和思想领袖”，他们将在广州等地起重大作用。所以，与陈独秀一样，他也认为，共产党应该准备改变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应该朝着建立我们党同国民党联盟的方面调整我们的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怎么做这件事呢？我认为，首先要使我们的党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成为越来越独立和越来越强大的组织。其次，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①

维经斯基在这里所说的不要“发号施令”，其所指与布勃诺夫并不一样。布勃诺夫是为了保全国共合作关系，不让共产党发号施令。而维经斯基的意思则是：为了脱离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共产党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上面，对国民党的工作不必要过分热心。

对于陈独秀来说，维经斯基的来信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宽慰。

陈独秀非常同意维经斯基在信中的观点。经过中山舰事件，他认为应该重新慎重考虑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不过，陈独秀也清楚，究竟什么时候与国民党分手，不是他说了算的事，也不是维经斯基说了算的事，这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允许才行。那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会允许国共分手吗？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当时以塔斯社驻华记者在华进行活

^① 《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20～22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整理党务案
PDG

动的联共（布）党员穆辛正在广州。事后，他根据自己对广州形势的观察，于4月24日拟就一份《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这个提纲送达联共（布）中央，并最终“绝密”文件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里。

穆辛提纲的总旨是：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一切对国民党左派团结不利的因素都应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

对于中山舰事件的起因，穆辛与布勃诺夫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是苏联顾问及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使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而事件可能造成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的关系恶化，导致国民党左派分裂和广州政府垮台，使国民革命遭到挫折。

穆辛对蒋介石革命的作用十分看好。他说，尽管蒋介石有种种主观上的缺点，将来有可能造成新的严重麻烦，但现在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做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主要核心力量，重新使汪精卫复职，使汪精卫、蒋介石联合和团结起来，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争取巩固和健全广州的革命政权，反对北方军阀的统治。穆辛告诫说：“排挤或不让蒋介石或汪精卫积极参与领导政治生活，这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为什么这样说呢？穆辛的理由是：“现在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走向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的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为进一步争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

基于上述理由，穆辛不赞成退出国民党，他认为，如果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彻底决裂，这对国民革命事业来说是很不恰当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组织，而是通过吸收新的阶层和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事业来发展、加强和巩固国民党本身。我们应当努力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真诚的联盟，为此我们必须使国民党领导层真正相信，我们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为巩固和发展它的国家机关和国民革命军而工作。

至于共产党人在军队的工作，穆辛认为，如果因为在军队中存在共产党支部，从而导致军队中发生激烈斗争，那么就应该取消它。共产党人的任务是遵循国共两党共同指示，在军队内共同的国民党支部中做工作。^①

穆辛的提纲，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提纲。它使共产党的所有工作都以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及军队将领的好恶为转移。它在发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口号下所提出的策略，实质是要共产党完全服从于国民党，完全彻底地为国民党服务。

穆辛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提纲呢？他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共产党只有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才能作为领导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目前是在帮助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只能是帮助者，而不能是领导者，为此共产党应尽力将所有的群众都聚集在国民党组织内，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壮大国

^① 《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10～21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整理党务案
PDG

民党。

穆辛的提纲以及被撤职的俄国驻华顾问拉兹贡、罗加乔夫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使联共（布）领导人深深感到了国共问题的复杂性。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就国共关系问题作出决定，其主要内容是：（1）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2）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危险的。（3）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将其开除出）国民党。（4）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5）如果在当地查明，主张在组织上同共产党人划清界限的运动很强大，并且两党关系有严重冷淡的危险，那就同意把这个问题尽快提交共产国际讨论。

很显然，上述决定的潜台词是：第一，共产党应该以让步来求得团结；第二，除非国民党内排共势力强大到共产党人无法再在国民党内立足，否则退出国民党是不允许的；第三，即使共产党不得不退出国民党，也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之所以不允许国共关系破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当时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反对派，正在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国共“党内合作”政策进行攻击，认为这个政策实质上是取消共产党的政策，警告这样下去必然会使中国革命发生悲剧。斯大林等人为了不给反对派提供口实，以证明他们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当然不允许共

产党退出国民党。所以，他们在上述决定中提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至于这“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指什么？尽管决定中没有说明，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却是不言而喻的。

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协议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不得不放弃原定回国的计划，于1926年3月下旬离开北京，途经张家口、库伦、上乌丁斯克、海参崴，由海路于4月29日赶回广州。

此时，广州的形势与他两个月前离开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孙文主义学会虽然已经解散，但其骨干分子仍在加紧活动。刚从苏联归国的胡汉民与蒋介石捐弃前嫌，来往密切。有传言说，胡汉民已向蒋介石提出，待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即将其逮捕。在共产党方面，由于受到中山舰事件的打击和布勃诺夫的退让，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受到重大削弱，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已经退出。

面对这样的形势，鲍罗廷在不违背斯大林给他的赴华使命^①的前提下，只能贯彻布勃诺夫3月27日信的精神和联共（布）中央4月29日的指示。不过，就鲍罗廷的思想基础而言，他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落实莫斯科的指示。因为在他看来，蒋介石仍是左派军人，同蒋介石合作的希望依然存在。这样，为了团结蒋介石，鲍罗廷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

^① 俄共（布）决定派鲍罗廷来华前时，曾责成他“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要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册，26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是：向蒋介石让步！

4月30日，即鲍罗廷回到广州的次日，便开始与蒋介石，以及蒋介石的坚决支持者张静江进行了接触。在蒋介石当年的日记中，有他们4月30日和5月1日、7日、12日、13日、14日的会面记载^①。

鲍罗廷与蒋介石、张静江的频繁接触，令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深为不满。他回忆说：

在此时期内^②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静江）、鲍三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烁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鲍罗廷总是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③

鲍罗廷一面与蒋介石进行磋商，一面说服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共广东区委接受蒋介石的限共提案。彭述之回忆说：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鲍罗廷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蒋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其理由是：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

① 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鲍罗廷与蒋介石、张静江会面的内容，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出版社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② 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的5月上旬。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119～120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北伐，将来随着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①

正当鲍罗廷为不能与蒋介石尽快达成协议而焦急不安之际，约在5月10日前后，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大批军火运抵广州。尽管在广州的一些共产党员强烈要求鲍罗廷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武器转交给他们，以便为同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做准备。但鲍罗廷还是拒绝了。因为，这些武器正是他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果然，5月14日，鲍罗廷同蒋介石最后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其一，鲍罗廷容忍蒋介石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包括他限制、排斥共产党员的行为和制造出来的“以蒋代汪”的局面。其二，鲍罗廷将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其三，蒋介石答应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同意鲍罗廷提出的关于打击右派的意见。

蒋介石后来洋洋自得地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②

在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当天下午，鲍罗廷即指示张国焘和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要他们向蒋和张表示，中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不会反对整理党务案。^③

鲍罗廷这种对有关国共关系的重大问题大包大揽的做

①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8页，前卫出版社，1972。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41~4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③ 张国焘回忆说：“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廷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120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另据蒋介石日记载：5月14日下午，“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587页，档案出版社，1992。

法，从组织关系上说是极不正常的，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也好，中共广东区委也好，对他的决定和指示不得不表示认可。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为幌子，与其他人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他自己又单独提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和“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案”。这四项目案后来被统称为“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目的在于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削弱共产党人的权力，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由于鲍罗廷事前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虽然对是否接受蒋介石的提案进行了讨论，但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①。就这样，“整理党务案”在全会上得以通过。

事实很清楚，执行妥协政策的，不是陈独秀，而是鲍罗廷。

陈独秀愤而要求退出国民党

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虽然曾有过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的计划，但他仍对蒋介石抱有一定幻想，认为蒋介石尚未真正站到右派的立场上，共产党只要方法得当，策略正确，就

^① 据周恩来说，在讨论会上，“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参见周恩来：《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123页，人民出版社，1980。

会使他向左转。^①另外，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还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不仅很快放弃了反击的计划，而且当得知蒋介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提案时，并没有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故而未拿出具体的对策。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后，陈独秀才了解到“整理党务案”的具体内容，并且得知，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几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已经辞职，他们的职位已由明显右倾的国民党员接任。这一结果大大出乎陈独秀的预料。

现实与认识的差距已使陈独秀愕然，而莫斯科的指示与现实的差距尤使陈独秀感到困惑。此时，他陷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意识到蒋介石接二连三对共产党进行打击，是有政治野心的。随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权力的进一步削弱，国民党会向右转，国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最好的选择就是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违背莫斯科要求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且必须向以蒋介石为首的所谓“左派”让步的指示精神。在这种矛盾的心态支配下，陈独秀于6月9日在《向导》第157期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陈独秀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蒋介石列出的证明共产党“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四个所谓“事

^① 参见《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电报》（1926年4月28日）。

实”，并且针对蒋介石想当国民党领袖的野心，指出“国民党的惟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但同时，陈独秀又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并非反革命分子，表示共产党决没有倒蒋的意图，对蒋介石只是抱着“爱护”的、“合作”的态度。他写道：“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①

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陈独秀指出，国共两党合作是必要的，“当此英日吴张战胜而形成反动统治并在日谋力讨所谓北赤南赤之时，吾人尤当集中全力于反抗其压迫革命势力及民众之斗争，且领导一般党外的民众，使集合于国民革命之战线”。至于两党的合作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以后“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在对于整理党务案的态度上，他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②

此时，对“整理党务案”抱矛盾心理的不仅是陈独秀，以陈延年为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也是如此。

^①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1926年6月4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226～2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141～1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宣言》阐述了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的坚定立场，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没有诚意”，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谋一党的私利”的澜言。对于“整理党务案”，《宣言》表明中共广东区委的态度是：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整理党务案，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有所规定，而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分子，对于此项议案并没有表示异议。所以没有表示异议者，因为共产党员以为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共产党员并不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共产分子的议决，包含着侮辱的意义，如果这样议决不是以之开反革命进攻的道路。共产党员在此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中的态度，即证明共产党员十分忠心于国民革命运动，并且认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十分爱护，而不使其受损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决不为主观感情所影响，而不顾及全部革命利益。^①

陈独秀和中共广东区委对“整理党务案”的反映，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态度。面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① 《政治周报》，14期，1926年6月5日。

所造成的国共关系的新变化，他们都同样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对鲍罗廷向蒋介石让步，使得“整理党务案”顺利通过，结果导致共产党人处于被动的局面深为不满。但囿于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中国共产党既不能像对待西山会议派那样，对制造这种局面的元凶蒋介石进行口诛笔伐，又不能不对“整理党务案”表示自己的态度。所以，无论是陈独秀的信，还是广东区委的宣言，都表现出以下两种倾向：

一方面，将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骂得狗血喷头，说是因为它们的挑拨、造谣、煽动，才使国共之间产生了矛盾和纠纷。

另一方面，极力表明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决心和加入国民党的诚意，提出只要对国民革命有利，对革命势力的团结有利，共产党可以作出任何牺牲，对“整理党务案”没有异议。

如前所述，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维经斯基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提出改变国共两党合作方式的建议。陈独秀在致国民党中央信中所说的两党合作方式，“原无固定之必要”，也表明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陈独秀这一想法不完全是受维经斯基的影响，也有他本人对国共关系发展走向的思考。

但无论当时退出国民党是否合适，莫斯科方面都是不予考虑的。维经斯基为此还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批评。这年6月，当他奉命来华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时，莫斯科方面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纠正陈独秀等人退出国民党的想法。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合提议，将

“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他们认为，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才能执行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但这个提案没有得到通过。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会议对陈独秀和彭述之进行了批评，指出：“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他，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①

7月27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去电报，汇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他说，可能导致从组织上脱离国民党的极少数人的立场在会上受到了谴责。会议决定采取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方针。其要点是：“留在国民党内，不监护左派，也不取代左派。”^②

就这样，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再一次被否决。他不得不继续带领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坎坷征途上艰难行进。

是谁蒙受了损失

在“整理党务案”中，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中共中央具有严格限制作用的，有如下几点规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17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第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并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

第二，共产党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保存；

第三，中共中央给其党员的训令，须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毫无疑问，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之后向共产党发动的又一次重大进攻，其根本目的在于将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岗位，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一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高级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不得不提出辞职。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新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由谭延闿担任，再加上蒋介石对军权的控制，实际上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掌握党、政、军大权的局面。难怪蒋介石评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时说：“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①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合法的形式，实现了国民党老右派早就想达到的目的，这就是从国民党重要领导岗位上排除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它还使广州原来汪（精卫）蒋（介石）合作的局面，转变为蒋介石专权独揽的形势，从而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实现了历史性的倒退，也为后来国民党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国共合作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4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然而，执行了莫斯科妥协政策，事先同蒋介石达成协议，并说服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整理党务案”的鲍罗廷，丝毫不承认“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和实施后所造成的恶果。相反，他认为“整理党务案”的被通过，是他的策略的一大胜利。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鲍罗廷在给加拉罕的一封信中喜气洋洋地写道：

中央全会^①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他们反对我们，似乎是挽救党使之免遭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控制。这是一个使他们得以把一些诚实的国民党人集合在他们周围的口号，因为这些诚实的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上述决议通过后，这种害怕心理大为减少，右派被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再说一遍，他们被剥夺了用来反对我们的主要的和很方便的武器。现在他们受到打击，也无法诱过于共产党人。

鲍罗廷还认为，“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蒋介石的处境也极为困难。他说：蒋介石为了讨好右派而提出“整理党务案”，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从此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派和右派会继续要求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他成了他们的俘虏。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仍标榜自己是左倾分子，但左派和共产党人则更怀疑他右倾，更响

^① 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亮地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①

在鲍罗廷看来，此时蒙受重大损失的是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表示自己仍然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右派中的个别人物进行了处分，如逮捕了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吴铁城，驱逐了著名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广州市市长伍朝枢等。但这只是做个样子给人看而已。实际上，“整理党务案”实施之后，蒋介石的处境非但不困难，他在广州的地位简直就是扶摇直上。他于6月1日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5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9日任国民政府委员；7月5日任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拥有任免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之权；7月6日，因张静江患病辞职，蒋介石又接替他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后仍由张静江代理）。

事实证明，蒋介石不仅没有像鲍罗廷所言的那样，陷于两难境地，而是在右派支持、左派软弱和共产党让步的情况下，使得他在党、政、军中的权力与日俱增，最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如果说鲍罗廷在给加拉罕写信时没有预见到“整理党务案”将要造成的严重后果，对自己对此事的处理沾沾自喜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仍对此事津津乐道，就有替自己辩护之嫌了。1927年10月，鲍罗廷在一次大会上作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时，再次提到“整理党务案”一

^① 参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72～273、28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事。这一次，他仍是老调重弹，宣称：“撤掉共产党员担任的职位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困难，因为这种职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从前那种价值了”；“我们决没有因为撤掉某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的领导职务而失去发展和深化革命运动的任何机会”。^①

鲍罗廷不是在蒋介石等新右派势力抬头之时尽力抑制其发展，而是决定先对其作出让步，然后“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②。这一策略显然是荒谬的。他的所谓“整理党务案”的通过对共产党有利而对右派和蒋介石不利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诡辩。

“整理党务案”是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妥协政策指导下，与蒋介石、张静江达成的协议，并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陈独秀事前并不了解“整理党务案”的内容，也未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事后发表的两封信，一方面表明他在不违背莫斯科指示精神前提下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对蒋介石的政治面目缺乏清醒的认识。无论让步是由谁、出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

^① 参见《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年10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82～48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谁对北伐持消极态度：难言之隐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支持北伐

1925年12月26日，按习惯应该来中央机关看文件的陈独秀却没有来。27日，他还是没有来……一连好多天，陈独秀都未曾露面。机关秘书处的任作民感到事情严重，便将情况报告了瞿秋白、张国焘和彭述之。

瞿秋白等人得知陈独秀已多日不见，便大为惊慌起来，急忙派人去四处寻找。但由于陈独秀的住处一向对外人保密，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何处。而当时中共又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偌大一个上海，要找到陈独秀，无异于大海捞针。

时间一天天过去，陈独秀仍然音讯全无，大家几乎绝望



了。陈独秀到底去了哪里，各种猜想都有。最令人信服的猜想是：陈独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或者别的什么人抓去杀了头！于是，张国焘带着哭腔对机关里的人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么个下场。”

就在陈独秀失踪以后，上海的反动势力开始了搜寻中共中央机关的联合行动，妄图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网打尽。得知此情况后，中共中央机关更是人心惶惶。为了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同时商议陈独秀失踪后党的对策，中共中央决定移往北京。这样，便有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北京特别会议”。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召开了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人，共青团代表1人，北京区代表2人，广东区代表2人。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正在北京的鲍罗廷等人也出席了会议。陈独秀没有出席这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开始后，忽然接到陈独秀从上海的来电。电报中说，他最近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现在已能扶病视事了。这个电报的到来，使与会人员大大松了一口气。于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便确定为讨论应对时局的策略。会议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的决定。

孙中山在世时，就曾希望通过北伐统一中国。可以说，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希望通过苏联的援助进行北伐，最终统一中国。但这个愿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孙中山逝世后，北伐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的重要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北伐，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团长加伦是积极支持的。早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加伦就开始筹划北伐问题。这年9月，他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中，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并拟定了军事部署。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期间，北伐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出席会议的鲍罗廷在讲演中表示支持北伐，认为国民革命军向北发展是必要的。2月中旬，鲍罗廷在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明确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缓，并且强调，北伐必须与群众革命运动，特别是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相联系，因此对北伐要有明确的要求和纲领。布勃诺夫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后也认为，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①

在这次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鲍罗廷力主共产党支持北伐。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遂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其中指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才能使全国人民得着必需的保证。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②

^① 参见《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6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56～5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会议还对中央机关的地址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机关已不适宜设在上海，因为上海已不是政治的中心，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所以，中央地址只能设在北京或者广州。由于广州地处一隅，在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较为不便，因此设在北京最为合适。如果国民军能保持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机关就设在北京；万一国民军失败，中央机关再移往广州。会议在作出这个决定时，考虑到了陈独秀的态度。于是，会议提出，这个问题必须在征得陈独秀同意后方能确定。

陈独秀虽因病未能参加北京会议，但他对会议的精神是完全同意的。3月14日，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对北京特别会议的决议作出进一步解释，并且更加明确了党对北伐的态度。《通告》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惟一的根据地，只有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对势力所包围而陷落。^①

同月，布勃诺夫使团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又表示，国民革命军应该立即出师北伐，以消灭吴佩孚。^②

这以后，陈独秀曾数次写信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提出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8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参见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3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民政府应及早出兵北伐，以便趁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予以打击，否则在吴佩孚南伐之时，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的可能。

可见，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并不消极，而是积极地督促、热情地支持的。

对于中央机关地址问题，陈独秀指出，中央机关设在何地，应依以下几个条件为依据：首先，要看何地能更便利地执行党在最近和将来的重要使命；其次，要看何地能更有利于党的全部工作的开展；第三，要看何地能使党更有凝聚力。他认为，如果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机关移往北京，在上海设交通处，在广州设临时委员会；如果北京政局发生变化，是否移往广州再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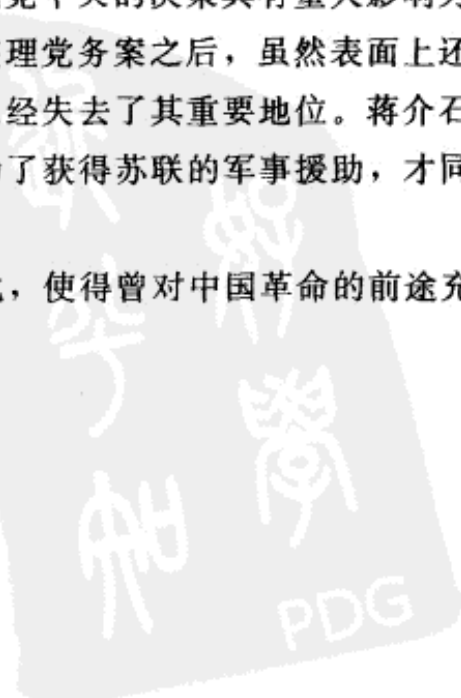
实际上，陈独秀有了中共三大前后在广州的那段经历，是不太愿意将中央机关移往广州的。

莫斯科强烈要求：暂缓北伐

1926年春，中国的形势确实让斯大林等人捏着一把汗。

在北方，国民军在直奉联军的进攻下，一败再败，冯玉祥为了减轻国民军的伤亡，被迫下野。在南方，国民党二大上左派所取得的胜利局面在一夜之间被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所破坏。曾经对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虽然表面上还拥有往日的辉煌，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重要地位。蒋介石已不再尊重他的意见，只是为了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才同他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中国形势的迅速变化，使得曾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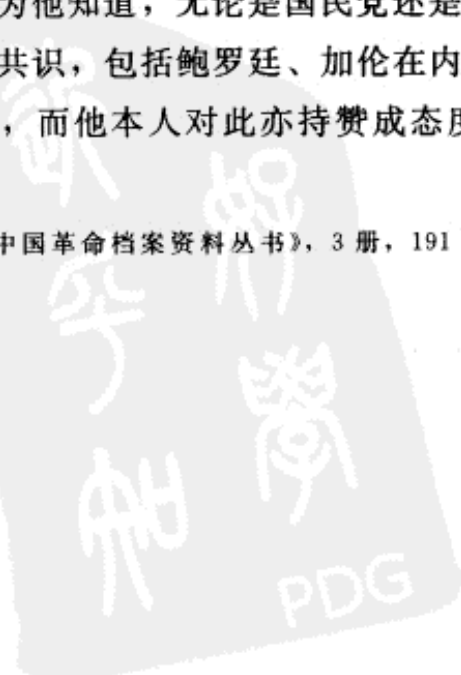
观态度的斯大林等人，不能不生出几分担忧。

斯大林等人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进一步夺权的行动中，已经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不是偶然的上层阴谋，也不是个别错误和某些派别、人物的没有分寸所致，而是广东内部矛盾的急剧尖锐化在政治上的反映。中山舰事件的后果，是国民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整个领导权从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和共产党人手里，转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这是因为，通过北伐既可以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夺权的行为合法化，又可以使它的势力在国民党内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对于以广大工农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革命是有害的。

基于上述考虑，再加之担心立即北伐可能会引起北方的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进攻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同时也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斯大林等人认为目前进行北伐是不合适的。1926年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广州不应该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决定，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以电报的方式传达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接到电报后，加拉罕感到很吃惊。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北伐已经形成了共识，包括鲍罗廷、加伦在内的苏联顾问们也希望尽快北伐，而他本人对此亦持赞成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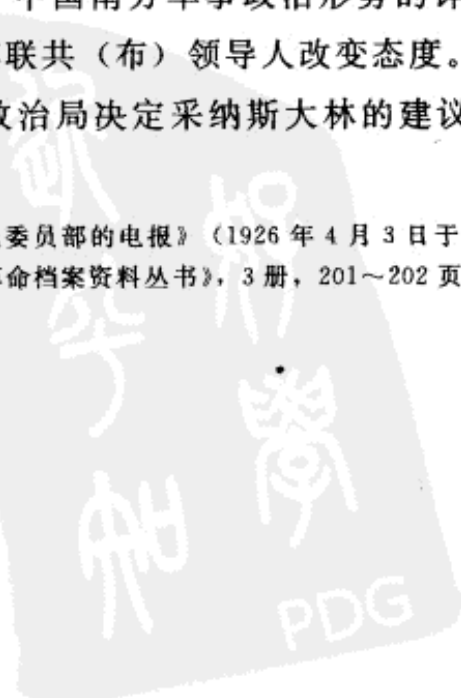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9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加拉罕认为，斯大林等人的决定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形势迫使广州政府必须出兵。于是，他在4月3日紧急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必要性。电文是：“广州不应提出占领新地区的目标，但它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现在在湖南，唐生智将军赶走了赵恒惕成了省督办。这是根据同广州的协议进行的，几个月前广州同这位将军达成了协议。现在的情况是：广州应帮助唐生智在湖南站住脚。唐生智是普通的中国将领，他同情广州，与其说是出于对它的原则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它的实力的尊重。如果不支持他，他可能屈从于吴佩孚。对他的支持可以是向湖南调动几个广州师，不动一枪一炮进驻那里，目的在于巩固唐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和平占领该省。广州军队的存在意味着在政治上使该省变成国民党的省。对湖南的这种支持也会巩固已对吴佩孚宣战的江西方本仁的地位。如果在湖南驻有广州军队，方会感到自己更坚强。方本仁在寻求同广州的联盟。他的代表（他儿子）今天来到我这里，请求给予支持和帮助同广州建立友谊。”“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以协助，这是预防性措施，因此在湖南可能受到吴佩孚的影响。我认为，作出的决定不适用于我所提到的具体情况。”^①

加拉罕在电报中对于中国南方军事政治形势的详细说明，并没有使斯大林及其联共（布）领导人改变态度。4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纳斯大林的建议，以

^① 《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26年4月3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01～20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中央名义给加拉罕发电，严厉指出：

1. 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

2. 在加拉罕同志第 242 号电报^①中发现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

3. 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②

这个电报发出不久，联共（布）领导人得知，加拉罕电报中所述情况已无法改变。一方面，蒋介石坚决要求进行北伐；另一方面，湖南的唐生智也迫切希望广东政府能够出兵援湘。形势已经到了非出兵不可的地步。考虑到中国的这些实际情况，斯大林等人的口气才有所松动。5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如下决定：“（1）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2）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③

然而，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收到布勃诺夫使团关于中国情况的总报告后，反对北伐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当天决定：“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

^① 即加拉罕4月3日的电报。

^{②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02～203、24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①

共产国际领导人领会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意图后，便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发出如下指示：“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从政治角度来说，广州号召同北方作战会被解释为广州不愿意维护和保卫和平，而愿意打仗。从宣传角度来说，它会给工农群众留下很坏的印象，他们可能会认为共产党人是战争的预言者。”

维经斯基苦劝陈独秀

尽管莫斯科三令五申，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支持北伐的态度并未改变。这一点，1926年6月来华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一到中国就注意到了。6月11日，他在北京向莫斯科方面汇报说：“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②

6月19日，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正式成立。6月21日，远东局在决定中明确指出：“认为在广州内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这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6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11日于北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0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以后，维经斯基等人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说服陈独秀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改变支持北伐的态度。为此，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进行了几次非常认真的交谈。

陈独秀并不是轻易改变自己态度的人。对于远东局反对立即北伐的态度，陈独秀表示难以接受。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6月30日，陈独秀在远东局会议上提出，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①

鉴于国共两党对北伐的态度，维经斯基指导远东局成员对广州的有关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查。经过调查，维经斯基才发现，在国共两党内拥护北伐的情绪都很强烈，尽管各自的目的不同。7月1日，维经斯基发电给莫斯科，汇报了有关情况。他在电报中着重指出：“管理权集中在蒋介石手中，停止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这都便于准备北伐。为建立1000万元的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捐税，提前一年征收了税款，全部款项集中在总司令手中，500万收入中有450万用于军事预算。还有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广州在围绕北伐……提出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

^①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3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1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华北去和筹集资金。”“在中央内部隐隐约约有一种要退出国民党的情绪。在北伐问题上，中央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央委员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惟一出路。”

维经斯基在电报中还说，远东局通过对政治形势总的考察，认为尽管国民政府和军队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倾向是可以防止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工农群众中还有相当大的优势，对军队也有影响。蒋介石是个中派，他仍在寻求革命力量对他的支持。有鉴于此，远东局的结论是：（1）继续支持蒋介石并要求他同右派进行斗争。（2）共产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是错误的。（3）广州此时进行北伐是错误的。广州应当采取防御立场，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巩固和同邻省的密切关系上，以便建立南方的联邦。^①

经过维经斯基等人的多次劝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认为到，北伐的方针虽然不能改变，但在广州目前所处的内外形势下，立即进行北伐显然是有害无益的。

陈独秀的思想一旦转变，考虑问题的角度就大大改变。他发现，此时北伐的条件并不具备：

首先，吴佩孚、张作霖正在联手进攻北方的国民军，而国民军败局已定。一旦北方战事结束，吴、张就会南下进攻广东。届时一些动摇不定的小军阀都必然会奉吴佩孚的命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广州此时在外有香港帝国主义

^①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20～32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者的封锁，在內有陈炯明、林虎、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进行扰乱。所以，广州政府目前的战略重点不是“进攻”，而是“防御”，防御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

其次，广州政府在准备北伐的过程中，已经停止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措施。不仅如此，为了筹措 1000 万元的基金，政府还预征了一年的税款，从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政府筹措到的款项全部集中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手里，供他支配。陈独秀认为，广州政府的做法与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期望正好相反。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北伐使工农群众得到利益，而广州政府的做法恰恰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北伐使革命力量得到发展，而广州政府将北伐经费交蒋介石支配，这只能增大蒋介石的个人权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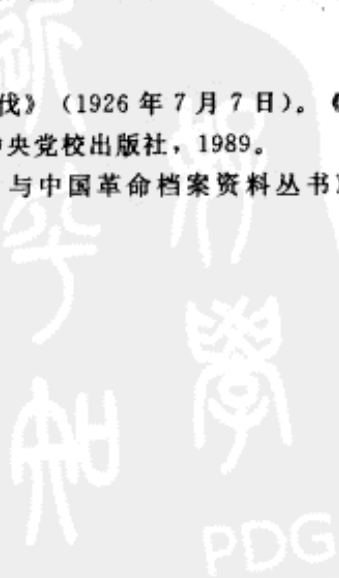
基于上述考虑，陈独秀遂改变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陈独秀态度的改变使维经斯基大为欣慰。7月6日，他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说：“对于北伐，现在中央采取了广州的防御立场而不是北上以使全国革命化的立场。”^②

一篇文章招来的谴责

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改变对北伐的态度或许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陈独秀是党的领导人，他的态度的改变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且维经斯基所期望的，也

^① 参见《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926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628~6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2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不仅仅是他改变态度即可，而是要他代表中国共产党说话，向社会表明对北伐的态度。

根据维经斯基的要求，陈独秀写了一篇《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前两天，7月7日，这篇文章在《向导》（161期）上刊出。陈独秀在文章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对北伐的态度：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惟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了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

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陈独秀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后，断言：

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陈独秀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国共两党内引起了纷纷议论，拍手称好者有之，顿足谴责者亦有之。

在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甚至一些向来表现左倾的人，都对陈独秀文章中的观点表示强烈的不满。顾孟余斥责说：“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的感情。”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不顾由于身体残疾而带来的行动不便，亲自找到鲍罗廷，要求他向陈独秀表示，不要再做这类文章。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特区党部则向中央党部提出对陈独秀的控告，并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

蒋介石是在8月24日督师北伐的过程中才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的。当天，他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陈独秀乃中国共产党领袖，《向导》周报为中国共产党言论机关，此种言论，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任。值此严重时

12
谁对北伐持消极态度：
难言之隐

期，发此言论，虽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不敢缄默。应请中共中央执委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①

在国民党内，对陈独秀口诛者有之，笔伐者更有人在。张静江在找过鲍罗廷之后，又于8月13日专门写信给陈独秀，认为陈独秀的文章“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②。除张静江的信外，陈独秀还相继接到署名为“符琇”、“黄世”、“冥飞”等人的来信，信中均对他的文章提出异议和斥责。

对于这几封信，陈独秀没有弃之一旁，也没有封存起来，而是将它们全部刊登在《向导》第171期“读者之声”栏目里，并且在同一栏目内，以张静江的信为主要对象，亲自作了答复。陈独秀在复信中不急不躁，于侃侃而谈之间驳斥了对方的观点，坚守了自己的立场。

陈独秀的文章不仅在国民党内引起不满，就是在共产党内，也有人反对陈独秀的观点。

瞿秋白认为，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中山舰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导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是异常迅速的发展着。现时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势力不足以完全打消农民运动，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无产阶级正需要利用北伐这个革命战争的时机，实行其力争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反对北伐。瞿秋白根据自己的观点写成《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660～661页，档案出版社，1992。

② 《向导》，171期。

一文，送到《向导》编辑部，但编辑部的答复是：拒登！

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陈独秀是制造了麻烦和纠纷，陈独秀的文章如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必然引起同蒋介石的冲突。他在见到远东局的维经斯基等人后，向他们抱怨说：“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北伐？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这项工作，以便使群众了解我们的态度，同时不过早地引起蒋介石和我们之间的冲突？现在我们支持北伐，甚至广泛宣传北伐，但同时又对它采取批评态度。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中共的立场就是这样，国民党也了解这一点。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他们的行动不能不给国民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反对北伐。我认为，这种方针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冲突，因此应该防止这种冲突的很快到来。陈独秀的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从北伐被转移到这篇文章的内容上来了。”

维经斯基当然不会同意鲍罗廷的看法。他告诉鲍罗廷：“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对北伐的惟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远东局的另一位负责人拉菲斯也向鲍罗廷表示：“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北伐问题上它使党的注意力转到内部反革命的危险上。这样一来，党的方针就纠正过来了。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不接受这篇文章。若是我们大刀阔斧地开展反对北伐的斗争，那就会产生危险。但文章中没有谈这一点。相反，它把注意力引导到内部的反革命上。为什么鲍罗廷觉得反对反革命必定会被认为是反对蒋介

石呢？”^①

陈独秀的文章不仅仅是在当时招来一片谴责之声，而且在许多年后，甚至直到今日，仍然有人对其大加指责。难道陈独秀真的错了？

陈独秀：警惕新军阀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所遭到的批评和攻击，使党内一些同志产生了困惑。这时，北伐已经如期举行，中国共产党究竟采取什么对策，亟须确定。

为了澄清认识，统一思想，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明确阐述了中央对北伐的态度。《通告》指出：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民众惟一无二的希望，遂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北伐之军事行动只是更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的局面，若果我们对北伐希望过高亦是错误。

现时一般民众对于北伐的确是存着许多幻想，存着许多等待倚望的心理，便是我们的同志亦多有

^① 鲍罗廷与远东局成员的谈话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对北伐存过分的希望，把北伐看做革命的惟一出路者，这对于革命的前途是要发生不好的影响的。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是赞成北伐，尤其是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1. 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 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3. 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所以当具体指出现时广东政府出兵的性质，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①

《通告》号召全党发动民众，积极支持北伐，在北伐军所到地区组织工农运动，以便使北伐真正成为革命势力向北发展的革命的军事行动。

从《通告》的内容可以看出，陈独秀在自己的文章中虽然反对立即北伐，但当北伐已经成为事实后，他便采取了积极的支持北伐的态度。不过，他所支持的，是革命的北伐，即能给工农群众带来切身利益的北伐，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的北伐，更不是扩张蒋介石个人势力的北伐。

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这篇文章？陈独秀对蒋介石的担心是否多余？

评价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不能离开它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和

^① 《中央通告第一号——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267~26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针对性。陈独秀发表此文固然是受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影响，但他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服从。如果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主张立即北伐，更多的是考虑北伐可能给苏联带来负面影响的话，那么陈独秀不主张立即北伐，则有他自己独立的考虑。一方面，他对广州政府面临的内外形势有所担心，对广州政府准备北伐的做法有所不满；另一方面，他对北伐可能引起的国共两党新变化也有所忧虑。

陈独秀看到，蒋介石在接连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企图通过北伐进一步掌握党、政、军大权^①，并对工农运动加以限制，国共关系已经隐藏着深深的危机。然而国共两党党员对北伐所能带来的结果却寄予很高期望，没有洞察到立即北伐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

仔细研读陈独秀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在文中提出了两种北伐观。

一种北伐观是：北伐虽然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但这种军事行动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进行北伐的应该是爱护人民群众，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困苦的革命军队；北伐的政治纲领应该是主张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并且不会因“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更不会“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这样的北伐才是革命的军事行动，也可称为革命的北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北伐。

^① 根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指总司令——引者）统辖”；“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处、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各军事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凡国民政府所属民政、财政各部机关均需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

另一种北伐观是：北伐是完全没有革命内容的单纯的在军事上对北洋军阀的讨伐。它有两方面内涵：一是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人民群众的具体纲领，反而为了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一是“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所谓军人政客的个人权欲活动，就是借北伐之机在军事活动中扩大个人或小集团的实力和权势。这显然是军阀行为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这样的北伐不具有革命的意义，是纯军事扩张的北伐。这就是蒋介石所主张的北伐。

陈独秀正是以这两种北伐观为标准，来观察、衡量、分析、批判北伐军事行动的。

首先，在两种北伐观的标准之下，陈独秀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企图借北伐之机建立军事独裁的野心，敲响了警惕新右派势力扩张的警钟。自从中山舰事件之后，由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为了维护国共联合战线而对蒋介石新右派势力实行退让、妥协的政策，使得蒋介石所进行的倒行逆施活动不仅没有得到制止，没有公开地给予揭露，反而通过改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组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等，把绝大部分党政军权集中到蒋介石新右派手中。在准备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已经暴露出建立军事独裁的倾向。在广州进行调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就指出，“准备北伐的过程同时也为军事独裁倾向取得胜利提供了方便，大大加重了预算负担，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活动，特别是在农村的活动”^①。陈独秀对蒋介石的野心也有所察觉。他认为，中山舰事件、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485～48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整理党务案以及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处置共产党员，“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①。在给蒋介石的公开信中，陈独秀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孙中山已经逝世，但“国民党的惟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因为除了孙中山外，“实在无人配如此”^②。鉴于蒋介石的野心不断膨胀，陈独秀敏锐地预见到：单纯的军事北伐，只能更加助长蒋介石的独裁欲望，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一个新军阀。然而，这一点却没有人给予公开揭露。陈独秀看到，不仅一般民众对于北伐存着许多幻想和等待倚望的心理，甚至多数共产党人也对北伐存有过分的希望，把北伐看做革命的惟一出路，而北伐应该具有的真正意义却被忽视或歪曲了。^③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告诫人们：革命的北伐，一定要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业落实到人民群众的自求解放上面，经济上必然要解决一般农工平民的困苦，政治上则要赋予人民群众以言论、出版、居住、人身等各项合法权利。可是，此时广州政府的北伐，不仅在出师之前就“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陈独秀由此感叹：“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此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湖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难道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政策比唐生智还不如？

其次，在两种北伐观的标准之下，陈独秀希望唤起民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1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1926年6月4日）。《向导》，157期。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267～26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支持北伐并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自觉性。不坐等北伐军的到来，而是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为北伐军的胜利推进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为自身的解放创造条件，这正是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本意。陈独秀认为，“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而“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谈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惟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①

尽管如此，面临北伐势在必行的形势，陈独秀看到，如果反对立即北伐，势必造成共产党的被动。所以，他顺应了这一趋势，积极号召民众支持北伐，以使单纯“军事行动”的北伐变成“革命的北伐”。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以更明确的语言，向全党传达了陈独秀的意图。报告说：“我们不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只是在从这个运动中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渐渐形成民众在政治上的势力。”^②

正是在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号召和领导下，北伐沿途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627、3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各地的党组织将支持北伐作为中心工作。在北伐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动员起来，为北伐军送信、带路、运输物资、破坏敌人交通等，为北伐胜利进军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翻天覆地的农村革命在北伐军所到地区迅速掀起，农民在政治上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猛烈进攻，在经济上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人民群众对北伐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在北伐过程中为自身解放进行的斗争，才使北伐如陈独秀所期望的那样，拥有了革命的成分。

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是复杂的，从支持北伐到不主张立即北伐，从在理论上对立即北伐持消极态度到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支持北伐，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北伐前景的担心。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虽然发表的时机不对，但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支持，而是揭露了新右派借北伐之机扩张势力的企图。

后来的事实恰恰被陈独秀言中，正是蒋介石这个“投机的军人政客”利用北伐战争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为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基础。

在国际远东局指导下：所得与所失

陈独秀身边有了“婆婆”

1926年3月蒋介石突然发动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联共（布）领导人无不震惊。

3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和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33人举行会议。会议听取了托洛茨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特里利塞尔、谢列布里亚科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决定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①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18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这以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相继收到关于广州局势的报告。经过对报告的分析，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加快组建远东局的步骤。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什么要决定在中国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呢？

斯大林等人意识到，中山舰事件所造成的广州的紧张局势虽然在短时间内得到缓和，但由此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层次的政治变化却正在萌芽之中。要正确把握中国政治的脉搏，及时处理紧急事变，仅靠北京的加拉罕、广州的鲍罗廷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人坐镇上海，以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以加拉罕为莫斯科在华最高领导，统辖和协调各方关系；以鲍罗廷为驻国民党代表，主要负责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东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联系；另外在上海组建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以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很显然，这一格局更有利于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力量的指导和协调。

4月29日，根据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提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共产国际远东局由以下人员组成：维经斯基（任主席）、拉菲斯（任书记）、格列尔、福京，以及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共产党代表。^①

6月初，维经斯基率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员启程来华。他们在哈尔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于6月中旬抵达上海。6月19日，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是为远东局正式开始在华工作。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23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从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的构成来看，斯大林等人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负责人。

拉菲斯——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

格列尔——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部长。

福京——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

从以上4个人的职务来看，颇具代表性。这说明联共（布）领导人在组建远东局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在中国开展全方位工作的需要。

从表面看，远东局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但组织远东局的决定、远东局人员的配备、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的成行时间等，都是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操作的。这就意味着，远东局在华工作期间，必然遵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愿望行事。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首先，远东局是直接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它直接从政治局那里领取指示，并直接向政治局或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汇报工作。

其次，远东局中的俄国代表团成员，恰恰又是远东局的核心成员，如主席维经斯基、书记拉菲斯，还有格列尔、福京等，由于其身上特有的“俄国代表团”的标签，他们自然秉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旨意行事。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因为这些人都是远东局的核心成员，所以他们的决定便成了远东局的决定，故“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就等于“远东局”^①。

6月19日，远东局举行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

^① 本书为了叙述方便，用“远东局”代替“远东局俄国代表团”。

确定了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员的分工：维经斯基（化名谢尔盖）负责全面工作；格列尔（化名教授）负责工会工作；福京（化名年轻人）负责共青团工作；拉菲斯（化名马克思）负责情报、宣传鼓动、组织和秘书工作。至于远东局的中国、朝鲜、日本代表，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的工作；朝鲜共产党的代表朝共中央选派；召来琼森、莫里和共青团的一名代表以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常设代表处。根据会议规定，陈独秀（化名老头子）、瞿秋白（化名文学家）分别作为中共中央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参加过远东局的会议。

这次会议还确定了远东局总的工作性质。主要是：（1）远东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日本和朝鲜代表团的身份作为集体机构领导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治、工会和组织活动。（2）远东局应作为切实指导各国（中国、日本、朝鲜）工作的机构，竭力避免把自己变成与中共中央并行的只从事或者主要从事中国事务的机构，避免在细小事情上干预中共中央的事务。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远东局不希望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干预中共中央的决策。然而，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却完全背离了这个规定。会议对俄国代表团成员的分工是：（1）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参加它的日常工作。（2）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志应定期报告中央的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向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3）远东局的俄国成员应帮助中央工作，为其部分工作部门负责人提供咨询。（4）建议让马

克斯同志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①编辑部工作。^②

按照这样的分工，“避免在细小事情上干预中共中央的事务”便成了一句空话。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说：除维经斯基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外，拉菲斯与从事组织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同志保持着联系，福京经常与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接触，格列尔定期与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会晤。一些决议、决定、声明，不管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起草的，都经过详细讨论，互相协商，最后达成共识。

看来，中共中央确实处在远东局的密切控制之下。

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如此密切的关系，令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深感不安。他明白，除了鲍罗廷对中共中央实行“遥控”外，远东局在上海的成立，意味着莫斯科又在他的身边派了个“婆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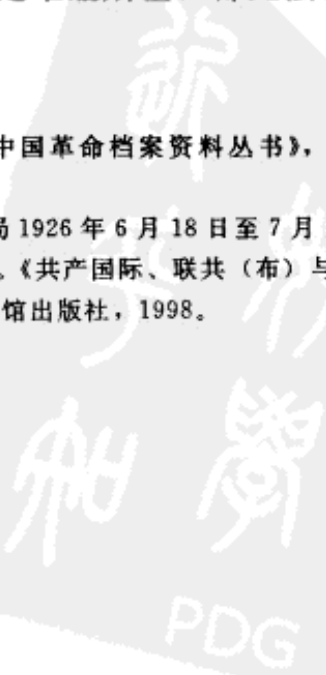
如此工作了一个月后，不仅陈独秀感到不舒服，就是远东局成员也开始担心，他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一些委员保持这样“最紧密的接触”，是否对党的工作有利？在维经斯基和拉菲斯写给莫斯科的报告里，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这种忧虑。他们写道：“我们都认为，在远东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最主要危险，是它可能变成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党的正常发展。”^③

然而，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维经斯基，都无法根据个人意

① 即《向导》周报。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0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间的工作报告》（1926年7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5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志来改变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关系的现状。这种不正常关系的存在，既是远东局的身份（代表莫斯科对中共进行指导）使然，也是中共的地位（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联共（布）的一个“小兄弟”）使然。

远东局指导下的中共中央

远东局在中国工作期间，正是中国大革命潮流波澜壮阔而又暗礁重重的时期。作为富有革命经验和领导能力的远东局成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及时的和有利的指导，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敏锐性和工作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更是受益匪浅。

远东局开始工作后的第三天，6月21日，即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的建议。^①7月1日，维经斯基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中，阐述了远东局要求结束省港大罢工的理由。他写道：“拖延结束香港的罢工会造成人们对形势的误解，现在可以证实，罢工使有些大资产阶级集团得到了好处，总的来说使形势复杂化了，无疑也加剧了右派的阵地。”维经斯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即停止香港罢工，不提出香港不能接受的大量物质赔偿要求”。^②

^①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2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18～32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7月15日至23日，国民政府派代理外长陈友仁同港英当局代表在广州就解决省港罢工问题进行谈判。港英代表拒绝谈判解决罢工的具体办法，只提出“实业借款”，企图进一步控制华南经济。谈判遂无果而终。事实证明，依靠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是徒劳的。

陈独秀此时也注意到，省港大罢工在坚持了一年之后，港英政府仍无诚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罢工工人在香港原来的工作岗位已经由新招的工人所代替，继续罢工已经不能给港英政府造成重大经济压力，反而使罢工工人的生活出路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而国民政府对于罢工工人的接济和安置也不得力，一般民众对罢工的援助也已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了。同时由于长时间封锁香港的策略，也开始引起中国商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延长罢工也好，封锁香港也好，既不能使香港屈服，又可能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

由于有上述考虑，所以当维经斯基等人提出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的建议后，陈独秀甚表赞同。但考虑到罢工工人的情绪和广州内外的政治环境，陈独秀认为，不能断然宣布结束罢工，而应该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

7月3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通告，指出坚持了一年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已经完成了许多任务，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现在已经到了结束罢工的时候了。但结束罢工的前提是：“要工人得到有相当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使香港得到政治的胜利”。为达此目的，中央要求各地极力做好以下工作：（1）联合各地工农商学各界一致举行排英大运动，并宣布香港政府破坏省港罢工及延宕罢工解决的阴谋。（2）通电鼓励省港罢工工人，并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应该对于省港罢工为有利的解决。假使香港政府不愿意解决罢工，也应当由

国民政府筹备巨款补助罢工工人并安置他们。^①

中共中央还指示中共广东区委，切实根据以下条件结束罢工运动：（1）要求香港的中国商人、广州商人、香港政府和广州政府支付 300 万元，以便一次性地分给罢工工人；（2）要求保证香港的中国工人有结社自由，并保证部分罢工工人可以返回工作岗位。

就在陈独秀已经向全党布置了结束罢工的策略之后，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等人却对立即结束罢工产生了顾虑。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的报告后决定：“推迟对香港罢工问题作出决定，就此问题征询国民党中央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②

这时，为了调查广州的政治军事情况，维经斯基等人组成的远东局代表团已经到达广州。接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后，他们于8月9日决定：“关于结束香港抵制罢工的问题，决定过几天，在与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得到新的情报后再讨论一次。”^③

不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犹豫并没有使维经斯基等人彻底放弃自己的主张。相反，当他们亲临广州调查了解之后，更加坚定了尽快结束罢工的决心。

维经斯基等人看到，长达 14 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虽然给港英政府带来了巨大损失，但对广州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正常的贸易发展，损害了向广州输送产品的部分农民的利益，使商业阶层一直处于罢工委员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 册，280～181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 册，367、376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纠察队的监督之下。而且，支援罢工工人的大量开支加重了广州政府的预算负担。另外，围绕这次罢工开展的政治宣传运动，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幻想，似乎单纯依靠广州政府就可以一举击败英帝国主义，从而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主动性。有鉴于此，他们认为，罢工在破坏英国声誉方面的政治效果早已达到，一定要香港方面满足罢工者的赔偿要求才结束罢工的政策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加剧罢工带来的负面影响。^①

对于这些具体情况，在上海的陈独秀并不完全了解。他虽然也同意结束罢工，但认为应该是有条件地结束。继7月31日党内通告中提出要使工人得到相当的经济利益之后，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致省港罢工工人书，明确提出：罢工是到解决的时候了，但结束罢工必须有一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给罢工工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否则就是工人阶级的重大损失。^②

在广州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条件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因此，应该承认，远东局代表要求立即结束罢工是正确的。

为了尽快结束罢工，消除不利影响，8月28日，维经斯基利用自己在广州的机会，亲自召开了解决省港大罢工的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远东局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广东区委代表。在维经斯基和远东局其他代表的建议和劝告

^①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8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192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2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下，会议最终作出了“在不要求香港给予货币赔偿情况下结束罢工”^①的决定。

这时，广州政府已经出兵北伐。许多罢工工人参加了支援北伐的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交通队、慰劳队等，并且已随军出征。为了巩固北伐后方的革命基地，结束罢工确实已经迫在眉睫。

9月30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从粤海关抽取2.5%进口货物附加税，奢侈品加征5%的附加税，作为结束罢工后津贴工人的费用。第二，保存罢工委员会和香港各工会机关，安排工人就业。第三，在保存工人纠察队的前提下，撤回纠察队，停止封锁香港。

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分别发表《为停止封锁宣言》，坚持了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正式宣告结束。

北伐军自出师以来，在工农大众的支持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接连击溃吴佩孚的军队，到1926年底，已经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

为了保证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共中央一面指示各地党组织动员工农群众大力支持北伐，一面要求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不怕牺牲，身先士卒。确实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可以说，北伐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辉煌的战绩，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牺牲是分不开的。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既为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而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6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高兴，又为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而头痛。他发现，尽管共产党为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为了维护国共团结又作出种种让步，但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共之间的矛盾却有增无减。由于工农运动的勃兴，引起了乡村土豪劣绅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恐慌和反感。这种反感情绪在国民党内得到强烈反应。更令人不安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大部分将领，都对工农运动持反对态度。在北伐的后方广东省，不仅出现了压迫工农运动的现象，甚至发生了国民革命军士兵受其官长纵容杀戮农民运动骨干的事件。

陈独秀敏锐地意识到，目前在革命阵营内部已经产生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倾向：一方面是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日渐向左；一方面是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两种倾向随着北伐的进军也在同时继续发展，而且距离越来越远，如果不加以阻止，最终将使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再次面临两难的选择：要维护国共合作，就必须限制工农运动，但这样做会使北伐失去其革命性，成为新军阀向老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要发展工农运动，就必然引起多数国民革命将领的强烈不满，最终必然导致国共关系恶化。

是选择发展工农运动而使国共关系破裂，还是约束工农运动而继续维持国共关系？尖锐的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摆在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在陈独秀看来，国共分手是迟早的事。既然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已走到了尽头，那么就应该坦然地与国民党说“再见”。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也与陈独秀有同样的感受。他也认为，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发展

工农运动与保持国共统一战线是互相矛盾的，共产党只能择其一。不过，维经斯基也非常清楚，国共分手是斯大林等人绝对不会允许的。因为国共关系能否保持，关系到联共（布）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攻击下能否站稳脚跟的重要因素。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不仅北伐的大好形势将毁于一旦，而且还会给托洛茨基反对派提供攻击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口实。因此，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国民党这条船。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1926年12月中旬，维经斯基指导中共中央召开了汉口特别会议。

长期以来，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标志。但人们或许不知道，这次会议的指导者，正是远东局领导人维经斯基。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都是在维经斯基指导下、在不违背莫斯科指示精神的情况下形成的。

仔细研读会议文件可以看出，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对于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右倾分裂倾向的估计是正确的，但他对于党的工作的批评却是错误的。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左稚病”，其表现是：（1）看不起国民党；（2）包办国民党；（3）包办民众运动；（4）否认左派存在；（5）误解党的独立；（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

为了处理好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关系，陈独秀提出了如下挽救危机的策略：（1）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2）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继续向敌人斗争。（3）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4）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提出“国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的要求。（5）改善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一

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尤其要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使左派获得群众。(6) 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7) 减少店员与中小商人的冲突。劝告店员不要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不可轻取罢工手段。^①

很显然，这些策略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软弱无力的，有些则是不正确的。但由于它们没有违背莫斯科的指示，所以在会上得以通过。

不仅如此，会议在《政治报告议决案》中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只有防止自己的“左”，才能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能避免“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②

汉口会议决议是自中山舰事件以来一直存在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华政策中的右倾错误的延续，也是北伐开始后国际代表为避免国共分裂制定的“加强左派、隐蔽中共”策略的发展，同时又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难以驾驭和自决的反映。还应该看到，汉口会议召开于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之时，置身于斗争漩涡中的鲍罗廷、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人，不能不对国民党左右派的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倍加关注。为了统一武汉方面的思想，稳定军队，加强其与蒋介石抗衡的能力，共产党只能收束工农运动。这也是右倾政策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口会议之后，1927年1月，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才迟迟传来。最新指示是在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559～568、57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确定的，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内。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2）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3）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4）为了加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以促进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①

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含有“进攻”精神的决议案。

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从而提高了陈独秀等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的认识。

1927年春，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鼓舞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

维经斯基：鲍罗廷同志在这里发号施令

早在维经斯基以远东局主席的身份来华之前，他就对鲍罗廷在华工作的方式和所采取的政策有意见。远东局成立后，尤其是维经斯基亲赴广州考察后，对鲍罗廷在广州的做法更加不满。

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分歧主要是在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国民党左派问题上。维经斯基认为，为了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最重要的方法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群众，扩大国民党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辑，282～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基层组织，组织革命的社会团体，加强国民党左派，提高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① 这就是说，中共中央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国民党左派并充实它的群众基础，以孤立蒋介石集团；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力量，密切与群众组织的联系，使之成为党的真正基础。在这两者的关系上，组织群众是党的工作的重点。鲍罗廷却否认国民党内存在真正的左派，所以他认为根本谈不上加强左派的问题。鲍罗廷并不反对工农群众运动，他也提到要搞土地革命，但他认为这些都要置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来进行。鲍罗廷既不肯真心实意地大力支持国民党左派，又不敢大胆地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这样他就只能靠玩弄权术，搞联甲倒乙的策略。鲍罗廷曾津津乐道地说：在北伐期间，他给共产党所拟定的任务之一就是利用军事集团间的矛盾来削弱蒋介石的军事力量。他还满怀信心地认为他的计谋可以成功。^②

由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不同，维经斯基和鲍罗廷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针也不相同。维经斯基提出，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针，通过加速开展城乡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加强国民党左派和壮大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鲍罗廷则指出，维经斯基的方针是完成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翻版。他的意见是，应该通过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和国

^① 参见 1.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6 年 7 月 6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 册，325～326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2.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 年 7 月 1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 册，346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 年 9 月 12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 册，486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民革命军中各种派系的“上层联合”，来达到抑制蒋介石的目的。

维经斯基将鲍罗廷的“上层联合”策略，斥之为彻底对蒋介石作出重大退让的策略。他指出，由于鲍罗廷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把蒋看做是广东最现实的力量，不主张反蒋，这就使蒋介石有理由认为，不管他对共产党人采取什么态度，反正共产党人都会支持他的。正是由于鲍罗廷的这种政策，才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攻的野心越来越大。^①

1926年8月，远东局成员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到广州进行考察后，对鲍罗廷及其指导下的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极为不满。8月9日，远东局委员会对广州局势作出初步结论，指出：广东的共产党人也染上了这种迷恋于军事的通病，这证明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不够坚定，也说明在总的革命建设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缺乏独立的政治方针，他们把北伐描绘成万应灵丹，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帮助向北推进的一种手段。^②

8月15日，维经斯基在远东局委员会会议上提议，要毫不迟疑的将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撤换掉。^③

维经斯基等人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于9月16日同中共

^① 参见《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6月2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0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关于广州局势问题的初步结论》（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7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③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议记录》（1926年8月15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8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中央执委会委员召开联席会议。远东局方面出席会议的是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中共中央方面出席会议的是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时、王若飞。会上，维经斯基代表远东局作关于广东政策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陈独秀作关于中国总的政治局势的报告。维经斯基谈了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意见，希望中共中央能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

本来，在远东局来华工作之前，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就对鲍罗廷在广东的做法颇为不满，这一情绪也影响到中央与广东区委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于8月12日向远东局汇报工作时，就表露了出来。陈延年说：“在我们这里一般说来工作安排的比北方好。区委受到信赖。虽然我们这里都是东大生^①，但这一点没有像在北方那样引起摩擦。中央还不理解我们，因此常常骂我们。鲍罗廷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施加压力，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从我们方面说，常有些工作我们没有同他协调一致。中央毫无根据地怀疑，鲍罗廷同志在这里发号施令。另外，我们过去的一些老同志对我们组织中的平等关系不满意并在北方反对我们。”^②

陈独秀和陈延年，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一个领导着中央工作，一个负责着广东地方工作。然而，血脉的联系和亲情并没有在他们之间开辟一条心灵相通的桥梁。他们对鲍罗廷的看法不一致，对待国民党的政策也有分歧，但他们

① 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8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并没有因为是父子关系而向对方妥协。他们都固守着自己的立场，认为自己才是党的忠诚战士。在他们心目中，党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

在这次会议上也是如此。陈独秀在听取了维经斯基关于广东情况的报告后，再次对广东区委的工作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与中央的分歧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广东区委只是孤立地看待广东，而不是考虑全国的形势。第二，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戴季陶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认为对其可以忽视不管。但中央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思想会找到自己的武装力量。第三，广东区委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因而它的整个策略是“左”的。它希望有一个左的国民党，根本否认有必要对国民党作出让步。从这个观点看问题，他们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中央同右派谈判导致的结果。但中央认为，采取让步策略是正确的。陈独秀还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是广东区委实行“左”的方针的结果。^①

陈独秀的发言支持了维经斯基等人的看法。

这次会议之后，1926年9月22日，维经斯基以远东局的名义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专门谈中共广东区委和鲍罗廷的问题。他在信中说，中共广东区委在1925至1926年间在对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过早的尖锐分裂和他的“三二〇”（即中山舰事件）武装示威，随之而来的是将汪精卫排斥在政府权力机关之外，并对共产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0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党人和左派的总进攻。所有这一切削弱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然而，广州的同志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些老的错误，而且由于他们坚持以往的错误观点，又在过去的错误上增加了新的错误。他们不同意中共中央全会^①最近关于国民党的决议，说明他们普遍不理解目前面临的任務。维经斯基在信中指出，广东区委的这些错误都是在鲍罗廷指导下形成的。要使广东区委改正错误，必须对鲍罗廷采取相应措施。

但斯大林会撤换鲍罗廷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斯大林相信鲍罗廷更甚于相信维经斯基。

在三次起义的烽火之中

1926年9月的上海，在一个名叫沙斯^②的苏联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霓虹灯映照下的大上海，有富丽堂皇的外国租界，也有贫穷可怜的华人区，有豪华的邸宅、商店和别墅，也有乞丐、衣不蔽体的人力车夫和食不果腹的苦力。他们四出谋生，有活儿就干。这个上海似乎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极端矛盾和鲜明对比的化身。

初到中国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为强烈的是殖

① 指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全会。

② 沙斯是苏联政府派往广州帮助国民政府改组财政管理制度的三人的经济学家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两人是苏联著名教授、财政学家施泰恩和经济学家叶利亚舍维奇。

民主义的典型现象——最为残酷的民族、社会压迫和侮辱。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傲慢的英国军官。他们站在码头上，十分专注地看着我们（“赤色分子”）下船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位军官身着殖民主义者通常穿的服装：身穿皮夹克，头戴软木盔。他的目光充满敌意和轻蔑，充满帝国主义者的自信：似乎英国人有天赐的权利在这个国家作威作福。我久久不能摆脱这个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帝国主义的化身，不是在公文，也不是在当时我已阅读书本里，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

直至今日，我脑海里仍保留着其他许多场面。例如，日本、英国或美国海员殴打赤手空拳的人力车夫，并将他们的人力车抛掷水中。或者：在中国沿长江航行的英国轮船上，有一次我和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同坐一桌，警察（本身也是中国人）从一等舱的公共餐桌上赶走一位中国打扮的富人，而将其安排在专设的一张小桌上，因为英国人自认为与中国人同桌就餐是不体面的。再如：江面舢板上住着中国最贫困的穷苦人家，那里有不少未成年少女。醉醺醺的美国水兵只消花上一枚银币，这还合不上我们的二十戈比，就可以拿姑娘寻欢作乐。

这就是我到中国后最初的表面印象。它说明殖民主义势力依然存在，说明殖民主义对各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何等可怕的灾难！^①

^① 沙斯：《在革命中国工作的一年》。《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92～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就是在这个殖民主义势力肆意横行的上海，以陈独秀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组织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反对北洋军阀、夺取上海的武装起义。其间维经斯基等远东局成员也参与有关决策。

1926年9月，面对北伐军势如破竹的气势，孙传芳不得不将主力调往江西战场，以阻挡北伐军的进击，上海防务一时空虚。中共上海区委根据这一形势，在“人民自治”的口号下，联络上海各界，准备掀起一场反对孙传芳的革命运动。

这时，民族资产阶级也由于不满孙传芳的统治，主张工商界联合起来，积极推动自治运动。其上层人物虞洽卿还特意与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联系。而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也开始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希望联合起来发动反孙起义。

当反孙风暴即将在上海爆发之时，中国共产党是否走在最前面，领导这次反孙运动？陈独秀又一次面临着重要抉择。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再次发挥“婆婆”的作用，替陈独秀拿主意。9月11日，远东局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反孙运动应该由与孙传芳有矛盾的资产阶级人士来领导。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角色呢？远东局指出：“我们党应该对这场运动从旁边加以支持，不抛头露面，也不谋求领导权。工会可以参加联合委员会。在支持这场斗争的同时，必须力求从领导人那里为革命团体和工人团体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①

远东局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一个助手的角色。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3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驻华代表的指导，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人没有对远东局的决定没有提出疑问。相反，他们尽量去理解远东局的决定。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表示：无产阶级不能急于来领导革命，因为这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而资产阶级也必然因为害怕而取不合作态度。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① 罗亦农的话显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就这样，虽然中共上海区委为起义组织了2000余工人，并且任命了起义指挥人员，但由于对起义没有主动权，只能听命于资产阶级。

按照钮永键的部署，10月24日拂晓开始暴动，以海军军舰上的炮声为号。10月24日拂晓时分，约定暴动的时间已过，军舰的炮声还没有响起。原来夏超起义已于前一天被孙传芳镇压，钮永键得知消息后，便自行取消了计划。

罗亦农等人意识到情况不妙，便立即派人通知已经进入岗位待命的工人纠察队散去。但少数纠察队因未接到通知，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靠近租界的南市斜桥、大木桥、日晖巷一带均发生小规模战斗，工人领袖奚佐尧、陶静轩等百余人被捕。不久，奚佐尧、陶静轩被反动军阀杀害。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了血的教训。

10月28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上，陈独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从起义的失败中吸取的主要教训应当是：我们在事先应当弄清自己想达到

^① 参见《上海区委召开市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

什么目的，有希望举行人民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很好地了解双方的实力对比。他特别强调：我们将来不应当夸大敌人的力量和贬低自己的积极性。他还从起义的失败中还看到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举行发动。”

罗亦农也指出：“从这次失败中我们得出了什么教训呢？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派别组成的。大资产阶级不准备发动起义，而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是不积极的。我们的结论是：（1）将来不能指望资产阶级，而自己要努力发挥领导作用，虽然表面上领导者可能是资产阶级；（2）国民政府的代表^①根本不是政治家，而是典型的旧军人；（3）我们学会了组织和准备军事发动。”^②

1926年11月初，北伐军取得了江西战役的胜利，开始向苏、浙、皖进军，孙传芳所部望风披靡，孙传芳不得不准备从上海退却，让张宗昌的直鲁军前来接防。这时，上海的局势异常混乱。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抓住军阀部队换防这一有利时机，以上海总工会为主体，发动商、学各界，开展反对直鲁军南下、打倒孙传芳的群众运动。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抵达杭州。这一消息使维经斯基等远东局成员开始兴奋起来，他们认为建立革命民主政

^① 指钮永建。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10月2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92~59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权的时机到了。2月18日，他们向陈独秀指出两条路：一是等待拥护蒋介石的何应钦军队到来，并由他建立政权，然后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再设法参加进去；二是在何应钦到来之前同国民党一起建立政权，然后让何应钦也参加这一政权。

按照远东局的设想，在上海建立的民主政权是一种苏维埃模式的政权，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政权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这一政权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①

当远东局正与陈独秀等人就举行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议时，2月19日清晨，在上海总工会号召下，上海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2月20日，远东局根据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将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准备建立民主政权。

2月22日，北伐军占领石湖荡，前锋抵达泾枝桥，离松江只有6公里。当天中午，由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上海各阶层代表组成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在中共上海区委主持下正式成立，委员有上海总工会代表汪寿华，中共代表罗亦农，国民党代表钮永建、杨杏佛，其他各界代表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共11人，其中共产党员6人，国民党左派2人。并宣告此委员会即为暴动胜利后的上海市政府。

作为起义的先声，停泊在高昌庙对岸的海军建康、建威

^① 参见《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纳索诺夫、福京关于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1927年3月4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3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两艘军舰，在担任大副的共产党员动员下，于下午5时50分开始炮轰高昌庙兵工厂。6时，各区早已准备好的工人队伍开始向各区军警发动袭击，解除军警的武装。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巷战。

由于工人武器较少，力量不足，动员中间力量和瓦解反革命军队的工作也做得不够，而且由于起义开始后到达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没有配合进攻上海，工人们浴血奋战到23日晚，起义被反动军阀镇压下去。有40余名工人、学生牺牲，300余人被捕。为了减少更大的牺牲和损失，上海总工会于2月24日晨发出复工令。

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召开了几十次各种类型的会议，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令人不解的是，对中共中央有着指导全权的远东局，将两次起义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身上。在这些会议上，远东局对陈独秀等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远东局指责说：上海党组织没有以战斗的阶级精神教育上海无产阶级，没有给他们指出中国革命的整个前景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懂得现在需要的不是通过实行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抵制行动和总罢工来进行消极对抗，而是积极进行争取参加政权的发动和斗争。总之，上海党组织和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实际上不懂得新形势、新任务，错误地估计了阶级力量，一方面等待小资产阶级行动，一方面顾及大资产阶级的态度。

远东局认为，这次起义的失败不是党的领导机关的偶然失误，而是过去整个方针的错误造成的。有鉴于此，远东局成员曼达良等人提出：必须坚决改变中央的政治方针，改变

其部分人员组成，撤换那些动摇得最厉害、在对阶级力量的估计上错误最严重的人。^①

远东局的批评使陈独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即便远东局所指的动摇最厉害、错误最严重的人不是陈独秀，他也明白自己脱不了干系。而问题在于，陈独秀的“婆婆”不就在身边吗？他们不是可以直接指挥中共中央吗？为什么失败的责任却要由陈独秀等人来承担呢？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失败所吓倒，他们从血泊中再次奋起，开始精心筹划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保证这次起义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以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武装起义总指挥。

中央特委成立后，多次研究起义的时机问题。鉴于前两次暴动时机选择上的失误，特委决定起义应选择在北伐军临近上海前的一两天举行。关于起义的具体步骤，决定先发动总同盟罢工，然后转入武装起义。此外，特委还决定在先进工人中选出5000名组成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训练。

3月19日，得知北伐军已快到上海时，中共上海区委制定了第三次起义的行动大纲，这就是：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用民众的力量，最后根本地消灭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上海民众的直接政权。^②

3月21日中午，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令，全上海

^① 《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纳索诺夫、福京关于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1927年3月4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4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北伐战争》，457～4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各工厂、作坊、机关、商店、车站、码头共 80 万人举行了总罢工。总罢工实现后，马上转入武装起义，以工人武装纠察队为先锋，广大群众为后援，按照预定的计划攻打各警署、兵营和军队驻地。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纷纷赶来参加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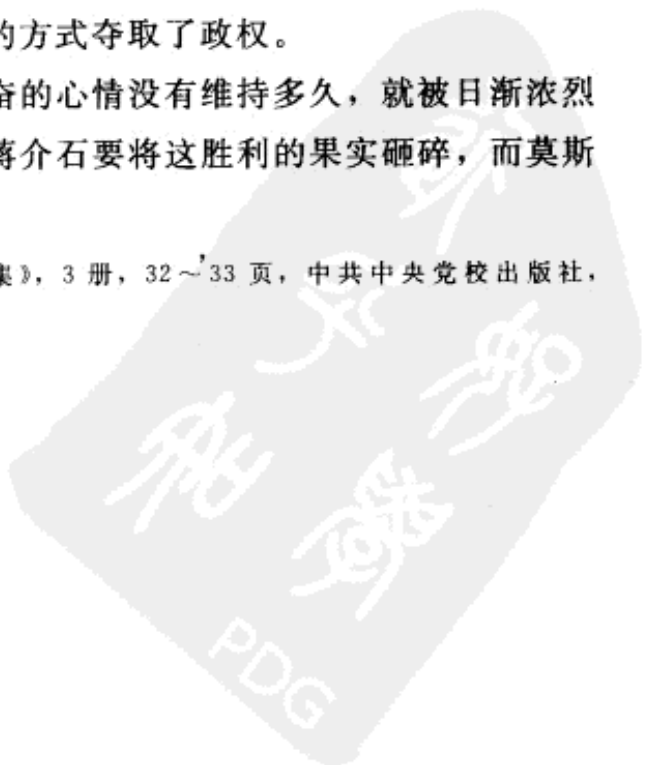
3 月 22 日上午，除闸北的战斗仍在进行外，其他地区的战斗已经结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天，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了市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革命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市政府委员共 19 人，其中共产党员 9 人，工人代表 1 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和上海市政府的建立，使陈独秀十分兴奋。3 月 28 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中，对上海工人阶级给予了热情赞扬。他指出：“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英勇的胜利的斗争，真可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模范。”“此次武装暴动起来并胜利以后，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①

陈独秀有理由为上海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胜利和上海市民政府的建立而感到骄傲，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城市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了政权。

然而，陈独秀兴奋的心情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日渐浓烈的阴云所笼罩。因为蒋介石要将这胜利的果实砸碎，而莫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 册，32～33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科又不让同蒋介石斗争。

从此，陈独秀陷入煎熬之中。

维经斯基败在鲍罗廷之手

维经斯基于1926年9月22日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要求撤换鲍罗廷。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维经斯基在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鲍罗廷同志依然作为苏联代表留在广州的话，那么任何部分地更换广东区委领导的做法（而由于人力普遍匮乏中央只能更换一小部分人员）都不可能取得所需要的决定性结果。鲍罗廷实际上领导着我们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并靠自己的威信加强了广州同志的所有错误观点。

鲍罗廷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问题上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因此，尽管鲍罗廷同志试图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①的指示来进行工作，但他今后不可能贯彻这一政策，因此他在这个岗位上也将是有害的。

维经斯基在信中还说：由于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他现在在广州的处境并不好。远东局使团在广州曾亲眼看到，国民党左派是怎样地明确无误地藐视他，甚至在自己的工作

^① 原文如此，疑为“联共（布）中央”。

中回避他。维经斯基认为，鉴于目前中国的形势极其复杂，必须对国民党各派实行非常复杂而又灵活的政策，但鲍罗廷是胜任不了的，他已不适合在中国工作。因此，撤换鲍罗廷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①

然而，令维经斯基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等人信任鲍罗廷更甚于信任以他为首的远东局。10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不接受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同志的建议”^②。

如同维经斯基想借重斯大林等人来压鲍罗廷一样，鲍罗廷也向莫斯科汇报了远东局的种种不是。这就促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1月11日作出决议：

(1) ①远东局对诸如在上海和南京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②用远东局采取的方式复制多份共产党广州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做法是等于公布这些记录，这在目前条件下是个严重的和不能容忍的错误。③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警告。④建议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远东局活动的全面通报。

(2) 在任命驻北京全权代表以前，让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3) 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如在这些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则交由莫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3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8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斯科解决。

鲍罗廷同志和远东局在这些问题上的一切措施和倡议都必须通报莫斯科的驻京代表。^①

这项决议无疑给了维经斯基最猛烈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根据这项决议，鲍罗廷实际上成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的主要政治代表，而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则失去了斯大林等人的信任。12月30日，斯大林等人决定再派一些人去中国时，特意指出：“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②

此后，远东局虽然仍在中国并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其决定政策的权力已被剥夺，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也就大大降低了。从1926年12月始，远东局成员陆续回国，至1927年初，只有维经斯基和福京留在中国。

1927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始考虑对远东局进行改组。3月28日，联共（共）中央政治局命令福京立即返回莫斯科。4月初，根据莫斯科方面的指示，仍留在中国的维经斯基与新派到中国的罗易、多里奥共同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这一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为共产国际又一个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4月9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正式决定解散远东局。^③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623～62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特字第57号）记录》（1926年12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5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③ 参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1927年4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8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至此，在中国存在了10个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远东局在中国工作期间，正是中国大革命形势极其复杂多变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远东局认真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制定一个正确的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政治方针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远东局成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限，而且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远东局与鲍罗廷之间存在分歧，使得难以形成统一的政策；其二，远东局内部在工作开始不久即发生分歧，因而分散了部分精力，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三，更为重要的是，远东局直接听命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它虽然针对中国大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建议，但由于这些建议同联共（布）政治局的对华政策不一致，所以这些建议在它的“上级”那里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或者干脆置之不理。

这是远东局的悲剧，同时也是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悲剧。

漩涡之中的抉择：难题重重

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

当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以迅猛的形势向北挺进之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开展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有两个主题：一是怎样认识北伐的性质；二是怎样认识中山舰事件之后的蒋介石。

要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鲍罗廷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因为长期以来，广州的共产党人一直是在鲍罗廷的指导下作出各种决策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对于鲍罗廷的依赖，更甚于对中共中央的依赖。

那么鲍罗廷是怎样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呢？

鲍罗廷说：“当我们谈论北伐时，应当注意到这个思想的两种提法。孙逸仙本人起初设想这次北伐是对北方军阀的

纯军事讨伐。后来俄国人来了，给这个思想提出了新的革命的提法：北伐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商人群众革命运动的产物……3月20日^①以后，北伐的思想在失去这种革命的性质。在蒋介石的政治提法中根本没有明确提出某些居民阶层的革命要求。他谈论的不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而是抽象的中国民族。他统率的不是由于这些一致的要求而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革命军队，而是挂着政治部招牌的纯军事组织。”

很显然，鲍罗廷认为，北伐不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也已经成为新的军阀。

既然如此，在北伐中是不是应该反对蒋介石呢？

鲍罗廷的意见是：“在3月20日以后，我们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和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都不能充当蒋介石的反对派，因为蒋介石本人在他对北伐的非革命的解释中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〇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

鲍罗廷的意思很明确：在北伐进行之时，不能反对蒋介石。

那么在北伐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

鲍罗廷提出：“如果我们由于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②

^①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② 《鲍罗廷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69～3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鲍罗廷还分析了导致蒋介石在政治上失败的两种可能性。他说：“如果蒋介石是占领武昌的那个集团的首领，那么其他力量就会纠集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一致进行斗争，蒋介石就会在这场斗争中遭到失败。这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灭亡的第一种可能。但也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蒋介石预见到在武昌的这种灭亡，现在就向保定派作出让步，不去占领武昌，率一部分部队向江西进军，并急忙回师广州。这样只会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回师广州和不去打武昌，蒋介石就不得不宣告北伐失败。他的回师也就意味着北伐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意味着重新审查蒋介石迄今所采取的整个政治立场。”

这就是说，共产党人不能在北伐的过程中提出反对蒋介石的口号，而应该等待北伐结束时让蒋介石在政治上自取灭亡。

鲍罗廷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他已经看到蒋介石越来越背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期望，正在走向革命的反面。如果不对蒋介石采取有力措施，会给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维持国共合作的现状，不能不对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政策，因为他不能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他非常清楚，如果国共关系破裂，就意味着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破产，就给了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以口实。因此，为了证明斯大林的正确，就要维持国共合作关系；要维持国共合作关系，就不能将表面上仍是左派，而且正在准备北伐的蒋介石拉下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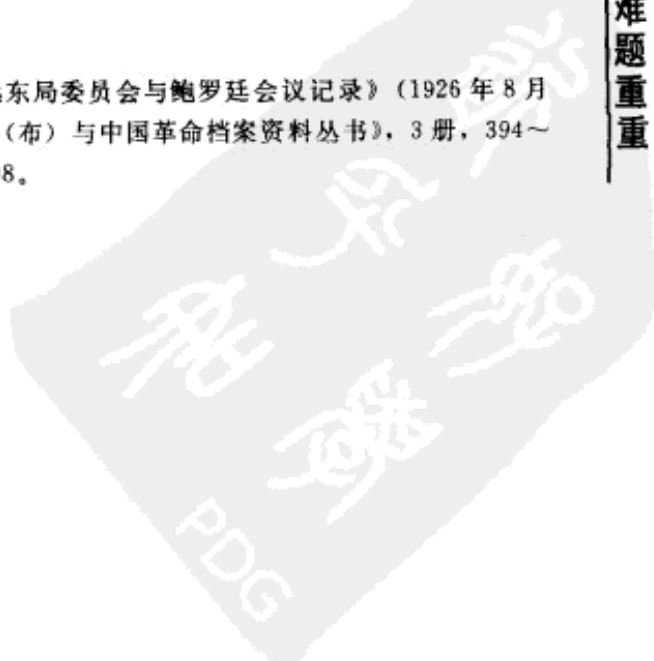
指导中共中央的维经斯基并不完全同意鲍罗廷的观点。他认为，蒋介石已经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共产党对蒋介石

应该进行批评和揭露，即使不公开点名也好，因为只有通过对蒋介石的批评和揭露，才能表明中共独立的立场，同时使广大工农群众真正分清是非，认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他指出，陈独秀于1926年六七月间先后发表的《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这两篇文章，就是批评和揭露蒋介石的。但只有这两篇文章还不够，还应该通过类似的批评和揭露，使得人们对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反动倾向有所警惕，从而孤立蒋介石右翼军事政治集团。

对于维经斯基的提议，鲍罗廷坚决予以否定。他认为维经斯基不懂中国国情，并且当着维经斯基等人的面教训说：“当你们在这里发表讲话和谈论反革命或者保卫革命时，在军人群众和非军人群众的意识中，‘反革命’这个概念必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从一定的时间起，即从3月20日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行的。因此，你们的言论将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言论。……反对反革命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这里有一个顽固的习俗，任何一个领袖都要对自己的下属负责。另一个习俗是，如果你们想打倒领袖，那你们就要先反对他的下属，因为蒋介石对3月20日以后发生的一切要负责，因此你们反对基层政权代理人就意味着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也正是这样来理解的。”^①

这就是说，要反对蒋介石，就可能将与蒋介石有联系的所有人推出革命阵营。由于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对是否反对蒋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94～39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介石意见不一致，使得陈独秀也莫衷一是。

北伐出征前，苏联顾问团团长加伦委托周恩来询问陈独秀：在北伐中是支持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周恩来为此专门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当时陈独秀正因病住院，他传下话来：“你们开会商量吧。”

这句话看起来挺民主，却难倒了中共中央一班人。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没有人对此发表自己的意见。

试想，连鲍罗廷和维经斯基都对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无法统一思想，更何况向来听命于莫斯科及其代表的中共中央。说穿了，没有莫斯科的命令，没有斯大林的指示，谁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建议？但他们又明明知道蒋介石已不是共产党的同盟者，支持蒋介石就是支持军事独裁。这就是中共中央难于抉择之处。

主持会议的张国焘见大家都不表态，便只好说：“依我看，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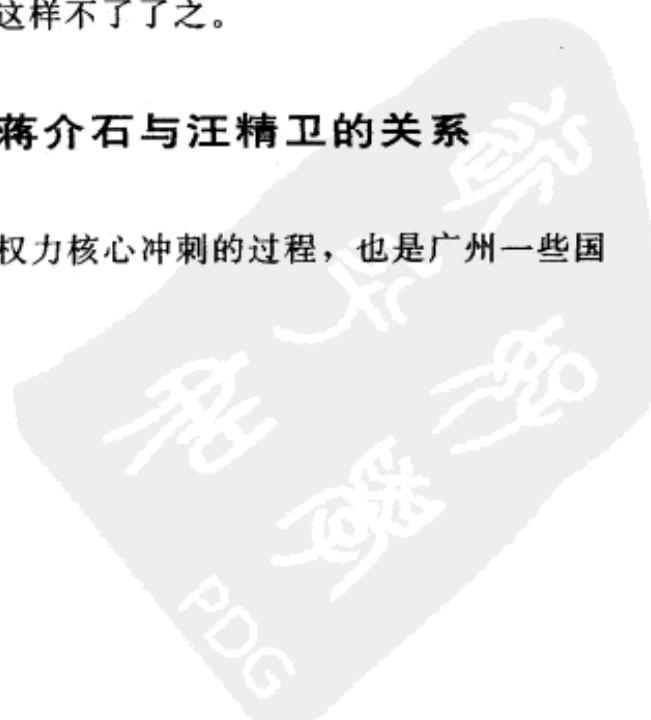
这是一句非常巧妙的回答！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是一句完全无用的废话。

当然，仅仅责备张国焘显然不公。连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不能擅自做主，张国焘就更不能有自己的明确的态度了。

于是，“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这样一个本来十分重大而又严肃的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如何处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

蒋介石向国民党权力核心冲刺的过程，也是广州一些国



国民党进步人士对他逐渐失去信任的过程。然而，他们自视力弱，无法与蒋介石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整下台的汪精卫，开始被一些国民党人所怀念，他们以为只有他才能与蒋介石匹敌。所以在北伐出师后，他们提出了“迎汪复职”的口号。

陈独秀得知广州的这个情况后，深以为然。因为他也对如何抑制蒋介石日益膨胀的野心而伤脑筋。与国民党左派一样，陈独秀对汪精卫的印象不错，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鲍罗廷都曾有过较密切的联系。如果汪精卫能从国外回来，国民党左派就有了主心骨，就能起到抑制蒋介石的作用，国民党内部的纠纷和国共两党的矛盾也会随之迎刃而解。

广州国民党人和陈独秀对汪精卫的期望，引起了维经斯基的警觉。他无不忧虑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说：“共产党人同汪精卫始终没有联系，因此谁也不知道，汪精卫本人对广东和全国国民党政权的任务是怎么想的，特别是他如何对待农民运动。广州的同志毫不动摇地认定，汪精卫正是这样的左派领袖，他能够毫无畏惧地同农民结成联盟，加强农民组织及其影响，为了农民的利益进行社会改革。但是我们认为，对汪精卫这位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相当脆弱的政治家作出这种极其乐观的评价是过分夸大了。”^①

维经斯基的看法并没有影响到国共两党对汪精卫的欢迎态度。迎汪复职运动很快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开展起来。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77~47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迎汪复职运动使鲍罗廷和维经斯基都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处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

毕竟鲍罗廷是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他虽然认为北伐是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开辟了道路，但他并不主张立即倒蒋。鲍罗廷的看法是：在中山舰事件以后，在一般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不能充当蒋介石的反对派。因为蒋介石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反蒋即意味着反对北伐，意味着革命军队的分裂。^①

基于上述考虑，鲍罗廷主张：在北伐中要给蒋介石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支持蒋介石并不等于抛弃汪精卫。他的基本想法是：汪精卫仍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他的复职可以增强左派的力量。另外，汪精卫与蒋介石仍有共事的可能性。鉴于目前蒋、汪双方的情况，只能在两者之间搞平衡。汪精卫回国后，由他负责政府方面的工作，而蒋介石则负责军队。^②

对于鲍罗廷所设计的“蒋汪合作”模式，维经斯基等人是赞同的。他们也认为，蒋汪合作是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的惟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径。大计既然已经定出，接下来就是要求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具体贯彻执行了。

当时蒋介石正率军北伐到达武汉，当得知广州正在紧锣

^① 参见《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6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9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密鼓地运作“迎汪复职”这个消息后，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倒蒋”的信号。为了粉碎“倒蒋”的企图，蒋介石采取了三方面措施：第一，借口广州偏于一隅，不利于对全国的影响，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以将其控制在自己手里；第二，找出种种理由，尽力阻止汪精卫回国；第三，寻求鲍罗廷、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支持。为此，他特意派胡公冕到上海面见陈独秀。除此以外，蒋介石还函请维经斯基到武汉，以借重于共产国际的威望，说服陈独秀支持他。

正在蒋介石为挽救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四处求援之际，军事上的胜利却帮了他的忙。9月初，北伐军连克汉阳、汉口，收复武昌也指日可待。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着北伐军的胜利而声誉大震。

天平再次倾斜到了蒋介石一边。

情况的变化使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急忙修正“蒋汪合作”的策略。他认为，现在已不是以汪抑蒋，或者是蒋汪合作的问题了，而是如何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的问题了。

9月1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发表意见说：“从主观上看，蒋介石还不是革命的敌人，他打击过右派，他需要我们，是可以同他一起工作的。……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

至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问题，维经斯基认为，北伐军占领湖北后，出现了帝国主义可能干涉中国革命的局面，英国开始在广州公然用武力破坏罢工，形势变得比8月份更

糟糕，因此现在只能为汪精卫回来做好准备，而不能急于召回汪精卫。如此一来，蒋介石也不可能激烈反对左派，因为他在前线的处境迫使他寻求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他指出：“我们不应挑头来反对蒋介石，他也不会来进攻。应当保持目前的局面，并在群众中进行十分热情的工作。在代表会议^①前应当拥有左派的多数，但不应在全会前把汪精卫召回。不应突出强调汪精卫的问题，而要强化政治问题，强调行动纲领。”^②

这就是说，只要蒋介石继续北伐，就不急于召回汪精卫。

会议根据维经斯基的意见，就处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作出如下决定：

(1) 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

(2) 因此，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声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

(3) 因此，全会的主要问题应当是通过一个政治纲领，动员左派，不给蒋介石及思想上的中派提供反对左派的可能性。这个纲领应在全会召开前公布，并以这个纲领为基础进行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① 指1926年10月16日至26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一些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00～50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 老头子^①应根据以上精神对蒋介石向共产党人提出的请求作出答复。

(5) 汪精卫回来的问题应当在国民党代表会议期间根据政治局势作出具体决定。^②

会议结束的当天，陈独秀即向全党发布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③

根据联席会议的精神，陈独秀在会见蒋介石的代表胡公冕时，要胡向蒋介石转告以下内容：“您应当同汪精卫一起工作。有三点主要理由：（1）国民党领导人中剩下的很少：廖仲恺去世，胡汉民变节。只剩下两个人：您和汪精卫，应当一起工作；（2）需要汪精卫来领导广州。张静江执行的政策不好，因此你们失去了联系和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违背孙的遗训的。应当让汪精卫根据您的思想和指示来领导广州的工作；（3）汪精卫将是您和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否则斗争会尖锐化，共同事业将遭毁灭。”

陈独秀还向胡公冕表示：我们赞成汪精卫回国，但他回来是有条件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

① 即陈独秀。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03～50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311～31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之军事首领地位，以后要更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以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①

其实，陈独秀是在矛盾的心态下执行联席会议决定的。一方面，陈独秀已十分清楚地看到：自从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其威福之甚，过于孙中山为大元帅之时。共产党支持和争取蒋介石，未必能够收到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支持和争取蒋介石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决定，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何况目前消灭北洋军阀是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在北伐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反对蒋介石必然影响北伐的进行。

在一份由陈独秀起草的报告里，有一段话十分鲜明地表露了他当时矛盾的心态。陈独秀是这样写的：“现时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大不利于 K. M. T.^② 之发展，然而在反对广东内外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我们还是要赞助他；我们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为赞助他的根本条件。我们极力促成迎汪复职的运动，但决不是梦想回复三月二十日前^③ 局面，决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汪蒋合作’。我们的态度是虽不退出 K. M. T. 但不代替 K. M. T.。”^④

① 参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2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24～52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325～32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K. M. T 即英文 Kuomintang（国民党）的缩写。

③ 指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前。

④ 《中央局报告（9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3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为了争取蒋介石，维经斯基决定亲自率远东局成员曼达良、福京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前往汉口，同蒋介石进行谈判。9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上，专门讨论去汉口会见蒋介石的有关事项。

会上，陈独秀表示了两点担心：其一，蒋介石会逼迫共产党答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支持他；其二，蒋介石会要求在前线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样他会掌握主动权。因此，陈独秀特别提醒，在与蒋介石谈判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维经斯基则对谈判定下了这样的基调：“我们不应在谈判中充当汪精卫的代表，而应当作为独立的一方，即不反对这个人，也不反对那个人。……应当将权力按几个方面来划分，如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广州方面和前线方面。国民党中央主席是汪精卫，而军事权力，汉口的新军校归蒋介石。”^①

迎汪复职运动给蒋介石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9月29日，蒋介石接到汪精卫自国外寄来的信，信中表明愿与蒋尽释前嫌，共同领导革命。蒋介石知道，这是逼他尽快表态。在多方压力之下，10月3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转汪精卫，表示欢迎汪精卫回国。蒋介石在“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的幌子下，似叹似哀地抱怨被他制造的中山舰事件逼走的汪精卫“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之后又继续玩起了戏弄汪精卫的伎俩，表示要让“静江石曾二兄前来劝驾，代达鄙意”。凡熟识张静江、

^①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52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李石曾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是根本不可能出国门一步的。

陈独秀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电报只是摆个样子。在给中共广东区委的信中，中共中央指出：“蒋这次发电欢迎汪，绝不是他已有丝毫觉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敌将士及后方民众的反蒋空气，再加以军事的失败逼迫他不能不如此。”^①

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这回被迫发出迎汪电报，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决不会甘心居于汪精卫之下，必然寻找机会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维经斯基指导中共中央精心策划的“蒋汪合作”模式，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为左派寻找主心骨

北伐时期，为了保证军事方面进展顺利，维护国共关系就成为头等大事。为了避免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直接冲突，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为中共中央制定了这样一种方案：通过共产党在暗中帮助，将国民党左派推向前台，以与右派相抗衡。

但国民党内有没有左派？左派的立场又如何？与国民党打了3年交道的鲍罗廷曾对维经斯基明确表示：“我本人并不认为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②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虽然承认有左派，但他对左派的评价是：“3月20日以后，这里^③的左派当中谁都不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不愿忍受蒋介石的压力，跑来向共产党人求教和求助。在3月20日至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4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7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③ 指广州。

5月15日期间^①，共产党人成了为国民党效劳的走狗。这是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国民党左派说，共产党人是靠蒋介石养活的姘头，他们不敢反对蒋介石。而左派自己提不出任何建议。”

陈延年还指出，尽管国民党内存在有左派，但他们已经产生分化，绝大部分人已转为中派。而且，他们由于对工农运动不满，提出了重新审查对工农政策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陈延年认为，国民党内的环境已不允许共产党人继续留在里面，他断言：“我们同国民党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②

但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却认为，否定左派的存在实际上助长了一种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和有害的观念，即在中国没有国民革命，共产党人能够承担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全体农民的直接领导。远东局的结论是：国民党左派虽然是软弱的，不稳定的，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是个坚强的和有纪律的组织；但它毕竟存在，它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以及基层和基层中层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有鉴于此，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态度应该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决抛弃在国民党左派内发号施令的想法。共产党人的参与无论如何不应突出表现出来。必须自下而上地帮助从上述社会阶层中推出新的分子，把他们团结到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分子领导层中，逐渐地消除其上层的清一色知识分子的现象。必须帮助国民党左派建立起俱乐部式的组织，在其主要核心周围建立各种行会式的地方机构。在某个组织的上层加入国

① 即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议记录》（1926年8月12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77～378、38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国民党左派的地方，必须使整个这个组织纳入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以便日后它完全可以宣布自己是支持左派集团的国民党组织。^①

后来，维经斯基将这一策略简单地概括为：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左派，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联合一切革命民主派别。共产党人在帮助左派做工作和参与领导工作时，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试图直接从组织上实行领导。^②

扩大和加强左派是对的，但维经斯基等人却将这一政策推向了极端，这显然是错误的。

陈独秀根据远东局的指示，检讨了过去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认为共产党人确实管得太多太宽，以致国民党左派没有充分发挥作用。10月4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广东区委，指出：“过去我们包办 K. M. T. 的工作已发生很大的错误，使党及革命的前途均受着许多坏的打击，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众组织更广阔的发展，一方面使斗争性质不扩大成为左右派之争而变成右派与 C. P. 之争，这个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现在左派对于我们的怀疑、畏惧、防闲，又有重演旧文的倾向，粤区须严重的注意此事。免除左派的怀疑、畏惧、防闲及避免右派的挑拨构陷的惟一办法，就只是：我们不包办一切，赞助左派起来自负责任，尽量的让他们也到工人中农人中去活动，让他们自觉也有群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关于广州局势问题的初步结论》（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37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9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众，也有力量能独立。”^①

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时表示：共产党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为此，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左派做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②

12月5日，中央局在总结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此时对K. M. T.的政策，是不要包办一切工作，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要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均容许左派参加。我们无须过虑左派参加群众运动便会夺去我们群众，只可虑左派得不着群众，这些群众到右派去。我们更为左派找到一个切实具体的政纲，作左派团结行动的标准，运动汪精卫回来使左派有中心领袖，希望在这些努力中造成左派的力量。”^③

至此，在维经斯基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明确了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将国民党左派推向前台，让他们自己负起责任，同时由共产党为他们争取群众。为了使国民党左派有中心，就要让汪精卫尽快回国。一旦汪精卫回国，左派就有了主心骨，就可以在广州建立左派的政权。所以，共产党方面要极力设法劝汪精卫回来。^④

很显然，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对汪精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他们盼着汪精卫尽快回国，认为这样一来，国共之间的一切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①②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374~375、427、443~44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③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49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新学社
PDG

“苦力观”与“在野党”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人民革命高潮的掀起，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和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向同情共产党人的维经斯基，身处矛盾的漩涡之中，深切地感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为难之处，同时也开始为共产党的前途担忧。

于是，维经斯基决定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写信，反映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在信中，他首先严肃地指出国共两党的现状。

关于国民党。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支徒有虚名的力量，它使用一些军事领袖，而且也被这些领袖所利用。随着国民党势力范围的扩大，打着国民党旗帜的独立的军事集团越来越多，而它们（这些集团）之间将发生争斗，竭力争取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便对它加以利用。除了军事集团以外，还有资产阶级也越来越依附于国民党。这些现象固然是北伐胜利进军的结果，但不能不看到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危险，不能不警觉地注意民族运动中日益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这将碍于民主革命的发展。

关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现在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不得不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斗争。这一任务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然而，国民革命的能否胜利，本身正取决于这一斗争能否开展和开展到什么程度。这样，中国共产党就陷于矛盾之中。

维经斯基对中国共产党的处境非常同情，他在信中无不

感慨地写道：

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革命力量联盟方面的任务也很复杂很艰巨，那里常常不得不同亲日派资产阶级携手来反对亲英派或其他派别的资产阶级。如果再加上共产党还要在国民党内进行周旋的困难〔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要实行领导但不能变成指挥和由自己（共产党人）取代国民党人，这是特别困难的〕，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①

维经斯基看出，发展工农运动与保持国共统一战线是互相矛盾的，年轻的共产党人无法应付其中错综复杂的问题。

事实正是如此。当时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正为如何对付日益猖獗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和如何发展工农运动而大伤脑筋。

倒是鲍罗廷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好”的建议。这就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只有先老老实实地为国民党当好苦力，才能在将来当好主人。这就是要共产党彻底放弃

^①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618~61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新学网
PDG

自己的独立地位。

鲍罗廷为中国共产党确定的“苦力观”显然伤害了共产党人，也伤了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自尊心。中国共产党固然力量还比较弱小，但毕竟是新兴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岂能将自己置于为国民党做“苦力”的地位。所以，鲍罗廷的“苦力观”一经提出，立即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中共中央专门致信中共广东区委，对鲍罗廷的“苦力观”进行了驳斥。信中说：“我们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到 K. M. T. 作工，决不是什么为 K. M. T. 当‘苦力’。阶级斗争的过程本来很长，不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运动是阶级斗争，不但一切国家里各种要求的罢工是阶级斗争，即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组织出版罢工之自由而参加国民革命工作，也是阶级斗争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我们对于此项工作，不能很简单的看做为他阶级当‘苦力’。”

中共中央指出，鲍罗廷的“苦力观”将导致共产党内发生两个危险倾向：一是积极的、左倾同志会因此愤懑，因不愿为别人当苦力而消极怠工；一是右倾同志会因此当真会国民党化，变成单纯的国民党苦力，而不是站共产党的立场上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努力为阻止老鲍的‘苦力说’在党内流行而奋斗！”^①

鲍罗廷的“苦力观”听起来虽然刺耳，令陈独秀等人不舒服，但这与维经斯基等人为中共中央制定的“不突出自己”、“不包办国民党”、“不抛头露面，也不要求领导权”^②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4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24次会议第18号记录》（1926年9月1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册，43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等政策，有异曲同工之效，这就是令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产生了“在野党”思想。

陈独秀等人认为，既然共产党人只能为国民党工作，只能隐藏在左派身后，不能占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那么共产党人就不能参加政府工作，否则就违背了莫斯科的旨意。

1926年秋，北伐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一些旧政权被打倒后，形成了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局面。在湖北，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了省政府领导工作。在江西，林祖涵、李富春参加了省政治委员会，还有一些共产党员被推为县长，如永修、九江县的县长即由共产党员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野党”的观点一度发生了动摇。夺取政权本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现在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拒绝参加显然是愚蠢的。但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党人是否参加政府这一点却拿不定主意，因为国际代表和远东局是不让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工作的。

为了弄清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中共中央特意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中共代表谭平山，请他在会议期间请示共产国际领导人。然而到了这年12月，共产国际对此问题还没有给予答复。但陈独秀等人也看出，形势的发展已经将共产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他们与维经斯基等远东局成员商议，共产党员是否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远东局专门召开了联席会议。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共产党员能否参加国民政府完全取决于国民党的领导权掌握在汪精卫手中还是蒋介石手

中。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则必须参加；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参加不仅有危险，而且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

看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人已经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而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了。难怪维经斯基在给莫斯科信中在谈到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可能性时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采取推翻蒋介石的方针，那我们不仅可以不管他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持何态度，而且相反还要促使他尽快决定自己的立场，并第一个开始同国民政府进行公开的斗争。

但目前应该排除这种情况。蒋介石同国民政府在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问题上发生分裂，会使事态严重恶化，因为蒋介石现在是全国性人物，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者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决裂，革命因而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威胁。我们能参加政府的另一种情况是：用一个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全国性人物与蒋介石相抗衡，这个人物就是汪精卫。因此，在弄清汪精卫返回的可能性之前，这第二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加以利用。一旦汪精卫回国，蒋介石很可能不去与国民政府作斗争，而是退却，那样就能在我们的积极参与下大大加强政府，以致再过一段时间蒋介石已不能冒彻底毁灭的危险而去同国民政府决裂。^①

^①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94～9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基于上述考虑，陈独秀没有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直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政府后，中共中央才派谭平山、苏兆征参加政府工作，分任农政部部长和劳工部部长。



限共与限蒋的较量：危机初显

蒋介石要求迁都暗藏阴谋

1926年9月初，北伐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后，蒋介石即致电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和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延闿，提出此时武汉已成政治中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应迁来武汉主持大计。

蒋介石之所以急于迁都武汉，是想取“一箭三雕”之效。

第一，抑制唐生智势力的增长。当时唐生智已控制湖南、湖北两省。蒋介石要率军继续北伐，武汉也必然会留给唐生智。蒋介石深知，如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武汉完全为唐生智所掌握，将来可能会对他造成严重威胁。俗话说，

“一山容不得二虎”，蒋介石当然不能坐视唐生智力量壮大，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因此，他希望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借以牵制唐生智。

第二，与汪精卫相抗衡。当时“迎汪复职”的口号在国民党内叫得很响，蒋介石虽然不愿意让汪精卫回国，但他清楚这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希望国民政府迁到武汉，这样即使汪精卫回国取得对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也可以就近对其势力予以钳制。

第三，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并最终取缔共产党。蒋介石知道，广州是共产党人最集中的地方，在国民党的各级机关中都有共产党人在工作。如果迁都武汉，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共产党人，逐渐形成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的局面，最后将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

基于上述想法，蒋介石希望迁都的心情非常迫切。9月18日，他再次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治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

在蒋介石电报的一再催促下，张静江、谭延闿遂决定于10月1日召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以便慎重讨论迁都问题。

当陈独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意识到迁都之事绝不仅仅是国民政府地点的改变问题，而是关系到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此消彼长的问题。所以，他于9月20日写出《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并通告全党。《意见》指出：“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张静江曾说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张继等均可请其加入）。表面上我们可以说国民



政府不能放在前线上；若武昌修水战事未了我们更可说：‘此问题须待军事结束后才能讨论。’”^①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时，表示反对迁都武汉。他们的理由是：国民政府应有一巩固的根据地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此时只有广东基础为好，但并不十分巩固。中央北迁后，后方情形可虑，除省港罢工的工人7万余人有较好的组织外，农民的多数还刚刚组织起来，战斗力并不强，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掌握在农民手中。自北伐出师后，中山、广宁、花县、普宁等县都发生了地主豪绅屠杀农民惨案，其原因是留守广东的军队许多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者。中央迁走后，广东的右派势力会更猖狂，这等于把广东根据地拱手让给反动派。其结果虽在武汉建立一个新基地，却失掉了广东，到头来武汉也不能巩固。同时，一个国家的首都不能随便搬迁，更不能受前方军事将领的摆布。为了便于指导工作，可以在武汉设一高级的中央代表机关。另外，武汉的地势极易受敌包围，尤其是怕敌人的经济封锁。

不主张迁都的意见显然在国民党内占了上风。10月16日，国民党各省区联席会议通过如下决议：“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②

蒋介石得知此决议后仍不死心。为了达到目的，他改变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3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26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了此前所提出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全部迁鄂的要求，提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及联席会议诸代表，称：“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

陈独秀：鲍罗廷又做了一件大错

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武汉，但他于10月30日接到一个报告后，便改变了主意。这个报告来自随蒋介石北伐的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铁罗尼在报告中说：“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武汉任由唐生智一人摆布。必须有两个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

联想到蒋介石电报的内容，鲍罗廷于是改变了主意。这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班人基本上还是听鲍罗廷的。于是，一个由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顾问鲍罗廷等组成的迁都调查委员会很快成立，并于11月16日启程，前往武汉调查迁都事宜。这实际上是作为国民党第一批党政官员迁往武汉。

12月1日中午时分，鲍罗廷一行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南昌。蒋介石亲自溯江而上，前往迎接。为了表示对广州来人的欢迎，蒋介石还在南昌组织了盛大的群众欢迎会，并邀请鲍罗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由于南昌市内形势不稳，12月4日到8日，到南昌的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与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举行会

议，共同商讨军事政治问题。鲍罗廷参加了会议。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以下决定：关于迁都问题，与会者均认为应早日迁都武汉，蒋介石亦表赞成；关于军事问题，决定联络张作霖，消灭孙传芳，但目前应暂缓进攻，须先整顿军队和巩固已占领的地区；关于工农运动，决定工人运动可取缓和之势，而农民运动可积极进行，在农村实行二五减租。

会议结束的当天，鲍罗廷一行启程前往武汉。蒋介石亲往送行。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南昌与武汉逐渐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当陈独秀从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得知鲍罗廷已经带人北上后，感到十分震惊。这时他又接到张国焘的来信，说在广州的李济深已经致电蒋介石，主张限制工农运动。中共广东区委也接连报告中央，说李济深与农民的关系恶化。

综合这些情况，陈独秀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商议，于12月4日致信中共广东区委，对鲍罗廷擅自做主离粤北上提出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倘因政府迁移而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都有可能），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和他从前主张‘以黄埔为中心’，主张‘我们退出 K. M. T.’，主张‘需要蒋专政’是同样的大错。”

陈独秀也明白，鲍罗廷既已铸造成大错，责怪是毫无用处的，关键是怎样应对国民政府迁都后广东面临的新形势。于是，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委提出应付新局面的几点措施：

- (1) 切实与左派领袖合作，给他们以群众，要求和他们

开一极秘密的联席会议，讨论应付新变局之具体方法。

(2) 即速进行联络省城各种左倾的军事势力，准备必不得已时的冲突，惟冲突时必须用左派出面。

(3) 加紧李济深军中的工作——公开的及秘密的。

(4) 由各方面尽可能的与李济深加强联络，以减其右倾之速度。

(5) 尽力设法使前方将领影响李济深。

(6) 巩固工、农、商、学的联合组织。

(7) 设法让李济深与商人冲突。

(8) 目前在工农运动中应避免小的冲突（工人纠察队直接封闭商店的举动须极力制止），准备到绝对不可避免时进行有组织的大冲突。

(9) 加紧党的秘密组织，加增党的机关及交通的秘密性。

(10) 准备必要时简单的解决方法。^①

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既已迁往武汉，如何应对蒋介石可能对武汉的控制，这个重要问题也随之摆在了陈独秀面前。12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如下决定：为避免国民政府迁都后之弊害，应尽力做到：汪精卫速回；大力发展左派和民众组织；搞好蒋唐之间的关系；巩固左派在广东省政府的权力。

蒋介石不买莫斯科的账

为了使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工作不致中断，已到武汉的宋庆龄、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孙科与鲍罗廷于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471～4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2月12日举行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党部代表各一人组成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武汉开会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伦为秘书长，鲍罗廷仍为总顾问。

次日，联席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并发出通电阐明成立的理由。蒋介石在南昌得到通知后，复电表示赞成成立武汉联席会议。然而，在1926年12月31日，当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二批人员谭延闿、张静江等到达南昌之后，蒋介石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将谭延闿等人滞留南昌，以此作为筹码，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定都南昌。

蒋介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他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此时南昌地区及江西已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他得到张静江、陈果夫等人的支持，国民党右派分子操纵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南昌一时成了右派势力的中心。在这里，他可以为所欲为。迁都南昌可以江西为立足点，进攻江浙，收拾长江下游。这样，他既可以巩固已取得的地位，还可以迅速东进，尽快拿下沪、宁，扩大势力。

第二，武汉克复后，武汉地区和湖北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武汉联席会议中国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较强，如果定都武汉，蒋介石无法把武汉政府控制在自己手里。

第三，武汉地区和湖北是在唐生智控制之下，驻湖北的第四、第八军不能随意指挥，对于蒋介石搞军事独裁是一种牵制作用。

与武汉相比，南昌偏处一隅，水陆交通不发达，蒋介石也认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但他的总司令部设在此地，

而且这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大，影响也有限。再者，江西和邻近江西的福建主要由他的嫡系部队或倾向于他的部队控制，可以随时调遣，便于搞军事独裁。所以，蒋介石不惜自打嘴巴，一定要将中央政府和党部所在地设在南昌。因为他看到，在武汉组成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完全是在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鲍罗廷的影响之下，这样一来，他的主张和权力势必受到扼制。

李宗仁曾分析过蒋介石当时的心态，他说：

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师心自用。因那时中央方面防蒋军事独裁的空气正日见浓厚，武汉方面的四、八两军，在蒋看来，又非其嫡系。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坚持中央应设在南昌。但是蒋氏的理由却十分薄弱，他无法否定武汉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对迁武汉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总司令部为何不迁往武汉，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蒋的理由是总司令部应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但是，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北上可指挥平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反无此方便。因此蒋的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说出来真是辞穷理屈。^①

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张静江，自然全力支持蒋介石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431~43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的意见。这样，蒋介石得以操控第二批滞留南昌的政府委员和中央执委会委员。1月5日，蒋介石公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待3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开会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

此后，蒋介石又用“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武汉，“命令”立即取消武汉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①

就这样，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

对于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武汉方面起初并未予以重视，以为这只是蒋介石一时心血来潮而已。他们决定电促蒋介石来武汉，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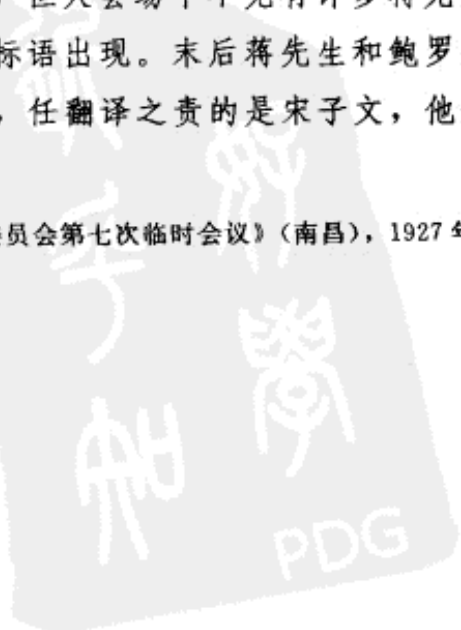
蒋介石本来是不准备到武汉去的，但为了摸清武汉的虚实，做武汉上层人士和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消除对他不利的影响，同时树立他维护革命阵营内部团结的形象，他还是决定赴汉。

1月12日下午2时，蒋介石抵达武昌时，武汉方面早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组织了各界群众30万人齐集江岸边迎候，场面十分隆重。但蒋介石没有想到，武汉方面在隆重欢迎他的背后，已经做好了与他进行斗争的准备。

陈公博曾有过如下回忆：

蒋先生终于一天到了武汉，那里自然也照例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但大会场中不免有许多蒋先生所不满意的口号和标语出现。末后蒋先生和鲍罗廷办过一次直接交涉，任翻译之责的是宋子文，他们争

^①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南昌），1927年1月7日。



议了许久，鲍罗廷最后对蒋先生说：“你想众人都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件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鲍罗廷的说话太挖苦尽致了，蒋先生听了这段故事，遂决意要驱逐鲍罗廷。^①

蒋介石在鲍罗廷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在武汉联席会议的徐谦等人那里，也没有讨到便宜。他们告诉蒋介石：迁都武汉，原来也有包括你蒋介石的许多人提议，经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现在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改变。即使迁都南昌的话，将来也可以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他们警告蒋介石：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是非法的，这个政治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是无效的。

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在武汉却碰了大钉子，这使他心里很恼火。本来，蒋介石去武汉的目的是希望说服武汉方面改都南昌，如若不然，也希望能够捞回在武汉政府改组中失去的一部分权力，并在其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来改变力量对比。但此行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受到鲍罗廷的奚落和徐谦等人的斥责。

蒋介石发誓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他回到南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发电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当

^① 陈公博：《苦笑录》，65页，东方出版社，2004。

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1月21日、22日，他与张静江、谭延闿连名致电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强烈要求取消临时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接着，他又派戴季陶赴武汉，督促在武汉的委员们去南昌。

是按照中央的决议定都武汉，还是满足蒋介石的一己之私改都南昌，一时成了武汉联席会议的委员们关注的焦点。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表面上看是迁都之争，实际上是党权和军权之争。

在武汉的联席会议成员虽然不主张完全听从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建议，使武汉向激进方面转化，但也不准备驱逐鲍罗廷和反对工农运动以取悦于蒋介石，因为他们普遍对蒋介石的做法和为人有所警惕和不满。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又派陈公博去武汉刺探情况。陈公博认为，邓演达、徐谦已经被共产党操纵，只能找宋子文、孙科、顾孟余等人打听。他从宋子文那里未得到所期待的答复，便只好去找孙科。结果怎样呢？陈公博回忆说：

我没有办法，跑去见孙哲生^①。

“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我开门见山地说。

“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孙哲生跟着滔滔不绝地发挥他的主张，说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示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

^① 即孙科。

的分裂。

反共的大将也这样，大概真不是共党把持罢，于是我又找顾孟余。孟余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说惟有国府迁汉，党才免得分裂，不过他又提起三月二十之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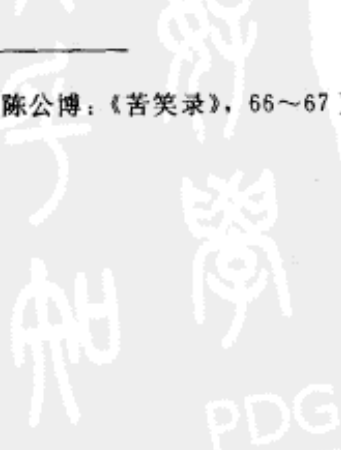
“蒋介石天天说要请汪先生回国，都不是诚意的。”^①

看来，此时武汉方面的反蒋态度是很坚决的。陈独秀也许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迁都之争中坚决站在武汉一边，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联席会议的决定。在他的首肯下，《向导》杂志专门刊发有关文章，宣传定都武汉的重大意义。文章指出：无论从经济政治交通和革命的历史意义上看，从国民党联席会议已定议案上看，国民政府应在武汉而绝不应在南昌，现在国民党的大多数领袖及各种群众大都同然一辞赞成武昌，不知蒋张有何理由，如此坚持主张南昌啊。特别在政治的意义上如果国民政府迁南昌便等于羞与本国革命民众见面。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决定不理睬蒋介石的无理要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去南昌敦促在南昌的委员们尽快来汉。

被蒋介石滞留在南昌的委员们，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蒋介石的做法，主张执行中央迁汉的原议。2月8日，被滞留在南昌的委员们举行会议后向外界宣布：“兹应民众及各团体要求，本日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2月12

^① 陈公博：《苦笑录》，66~67页，东方出版社，2004。



日，又明确决定：“中央党部设于汉口，国民政府设于武昌。”

不久，除张静江等几个顽固支持蒋介石的人外，被蒋介石滞留在南昌的委员们相继赴汉。

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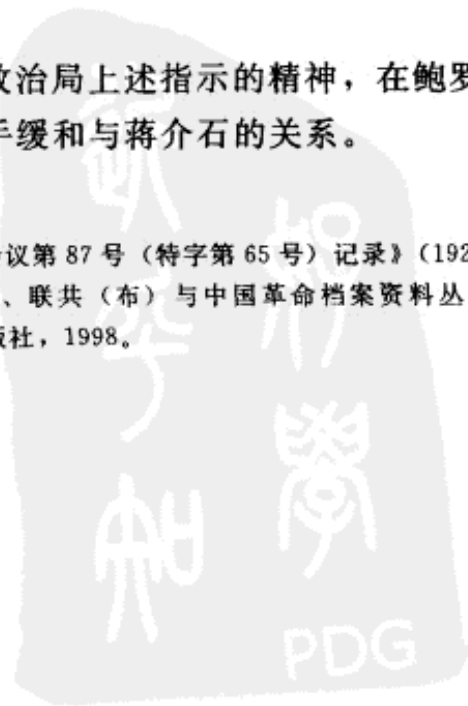
鲍罗廷将蒋介石逼到了角落处。是继续保持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从革命队伍中将其清除出去？还是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图继续拉住蒋介石？鲍罗廷也拿不定主意。按照鲍罗廷的想法，应该选择前者。但他知道，没有莫斯科的命令，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大局，将来他本人要对一切后果负责。于是，他决定请示上司。

2月7日、8日、10日，鲍罗廷接连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分歧，希望对下一步工作给予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接到鲍罗廷的电报后，召开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决定给鲍罗廷发出如下指示：“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①

接到这个指示后，鲍罗廷还真有点后怕。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选择与蒋介石决裂的道路，否则就完全违背了斯大林的旨意。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上述指示的精神，在鲍罗廷指导下，武汉方面开始着手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1927年2月17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18～11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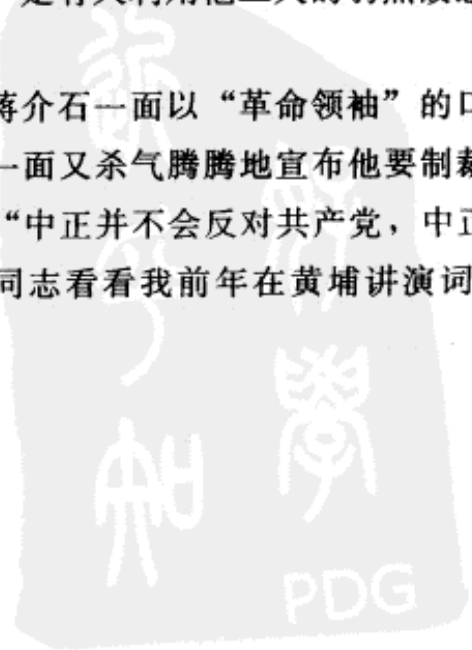
然而，蒋介石并不买莫斯科的账。

在迁都之争中败北后，蒋介石并没有收敛独裁的野心，相反，由于军事实力的增强，他更加有恃无恐，决心与武汉方面（包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鲍罗廷、共产党进行斗争，以获得中外反对势力的支持。

2月21日，蒋介石利用在南昌总部第十次纪念周演讲的机会，开始对武汉联席会议和共产党大加攻击。针对武汉方面“提高党权”的口号，蒋介石振振有词地说：“中正是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的主席，而且是政治会议的主席，就是最高的政治机关主席，对于拥护党权，拥护我们国民政府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我敢说决不使得党权分散和旁落，为一人或一派来操纵或利用；这是我们党员无论谁也有监督的责任，现在有人主张集中党权和提高党权，究不知党权分散在那里？……现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权限有冲突的，我认为没有第二个机关，如果有就是现在汉口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若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不然是没有党，也没有政府了，而他反要来命令党和命令政府！这样还有党的纪律吗？还能说提高党权，集中党权吗？”

蒋介石还对所谓“独裁制”和他与汪精卫的关系大发议论，声言如果有人说他独裁，他的独裁权力也是中央党部和政府授予的，而真正独裁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联席会议主席徐谦；他与汪精卫情同手足，是有人利用他二人的弱点故意从中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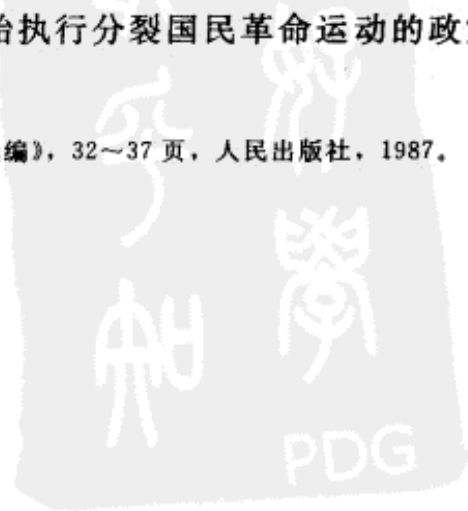
谈到与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一面以“革命领袖”的口气声称他是扶助共产党的，一面又杀气腾腾地宣布他要制裁“越轨”的共产党人。他说：“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扶助共产党的！各位同志看看我前年在黄埔讲演词，



就可以明白。前年黄埔第二期学生党部成立的时候，当时有一句话对他们说，我并不是偏袒共产党，我是扶助中国弱小的革命团体来和我本党共同革命，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因为这时候，共产党同志为数很少，他们对本党对学校都很忠实诚恳，共产党既是一个革命的团体，我们要助他们，所以不许大多数的国民党党员压迫他们。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之一，所以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权力。”^①

巧合的是，就在蒋介石讲了这番讲话的第二天，2月22日，维经斯基、张国焘便赶赴九江去面见蒋介石。在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中，蒋介石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对鲍罗廷的不满和指责。他说：“南昌与武汉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冲突的根子在武昌。我对冲突的态度是明确的，报上发表的我的讲话作了表述。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由鲍来负。鲍为我们的国民革命做了不少事。他为建立我们革命和党的巩固基地付出了辛劳。但是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

^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32~37页，人民出版社，1987。



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我个人对鲍没有任何恶感。我迄今为止一直把他当作老师看待。但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在坚持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我认为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种政策会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造成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东方各国被压迫国家都会有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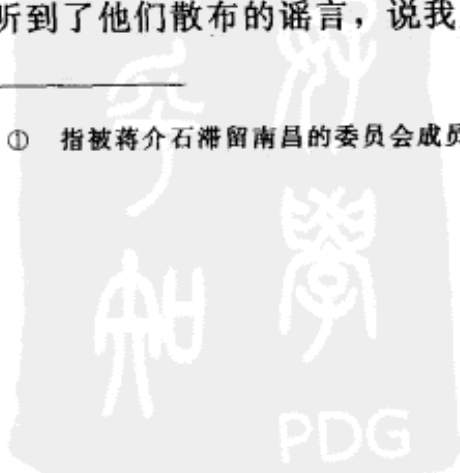
同一天，蒋介石收到武汉来电，宣布国民政府在武昌正式办公。这意味着他想迁都南昌的企图要落空。

23日晨，蒋介石找到维经斯基，大发了一通议论，说武汉那边想成立第二个政府。他还咄咄逼人地问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持什么方针？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如果不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呢？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持客观的态度。他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主观。这会破坏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和一切东方弱小民族心目中的威信。”

为了说明自己只是对鲍罗廷有意见，蒋介石接着补充道：“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我想您是相信我的。”

在谈话的最后，蒋介石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我对您的到来已等待很久。您现在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①，认为目前形势非常严重。我们准备决裂。现在您负有很大责任。我等待您去汉口后的建议——怎么办，政府是否迁往汉口。我等待您的通知。”说到这里，他又把语气一转，愤愤然地说：“共产党人在攻击我。您是否听到了他们散布的谣言，说我成了军阀，是独裁者，想同

^① 指被蒋介石滞留南昌的委员会成员。



苏联断绝关系，要同日本人妥协？”^①

维经斯基基本想通过这次谈话，争取蒋介石向左转，但他从蒋介石的话里话外已经听出，要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已经很难了。

果然，过不了几天，3月7日，蒋介石又在南昌总部的演讲中大放厥词。这一次，不仅是攻击共产党、攻击武汉国民党中央，而首先是将火力对准苏联顾问鲍罗廷。他说鲍罗廷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他，这实际上是侮辱国民党。

陈独秀质问蒋介石

蒋介石在南昌的演讲中，口出狂言，对共产党提出种种指责，这使陈独秀感到很是不平。自从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步步紧逼，中共节节退让，不仅答应了他整理党务案的要求，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甚至对于中共一向重视的工农运动也有所约束。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要压迫中共继续退让，难道中共为了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只有退让这条路吗？再说鲍罗廷，为国民党工作数年，将苏联的援助都给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手下的军队，也是靠苏联的军事援助在打仗。当年廖仲恺遇刺后，如果不是鲍罗廷坚决排挤走许崇智，扶植蒋介石掌握军权，他蒋介石也未必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今蒋介石翅膀硬了，就对阻止他搞分裂的鲍罗廷不屑一顾了。

陈独秀愤愤然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不能任凭

^① 《1927年2月22日和23日维经斯基和蒋介石在九江的谈话记录》（1927年2月26日于九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32~13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蒋介石的无端指责而无动于衷，他要用笔杆子来责问枪杆子！

针对蒋介石在两次演讲中将“我”等同于“领袖”，动辄以“我”为核心的狂妄做法，陈独秀尖锐地批评道：“凡是一个民主主义党的领袖或民主主义政府的领袖，对民众发表意见，照例都称我们，决不称我，这是表示非个人专政的意思。若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①

针对蒋介石对鲍罗廷的指责，陈独秀写道：“如果苏俄代表真有压迫国民党领袖或侮辱国民党的行动，不但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起来反对（何以最近党中央全体会议并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蒋一个人感觉着？），即中国共产党亦应当向代表严重警告，甚至于请求苏俄另换代表。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主张汪精卫复职，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在国民党的宴席上劝告勿抑制工农运动，便以为是压迫国民党领袖和侮辱国民党，则压迫国民党领袖侮辱国民党者还有百数十万国民党党员和广大的民众，不只是苏俄代表。北方的张总司令（张作霖）宣称苏俄代表辅助国民党而逮捕其家属，南方的蒋总司令则宣称苏俄代表侮辱国民党而欲加以驱逐，所持理由虽不同，而反对苏俄之事实则同。”

至于蒋介石有无与奉鲁军勾结一事，陈独秀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是谣言，如果是中伤，则造谣煽惑中伤捣乱以图破坏国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汉的党员，而正是蒋介石现方表示亲近的奔走牯岭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协之日本政党及

^① 实：《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191期，1927年3月12日。“实”为陈独秀笔名。

东京的日本通讯社及报馆。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报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载十七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廷。’不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及报馆声辩，而只痛骂自己的同志，这是绝对无益的事。”^①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严重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利于革命阵营的团结和国共合作。为此，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对革命势力团结问题发表了意见。其中指出：

此次介石同志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一则曰纠正共产党，再则曰制裁共产党；本党乃代表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匪独不受他党之纠正与制裁，并不愿受他党之扶助，亦不曾受他党之扶助。介石同志所称纠正与制裁之理由，谓共产党党员对待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使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中果有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实，不独国民党得据党纪加以纠正与制裁，即本党最高机关亦应加以处分，然而事实恰正相反。试问本党对于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有过异议没有？事实上有违反过此案的决定没有？不但事实上未曾违反过此案所决定，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中央委员，共派本来不及全数三分之一，新近广东及江西省党部之改选，经贵党中央之圈定，广东十五委员中共派只三人，江西九委员中共派只一人，这是谁

^① 独秀：《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向导》，192期，1927年3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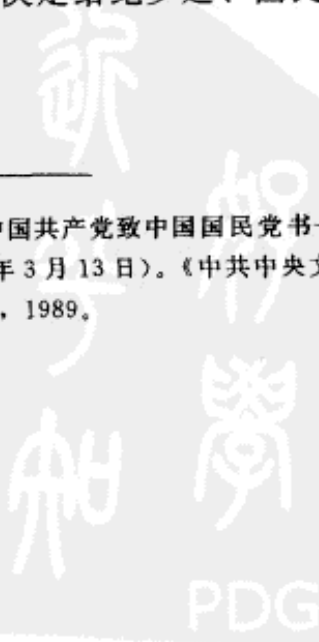
排挤谁，谁压迫谁？

……介石同志为贵党负责领袖之一，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于他自己也承认是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员，却防闲之，排挤之，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是出于何项动机？贵党最高机关若听任此种状况继续下去，是否有碍合作之精神？^①

在当时条件下，陈独秀的信也只能是表示表示中共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已。因为，此时蒋介石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既然决心与武汉方面决裂，就已经是不计后果了。更可悲的是，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竟然对蒋介石毫无约束力。本来，武汉方面希望蒋介石能够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为此还将会期推延了几天。但到会议开幕的那天，蒋介石仍不见踪影。会议期间，武汉方面再次致电蒋介石速来参加中央全会，但他还是置之不理。

对于蒋介石和武汉方面的关系，在远方的斯大林等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仍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并且认为武汉方面还有能力控制蒋介石。至于国共关系，他们认为更有继续维持的必要。于是，就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的当天，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鲍罗廷、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发出如下重要指示：

^①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1927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29～3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建立两个中心、两个国民党、两个政府和因此建立两支军队的做法是危险的和不能容许的。(2) 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3) 我们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因为我们坚信，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革命的中国。(4) 我们认为不久前蒋介石显然为讨好国民党右派所作的答记者问，是对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不能容许的分裂主义的打击。(5) 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在武昌提出的同蒋介石合作的条件^①是正确的并能保证国民党的统一。^②

这个指示的主体精神是维护革命势力的统一。但莫斯科哪里知道，蒋介石此时是决心要与武汉分裂了。

3月10日下午2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和武汉地区的党员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提出了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迎汪复职等11条要求。党员群众的情绪感染了与会的委员。大家一致对蒋介石进行了谴责。会议最后通过《统一革命势力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2月21日给蒋介石的信。其中谈到必须集中党的领导和恢复党的权力，恢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集中国民革命军中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治教育工作，统一外交政策和财政政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等。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0号（特字第68号）记录》（1927年3月10日子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49～15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对全体党员训令》等多种重要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支持工农运动；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取消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

但是，也应该看到，会议在蒋介石已经公开在南昌大搞独裁和分裂活动的情况下，还保留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等职务，这就使蒋介石仍然掌握着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权力，可以继续号令各军，保存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实力。而且会议虽然对蒋介石等右派的行动进行了声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遏止蒋介石的分裂活动，使得蒋介石仍能在南昌为所欲为，最终走上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独裁道路。



将革命推入血泊之中： 莫斯科的失策

蒋介石开了杀戒

一切善良的愿望和举措都无法将蒋介石从反革命的道路
上拉回来。羽毛已经丰满的蒋介石，决心向共产党人开
刀了。

1927年3月6日晚，受蒋介石指使，驻江西的倪弼下
令枪杀了共产党员、江西省总工会主席陈赞贤，制造了赣州
惨案。接着，蒋介石又指使打手在江西制造了一系列反共
事件。

3月16日，蒋介石的走狗段锡朋纠合500余青帮分子
和流氓地痞，包围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
部，捕去会计1人，捆绑押至由反动分子把持的江西省党
部，接着搜捕南昌市党部委员。他们还解散了江西省学联，



封闭了国民党左派主持的《贯彻日报》社，逮捕新闻记者，并宣称要解散市党部、市工会和市农协，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搞得南昌市一片恐怖。

3月17日，蒋介石到达九江后，九江的反动分子立即活跃起来。他们手持刀剑、棍棒等凶器游行示威，大叫“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随即围攻和捣毁了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市农协、总工会及《国民新闻》社，打死职员和工人4人，捕去新闻记者1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介石即派大队卫士弹压，掩护暴徒出市，并以“保护”为名，调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当日，蒋介石即设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反抗。

3月20日，蒋介石到达安庆后，由地痞流氓、青帮分子组成的敢死队，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将所有文件什物抢劫一空，打伤机关职员和省党部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

蒋介石一路向上海杀来……

3月26日，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介石到达上海。一面假惺惺地向工人纠察队保证：决不缴纠察队的一枪一械；一面紧锣密鼓地布置反革命清党。

3月29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致函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要求市政府暂缓办公，任命吴稚晖、钮永建等13人组成上海市临时政治委员会，以吴稚晖为主席，负责规划指导上海市的党政工作，从而取代了临时市政府。与此同时，蒋介石暗地里加紧纠集反共势力，制造反共“清党”的借口。

子
舟
舟

PDG

3月28日，吴稚晖约集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吴稚晖“揭露”了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的种种“罪行”，还指出陈独秀明言20年内实行共产主义，因而提出纠察共产党的要求。会议决定打出“护党救国运动”的旗号，以使反共“清党”师出有名。

4月2日，在蒋介石紧急召唤下，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已齐集上海。

这天，蒋介石召集上述人员在东路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蒋介石首先讲话，他说：“十三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他们的组织。……北伐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成功。”^① 蒋介石讲话之后，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与会者一时各诉其苦，对共产党大加责骂。

蒋介石在秘密召开反共“清党”会议的同时，还与上海青帮流氓头子打得火热，给他们金钱和武器，要他们充当反革命的打手。按照蒋介石的部署，杜月笙于4月初组织了所谓“中华共进会”，开始训练流氓打手。

^① 黄绍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文史资料选辑》，45辑。

陈独秀向莫斯科告急

蒋介石在赣州等地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陈独秀就开始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有所警惕。他认为，蒋介石已经彻底反共了，目前的形势已经不再需要与蒋虚与委蛇，而是真刀真枪干的时候了。如若不然，共产党就要吃大亏。

3月25日晚，陈独秀召集了一次特委会议，参加者有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彭述之、汪寿华。会上，陈独秀阐发了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决斗的思想。他说：

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在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①

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时，上海正流传工人纠察队

^①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要冲入租界的谣言。当天，在蒋介石授意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即发出“保护外侨”的布告。布告宣称，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一切外交问题，当由国民政府与各关系国协商办理，其他人不得妄动。并且威胁说：“当此军事时期，上海治安，至关重要，本军职责所在，自当力予维持。倘有不法之徒，假借名义，借端煽动，以暴力扰乱租界秩序，侵害侨民生命财产者，本军定行严惩，不稍宽假。”^①

此时，陈独秀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将集中力量向共产党人开刀，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将是其第一步。所以，上海工人阶级一定要保持手中的武器，而且做好随时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准备。然而，陈独秀还是犯了愁：在莫斯科没有明确指示与蒋介石决裂的情况下，这样做是违反斯大林等人的旨意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陈独秀非常希望莫斯科能够支持他与蒋介石斗争。然而，令陈独秀大为失望的是，他接到的指示与他所希望的恰恰相反。

3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斯大林、布哈林和加拉罕的建议，决定给中共中央发出如下指示：“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

这就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为了维持国共关系，上海工人阶级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3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中共中央发来

^① 《申报》，1927年3月27日。

这样一封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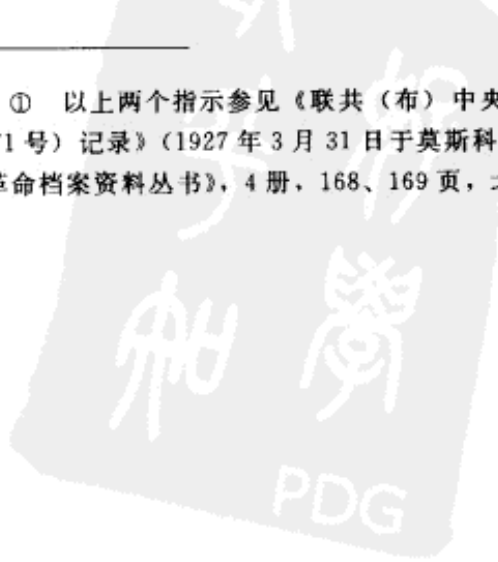
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陈独秀感到左右为难。他知道，如果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就只能坐以待毙；而如果违背莫斯科的指示，则是国际纪律所不容许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在给中共上海区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即上海总工会）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罢工问题，第一先决条件要国民党及老蒋同意。”

在当时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时机稍纵即逝，任何延宕、犹豫都会使自己失去主动，陷入被动。陈独秀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莫斯科不让与蒋介石搞僵关系，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陈独秀犹豫不决之际，蒋介石却加快了反共的步伐。3月29日，蒋介石以威胁的口气要求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暂缓办公”。3月30日，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声称保证不以武力收回租界；对于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则扬言其应受军事训练。其实，就是要缴工人纠察队的枪。

这时，陈独秀见事情紧急，便顾不了莫斯科的指示，于3月30日布置“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第二天，他以中共中央名义给莫斯科发电，报告了这一决定。

^① 以上两个指示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68、16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当天，联共（布）领导人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立即举行秘密会议，会上作出两项决定：

一是给鲍罗廷发电，内容是：“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二是给中共中央发电，内容是：“（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6）请每日通报情况。”^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这封电报，令在上海的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大失所望。罗亦农看了电报的译文后，愤怒地把它摔在了地上，说：“将武器藏起来无异于自杀！”

斯大林等人之所以作出如此决定，一来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上海形势的严峻性，没有想到蒋介石会真的对共产党下毒手。二来他们还指望蒋介石继续指挥军队进行北伐，以便尽快统一中国，这样将来的中国政府必然就是亲苏的政府，因为是苏联在支持蒋介石北伐。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斯大林等人尽管听到和看到许多关于蒋介石要叛变的报道，但他们宁肯相信这是敌人在造谣。当蒋介石已经明显暴露出反共企图之后，他们仍然对其抱有幻想，不相信陈独秀电报中

^① 这两封电报均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167～16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所说的情况，仍希望通过共产党人的让步来将蒋介石留在统一战线之内。

莫斯科方面可以用一纸电报将天大的事情轻轻推开，然而陈独秀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既然莫斯科不让反击蒋介石，还能有什么“高招”来改变局面呢？

在汪精卫身上下功夫

就在蒋介石一伙紧急部署反共“清党”行动之时，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蒋介石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汪精卫赞成反共，就有与汪合作的必要，待将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后，再与汪精卫谈判权力的分配问题；如果汪精卫不赞成反共，就单独干。蒋介石估计，这样一来，汪精卫就会联络共产党人和武汉的国民党人反对他，最终必将导致国民党的分裂。但他既然决定反共，就是不计后果的。而且他相信，只要手中有枪杆子，任何人的反对都是无用的。

为了拉汪精卫一起反共，在汪回到上海的当天，蒋介石即派吴稚晖去见汪精卫，以探汪的口风。4月3日，蒋介石发电给国民革命军各军将领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唐生智等，表示衷心拥护汪精卫执政。

当天，蒋介石与汪精卫这两个一年没见的政治对手，坐在了了一起。在座的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等。众人纷纷劝汪精卫不要去武汉，而与他们共同反共。为了说服汪精卫，吴稚晖采取了“下跪”的绝技。据李宗仁回忆说：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



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①

再说陈独秀，当他得知汪精卫回到上海的消息后，便将几天来的愁苦心情一扫而光。他认为，汪精卫是公认的左派领袖，也是国民党的一面旗帜，他回来对蒋介石肯定能起一种制约作用。如果汪精卫联共的态度坚定，或许还能够挽回危局，至少可以缓和共产党与蒋介石的矛盾。抱着这种想法，陈独秀与汪精卫进行了会谈。

汪精卫一回到上海即被蒋介石一伙包围，听到了许多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的抱怨，所以当他见到陈独秀后，便质问陈独秀：中共是否要打倒国民党？是否要工人纠察队冲入租界？陈独秀连连表示绝无此事。

汪精卫此时还不想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除了他认为时机不成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蒋介石的人格有怀疑。中山舰事件败在蒋介石之手，他现在想起来心里仍隐隐作痛。吃一堑长一智，他绝不敢贸然与蒋介石合作。

^① 《李宗仁回忆录》，322～32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再者，他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热情邀请下才回国的，他知道自己在武汉的身价，所以不愿即时就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机会。而且他知道，共产党还有可利用的价值，何况共产党身后还有莫斯科，这些力量在他与蒋介石抗衡之时，都是重要砝码。汪精卫于是拿定了主意：与共产党再一起走一段时间。

汪精卫的态度使陈独秀吃了定心丸。为了使汪精卫相信共产党继续合作的诚意，同时为了廓清迷漫在上海的种种谣言，陈独秀亲自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起草好以后，陈独秀交给周恩来，由他拿去给汪精卫看。汪精卫欣然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且故意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后面，在前面留下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独秀的名字签在前面。陈独秀接到由周恩来转回的稿子后，为了表达谦逊之意，仍将自己的名字签在汪精卫的名字后面。

4月5日，《申报》以《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之名，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全文登出：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问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推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

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

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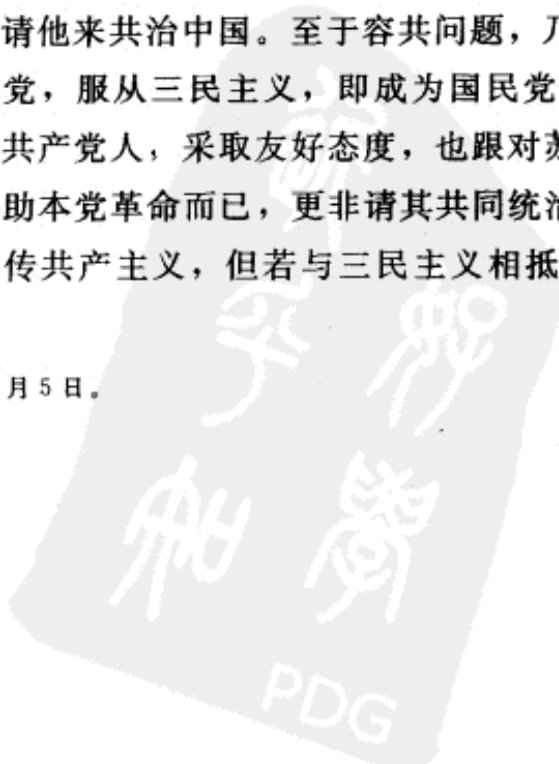
陈独秀见到报纸上登的《宣言》后，高兴地对正在身边的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不过，也有人对《宣言》的发表十分恼火。正在策划“清党”反共的吴稚晖，一早起来，看到报纸上赫然印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几个字后，便不由大吃一惊。当他看完《宣言》的内容后，立即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汪精卫“降共”，甘当“共产党的尾巴”。他找到汪精卫，指着《宣言》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汪精卫听后大笑，说：“这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

吴稚晖狠狠地说：“总理的联俄政策，是希望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并非请他来共治中国。至于容共问题，乃容纳共产党个人加入本党，服从三民主义，即成为国民党员；对其他未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采取友好态度，也跟对苏俄一样，只希望他们协助本党革命而已，更非请其共同统治中国。他们固然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但若与三民主义相抵触，

^① 《申报》，1927年4月5日。



或有危害国民党之处，即应予以相当的制裁。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过了友谊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自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联共’二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去年5月在广州虽有国共联席会议，但其意旨仅在疏解双方友谊的误会，决谈不上‘联共’之说。”

但汪精卫却认为即使需要变更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召开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吴稚晖见自己滔滔不绝的“宏论”，还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便挖苦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汪精卫见与蒋介石等人谈不拢，便于4月6日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宣言》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即将反共的蒋介石一伙的反感，而且在后来，甚至到今天，人们提起这个《宣言》时，也少不了批评它是陈独秀右倾退让的产物，认为它在当时起到了相当消极的作用，麻痹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看来，陈独秀起草和发表这个《宣言》并不是什么高明之举。

斯大林看好蒋介石

在莫斯科，还有一个比陈独秀更不高明的人，这就是斯大林。

事有凑巧。就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发表的当天，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

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表达了对蒋介石这样的看法：

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连捷里和克伦斯基们都高。当然，蒋介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而策连捷里和丹以及克伦斯基^①也许读过马克思著作。蒋介石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恰恰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高于这些克伦斯基、策连捷里和丹之流。为什么？因为，由于事物的逻辑所致，他领导着反帝的战争，迫于形势他在打仗。……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②

斯大林这段话道出了联共（布）中央领导人不主张反蒋的两个原因：一是蒋介石正领导着反帝的军队，而中国的反帝斗争与苏联的利益息息相关；二是莫斯科方面有能力和控制蒋介石，可以在利用完之后再从容地将其抛弃。

然而，斯大林没有预见到，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右派在利用苏联的帮助增强自己的实力之后，会从容地抛弃孙中山

^① 策连捷里，俄国1917年2月革命后领导孟什维克护国派，曾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丹，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克伦斯基，1917年任俄国临时政府首脑。

^②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1927年4月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

的三大政策，拉着军队走向反动之途。

4月9日，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上海戒严司令，由白崇禧全权指挥反革命政变。他自己则于当天离开上海，进驻南京。

4月11日下午4时，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始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分散把守，市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预感到事情不妙，当即致函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望予以援助，但未得答复。总指挥处遂通知分驻吴淞、浦东、南市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加紧戒严，以防不测。这天晚上，杜月笙以宴请为名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至法租界，并将其杀害。

4月12日凌晨4时，隐藏在法租界内的青帮流氓，臂缠“工”字符号的袖标，携带枪械，乘多辆汽车迅速出动，分别向工人纠察队所在地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英勇抵抗，双方发生激战。事先早已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周凤岐、刘峙的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上海2700名武装工人就这样被缴了械！工人纠察队员因抵抗而牺牲者120人，受伤者180人。

当天上午，由流氓、党棍等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了总工会会所，配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破坏总工会所属的各工会，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为反抗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当天上午，闸北工人群众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上海军事当局的反动行径，要求发放被收缴的武器，惩办破坏工会的军官，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属。

会后，群众前往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早已埋伏在此地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向群众开枪射击，历时15分钟之久，死者血流街道，伤者纷纷倒地，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闻，当场被枪杀的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反动军队制造血案之后，为了掩盖罪行，立即实行清街，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埋藏，每车堆装十余人，受重伤而未能撤走者，也被横拖倒拽扔入车内一并埋掉。^①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来说，上海大屠杀远非反革命政变的全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如同肆虐的洪水迅速在东南各省泛滥。广东、广西、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四川、福建等蒋介石势力统治地区都进行了严密的搜捕和残酷的大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与蒋介石相呼应，在北方逮捕和杀害大批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在南北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中国共产党牺牲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和精英分子，损失之惨重是建党以来前所未有的。党的领导人也失去了在上海的立足之地，不得不将中央机关迁到武汉。

无数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在内，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谁之罪？”

^① 参见《四一二大屠杀纪实》。《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争取汪精卫：莫斯科推出新政策

发起讨蒋运动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将自己推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度进行了坚决的反蒋斗争。

4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指出蒋介石已经成为革命的“叛徒”，决定用国民政府或中央党部的名义，电令各军查办反革命政变的主动者及负责者。

当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蒋介石、白崇禧，明令：“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之长官，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

械，退回纠察队。”^①

4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蒋介石、张静江党籍，并交与前方将士及各级党部严行拿办；开除戴季陶、陈果夫、古应芬党籍；对蔡元培、吴稚晖处于停职3个月的处分；对李石曾作出警告处分。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②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宣布了蒋介石的十二大罪状：
 (1) 违背总理遗训；(2) 破坏黄埔军校分散革命势力；(3) 破坏党军危害中央职权；(4) 把持党部引用宵小；(5) 擅发命令滥委军长；(6) 违背中央决议反对提高党权；(7) 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妥协；(8) 摧残农工屠杀民众；(9) 破坏军队中政治工作；(10) 反抗中央，召集非法会议；(11) 干涉地方行政，蹂躏民权；(12) 箝制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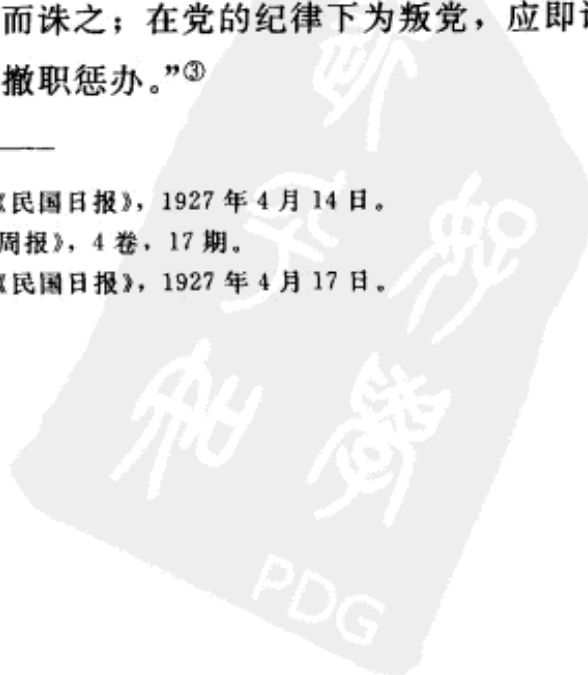
到达武汉的陈独秀，此时也号召全党发起讨蒋运动。

4月16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之反叛行为，在革命观点上为反革命，全国革命民众人人皆得而诛之；在党的纪律下为叛党，应即请求中央开除其党籍，撤职惩办。”^③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② 《国闻周报》，4卷，17期。

③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湖北省农民协会也发表《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十二大罪状，表示：“誓率领 150 万有组织的农民及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的同胞，拥护我革命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此獠决一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①

此外，全国学生总会、汉口商民协会、武汉码头总工会、武汉纺织工会、武汉店员总工会、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也纷纷发表《讨蒋通电》，一致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其党籍并捉拿归案的决定。宣言说：“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现在决不能容许他再留在国民革命的党内了，决不能再信任他当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反叛国民政府，他谋推翻国民政府，这个革命的叛徒值得国民政府最严厉处分的。”^②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武汉地区的讨蒋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

4 月 22 日，汪精卫、谭延闿、宋庆龄、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 41 人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央委员联名讨蒋》文，指出：“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让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18 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 册，39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月23日，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倡议下，军校全体学生和武汉40多个团体的革命群众共30万人，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主席蒋先云以其亲身经历，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丑恶嘴脸。同日，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社出版了《讨蒋特刊》。黄埔军校内部还开展了清除反动分子的工作，通令开除28名拥蒋学生的学籍。

5月6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和黄埔各期毕业学生联合召开讨蒋大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讨蒋运动委员会，随后派人赴湖南、江西组织分会。

同一天，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第十次扩大全会决议开除胡汉民、吴稚晖、古应芬、蔡元培、甘乃光、李济深、陈果夫7人党籍，并决定重组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和北京分会。

在湖南、江西、陕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蒋示威活动。

托洛茨基质疑斯大林

蒋介石的反共大屠杀令联共（布）领导人十分震惊，而掌握着莫斯科对华决策权的斯大林，在震惊之余更是感到颜面无光。想到几天前自己还在大谈利用蒋介石的问题，他真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因为，不是他利用了蒋介石，而是蒋介石利用了他，是蒋介石利用了他的轻信，利用了他所提供的武器，屠杀了与他有着共同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

面临难堪的斯大林，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为自己辩护。因为，此时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内，以托洛茨基为首

的一批人，早就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提出质疑，此时正准备利用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加大对斯大林派的攻击力度。斯大林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才能避免遭到对手猛烈的打击。

斯大林毕竟是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人物，他并没有费多少精力，就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就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对中国所采取的路线是惟一正确的路线。中国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责任不在莫斯科方面。

遵循着这条思路，斯大林宣称：莫斯科的路线是独一无二的正确路线，因为“这条路线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右派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那么，是斯大林将蒋介石逐出了国民党，还是蒋介石以屠杀的方式要将共产党逐出国民党？斯大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他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更可悲的是，斯大林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又提出了另一个错误的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是北伐时期，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中国，中国革命进入第二时期，即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工农群众的革命，即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武汉国民政府逐渐变成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①

这表明，斯大林此时已经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集团身上。

对于斯大林的观点，联共（布）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持有不同看法。5月7日，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一文，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独断专行提出了尖锐批评，并且猛烈地抨击了“党内合作”政策。他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的政策，就是将无产阶级政党与大资产阶级放在一个为大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圈栏内的政策。由于执行了这种政策，中共实际上是服从了将军队和政权都握在自己手中的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了蒋介石的纪律。所谓“利用右派”的政策，其结果就是大资产阶级同中等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联合，消灭和残杀工农。

托洛茨基指出：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离，只是在资产阶级自己把无产阶级抛却，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对无产阶级拳打脚踢的时候才可以的，而且要等到右派用机关枪向我们说话以后，我们才能与他们斗争。这种错误的政策如果不揭露出来，四月事变一幕，将要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一次。而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组织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②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并非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但他对武汉国民党将走向反共道路的预见，被后来的历

^① 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9卷，199～203页，人民出版社，1954。

^②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集，26～40页。

史证明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也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在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季诺维也夫指出，国民党就其实质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决不是什么四个阶级的联盟。由于蒋介石一伙拥有差不多无限的权力，所以，国民党及其政府首脑是将军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它最后必将走上反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人的基马尔^①道路。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起作用，还是汪精卫起作用，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季诺维也夫认为，在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人不宜再留在国民党内，他的理由是：“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么这不仅会导致毫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掩饰国民党中的阶级斗争、隐瞒枪杀工农和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实，而且还会导致共产国际内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

与斯大林一心依靠汪精卫的想法正好相反，季诺维也夫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对国民党的“左翼”领袖，首先是汪精卫抱任何幻想，在决定命运性的时刻，他们也不会比英国总委员会的“左翼”好多少。所以，共产党人必须尽可能把国民党左派人士引上革命的道路，而不是变成左派的尾巴。^②

然而，对托洛茨基派的偏见令斯大林拒绝接受他们提出的一切正确的建议，从而导致其在对华政策上一意孤行。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对汪精

① 基马尔，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家。

② 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2辑，211～224页。

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寄予了厚望。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有一切机会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因此，共产党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他指责说，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就要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斯大林他还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加以美化，宣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左派国民党“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①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在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下滑。

鲍罗廷舌战罗易

莫斯科喋喋不休的争论尚未结束，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因局势的发展变化而产生了新的争论。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全国政局由南北两个对峙的政府变为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分庭抗礼。江南各省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统治下，已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武汉政府虽然还管辖着湘鄂赣三省地区，却处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

^① 《斯大林全集》，9卷，274页，人民出版社，1954。

之中。在南方，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占有闽浙全部及苏皖的一部分，与川粤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在北方，张作霖利用吴佩孚的溃败而进兵河南，也对武汉虎视眈眈。武汉面临着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局面。所以，如何保卫武汉政权，不仅是个必须立即给予回答的问题，而且还必须立即付诸于行动。

身在武汉的陈独秀，对武汉面临不利形势非常清楚。然而至于下一步该如何办，他却没有主意。在他周围的人，也是意见不一。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南伐广东，因为南方敌人力量比较弱，群众基础又好，士兵南伐的积极性高，易于取胜；而且南伐取得海港，可以打通与国际的联系，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上被包围的困境。瞿秋白则主张先打南京后再北伐，但避免在上海与蒋介石决战。蔡和森主张先消灭两湖的反革命，实行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然后再东征北伐。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则坚决主张东征蒋介石。

经过这几年与莫斯科的交往，陈独秀已经深深懂得，尽管他领导的党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它的任何一个重要决策都不能不得到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的准许。现在革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究竟是东征消灭蒋介石，还是继续北伐？没有“上司”的指示，是不能拍板定案的。

当时在莫斯科驻华代表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鲍罗廷，另一个是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易。他们掌握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决定权。

鲍罗廷是反对东征讨蒋的。在4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就明确提出：东征讨蒋是下策，而北伐才是上策。他的理由是：（1）帝国主义在东南的

势力太强大，谁到东南，不是失败便是投降，远如太平天国，近如四一二政变。所以东南各省不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2) 帝国主义在西北的统治薄弱，且靠近苏联，宜建立革命根据地。(3) 东南是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中心，蒋介石叛变后，他们对武汉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如不迅速北伐，去经营西北，武汉地区的经济将自行崩溃，故不能坐以待毙。(4) 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正在增加，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30多艘军舰已卸下炮衣，天天有陆战队士兵上岸的传闻，若不迅速北伐，是没有出路的。(5) 唐生智已经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不足以牵制唐生智。(6) 北伐可以壮大武汉政府的声色，给彷徨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以希望和出路。与其在进攻上海的冒险中被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将革命像太平天国起义那样被粉碎，不如进行北伐，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更稳妥。总之，鲍罗廷感到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力量太强大了，只能避开其锋芒，把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西北去。鲍罗廷的这个主张被罗易冠以“西北学说”。^①

而罗易则认为，当时的形势下进行北伐，是新的军事冒险，是在寻求廉价的“荣耀”，是武汉政府转移群众视线，摆脱群众影响的“阴谋”。他提出反对立即北伐的理由是：(1) 现在北伐对革命明显有害，因为它的动机是逃避革命的责任。一旦进行北伐，武汉政府便会以军队在前线打仗为借口，为了后方的安宁，而压制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2) 果真北伐，我们须认真对待，把我们所有的军队集中于京汉

^① 参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99~10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路，这会使武汉处于毫无防卫的地位，从而给蒋介石或北洋军阀从南京方面进攻武汉以可乘之机。(3) 北伐的计划是以冯玉祥或阎锡山将和武汉联合的假想为基础的，但他们的可靠程度并不很大，我们无法保证他们到北京后不会变成另一个唐生智或蒋介石，产生另一次分裂，那时我们将走投无路。(4) 我们与其得到随时可能掉转枪口反对我们、反对革命的几千士兵，不如加深革命，获得巩固的群众基础。北伐要离开武汉地区，到陌生地区去。在两湖地区我们有强大的共产党和工农组织；在陌生地区，除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外，没有我们的组织力量，也不可能保证这些部队会永远和我们友好。(5) 在事实上，共产党人掌握着决定武汉政府是否北伐的“关键”。只要我们使武汉政府清楚地明白，共产党人不赞成这种军事冒险，这一计划可能会被废弃；因为没有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群众的支持，北伐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①

罗易的意见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支持，这使鲍罗廷大为不满。在4月14日召开中共中央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鲍罗廷发表声明说：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内担任的职务，因为他不能执行这个决定，更不能从事他以后要反对的工作。而如果不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将为进行北伐而在国民党内继续进行工作。

罗易当场反驳说：“鲍罗廷的声明等于提出最后通牒，这是采取‘炮舰政策’。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接受他的主张。我认为，鲍罗廷没有任何理由提出最

^① 罗易：《我在中国的经历》，英文版，39～42页，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5。

后通牒。”

鲍罗廷的威吓没有起到作用。4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推迟北伐，巩固根据地。决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然而最需要的是保卫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否则，巩固革命基地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进行”。决议还建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做出向北进军的决定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应予考虑”。^①

正是从这一天起，国共两党领导人在汉口南洋大楼连续举行联席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共产党方面出席的是：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先是决定东征，可是到了晚上，又改为支持北伐。

就这样，中共中央和罗易的东征主张最终被否定掉。鲍罗廷胜利了。武汉方面的军队挥师北上，去寻求远方的胜利，却放掉了身边的敌人。

在采纳了讨伐张作霖的方案而不是首先讨伐南京的方案后，武汉的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糟。由于受到南京和上海方面的封锁，武汉的经济面临危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光是在汉口就超过了10万人。小资产阶级几乎全部放弃了经营，而大资产阶级早已携带白银逃离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其糟糕，一个月内通过各种途径才能勉强收集到100万元，可是一个月的支出却超过1500万元。武

^① 参见《罗易赴华使命》，176~1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汉方面最终为这一决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直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在反思这一段历史时，才认为自己的北伐主张是一个“大错”。错在哪里呢？他说：“它错就错在我们追赶着两只兔子。如果我们暂时放下张作霖，派遣我们的力量去攻打南京，那么，想必我们会打败南京，从而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疏漏。甚至在我们与国民党左派之间出现的裂痕，由于群众运动的高涨，由于湖南的农民起义和由于武汉三镇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也丝毫不会和不可能使我们感到恐惧。因为战胜了蒋介石，战胜了三月分子，我们就可以牵着国民党左派的鼻子走，可以无所顾忌。那时谁还敢反对我们呢？国民党左派就不得不对自己说：‘我们现在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曾在广东消灭了资产阶级和豪绅的军事力量，而不惜炮轰城市中心和烧毁广州最富有的城区。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曾消灭了大小陈炯明分子，并打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始终成功地给了反革命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们不惧怕英帝国主义并一直在反对它，在连续 16 个月的时间里使它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当这种力量到达长江流域时，它在帝国主义炮舰的眼皮底下夺回了租界地。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消灭了曾企图动用跟随其一起走的力量来反对党和革命的蒋介石。’而小资产阶级就会跟着我们走。”“然而，我们并没有消灭蒋介石，我们容忍了自己，同时也容忍了同我们争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另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本来是应该予以消灭的。但是，我们却对自己说，此事并不特别困难。应该先去北方消灭张作霖，尔后再去东方消灭反革命巢穴——南京。我们的致命错误就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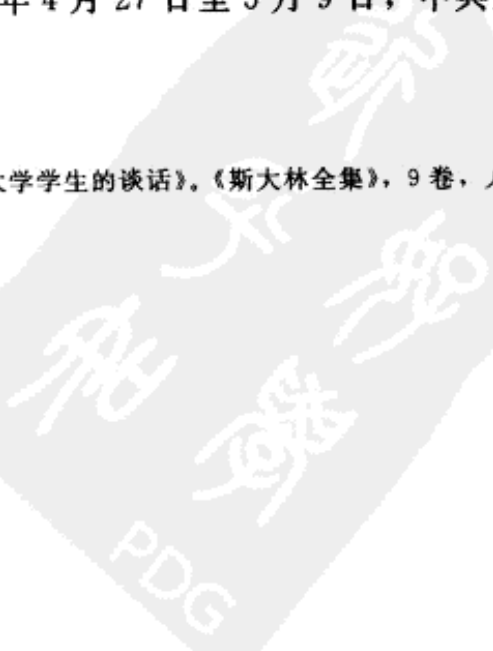
鲍罗廷无不后悔地说：“我本应把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实行第一个方案。我本应尽一切努力抵制第二个方案。我不该听信我们能够同时消灭河南的张作霖和蒋介石这种美好前景。我本应向莫斯科说明，各方面情况都要求我们经南京而不是经河南北上。我本应使莫斯科相信，第一个方案是最佳方案，必须实行这个方案。”

但是鲍罗廷未能这样做。即使鲍罗廷这样做了，也未必能够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因为斯大林认为，只有北上迎击奉军才是武汉的惟一正确的选择。斯大林的理由是：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攻，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如果武汉军队进攻上海，就会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推迟与冯玉祥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会一无所得，反而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威胁。为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开展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而再向上海进军。^①

瞿秋白批评陈独秀

急剧变化的形势和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使陈独秀意识到，中共五大必须紧急召开，以商讨挽救危局的办法。在做了一番准备之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

^① 参见《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9卷，人民出版社，1954。



指导中共中央这次大会的，仍然是鲍罗廷、罗易，此外还有已经不受斯大林重视的维经斯基。鲍罗廷和罗易将他们在会前关于北伐的争论搬到了会上，当着中国共产党全体与会代表的面，继续进行唇枪舌剑。

国际代表的意见分歧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甚为困惑，无所适从。这一状况从蔡和森在会上的一段发言中就可以看出来。蔡和森说：“我们听了老鲍和鲁易（即罗易，下同）的演说之后，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在老鲍的演说中，有些动听的办法是可宝贵的，但试拿以与国际决议案相比较则完全是与原则相违背：如国际决议教我们实行土地革命，而老鲍则教我们只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农民运动过火，而现在代表土劣、地主、军阀的国民党中央一点不好的倾向也没有，反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取消民众运动的法令；这样，还有什么原则？至于鲁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已经不是左派，我们应当推翻他，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至于鲁易忽然提出工农民主独裁制，也与国际决议不相合，是否国际有所改变应请说明，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①

国际代表固然各有各的意见，但作为陈独秀来说，就不

^① 参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11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能再徘徊于鲍罗廷和罗易之间，一定要拿出自己的主张来。经过对鲍、罗两种意见的比较，陈独秀认为还是鲍罗廷的意见更实际一点。所以他在发言时说：“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目前就没收一切土地，毕竟太激进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土地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①

陈独秀的观点很明确，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影响北伐战争的进展，现在不能进行土地革命。

赞成鲍罗廷意见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人。张太雷也认为：“政策太左，以致封闭了小资产阶级参加我们这边的可能性。我们提出的国民革命纲领太左了，小资产阶级将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而瓦解。……在共产党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或者为了同小资产阶级保持良好关系而延迟土地革命的发展。”张太雷的意见是，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当然应该先继续北伐。^②

彭述之、罗亦农都赞成鲍罗廷的观点。

当与会代表为今后何去何从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一向对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右倾做法不满的瞿秋白，在会上突然做出一个重大举动，散发了一本名为《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是他在当年2月撰写的。这本小册子表面是揭露和批判“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是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而来的。他在其中列举了自1923年中共三大以来中央所犯的

^① 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3辑，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② 《罗易赴华使命》，207、1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17个错误事实”，对陈独秀的领导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这本小册子散发后，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代表批评了中共中央的错误。陈独秀迫于压力，不得不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中共五大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①决议还专门制定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提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等等。^②

不料，中共五大刚一结束，鲍罗廷就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在目前情况下，若实施土地革命，会吓跑资产阶级或国民党左派，导致统一战线完全破裂，而假若我们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③

实事求是地讲，鲍罗廷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土地革命，他只是不赞成立即实行土地革命，而主张首先向西北发展，打通与苏联联系的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70～71、69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③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170页，人民出版社，1980。

由于鲍罗廷的反对，更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五大的决议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鲍罗廷：惟一的出路是让步

中共五大结束后，陈独秀并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相反，他从中共五大上鲍罗廷和罗易的争论，看出形势已发展到国际代表也无法把握的程度。既然如此，他陈独秀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中共五大上与会代表对他的批评来看，大家对一味妥协退让政策是大为不满的。可是，难道这是他陈独秀愿意的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难道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难道他不希望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有力地反击吗？如果他不希望这样做，就不配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他陈独秀说了算的吗？谁又能真正明白他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呢？

就这样，陈独秀怀着一肚子委屈和难言之隐，继续应付着日益恶化的局面。在陈独秀看来，既然中共和武汉国民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双方应该鼎力合作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在中共五大结束后专程到武汉与汪精卫等武汉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谈。

与当初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时相比，汪精卫这次的态度可说是糟透了。陈独秀对他与汪精卫会谈的情况是这样介绍的：

陈独秀通报他同汪精卫谈话的情况，汪提出以下四点：

(1) 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2) 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在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3) 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4) 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鉴于这最后一点，参加谈话的徐谦要求苏联与国民政府结成反帝军事联盟。为了证实上述第四点，他援引了张作霖公布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似乎表明，苏联喜欢呆在幕后。汪精卫也说，他收到了江西几位将军的会议发来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表示反对蒋介石，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人。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他们发了复电，表示支持他们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同时汪精卫只字未提国民党左派对电报后一部分内容的态度。

汪精卫总结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如果国民革命因此遭到失败，那

对人民群众来说会更糟糕。^①

这份会谈记录，记录的是1927年5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情况。十分宝贵的是，在这份记录中，还记录了陈独秀汇报之后一些与会者的发言。这些发言澄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是陈独秀决定向汪精卫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让步的。而会谈记录反映出，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份记录中来：

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鲍（罗廷）提出三点意见：（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若这三点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那么整个^②形势就会变得毫无希望。

张国焘拒绝鲍提出的所谓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政策的指责。他要求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

维（经斯基）说：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国民党左派会在一定的方面摇摆不定，因为现在坐而论道的时候已经过去，需要解决的问题非解决不可了。对于农民，问题可以通过局部没收土地

^① 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13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248～24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原文为“国际”。

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左派也赞成这样做。但湖南农民运动使他们感到害怕。对所提出的问题共产党可以作两种回答：

(1) 要求国民政府对土地运动有明确的态度，协调而不是反对这一运动，或者(2) 完全支持土地运动(?)。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明确的：国民政府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它自己也要同大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且支持这种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应当通过工会加以协调。国民党内的派别问题也很重要。

陈独秀：比如在土地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方针呢？原则上说，我们同国民党左派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似乎是一致的。但是今天有人告诉我，国民党关于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决定由于河南的形势而不会公布。

鲍罗廷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不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看不见的，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金融封锁和其他封锁，另一个原因是看得见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明显感觉到的，这就是在手工业部门做工的工人争取自身经济需要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第二个原因上。试图向小资产阶级说明真实情况，但只指出第一个原因，并用它来偷换第二个原因，这是没有用的。惟一的出路是向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但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在游行示威

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针，但条件是共产党能够执行这个方针。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果共产党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它同国民党一起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共同解决的原因。国民党相信，你们能领导群众，但实际上却不能。出路只有一条：或者同国民党决裂，或者一起作出决定，一起执行。

老头子（陈独秀）提出六条意见供讨论：

(1) 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

(2) 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

(3) 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

(4) 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

(5) 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

(6) 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①

经过热烈讨论，最后通过了《国共两党在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关系的决议》。《决议》再次强调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的必要性，但为了消除国共两党在小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13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249—25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分歧，《决议》提出共产党决定采取以下实际措施：

(1) 劳工部要建立仲裁法庭，解决小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工之间的冲突。

(2) 劳工部要制定包括工作日、最低工资、抚恤金、社会保险、劳动条件等等法令，特别要注意规定商店店员的工作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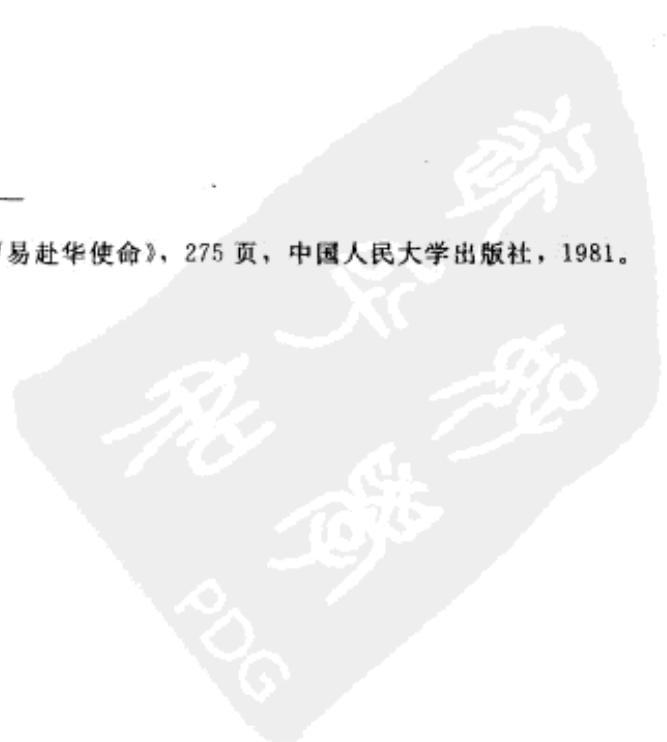
(3) 店员的过高要求要加以限制。工人管理要有规定，防止干涉企业行政。由总工会、劳工部、店员工会、商会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要审查店员提出的一切要求，根据物价上涨情况规定合理的限度。

(4) 在目前，对帝国主义的商业活动不加限制。

(5) 除了那些参加反革命活动或有反革命嫌疑的商人以外，其他商人都享有一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①

毫无疑问，这个决议完全贯彻了鲍罗廷“向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意见。问题在于：向小资产阶级让步就能争取汪精卫向左转吗？

^① 参见《罗易赴华使命》，2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危机加深

莫斯科纸上谈“进攻”

正在鲍罗廷指导中共中央以退却拉住小资产阶级和汪精卫的时候，5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讨论了中国问题，决定给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发出如下指示：

（1）现在在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各省，特别是在广东省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这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这是在中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军事大军的基础。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

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过一个月或更晚些的时候，国民党可能批准没收土地。现在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关于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法令是必要的。

(2) 开始组建 8 个或 10 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

(3) 应当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那里的地主政权特别不能容忍。^①

斯大林等人此时已经意识到，只有开展土地革命，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革命力量，尤其是农民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抵挡日益右倾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进攻”的口号。然而，斯大林等又要求以国民党为中心来领导土地革命，这无疑是与虎谋皮。试想，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真正拥护土地革命的又有几人？

依靠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来进行土地革命，莫斯科的指示能行得通吗？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102 号（特字第 80 号）记录》（1927 年 5 月 13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 册，252～253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当时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运动。受到冲击的土豪劣绅在农村站不住脚了，便跑到城里大造舆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说农民在村里杀人放火，说北伐军将领某某的家属被戴高帽子游街，说北伐军寄回家里的钱被农会没收……总之，农民无法无天，“好人”已经呆不下去了。

国民革命军中有一些军官，本身就出自于地主豪绅之家，或者其本人就是地主豪绅，听了家乡的土豪劣绅如是说，自然十分仇视农民运动。于是，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等流言在军队中散布开来。一些反动军官便以此为借口，运用手中的军权，镇压农民运动。

1927年四五月间，国民革命军将领夏斗寅、杨森联合叛变，派兵进攻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企图推翻武汉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鼎力支持下，武汉政府才依靠叶挺部队平息了叛乱。

夏、杨叛乱本来是针对武汉政府的反革命叛乱，而汪精卫等人却认为，这是工农运动“过火”所致，主张对夏斗寅采取纵容、庇护的政策。结果不到半个月时间，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叛变不断发生。在湖北各地，凡是杨森、夏斗寅、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军所到之地，如江陵、嘉鱼、武昌乡区、通山、鄂城、大冶、天门、公安、枣阳、沔阳、宜都以及鄂西一带，土豪劣绅都相率反攻倒算。党部和工农团体被捣毁，有3000余名农运骨干和农会会员惨遭杀害。

事实证明，依靠国民政府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是根本不现实的。

“马日事变”令鲍罗廷乱了方寸

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军中，有一个军官名叫许克祥。此人原为贵州军阀袁祖铭的部下，北伐开始后倒戈，被任命为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驻扎在湘乡、湘潭一带，受命于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对于湖南的农民革命风暴，许克祥是极为反感的，因为他的家也受到农民运动的冲击。许克祥的父亲自儿子发迹后，在湘乡广置田产，仗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在农民运动高潮中，他受到当地群众的斗争，因而对农民运动极端仇恨。许克祥得知其父被斗，发誓要报所谓“辱父之仇”，决心与共产党作拼死斗争。

5月中旬，许克祥部调到长沙。5月17日，许克祥等人开始密谋军事叛变的方法和步骤，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发动叛变，由许克祥担任叛变行动的指挥官，由他的三十三团担任叛变的主力部队。

5月21日晚，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反革命叛乱在长沙爆发。叛军在许克祥统一指挥下，分兵向长沙各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袭击，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当晚，叛军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捣毁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撕毁了“打倒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等标语，张贴出“拥护蒋汪合作”、“铲除暴徒分子”等反革命标语。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在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之后，湘潭、衡阳、醴陵、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

叙浦等地均发生了反革命屠杀事件。至6月10日左右，在湖南的二三十个县中，即有1万多人被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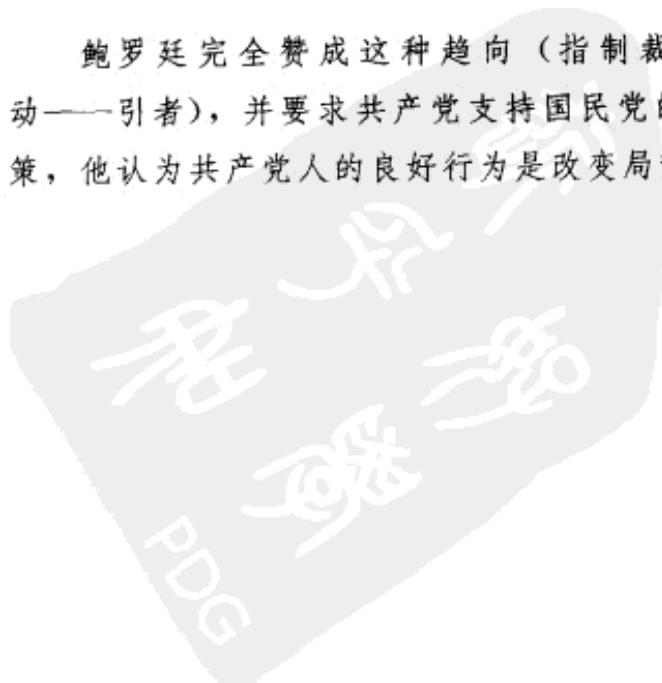
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后，反而恶人先告状，于5月22日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分别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及湖南省各团体，诬称事变是由于工农武装纠察队抢劫三十五军留守处，并打出“打倒三十五军”的旗帜，以致与军队发生冲突，通电要求解散工农纠察队。

这时，唐生智因率军北伐正在河南。接到许克祥的电报后，他发电给湖南省党部等组织，攻击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的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定军心。此后，他又多次为许克祥等屠杀工农的行为辩护，使湖南工农希望制裁许克祥的要求难以兑现。

想依靠唐生智的军事实力以与蒋介石相抗衡的汪精卫等人，当然不愿开罪于唐生智的部下许克祥。于是，他们也宣称事变由于工农运动“过火”造成的，而共产党人没有及早纠正这种“过火”行为，才导致了这次事变的发生。6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说：“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无路可走，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的反应很强烈。但他不是谴责许克祥等人，而是与汪精卫唱一个调子，责怪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据罗易在事变后给莫斯科方面的电报称：

鲍罗廷完全赞成这种趋向（指制裁工农运动——引者），并要求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退让政策，他认为共产党人的良好行为是改变局势的惟一



手段。他为达到此目的提出的计划将意味着实际取消共产党。他要求共产党抑制工农运动，并把工农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看成是反革命分子。他想逮捕我们在湖南的领导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他说，工人纠察队应当被解除武装。简言之，鲍罗廷实行的是葬送革命的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他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政治影响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同莫斯科的关系的垄断的基础上。^①

很显然，鲍罗廷主张对事变采取姑息、妥协的态度。当得知汪精卫等人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前往长沙调查事变真相后，鲍罗廷不仅同意派谭平山去，而且决定自己亲自前往。

陈独秀的应急措施

在鲍罗廷态度的影响下，陈独秀也认为，是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了事变的爆发，但他也看出，这其中也有反动势力在作祟。陈独秀的认识最终成为中共中央一致的观点。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指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

^① 《罗易给某人的电报》（1927年5月25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273～27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为了应付马日事变后的困难局面，同时为了缓和反动势力对工农运动的进攻，阻止汪精卫集团继续右转，中共中央只得对工农运动有所约束。为此，这次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城市中工运问题，应该迅速执行已决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决议案及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而解决。

（二）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有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得不在此例）。

（三）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需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得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1）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2）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①

5月26日晨，鲍罗廷随同谭平山等5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启程前往湖南长沙就事变进行调查。

鲍罗廷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会议。由于没有了鲍罗廷的干扰，这次会议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保存党的力量和工农武装，以便将来更好地进攻。会议作出《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提出必须千方百计地保卫党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136～13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合法地位，为此，将运用以下策略手段：（1）接受唐生智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的电报中所提出的纲领，即：①支持国民政府；②联合苏联；③支持工会和农会；④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⑤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⑥继续进行第二次北伐。（2）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湖南的省政府。（3）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同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去反对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4）争取左派国民党支持如下的要求，即：有进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自由；把被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5）保卫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运用这些策略手段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会议的决议指出：利用以这种策略手段争取到的时间，来为同国民政府势力范围的军阀反动势力的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就是彻底改变把革命的未来的宝压在所谓的左派军阀身上的老政策。当前的局势就是这一错误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必须废除。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革命必须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把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并且把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这是党在以上述策略手段所争取到的时间内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主要任务，会议决定采取以下几项措施：（1）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在进行公开活动的时间加紧进行秘密活动。（2）把工人和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隐藏起来。（3）弄到大量的武器，并且把它们分发到各战略地点。（4）用派我们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扩大叶挺等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5）利用第二军、第六军同第

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之间的矛盾，用派遣大量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进去的办法，把第二和第六军掌握到我们手中。(6) 为收复广东进行鼓动。(7) 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湖南重新组织党在该省的活动。

中共中央也考虑到鲍罗廷未必会同意这个决议，所以，在决议的最后特别指出：“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同志，让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他们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①

这个决议还未来得及执行，陈独秀等人就得知鲍罗廷和谭平山一行又回到了汉口。

原来，当鲍罗廷等人到达岳阳时，专车被军队所阻。一个军官威胁说，他已接到许克祥要将鲍罗廷等人“就地拿获处决”的电报。为了安全起见，鲍罗廷等人只得折回汉口，只有商人部部长陈公博去了长沙。

鲍罗廷回到汉口后，继续推行他的退让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5月26日的决定就这样被一风吹了。

冯玉祥变卦，斯大林翻脸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形成对立之势。为了在抗衡中取胜，南京和武汉都企图拉拢冯玉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冯玉祥便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政治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国民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时冯玉祥虽然对共产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138~14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和工农运动有所不满，但仍然与武汉方面相配合，率国民军联军进行了二次北伐。

但冯玉祥并不愿反蒋。他认为，蒋介石虽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但并没有投降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蒋介石仍然是革命的。蒋介石所反对的，只不过是共产党和武汉方面“过左”的行动。所以，当汪精卫等人在郑州会议上拉他共同反蒋时，遭到了他的拒绝。郑州会议之后，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召开了徐州会议。会上，蒋介石当场赠送冯玉祥 50 万元以犒赏冯军，并应允自 7 月份起，由南京政府按月拨给冯军军饷 250 万元。

就这样，冯玉祥与蒋介石站在了一起。他一方面主张宁汉合流，共同北伐，并表示愿在宁汉之间担任调和人的角色；一方面同意“清党”，并驱逐鲍罗廷。

冯玉祥返回河南后，向全国和国民党发出通电，力主宁汉合流，并对共产党、苏联顾问和工农运动表示了自己强硬的态度。他还亲自审订了对付共产党员的办法三项：（1）自己报告是否是中共党员；（2）凡是中共党员，一律脱离政治部；（3）如有共产党员仍欲继续国民革命者，须宣布脱离共产党并宣誓忠于国民党。要求河南、甘肃、陕西等省依据这三项办法进行“清共”。

当斯大林等人得知冯玉祥站到蒋介石一边的消息后，大为震惊。6 月 2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经过征询政治委员们的意见，决定给鲍罗廷、加伦、陈独秀发出以下指示：

冯与蒋介石的联盟实际上是反对真正的人民革命的联盟。将领们企图扼杀工农运动，通过同帝国

主义者的妥协来解决问题，把中国置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保护之下，并在新的基础上确保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政权，同封建主和军阀达成妥协。冯背着国民党同叛徒蒋介石结成联盟是对革命的打击，因此，必须让武汉政府公开揭露冯的策略，并要求国民政府的一切支持者无条件地同背叛革命的冯划清界限，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1）向冯声明，鉴于他采取了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立场并同蒋介石签订协议，共产国际中止同他的关系；（2）建议武汉从冯的军队中召回顾问；（3）不再给冯进一步的援助。

冯玉祥的右转如同蒋介石的叛变一样，给了斯大林等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他们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武汉这块仅存的革命基地上，满心指望“武汉应当成为为中国另一种发展道路而斗争的中心，即真正的人民革命的中心”^①。

使武汉成为“人民革命的中心”，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愿望。然而，它也只能是一个好的愿望而已。因为，此时汪精卫集团已经准备与人民分手了！

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一直面临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武汉方面本想通过北伐打破这个被动局面，但没想到北伐胜利的结果反而使武汉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

随着形势的恶化，武汉集团内人心浮动，政治涣散。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便将怨气全撒在共产党和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卷，376～37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工农运动上。他们开始攻击工农运动破坏了联合战线，使工商业者脱离了国民革命，提出要限制和“纠正”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一向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此时也完全改变了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态度。

从5月中旬开始，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接连发布限制工农运动的命令、训令等。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也散布各种谣言。6月29日，何键在汉口发出反共训令，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极尽诬蔑之词，说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他还宣称：“民众的敌人，是万恶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敌人，也是万恶的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强烈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并煽动武汉军民“共起急图”。

5月29日，武汉集团的另一将领朱培德，将在其部队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共142人召到军部，然后派出一个团将这些人武装押运到汉口。6月1日，在朱培德部所在地南昌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打倒共产党，欢迎蒋总司令”、“欢送共产党”的标语。6月4日，朱培德又以应部下请求为名，将在江西省党部和南昌市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一峰、方志敏等22人强行遣送出境，并下令活埋了两名政治工作人员。6月5日，朱培德下令江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以及各县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并宣布南昌戒严，命令江西卫戍司令部派出武装宪兵在各处设岗哨，断绝交通，收缴农民自卫军的枪械。

在朱培德的纵容下，江西各地的土豪劣绅开始大肆活动起来。吉水、南昌、新建、铜鼓、弋阳、泰和等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反动军队，捣毁革命团体，捕杀农会会员，抢夺农民

耕牛、家具等。

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和镇压工农运动的一系列活动，是一个变相的“清党”行动，这一行动开了武汉政府高级将领以武力为后盾“清党”的先例。

对于汪精卫集团态度向右急速转变的情况，鲍罗廷无不感慨地说：“当一切都顺利时，他们听我们的话，而现在，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出路时，先是惶恐不安，尔后为了拯救自己，逐步摆脱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人的影响。”^①

此时，国共关系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罗易指责陈独秀

在中国革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罗易，却发现自己很难发挥作用，这使他非常恼火。

在罗易看来，自己是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而来的，自然应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鲍罗廷一手遮天，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都听鲍罗廷的，才导致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通过与鲍罗廷多次交锋而败北后，罗易终于明白：要想发挥作用，只能向莫斯科寻求支持。

5月28日，罗易就中国形势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作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武汉政府中的成员一一进行了剖析，指出武汉政府已不是左派政府。他

^① 《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年10月2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50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担忧地说，近几周来，限制群众运动的要求变得更为强烈。然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赞成“自律”，工会联合会成立了“革命法庭”，谴责组建纠察队，受到谴责的工人被投入监狱。他认为这都是鲍罗廷退让的结果。他写道：“在一场新出现的而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某些古怪行为和乱子。国民党打着纠正这些‘过火行为’的幌子，策划消灭湖南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共产党不敢反对鲍罗廷的政策，因为他的政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政策，只好不情愿地采取违心的行动。”

罗易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受鲍罗廷控制的，而鲍罗廷的权力则来自斯大林。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得到承认，6月2日，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电说：“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领导很软弱，共产国际实行直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实际上是由鲍领导的，没有认真对待共产国际代表。我本着你们电报中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议常常遭到拒绝或抵制。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当改变。当党自己在目前的危急局势下没有能力进行领导时，它就应当接受关于承认共产国际全权的指示，并应遵循这些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应同国民党有官方关系，否则就不能对共产党实行真正的领导。”^①

罗易在恼火于鲍罗廷的同时，对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做法也无不愤怒。

马日事变后，罗易曾建议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运动，采

^①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2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01～30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取措施镇压湖南的反革命。但这一建议最终未能实行。罗易当时向斯大林报告说：“共产党领导人在反革命气焰嚣张时、表现得非常消极。他们主要是同汪精卫一起开会，考虑这个或那个将领下一步要干什么。没有做任何群众工作。昨天（5月28日）晚上，谭平山向政治局报告了自己使命的失败。共产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陈独秀发表意见说，共产党没有得到足够的消息，所以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我提出了建议，但没有被采纳。共产党领导人不懂得宣传‘武装工农，保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口号的政治意义。他们勉强同意根据我的建议发表一个声明，但根据这个声明做些什么还需要看一看。这里的共产党人常常坚持这样一种做法：同意做某件事，然后又各行其是。”^①

6月5日，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又告了陈独秀的状。他说：“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我建议农民部的纲领应包括解决土地问题，谭不要率领考察团去湖南，这些建议被政治局否决。陈（独秀）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不顾共产国际提纲、[中共]五大决议、莫斯科指示和政治局决定，反对共产党党团在国民党内工作，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向农民运动进攻。他认为湖南的

^① 《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29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同志对发生反革命叛乱有严重过失。在目前革命处于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领导对党是极其有害的。共产党领导的令人可悲的状况是近四年来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党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但不是它的领导成长壮大了。要顺利实行形势和你们的指示所要求的坚定革命政策，有赖于某些组织措施。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①

^①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02～30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寻找挽救危机之策：回天无力

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在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紧急关头，莫斯科终于有了明确的指示。5月30日，联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在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向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柳克斯发出如下指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要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罗易对谭平山之行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不应脱离工农运动，而应千方百计对其加以促进，否则就会葬送事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土地占有者作出的让步是必

要的，同这些阶层的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

(3) 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害怕发生事件，他们会动摇、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

(4) 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 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①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月紧急指示”。以前称这个“紧急指示”来自于共产国际，显然是不正确的；称这个指示是发给中共中央的，显然又是谬误的。

“紧急指示”先是由鲍罗廷接到的。他一看电报，就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只能暂缓执行。

6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议，再次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其主要内容是：

(1) 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298～30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2) 关于军事计划，建议让唐生智和冯玉祥向北京和济南府推进，切断蒋介石的去路，进而在山东和北京站稳脚跟。要以伤亡减员为借口将张发奎的部分部队，如若可能，则将其所有部队作为比较可靠的部队调作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或把它们作为主要支柱留在武汉，或令其向南京蒋介石的后方推进，或利用它们去解放广州，然后从南面向福建推进。

(3) 应当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儆效尤。^①

这个电报可以看做是给“五月紧急指示”的补充。

6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决定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去电报，以十分严厉的口气再次重申：阻止进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②

莫斯科方面要求进行土地革命，要求武装工农，鲍罗廷和陈独秀又何尝不愿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军队的支持，土地革命能开展吗？没有武器，又怎能武装工农？

罗易轻信汪精卫

罗易一向是比较看好汪精卫的。这固然与他受斯大林等人的影响，对汪精卫这个隐蔽的资产阶级两面派认识不清有关，但同时也与他同汪精卫的私交甚好分不开。据时任罗易翻译的王剑龙说：

^{①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06～307、3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罗易依赖汪精卫，可说是推心置腹，毫无保留。汪能说英、法两国语言。他经常不带翻译，来罗易处作长时间谈话。他来时必经过我住的房门口，问罗易在家否？我答：“在”。他即至罗易办公室，关门对谈。谈话内容，我无从知晓。谈话完毕，罗易送汪下楼，也要经过我的房门口。有次谈话，我用表计时，竟长达一个小时。^①

6月2日，罗易参加了一个有汪精卫出席的会议。会上，汪精卫强烈指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反对实行土地革命。在罗易的说服下，汪精卫口头上同意在一周内结束长沙事件。这不过是汪精卫应付罗易的一句话，然而对中国人“委婉的拒绝方式”一无所知的罗易，竟相信了汪精卫的话。会后的当天，罗易即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形势对执行你们电报中的指示有利。”

这时，武汉方面的各种关系非常微妙而又错综复杂，汪精卫已经成为决定局势的至关重要的人物。罗易在得不到鲍罗廷和陈独秀支持的情况下，只好亲自出马为挽救时局而努力。而他挽救时局的惟一希望，就是拉住汪精卫。

罗易认为，汪精卫革命意志坚强，并有世界眼光，但现在每天都有人把他往右推。尤其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军人，仗着手中有兵权，飞扬跋扈，汪精卫手中没有武装，感到苦闷。他虽然已经与右派进行了对话，不过仍然处于动摇之

^① 王剑龙：《我所知道的罗易》，《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4期。

中，所以应该设法将他向左拉。^①

6月4日，罗易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更加促使罗易下了拉住汪精卫的决心。在谈话中，汪精卫向罗易抱怨：没有人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他们。他曾给斯大林发去一电，但没有接到回音。他问罗易：在武汉，究竟是谁代表莫斯科，是鲍罗廷还是罗易？汪精卫还表示，国民党愿意与共产国际互设代表机构。^②

汪精卫的抱怨、询问和表态，促使罗易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汪精卫的信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来自莫斯科的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罗易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紧急时期需要的指示到来，但电报来得太迟了。那时汪精卫认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已经和右派进行了谈判，叫喊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我想在这关键时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汪精卫的信任，我把莫斯科来的电报通知给他。”^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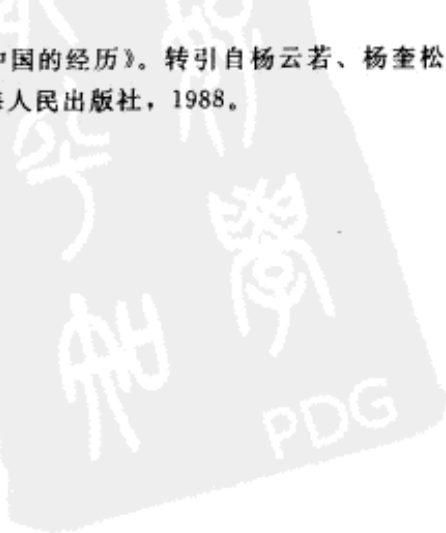
一开始，罗易并不准备亲自去送，而是要他的翻译王剑龙送去。王剑龙回忆说：

我说这个训令极其重要，应当保密，不能送给

^①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0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王剑龙：《我所认识的罗易》。《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4期。

^② 参见《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0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③ 罗易：《我在中国的经历》。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2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汪精卫，应当先送中共中央。罗易说：“你不懂得汪精卫。我很了解他。这个训令不是送给国民政府，而是送给汪精卫私人。汪正愁没有武装力量。如我们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他是求之不得的，他的腰膀就会硬起来。他知道我们是拥护他的，也许或明或暗，他会给我们一些帮助。这对于我们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是有益无害的……”我说：“万一汪精卫把这个训令出示于众，那又怎么办？”罗易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国民党内反动势力非常猖獗。纵使汪氏把这个训令公布出来，并没有什么可怕。以革命武装力量去抵制反革命武装力量，也是理所当然。赞成我们的人还是有的……”他说得活灵活现。最后我说：“你另外派人去送，我绝不去。”^①

罗易为了争取汪精卫，只好亲自出马了。

6月5日，罗易拿着五月指示的译文给汪精卫看。汪精卫看后苦笑着说：“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汪精卫拒绝了罗易，却将电报译文留了下来。这个电文成了他后来“分共”的重要依据。

罗易此举不仅没有拉住汪精卫，反而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分共”步伐。汪精卫后来对人说：“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

^① 王剑龙：《我所知道的罗易》。《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4期。

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汪精卫决心把共产党这个“舵手”赶走。

就在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的同一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这实际上是宣布同莫斯科决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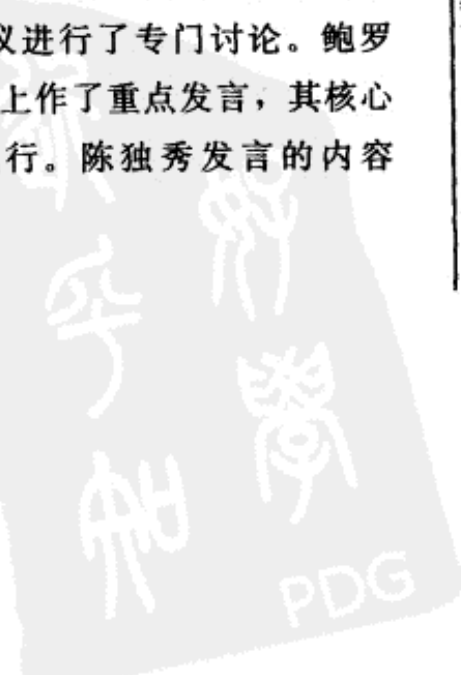
当鲍罗廷得知罗易让汪精卫看了五月指示的电文和国民党已决定解除他的顾问职务后，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当即找到罗易，对其大加斥责。接着，他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撤回罗易。

斯大林等人得知罗易的愚蠢行为后，非常恼火，便分别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命令罗易离开中国，返回莫斯科。罗易自觉委屈，多次去电为自己辩解，但已经无济于事。

就这样，罗易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仅在回到莫斯科后遭到谴责，甚至到现在，人们提起此事时，仍然指责他犯了错误。

陈独秀：莫斯科的指示无法执行

在连续接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两封电报之后，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行了专门讨论。鲍罗廷和罗易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其核心内容就是：莫斯科的指示无法执行。陈独秀发言的内容如下：



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谭平山不应对他们谈土地革命问题。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与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本应让谭平山委员会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

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对提议改变国民党领导的想法还有一种反对意见。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样撤换老领导人，那么国民党就会变成工农党。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我们衷心赞

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①

会上，其他人也发表了意见，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执行起来有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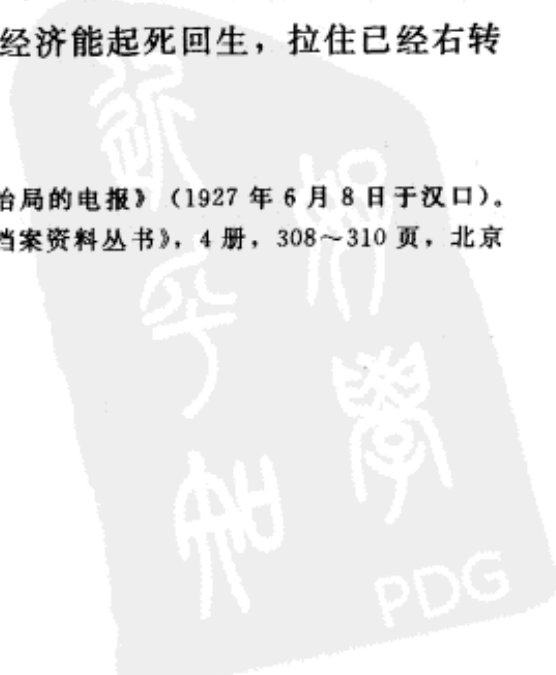
陈独秀对紧急指示持消极态度，固然是出于他对形势过于悲观的估计，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紧急指示传到中国为时已晚，而指示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既要求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中央，又要求这些都应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这就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通过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在汪精卫集团已经右转的情况下，显然是做不到了；撇开武汉政府独立开展革命武装，又必然会使危在旦夕的国共关系立即破裂。

斯大林开出挽救中国革命的“药方”

斯大林等人虽然因为罗易的莽撞行为要将他召回，然而他们也同罗易一样，对汪精卫抱着幻想。从6月23日之后，斯大林和联共（布）领导人就中国问题频繁地进行书信联系，并给中国发来一些电报。他们在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做着最后的努力。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给武汉政府拨款200万卢布，以期武汉经济能起死回生，拉住已经右转

^①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08～3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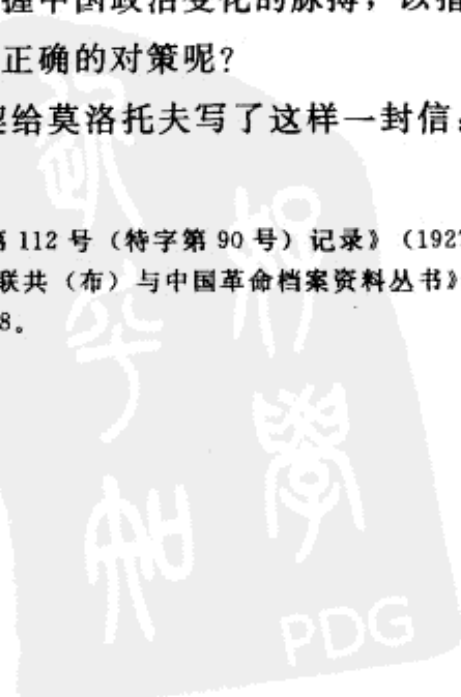
的汪精卫。这次会议还决定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汪精卫发出电报，其内容如下：

鉴于近来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自己有革命义务向您通报如下：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以为反对农民或置身于农民运动之外可以推动革命，那是目光短浅的。恳请您运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国民党的整个命运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命运，都取决于国民党的立场。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您的威望，国民党中央内的动摇是会减少的。我们建议从下面农民运动首领中找人来帮助工作。^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共关系日趋恶化、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莫斯科方面对华政策的最高决策人——斯大林却在一个叫索契的地方休假。在当时通讯条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斯大林怎么能够随时把握中国政治变化的脉搏，以指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制定正确的对策呢？

6月24日，斯大林从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了这样一封信：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4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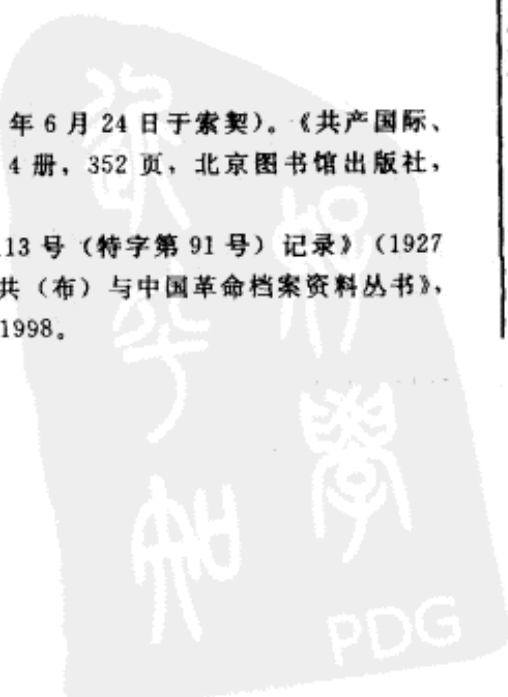
“刚从信使那里收到你最近一封信。关于中国问题，我想现在就可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万~400万，但1500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①

6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通过苏联驻汉口领事，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转去这样一封电报：“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中国国民革命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我们坚信，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领导将保证取得进一步的政治成就和军事胜利。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至于你们的新贷款请求，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满足，但不拒绝今后讨论你们这一请求。请你们在近期内指望兑现我们的第一笔贷款。我们认为特别有必要利用所拨出的经费来组建若干由工农组成的并拥有革命军官的可靠的忠于革命的部队。请通报你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了组建忠实的军队，应该准备作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我们确信，有支持土地革命的坚定方针，在同共产党合作的情况下，你们一定能够建立起这样一支坚强的军队和克服各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困难。”^②

这个电报刚刚发出，联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又接到斯大林从休养地索契写来的信。信中说：

^①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5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64~3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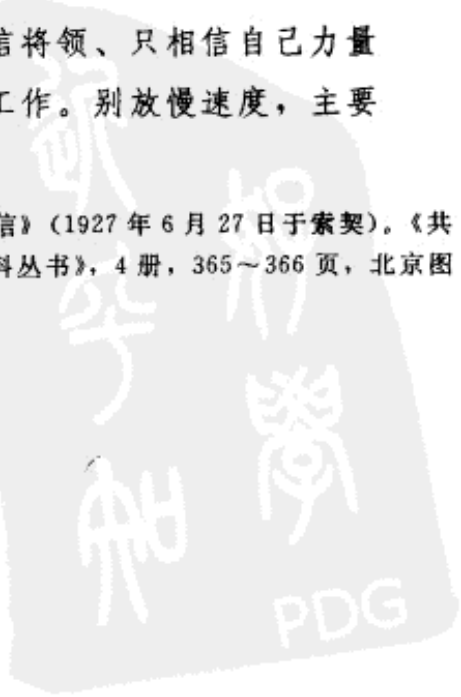


“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由于鲍罗廷问题（如果武汉想解除他的职务）而同武汉进行争论当然是不值得的。但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丧失共产党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①

为了挽救即将倒悬的形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30日决定给鲍罗廷和陈独秀下达如下指示：

必须在国民党内采取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大胆方针。在国民党面前有两条路：或者它将逐步地清除自己的取消派，不怕决裂，面向群众运动和土地革命；或者让半背叛者和蒋介石的秘密追随者来领导自己。必须为争取国民党的第一条发展道路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应当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和在不相信将领、只相信自己力量的口号下组织下层群众的工作。别放慢速度，主要

^①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65～36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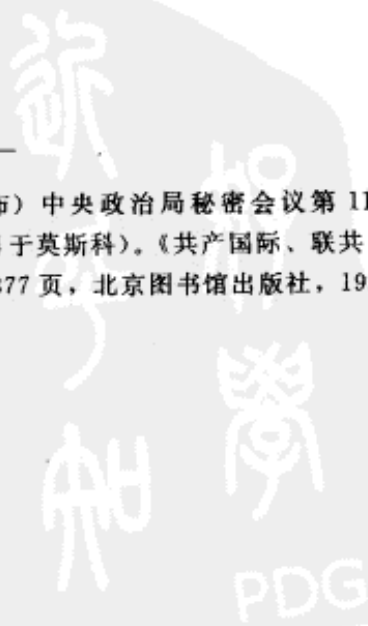


是要在土地革命和使国民党民主化的基础上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一点上拖延和怠工无疑会使反动派取得胜利。如若依靠群众，尽管有背叛行为和暂时的、甚至是惨重的失败，最终都必然取得胜利。^①

这就是斯大林等人为挽救中国革命开的“药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群众运动、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和使国民党民主化。但他们又要求，这一切必须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这可能吗？

莫斯科的这些努力能使已经病人膏肓的武汉方面起死回生吗？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4号（特字第92号）记录》（1927年6月3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76~37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诱过于人：莫斯科编织“机会主义”

陈独秀：在左右两条道路上等待 我们的都是灭亡

当危机越来越严重之时，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人纷纷请缨，要求中央立即在湘、鄂、赣三省发动暴动。然而，这些呼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在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右转的情况下，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国共之间更大的矛盾，势必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在莫斯科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所以只能采取防守的态度。

从6月中旬起，汪精卫集团的“分共”迹象就明显表现出来。他们连续召集武汉地区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策划“分共”办法，并在唐生智、张发奎部队中进行

“分共”的宣传活动。

为了应付局势，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议。陈独秀在发言时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也许应该寻找第四条道路？在我们这次会议上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鲍罗廷将莫斯科发来的指示内容归结为四项任务：
(1) 进行土地革命；(2) 使国民党民主化；(3) 武装工农；
(4) 不退出政府和国民党。那么，如何理解这四项任务呢？
鲍罗廷说：关于土地革命问题，莫斯科指示的意思并不是要立即没收土地。关于国民党民主化问题。第一种办法是吸收工人和农民，在各省举行代表会议，提出自下而上更新国民党的要求；第二种办法是劝国民党从群众中选新的领袖参加领导。第一种办法是可行的，第二种是不可行的。第二种办法必然导致同国民党的决裂。关于武装工农问题。我们当然衷心欢迎这样做，但局势可能不允许我们在武汉再呆上两个月。无论如何我们得交出武汉，或者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左派一起转入地下。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汉阳兵工厂每天生产200枝枪，都被军阀拿走了。如果我们提出武装工农的问题，军阀会感到担心，会猜出我们的计划。因此，讨伐南京或广东就不可能了。因此，现在武装工农的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广东或南京解决这个问题。关于不退出政府和国民党问题。退出的时间还没有到来，我们应该象征性的留在政府内。比如，部长们可以让副手、秘书呆在那里，而自己去国

外住上6个月。

鲍罗廷的观点很明确：目前不能没收土地；不能武装工农；国民党民主化问题要推迟解决；共产党人不宣布退出政府但实际上并不工作。

陈独秀不同意鲍罗廷的主张。他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我们确切地知道，莫斯科的所谓土地革命指的是什么。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出席会议的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任弼时等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争论非常激烈，观点很不统一。^①可以看出，当形势已经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在关于革命的重大问题上，鲍罗廷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是多么的混乱。在这种状态之下，很难找到挽救危机的好办法。

6月26日，就在上述联席会议正召开之际，武汉各处谣言纷起。中共中央军事部得到情报说，何键将以工人纠察队要缴第三十五军的枪为借口，采取反共行动，即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紧急报告，要求党的各机关注意戒备。

因为担心另一个“马日事变”即将到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仍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参加会议的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发言批评了陈独秀，要求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把青年团所作的拥护共产

^① 参见《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于汉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357～36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国际指示的决议交给陈独秀。

本来就心急火燎的陈独秀，此时受到任弼时的指责，一时无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指着任弼时大发雷霆，说：“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暴怒中的陈独秀将任弼时交到他手里的青年团决议撕了几把，扔在地上，甚至还踩了几脚。

发火解决不了问题。为了应付即将发生的突然事变，6月28日晨，会议继续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的住宅里举行。据蔡和森回忆，会议的情况是这样的：

立三、兆征因劳动大会缺席，秋白亦未到。恩来、太雷（鄂省委书记）皆报告何键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时散布工人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之谣言与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平山报告邓演达已出走，临走希望C.P.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到来。据他（邓）所知，何键一定开刀无疑云。同时太雷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日一定要解决；恩来报告中央军队与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队调过武昌入张发奎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耳目计，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大家遂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①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1982。

会议结束的当天，湖北省总工会即发出布告，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同日，总工会组织工人将纠察队的大约 1000 枝破旧的枪支和一些子弹送到了管理武汉卫戍事宜的汉口办事处。

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纠察队有 3000 枝枪，他们把破旧的枪支交出后，将好一点的枪支交给了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同时一些纠察队员也补充到叶、贺的部队之中，在后来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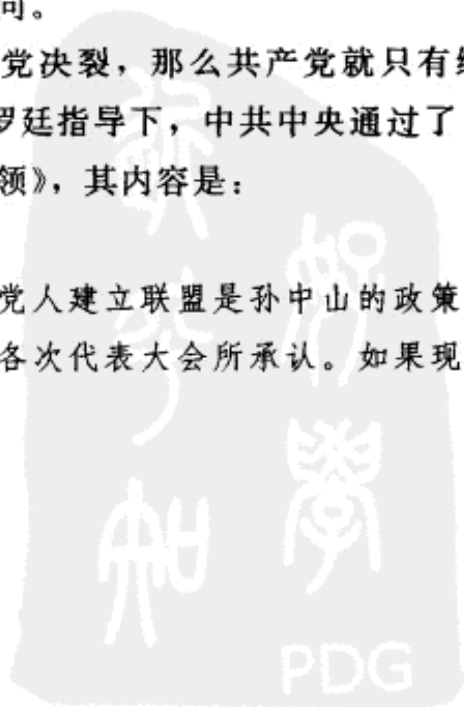
然而，自动缴械还是在湖北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有的人甚至惊惶失措，大有灾难临头的感觉。

陈独秀等人本以为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就可以与国民党相安无事。不料反动势力更加猖獗起来。第三十五军和第八军相继抢占了全国总工会湖北办事处，李品仙派了一个机枪连占领办事处，何键也派人来要房子。一些地痞流氓乘机作乱，捣毁各业工会，抢劫财物，殴打辱骂工会负责人。

在主动退让也无法消除武汉集团反共情绪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本应宣布与武汉汪精卫集团决裂，坚决依靠工农革命群众，走自己的路。但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陈独秀固然在会上提出与国民党分手，也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更得不到鲍罗廷的赞同。

既然不能与国民党决裂，那么共产党就只有继续退让了。7月3日，在鲍罗廷指导下，中共中央通过了《对国民党关系方面的退却纲领》，其内容是：

- (1) 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是孙中山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所承认。如果现在由



于军事力量的原因有人企图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那么，这将会大大损害国民党的力量和革命性，这只能暴露它的弱点。我们不希望国民党遭受这种不幸。

(2) 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革命，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共产党人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这一斗争。

(3) 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国民党。但是，国民党中央必须在它的地区采取措施，制止对共产党的一切迫害。

(4) 国民党是一个反帝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政党。这种反帝斗争必须是国民政府的宗旨。

(5) 共产党参加政府（中央和地方）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但是，它不是执行机关。这两件事（参加政府和共同协商）并不含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

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

(6) 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同时，国民党必须根据它的决议保证这些组织的自由和工人、农民的利益。

(7) 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

(8) 没有政府和国民党的允许，工会和纠察队不得行使行政权，如逮捕、审判、巡逻。

(9) 店员工会必须由国民党和总工会进行改组。他们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越店主的经济能力。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雇用和解雇，不得干预店铺的管理。工会不得惩罚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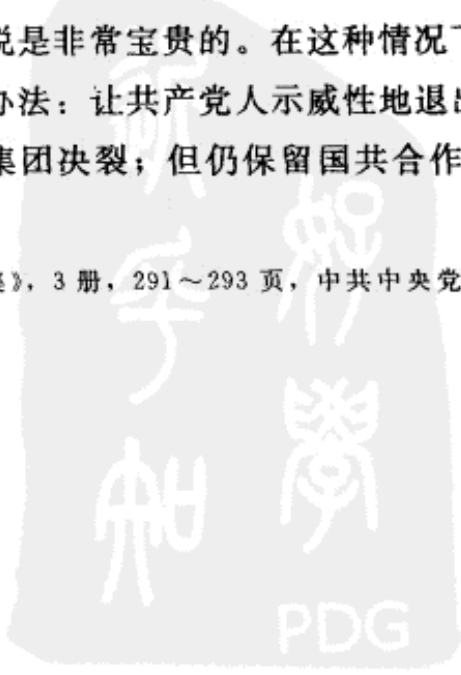
(10) 禁止童子团行使警察职权，如逮捕、干涉行人等等。

(11) 兵工厂、水电厂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人的工会不得干预管理事务。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不满，必须通过总工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以便解决问题。^①

莫斯科舍不得“国民党”的旗帜

中国革命的形势令莫斯科领导人越来越担忧。他们终于认识到：将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绑在一条船上已毫无意义了。但如果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岂不是宣告国共合作政策的失败？！对于斯大林来说，承认国共合作政策的失败，就等于承认自己在与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败北。这在斯大林是万万不能的。何况，此时斯大林仍然认为“国民党”这三个字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方面提出这样一个办法：让共产党人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以宣布与汪精卫集团决裂；但仍保留国共合作的框架，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291～29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即共产党人不退出国民党，而在国民党内领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的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以下指令：（1）中国共产党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2）在退出武汉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的政策。^①

莫斯科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说到底，就是不愿抛弃“国民党”这面旗帜。他们认为这面旗帜还是可以利用的，强迫共产党人继续集合在这面旗帜之下，结果使中国共产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当国民党宣布“分共”之后，共产党仍挑着“国民党”的旗帜在举行武装起义。

斯大林找到“替罪羊”

1927年7月9日，斯大林在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了一封信，这是斯大林诱过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材料。信中在谈到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时，斯大林用了非常十分轻蔑和刻薄的语言。他写道：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任何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尽管任何合作总会多少束缚合作成员的手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反对一切合作。就拿蒋介石的沿海五省（从广东到上海）来说，那里没有与国民党进行任何合作。蒋介石的代理人在瓦解共产党人“军队”方面取得的成功要比共产党人在瓦解蒋介石后方方面取得的成功要多，这如何解释呢？许多工会脱离了中共，而蒋介石稳坐宝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共的“独立性”又是什么样呢？……在我看来，原因不在于这些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也有作用，而在于现在的中央（它的上层领导人）是在国民革命时期锻炼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洗礼，但它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中央

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含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现军队革命化，促使士兵与将军相对立。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错误地称之为政党的（的确，有相当战斗力的）各种人物的大杂烩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当然，在基层是做了工作。而这方面的工作应归功于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中央走向工农，而是工农走向中央，而且工农越是接近中央，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央离开他们就越远。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并把中国的阶级斗争归结为高谈阔论“封建资产阶级”（现在彻底弄清了，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原来是罗易）。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怕过早地让这样的党到“汪洋大海”中去自己游泳（它还来不及巩固就会被碰得粉碎……）。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认为党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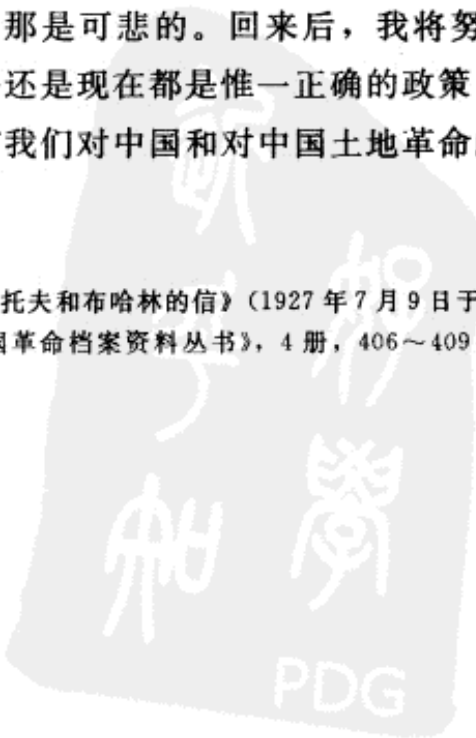
在斯大林眼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几乎一钱不值，“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型和业务上不精通”，总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一切都搞砸了。他同意将陈独秀和谭平山召到莫斯科，“教给他们一点东西”。他在信中还提出从莫斯科派出顾问到中共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去作“保姆”，以便发挥“钉子”作用，把现在的“大杂烩”固定成政党。

斯大林在对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番怒斥之后，也对鲍罗廷、罗易等人表示了不满，认为他们不是优秀的工作人员，提出：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

至于被派到中国军队中的苏联顾问，斯大林也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并不称职，因为他们从来不善于及时地向我们预告自己“上司”的过急行为。^②

总之，斯大林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别人身上，尤其是中共中央身上。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包括斯大林本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有没有错误，斯大林是这样认识的：“据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

^{①②}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406～40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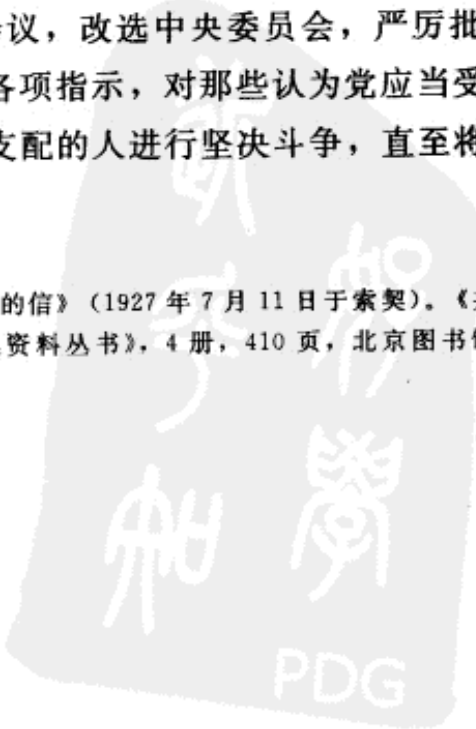
正确性。”^①

斯大林已经开始为莫斯科的对华政策辩护了！既然他们制定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那么失败的责任肯定就不在制定政策的人身上，只能在执行政策的人身上。这就是莫斯科方面后来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身上的最基本的逻辑。

此时，共产国际领导人也开始为自己辩护，并对中共中央大加批评。7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最近一段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顽固地抵制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一些地方组织的工作人员因带领群众进行战斗而殉职，而党的政治局则公开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办反革命，以及促使国民党实行民主化。共产国际日复一日地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越来越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行动不够坚决和所提口号往往失之片面等毛病。”他尖刻地称陈独秀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说陈独秀要求退出国民党是为了自己“更加脱离群众，从旁边搞玩弄手腕的政客活动”。

布哈林在斥责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之后，宣布他的结论是：“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各项指示，对那些认为党应当受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支配的人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将他们开

^①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7月11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册，4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除出党。”^①

7月16日，曾任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曼达良，在《真理报》发表《中共领导为何失败？》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胜任历史的使命，充当了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尾巴，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列举了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指责说中共中央没有执行，或者是有意进行抵制。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国际指示有计划的、有时是经过巧妙伪装的抵制行为是否出于偶然的呢？不，绝对不是。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他们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去理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任务和目的。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应俱全，理论一片混乱，策略摇摆不定，这一切合在一起，便把党拉向右转，拖入机会主义的泥坑。

曼达良还在文中强调：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的是惟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的则是一条直到最近还用极左词藻掩盖起来的有害

^①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辑，498～51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

曼达良在文章中明确表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①

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

1927年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应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错误。^② 这一决定随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下达到中国。

7月12日，鲍罗廷向中共中央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指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让陈独秀去莫斯科，并另组临时中央常委会，这实际上是免掉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此时，陈独秀也感到无法再工作下去，遂向党中央提出辞呈。他在辞呈中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但他表示拒绝去莫斯科。就这样，陈独秀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

7月13日，布哈林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了由布哈林等人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

^①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辑，515～525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② 从斯大林在7月9日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次会议还决定召陈独秀和谭平山到莫斯科去。

决定》，并决定立即予以发表。《决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近一年来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给中国发出的指示也是正确的。接着批评中共中央说：

中国共产党的现今的领导机关，近来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策错误。中国共产党应当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展开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地批评和揭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急进”的领导者之不彻底的和怯懦的立场，警告群众预防军阀方面叛变的可能，武装大量的工人，十二分坚决地推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没有执行这些指示。中央不是领导土地革命，而在许多场合之下，作了制止土地革命的因素。党的个别领导者，提出了显系机会主义的口号。

至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统一了口径：莫斯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由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没有执行这些正确的指示，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分共”。国共关系宣告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卸任总书记的苦与愁： 莫斯科没有忘记

罗米纳兹挥舞惩罚大棒

1927年7月中旬，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搜捕，陈独秀搬到一个叫“宏源纸行”的纸庄暂住。此时，他已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由于时局的艰险、政治上的失落，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时任陈独秀秘书的黄文容（玠然）回忆说：

在隐居的日子里，陈独秀终日沉默寡言，苦思冥想，我在楼下经常能听到他在楼上来回徘徊的脚步声。过了些日子，他的情绪似乎稳定了些，开始不停地翻阅楼上的藏书，还研究起中国的文字改革。

我们在这里最苦恼的是与世隔绝，外面的情况，时局的变化，一点都不清楚，像南昌起义这样重大的事件，我们也是在“八七”会议之后才知道的。我们在这里既不可能订报纸，也不可能出去与人联络，就连纸庄老板汪源放也极少来纸庄。

我心里也很苦闷，也有许多解答不了的问题，很想同陈独秀谈一谈。有一天，我趁保姆不在，便上楼去向陈独秀请教三个问题：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怎样去做？陈独秀听完我的话，凝视了我许久，最后露出了一丝苦笑，却未讲一句话。^①

7月23日，又一个衔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之命的共产国际代表来到汉口。他就是时年30岁的罗米纳兹。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他的助手、德共党员纽曼。

罗米纳兹来华的首要任务是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便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制定新的方针路线。到达汉口的当天晚上，罗米纳兹即与中共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1927年8月7日，在罗米纳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形势严峻，时间紧迫，许多应该参加的人都未来得及通知，或者是接到通知后未来得及参加。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

^① 辛平：《陈独秀秘书黄玠然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炎黄春秋》，1997年第1期。

以及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及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过去的错误，二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报告是这次会议的重头戏。

年轻的罗米纳兹初来乍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究竟了解多少，很难下定论。但由于他的头上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光环，无论他是否了解真实情况，他都有权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这不，在汉口特别会议上，罗米纳兹就摆出了盛气凌人的架势。他在报告一开始，便口气强硬地说：关于过去的错误，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导提出批评，这是不对的，共产国际没有责任，国际没有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正轨的。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共中央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反工农的机会主义”错误。罗米纳兹还说：“至于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经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①

继罗米纳兹之后，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发了言。绝大多数人同意罗米纳兹的观点，认为错误在中共中央，而不是在共产国际。只有罗亦农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地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维经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维经斯基是1917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

^① 《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5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

尽管罗亦农只是强调国际代表不好，罗米纳兹对他的发言还是很不乐意。在作结论时，罗米纳兹特意指出：“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易）维（经斯基）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①

为了维护莫斯科的权威，罗米纳兹甚至连批评国际代表都不允许。而他的这一番话，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强词夺理。

由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在会上被原则通过。这份文件指出：国民政府已经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以汪精卫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因恐惧革命的发展而背叛了国民党的主义，完成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已经背叛和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的光荣旗帜。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会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文件认为：是中国党的指导机关犯了错误，执行了“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中国党犯错误的根源是不了

^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结论》。《八七会议》，6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

这样一来，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就完成归为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了。

罗米纳兹不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身上，而且武断地表示：不许任何人推翻这个结论。文件宣布：“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告别了！”^①

八七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变，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在罗米纳兹的压力下，会议承认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在中共中央，而不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八七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召开时，陈独秀虽在汉口，但由于罗米纳兹的反对，会议没有请陈独秀参加。对于这个问题，几个当事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李立三的观点是：“临时的中央还主张他加入，但国际代表非常反对。这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使正当道路挽救过来，非使独秀离开不可。独秀不参加‘八七’会议则挽救党脱离机会主义非常之快。”^②

李维汉则认为，应该让陈独秀参加会议。他说：“一九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266～2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二七年七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①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也发表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②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去见陈独秀，将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至于这次谈话在陈独秀的心里引起多么大的震撼，陈独秀始终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只能从他的秘书黄文容的回忆中，窥见一斑。黄文容说：

八七会议后的一天，瞿秋白和李维汉突然来到纸庄，一见他们，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赶紧请他们上楼，自己则留在楼下放风。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从楼上下来，对我略点了点头，便匆匆离去。他们同陈谈了些什么，陈没对我讲，我自然也不能问。我只是感到，谈话之后，陈显得很愉快。那天夜里，陈独秀一直在楼上踱来踱去。一两天后，陈病倒了，情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16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②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172页，人民出版社，1980。

况很厉害，我不得不请来医生给他看病，整日照料他的生活。几天后，他的病好了，但情绪却无好转。^①

陈独秀憎恨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却悲叹自己无能为力；他不甘心接受被免职的处分，却又不能不承认现实……。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心头难以排遣，他只能将它们凝聚在笔端，写就一首《献诗》：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我们有自己的觉醒。
有的火已在爆裂。^②

^① 辛平：《陈独秀秘书黄玠然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炎黄春秋》，1997年第1期。

^②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16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不久，陈独秀就迁到上海，住进位于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的彭礼和家。

“撒翁”没有撒手

八七会议以后，汉口的条件愈来愈恶劣。汪精卫集团狂妄地喊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呆不下去了，不得不于1927年10月移驻上海。

此时，陈独秀虽然已经没有资格再过问中央工作，但新的中央领导人对他还是相当敬重的。瞿秋白等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去拜访陈独秀。他们还向他提供中央的有关文件，以征求意见。鉴于陈独秀生活方面存在困难，中央决定每月发给他32元生活津贴。总之，瞿秋白等人对陈独秀是尊重的、关心的。

不在任的陈独秀，虽然感到几分寂寞，但一方面得到瞿秋白等人的关怀，一方面他毕竟曾经是党的领导人，所以他与中共中央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时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的郑超麟回忆说：

瞿秋白和罗亦农二人对陈独秀还是很恭敬的。瞿秋白到上海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去拜会陈独秀；他还是同过去那样像学生对先生的态度。二人谈什么话，我不知道。当时黄文容还住在陈独秀家里，做陈独秀的私人秘书，他也没有告诉我谈话内容。我只知道，当时陈独秀就把黄文容交还给中央，秋白也接受了。以后几日，罗亦农也去拜会陈独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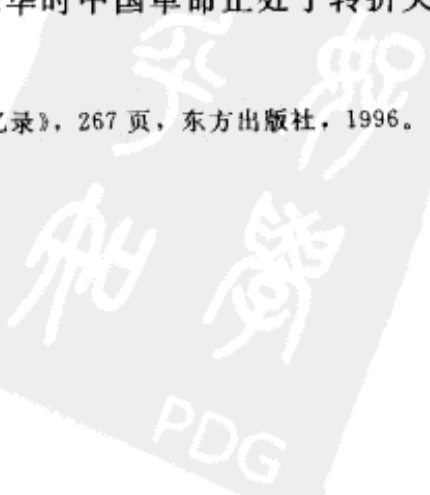
不用说也是很恭敬的。……十二月下旬，罗亦农来我家，同我商量要接陈独秀到我家（编辑部机关）来住三日，以便他和秋白同“老头子”商谈。十二月二十四日，黄文容雇汽车接陈独秀来，住在黄文容房间。当晚，我办了一桌酒席请他们吃饭，客人来的有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次日瞿罗二人便与陈独秀谈话，我因私事，没有参加。三日之后，黄文容又把陈独秀送回家去了。^①

这年11月9日至10日，在罗米纳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整顿政治纪律”的口号下，通过了由罗米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罗米纳兹的所谓“无间断革命”的观点。这一观点不承认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求在全国举行城乡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后，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会议决定给予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以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张国焘等以不同程度的政治纪律处分。

罗米纳兹来华时中国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他在中国只

^① 《郑超麟回忆录》，267页，东方出版社，1996。



停留了短短的3个月，但作为联共（布）、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首先，罗米纳兹引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承认，大革命的失败是党的领导机关本身犯了错误，而不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的错误。

其次，罗米纳兹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左”倾盲动的歧途，使党在“左”倾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次，罗米纳兹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开惩办主义的先河，将党的工作的失误和斗争的失败，与党的某个领导人直接联系起来。对失误和错误的反省，成了对某个领导人的批判、指责和组织上的惩罚。

不过，在八七会议和11月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中，都没有明确点出陈独秀的名字，更没有将他的名字与“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笼统地批评“中央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

这是为什么呢？郑超麟曾分析过其中的原因，他说：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尤其是瞿秋白，都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由陈独秀一人来负；都明白陈独秀退出领导岗位，完全出于共产国际的命令。^①这个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再说陈独秀。自从他来到上海后，便称自己为“撒翁”，似乎准备做一个撒手不问政治的寓翁。他开始也确实做了一些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但与他熟知的人都认为，他不会从此在政治上消沉下去。郑超麟回忆说：

^① 《郑超麟回忆录》，158～159页，东方出版社，1996。

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①

陈独秀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还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不久，他便撰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然而，这并不说明他确实从此潜心搞起了拼音研究。当时经常与他接触的张国焘说：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石的下野（1927年8月15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②

① 《郑超麟回忆录》，186~187页，东方出版社，1996。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363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此时陈独秀确实没有撒手不问政治之意。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的道德和良心不时催促和提醒着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艰难的时刻，不能置身事外，不能保持沉默。从他当时写的一首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激荡在他胸中的激情：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①

陈独秀的诗既是在催促别人，也是在鼓舞自己。这不，

^①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16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陈独秀又行动起来了。他应瞿秋白的邀请，拿起了他最有力的武器——笔。

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上主持“寸铁”栏目，发表针砭时弊的小短文。从1927年10月24日的创刊号到1928年2月27日的第19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笔作刀枪，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猛烈攻击。他的文章或抨击国民党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压制工农群众运动的反动行径；或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或讥讽国民党统治下的时局；或批判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反动宣传……总之，凡是他认为不满、不平的事，尤其是有关国民党方面的事，都会以犀利而尖锐的语言给予评论。

为了抨击新军阀割据的状况，陈独秀在题为《滑稽的禁令》中写道：“广东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李济琛，两湖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唐生智，河南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冯玉祥，浙江的民政财政必属之何应钦，江西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朱培德，这种军人割据的状况，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没有两样；然而南京的所谓国民政府，方通令各军长官，严禁干涉民政财政，可谓滑稽之至！”^①

陈独秀大肆嘲讽蒋介石的所谓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三分之二”的说法。在《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一文中，他辛辣地指出：“自从国民党清党反共，遏止民众的革命高潮，以前所得的收回汉浔租界这一点小小胜利，英帝国主义者都要乘势推翻。国民革命的成功在哪里？蒋介石在神户讲演说：‘国民革命之大业，今已成功三分之二。’他显然是指中

^① 《布尔塞维克》，1卷，1期，1927年10月24日。

国三分之二的地方已经挂了青天白日旗。从前挂上五色旗便算是共和国成功，现在挂上青天白日旗便算是国民革命成功，哈哈！革命大业原来是如此吗？或者是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不过如此！”^①

除了在《布尔塞维克》发表小短文外，陈独秀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如在1927年12月26日的《上海工人》第43期的夹缝中，他就发表了一篇讥讽国民党的顺口溜——《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
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陈独秀虽然被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之外，但他对党的工作还是十分关注的。他看到，八七会议以后，党虽

^① 《布尔塞维克》，1卷，4期，1927年11月14日。

然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都遭到挫折。他认为，这是儿戏暴动的行为，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违反了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①

中央11月扩大会议后，陈独秀看到了会议的有关文件。他从文件的字里行间中，感到党内的“左”倾苗头正在滋长。他不同意中央关于国民党的统治根本不能稳定的观点，也不同意直接组织政治的、军事的暴动，而忽视经济的斗争。他意识到，如果按照文件的精神去做，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会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作为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他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不再顾忌是否会被人说成是贩卖“机会主义”，毅然于11月12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看法。

陈独秀在信中指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眼前还不至于崩溃，共产党以群众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来。所以，对于工农运动，在不回避政治斗争的前提下，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更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在城市，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在上海。

陈独秀不赞成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党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提出“四不”：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这样简单明了的口号，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在全国通用。他指出：“我们此时若不用最彻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36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①

这封信刚写好，他又看到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这个通告说，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到武装暴动以创建苏维埃政权阶段。陈独秀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于是，他又立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醒他们：共产国际的决议多次指出，认为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而中央在通告中却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入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他问：中央如此提出，是否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改变认识？鉴于自己以前的教训，他提议：“我以为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亟须确定，应速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因为，“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②

中央常委收到上述两封信后，于12月9日给陈独秀写了复信。信中首先对能接到陈独秀的信表示“非常之欣慰”，接着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独秀对当前形势、工农暴动等问题的看法。

关于当前形势，中央认为，国民党由于内部派别林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已不能巩固其统治。目前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革命的形势是无间断的形势，是比较长期的斗争。所以，说中国可以由某地工农暴动以夺取政权的时机已到，固然是错的，但像陈独秀所说的“以群众力量扫荡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时机还未到”，则也有

^{①②} 《陈独秀来信》（192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554~555、5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语病”。

关于工农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中央表示不同意陈独秀所说的“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更不可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的说法。中央指出，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的与政治的，用陈独秀所提的“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要实现“四不”便必然走向暴动。因为农民群众不拿起武器暴动，统治阶级是不许实现“四不”的。中央认为，陈独秀提出的应当注意经济斗争，以经济斗争进行政治斗争，不应当只注意军事行动，这是对的。但说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夺取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

至于陈独秀所担心的中央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否与共产国际的提法一致，中央并未作详细的解释，只是回答：中央11月扩大会议已经说明。中央认为陈独秀会明白，11月扩大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召开的，有关决议并不是中央随便作出的。^①

从中央的复信可以看出，当时瞿秋白等人虽然不同意陈独秀的一些看法，但他们还是心平气和地与陈独秀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回信的用词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正是瞿秋白等人的这种态度鼓舞了陈独秀，12月13日，陈独秀又写信给中央，对广州起义时提出建立“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等口号，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口号如果离开“无产阶级独裁”，并无特殊的

^① 《中央复陈独秀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192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册，550～5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意义。

总之，此时的陈独秀虽然已不在领导岗位，离开了中央决策核心，但他非常关心中共中央的工作，并毫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意见。

莫斯科：陈独秀会另组党吗？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经过了八七会议和11月中央扩大全会，但中共党内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在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分歧，在具体行动上也很不一致。据当时在上海的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观察，中共党内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 一些人认为应该严厉惩罚以前一切机会主义的过失，结果搞得犯了错误的同志人人自危。

(2) 挑选工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同时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人进行惩罚联系在一起，结果在党内形成了歧视和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

(3) 一些人错误地理解恐怖手段。在浙江，决定用恐怖手段对付不愿参加暴动的农民；在海陆丰，党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每个党员都要杀死9个同村人，结果有一个党员走进村子就上吊了；在长沙，党组织由于迷恋于搞恐怖被人们称为“深夜党”。

(4) 不少党的干部对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和中国党身上强烈不满，认为是共产国际犯了严重错误，却委过于人。

思想上的混乱、认识上的分歧和行动上的不一致，伴随着“左”倾盲动错误的滋长，导致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威信

开始下降。到了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不得不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他在报告中指出：对于全党来说，无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党的代表会议，都不是很有权威性。而且中央委员会内部也缺乏足够的团结，所以需要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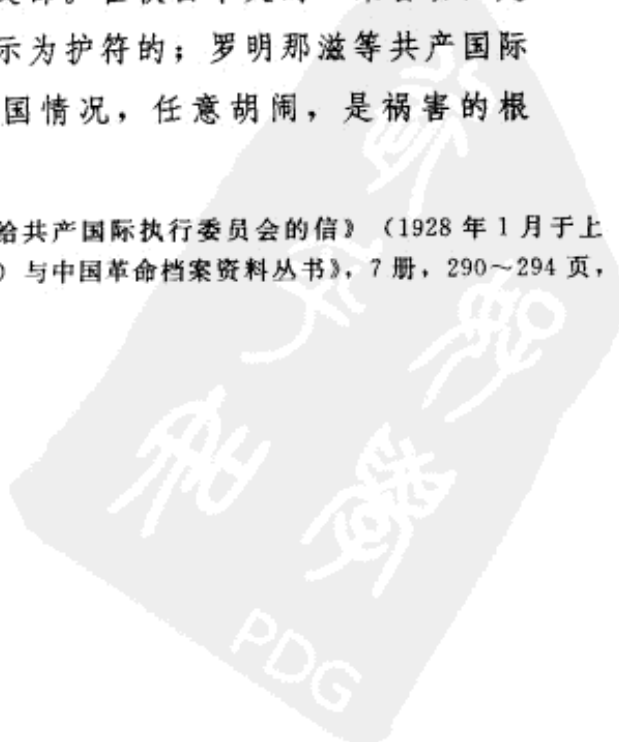
此时，对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不满的一些人，开始不断对陈独秀进行游说，希望由他出面另组一个新的政党。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他曾向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说法，认为中央是个暴动编辑部，天天做暴动的计划，假使做科学的暴动编辑部还可以，可惜还是文学的暴动编辑部。而中央则视他为反中央的首脑，他的住所也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

重大的失落感使张国焘产生了脱离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意图。于是，他找到陈独秀，希望陈独秀能支持他的想法。张国焘回忆说：

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得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

^① 参见《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1月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290～2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高叫暴动，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另组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①

张国焘知道，另组“工农党”如果没有陈独秀这位党的前任领导人打出旗帜，他张国焘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然而陈独秀却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张国焘不理解陈独秀的用意，反而认为陈独秀是无足够的勇气来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364～36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负担这个艰巨的任务。

与张国焘想拉陈独秀组织“工农党”的同时，其他一些对临时中央不满的人，在没有得到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则自称“陈独秀派”，开始在党内进行反对瞿秋白等人的活动，力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陈独秀得知这些情况后，不仅不支持他们的这些活动，还表示坚决反对。陈独秀为什么持这种态度呢？郑超麟作过如下分析：“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工作精神。”^①

除上述这些人在党内进行活动之外，在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也积极在党外进行活动。他联络香港、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地的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还与在德国的邓演达取得了联系，开始加紧组织一个超然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党”。

中共党内、党外的这些动向，通过多种渠道反映到了莫斯科，从而使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陈独秀增加了几分戒心。

1928年2月初，正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工作的周达文，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索洛维约夫报告了以下情况：

（1）一批中共领导人由于对中共中央现领导的最近政策不满，公开号召成立新的似乎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

（2）这些领导人推举陈独秀和谭平山为该党首领。

^① 《郑超麟回忆录》，160页，东方出版社，1996。

(3) 实际发起人和领导人是：

于树德——原中共北方委员会委员；

李求实——原共青团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26年）；

杨匏安——著名的广州工作人员，曾任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常任联络员。

此时，在八七会议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向忠发，作为中共代表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索洛维约夫遂向向忠发询问以上情况是否属实。向忠发回答，根据他从中山大学一些学生那里得到的情况，确实有人要组织一个新党，名“工农党”，并且准备发表相应的声明，首先在广州和上海开展活动，还要与正在德国的邓演达进行谈判，吸收他加入该党。

2月6日，索洛维约夫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负责人布哈林作了汇报。^①

共产国际领导人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分裂倾向一事，为此他们特意请向忠发报告有关情况。2月11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向忠发就这一问题作了详细汇报。其主要内容是：

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后，在自己的周围纠集了一部分在省里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广东省的于树德、李求实、莫苍白等人。广东省的其他工作人员杨匏安、冯菊坡、郭瘦真、阮啸仙等也受到谭平山的影响。而且周恩来和张国焘似乎也在向谭平山集团方面摇摆。大约两个月以前，谭平山集团在香港

^① 《索洛维约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301、3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发表了声明，否定武装暴动的策略，号召建立“工农党”。

在会上，向忠发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谈了自己对中共党内情况的结论：

(1) 谭平山试图建立所谓的“第三党”（或“工农党”）。

(2) 于树德和广州的一些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支持谭平山的图谋。

(3) 陈独秀、周恩来和其他非广州的同志现在正摇摆于谭集团和中共中央之间。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反对现时的中共中央，从而也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

(5) 这确实是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倾向。^①

2月15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专门就中共党内出现分裂的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

解除这样或那样一些同志（如陈独秀、张国焘等）的党内领导工作，不能不给他们造成某种共同的委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委屈变成了对自己党——共产党的敌视，这又是小资产阶级性格所固有的现象，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高于党的利益。党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同这些人划清界限，为加强党的布尔什维主义领导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① 参见《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2月11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303～3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向忠发在信中还谈到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谈到陈独秀时，他说：“陈独秀同志很容易受他周围人的影响。所以很难说他是否会同谭平山走到一起去。”他提出：“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①

然而，陈独秀并没有受到他周围人的影响。他既没有被谭平山拉过去，也没有同张国焘一起另组新党。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有人猜测，说陈独秀骄傲，不屑参与党内斗争。也有人认为，陈独秀这样做是保持了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但熟知陈独秀的郑超麟却是这样解释的：

我认为他自知反对他的是莫斯科，而不是中国那些领袖；他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他并不把若飞等人看做“他的”群众，他认为一切党员都是他的群众，连秋白自己也是的。为此缘故，他于研究文字学余暇，只限于为某一特定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而不肯组织一种反对势力。^②

1928年夏，谭平山等人宣告“中华革命党”（“第三党”）成立。在这个党的组织者成员名单中，并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但斯大林等人还是没有放下心来。

这年11月初，斯大林在召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314～3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郑超麟回忆录》，187页，东方出版社，1996。

白、张国焘时，曾向他们询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明白：斯大林是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办报来进行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于是，他答道：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纸。他做了这么些年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支持他办报。但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行动，是很显然的。至于他是否真有别树一帜的打算，也还是个疑问。^①

听了张国焘的话，斯大林是否放宽了心，没有人能知道。不过，即使斯大林当时对陈独秀不再有什么疑虑，那么一年后陈独秀组织托派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还是让斯大林揪了一把心。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有这样一种意见：如果在此前能够让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共同商讨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党就不会遭到如此惨败。这一意见最明显地反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索洛维约夫于1927年9月5日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一封信中。他在信中写道：“早在去年秋天，维经斯基同志就和陈独秀一起提出后者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情绪的问题。后来，已是在今年春天，又提出了陈独秀来莫斯科的问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425～42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题，以便他能回国后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这两次，问题都被否决了，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也没有同意让维经斯基来莫斯科。很可能，如果当时陈独秀来莫斯科的话，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国党较为正确的路线。”^①

索洛维约夫的信引起了斯大林等人的重视。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布哈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就有关问题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并将此问题交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作最后决定。^②

可见，这时斯大林等人虽然将陈独秀当做了替罪羊，但他们并不想完全抛弃陈独秀，也不想将陈独秀置于死地。他们还是希望陈独秀能到莫斯科去，以便与他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

遵照莫斯科方面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等人多次劝陈独秀去莫斯科，但陈独秀却坚持不去。自陈独秀离职后，新任中央领导人和陈独秀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现在为了陈独秀去不去莫斯科的事，由于意见不一致，每次见面都是不欢而散。

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去莫斯科，起初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他对斯大林等人将错误一股脑儿推到他和中国党身上的做法十分反感。他曾对人说，国际为挽救威信，牺牲了他和谭平山。^③

^{①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卷，33、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③ 参见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27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2。

1928年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尽快召开党的六大，并且希望会议能在苏联境内举行，因为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非常困难，其原因是：“首先由于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其次是因为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第三是因为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进行工作。”^①

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要求。会议决定在4月底或5月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中共六大。^②不久，又决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鉴于中共六大所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等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

为了争取陈独秀能够赴会，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瞿秋白亲自找陈独秀谈话，并动员王若飞、黄文容、郑超麟也去做说服工作。

许多年后，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对他劝陈独秀去莫斯科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黄文容回忆说：

有一天，我见陈独秀情绪不错，我便乘机向他谈起去苏联的事。他马上就说：“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同志最了解，不能跑到外国去同外

^①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1月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2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会议的决定是：“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3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材料都在中国，让我到外国去，材料都没有，我怎么去研究呢？”我说：“研究中国问题也可以同外国同志共同研究，互相交流，需要的材料中央可以随时派人送去。”陈说：“靠送材料可以研究问题吗？你为什么来提这个问题？是他们让你来同我谈的？这个问题你搞不懂，他们要我去苏联，并非真的让我去研究讨论问题，而是排挤我！”我认为，让陈去苏联是中央的决定，陈应该服从，因此我又说：“我们党章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中央让你去苏联，是多数同志的意见，你应该服从。”陈听我这么一说非常恼火，质问我：“你怎么提这种问题？怎么能这样和我讲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后我没有再提这个问题。^①

郑超麟后来也回忆过当时的情况。他说：

毛子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缘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

^① 辛平：《陈独秀秘书黄玠然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炎黄春秋》，1997年第1期。

在兆丰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其余的重要领袖都去了……^①

这“其余的重要领袖”中，就有张国焘。张国焘本来是想劝陈独秀一起去莫斯科的，但也没有成功。他回忆说：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的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文，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②

就这样，陈独秀最终没有去莫斯科，当然也没有参加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仍希望陈独秀能够到莫斯科去。7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的电报中提出：“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

^① 《郑超麟回忆录》，174页，东方出版社，1996。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36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①

8月15日，阿尔布列赫特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谈到了他落实米夫电报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根据你们的电报，我曾想同老头子^②谈他去你们那里的问题。我本人未谈成。但我们中的一个朋友见到了他。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等瞿秋白和周^③回来后，他再决定这个问题。”^④

这年10月初，一个消息开始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内部悄悄流传：共产国际决定开除陈独秀了。对此消息，相信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有许多人为陈独秀的政治命运感到担心。

为了搞清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正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费尔格德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询问消息是否属实。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费尔格德的电报后，于10月11日回电说：“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我们再一次坚决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⑤

以上情况表明，当时共产国际对陈独秀采取的仍然是“争取”政策。无论是以学习的名义，还是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名义，共产国际都希望陈独秀能去莫斯科。

陈独秀坚持不去莫斯科，自然驳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面子。

没有陈独秀的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

①④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513页、537页、1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指陈独秀。

③ 可能是周恩来。他同瞿秋白正在莫斯科。

开。会前，6月9日，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谈了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重点指出：中国革命不是处于高潮时期，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①

根据斯大林的谈话精神，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决定：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和其他机构成员、中山大学中国研究所成员、中山大学教师和学生，会同中共代表，共同组成中共六大有关决议草案的起草班子。^②

6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决定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主任）、艾尔科里和米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组成委员会，指导中共六大工作。^③

中共六大期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是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引导与会代表统一认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时，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犯了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错误：

第一，在与国民党联合时缺乏独立性，对于国民党的错误缺乏批评性。他说：拥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一，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完满的独立性。但事实上，我党没有过充分的独立性，对于国民党这个同盟者很少批评的态度。不但如此，而且常常把自己的政治路线来屈从于自己的同盟者的

^①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477～4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③}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册，496～497、4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时期中最主要的一个根本错误。

第二，不了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了解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就要预见到分裂的危险，并随时为这个分裂作好群众和力量的准备。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叛变的前夜，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以图反攻。

第三，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反而常常成为群众运动的阻碍物。布哈林说：“如果这个临时的联合（指与国民党合作——引者）要以阻止群众运动发展为条件，那末，我们就应把这种联合抛到九霄云外去。因为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于团结群众，吸引他们参加运动，这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但中国共产党“没有把自己成为一个发展工农群众的因子，反而成了一个阻碍这个运动的因子”。^①

如果布哈林对中国共产党错误的归纳是正确的，那么，导致中国共产党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布哈林没有指出来。他没有说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对中国共产党有直接指导权的联共（布）的指示。布哈林们的观点是，指导者没有错，一贯正确，错的只是执行指示的人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包括鲍罗廷等莫斯科驻华代表。事实上，布哈林指出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的三大错误，无论哪一个都是因为遵循和执行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才酿成的。对此，布哈林却闭口不谈，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愿承认？

^① 布哈林的发言摘录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布哈林的报告实际上是给中共六大对党在大革命时期工作的评价定个调子。但代表们在讨论布哈林的政治报告时，对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仍然提出了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但国际代表的具体指导有失误。有的认为，不应该由陈独秀一人承担责任，中共中央全体都有责任。也有人提出，陈独秀应多负一点责任。

6月28日，瞿秋白在大会上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谈了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

不能说国际给我们的指导者，如马林、鲍罗廷、越飞都是机会主义的，如果他们认识的正确，至少是可以帮助我们党纠正的。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他们虽然不能教训我们，群众是教训了我们。我们如果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定不会走到机会主义道途上去。……并非联合战线是机会主义，并非联合小资产阶级政策是机会主义，而是共产党指导机关自己小资产阶级化是机会主义。

很显然，瞿秋白承认责任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不过，他不赞成责任应由陈独秀一人来负，他说：

是否责任由他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

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①

会议最后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承认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要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准确些说，要由“党的指导机关”来承担，因为它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所谓错误的主要表现，《政治决议案》是按照布哈林定的调子来写的，有一些表述更是从布哈林的报告中照搬而来：

(1) 对革命性质的误解和联合战线策略的谬解。“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

(2) 无独立性无批评性只知让步政策，阻碍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竟是自愿地断送革命中之领导权。“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征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3) 党的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了大革

^① 《瞿秋白文集》，5卷，609～610页，人民出版社，1995。

命的失败。

中共六大选出中央委员 23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 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7 月 20 日，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中共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目前革命正处于低潮，党的任务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而不是千方百计组织暴动。

但中共六大由于接受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错误地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最危险的敌人；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对敌我力量悬殊和革命低潮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这成为中共六大后继续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中共六大没有认识到农村斗争对革命的特殊意义，仍然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由于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中共六大追求工人参加领导的人数，将不合作领导工作的向忠发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中共六大对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代表的批评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经过认真考虑，共产国际决定不再向中国派代表，而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代表团对中共进行指导。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

为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但当他从王若飞的来信中得知六大的情况后，反应还是平静而积极的。他认为，中共六大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

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挑战莫斯科

向苏联发难的“中东路事件”

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时，双方代表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理事会应在最短时期内修订旧俄时代的《中东铁路章程》，在此之前，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

中东铁路理事会共有10人，中苏两国理事各占半数。在《协定》签订之后的4年中，由于理事会成员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争执不休，以致任何议案都无法通过。在此期间，苏方铁路局长便一直根据旧章程所赋予俄方的权力，独揽一切。铁路的业务、财政、人事大权均掌握在苏方人员手里，铁路的收益也全部存入苏联远东银行。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

的怂恿下，以苏联顾问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广州起义等借口，单方面宣布与苏联绝交。

1928年6月，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同各国改订新约，实行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同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从而在表面上实现了南京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以后，蒋介石便企图利用张学良的力量，从中东路开刀，作收复国权的尝试。

1929年3月1日，中方的中东路督办兼理事长吕荣寰就中东路有关问题，向苏方的副理事长池尔金提出严重交涉。但苏方不仅不理睬，反面进一步霸占了机务、车务、总务、商务、财务、进款等六个主要处的处长职务，仅同意将印刷所、图书馆、天文台等次要岗位让于中方。

3月27日，中方提出最低限度办法。苏方仍坚持原议。这时，张学良在南京政府支持下，决定放弃和平交涉的方针，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

5月27日，张学良下令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监视总领事及馆员，逮捕正在集会的中东路各站共产党员及苏联驻沈阳领事共30多人。

7月8日至10日，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在北平举行会议，决定以武力收回中东路。

7月11日，张学良下令强行接管中东路，解除苏方人员职务，逮捕苏方职员200余人，将包括正副局长在内的60余名苏联人驱逐出中国。是为“中东路事件”。

为了扩大的反苏行动的影响，南京政府在北平、天津、哈尔滨、上海等地策动反俄大会，宣传收回中东路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防止“赤化”。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联共（布）领导人认为，这不是一

个单纯的事件，而是世界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新一轮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国东北地方政府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成立以加伦为司令的“特种远东军”，做好战争准备，最大限度地对中方采取一切施压和镇压手段^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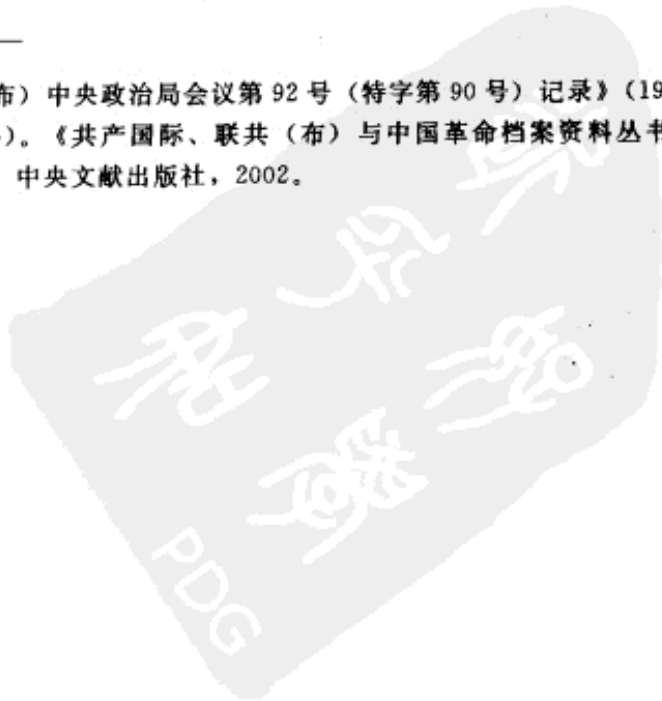
7月13日，苏联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中方以3日为限，停止在中东铁路的行为，释放苏方被捕人员。7月17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两国绝交，召回苏联驻华外交代表和工作人员，并要求中国外交官回国。

在两国关系恶化的同时，双方均开始在边境地区集结军队。从8月中旬开始，中苏边境军事冲突迭起。10月1日，苏军发动强大攻势，很快占领同江，向松花江推进70公里，击毁松花江舰队的全部军舰，占领富锦城。11月，苏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扎兰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在东线，中国军队也受到重创。这次战争中国军队伤亡和被俘官兵达2万多人。

中东路战争最终以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军事冒险失败而告结束。12月22日，中国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在伯力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规定中东铁路恢复到冲突以前的状态，所有双方合办中东铁路的争议问题，均应于最近的中苏会议加以解决。

1930年1月5日，南京政府派莫德惠任中东铁路督办，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9年8月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47、1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月1日又派莫德惠赴苏出席中苏会议。因苏方有意延宕，会议于10月11日才正式开幕，但会商毫无结果。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会议遂不了了之。

南京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暴露了其军事上的弱点。同时，中东路冲突的失利使南京政府依靠自己力量解决国际争端的决心受到打击，从而使它进一步靠近了西方。

苏联政府为了维护沙皇时期在中国谋取的特权，不惜动用武力解决两国争端，并把战火烧到中国领土上，强迫南京政府按苏联政府的意志处理中东路问题，这无疑有损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宗旨。

共产国际要求“拥护苏联”

中东路事件只不过是中苏冲突的局部事件。但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信号，要求共产国际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由于中东路事件发生在中国，所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特别重视。事件刚一爆发，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要抓紧中小城市的工作，特别是哈尔滨的工作，加强“拥护苏联”的宣传。^①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把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当做党的中心任务。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7月12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41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宣言》接受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东路事件严重性的判断，指出：中东路事件不仅是国民党进攻苏联的行动，而且是“整个国际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表现”，号召全党和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①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示威。

7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指出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作反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抗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拥护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示威斗争，要使“反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口号为群众所了解。^②

7月中旬，共产国际发出《告中国劳苦群众、太平洋各国劳苦群众书》，号召中国人民行动起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振动拥护苏联的铁铃，制止与撤回国民党由帝国主义的鼓励、帮助在满洲的战事行动”，“站在苏联一边来作战”。^③

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共产国际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号召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以革命行动来答复“中国军阀的这种暴行”，“冲上前去，打倒世界帝国主义，反对新的大战，拥护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不畏一切的牺牲，

① 《红旗》，31、33期，1929年7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382～3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③ 《红旗》，34期，1929年7月。

去领导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①

7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在“八一国际赤色日”开展反帝运动的指示，再次发表宣言，谴责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进攻苏联是出卖民族利益，号召“拥护苏联”、“打倒替帝国主义作进攻苏联的国民党”。中共中央提出，要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用革命暴动推翻帝国主义，用国内阶级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进攻苏联分割殖民地的反动战争为拥护苏联与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红旗》等报刊上，连续发表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攻击帝国主义的文章，宣传中东路事件的严重性，甚至以大幅标题写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了”，似乎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瓜分中国的狂潮就要再次掀起。文章大声疾呼：“大家起来为保卫苏联而斗争！为拥护中国革命而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作瓜分中国的大战而斗争！工人们！离开你们的工厂，到马路上示威去！学生们！离开你们的学校，到马路上示威去！店员们！离开你们的店铺，到马路上示威去！兵士们！离开你们的营盘，到马路上示威去！”^③

陈独秀提醒中央：宣传要有针对性

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严重性的估计，与莫斯科方面是一

①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9卷，64、68期，1929年。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386～38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③ 《红旗》，34期，1929年7月27日。

致的。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中苏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但与莫斯科方面不同的是，他认为战争爆发后，战场不在苏联，而是在中国，直接遭受蹂躏的是中国人民。当他看到中共中央在通告和宣言中发出“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号召时，他认为这种方法不妥，只是“说教式地”、“超群众地”、“单调地”宣传世界革命的大道理，而不是根据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来唤起群众。

陈独秀认为：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共产党拿了苏联的卢布，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同时，国民党会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以赢得群众的支持。有鉴于此，陈独秀指出：

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7月28日，陈独秀将自己的意见以书信的形式反映给中共中央。在信的最后，陈独秀写道：“我估料现在的情形

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①

陈独秀的意思是说，他认为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比中共六大前的中央对他的成见更少，更能接受他的建议。

中共中央尊重了陈独秀的意见。8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第37期特辟《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公开刊登了陈独秀的信，同时登出中共中央8月3日的复信。

中央的复信一开始就指出：对于中东路问题的讨论，不是部分策略问题，而是很严重的原则问题。陈独秀所持的中东路事件是“中俄两国间纠纷”和“国际间纠纷”的观点，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针对陈独秀所说帝国主义将在中国做战场，将带来中华民族的灾难，中央指出：国民党会利用这个分析来做仇视苏联的宣传，这样的分析就可以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结果便是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

中央认为，“拥护苏联”的口号是真正能够动员群众的口号，而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总之，中央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并且在信的末尾表示，希望看到陈独秀取消他的观点的“申明”。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此时已不是平心静气地与陈独秀讨论问题了，而是将陈独秀的意见上纲上线，将其与“社会民

^① 《撤翁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394～3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主党”、“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等放在了一个平面上来进行看待。

中央并没有以一封复信了之。8月10日,《红旗》第38期登出李立三^①的《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一文,再次驳斥了陈独秀以“反对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来代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的建议,认为陈独秀的提法与汪精卫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是毫无分别的。

陈独秀当然不同意中央对自己的批评。他认为,中央对他的意见根本不了解。8月11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复信,指出:他7月28日给中央的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他在信中说:

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

^①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决定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蔡和森在中共六大之后即受到处分,宣传部的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负责。

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陈独秀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他并不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陈独秀指出：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为问题。^①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虽然是在说明自己的观点，但字里行间还是表现出一种教训中央的气势。这一点，连不懂汉语和不太了解中国人处事方式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都

^① 《陈独秀 1929 年 8 月 11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看了出来。他们认为陈独秀是在“讥笑”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①

8月20日，中央在《红旗》第39期再辟《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的专栏，刊出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的长篇文章。文章一开始即指出：

看了撒翁同志解释他的观点的第二封信以后，觉得他只是对于自己错误观点的文饰，并没有接受中央正确的批评，而改正他自己的错误。虽然他声明与中央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中央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在原则上是对的；虽然把他在第一次信中提出的，认为“更能使群众亲切了解”的，“误国政策”的口号，很巧妙的，狡猾的，敷衍过去了，实际上完全是辩护他原有的错误观点。中央认为这一错误观点，是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整个的路线，必须给以严厉的批评，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

接着，文章分五个问题对陈独秀的观点进行了一一驳斥，阐明中央的立场。文章在总结部分将中央与陈独秀的争论上升到了“路线”问题。文章说：

^① 参见《马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1月14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概括上面的说明，很明显有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中央站在阶级的观点上分析中东路事件主要的危险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因此中央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征取广大的群众到无产阶级民族革命思想的水平线；撒翁同志分析中东路问题，认为进攻苏联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平列的前途，又不明白向群众指出两个战争的不同意义而空喊“战争灾祸”，同时惧怕群众的民族观念，因此提出“误国政策”的口号，使无产阶级政党堕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很明显的一个是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个是机会主义的路线。撒翁同志站在他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因此觉得中央的正确路线是盲动主义。凡属怀疑的或不愿意接受列宁主义的路线的，毫无疑义的不走入极左的幼稚病，便要走入更深的机会主义，这就是撒翁同志直到现在还不能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脱离出来的原因，希望撒翁同志对于这一点要有深刻的自觉。

与此同时，中央还在另一刊物《布尔塞维克》上登载批判陈独秀观点的文章。其中王明以“韶玉”署名发表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是分量最重的一篇。

在文章中，王明提出：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犯了八个错误：（1）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战争的本质；（2）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3）不了解反苏联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4）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

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5）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的战争；（6）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7）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8）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

王明指出：以上错误证明，陈独秀的观点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王明还分析了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①

尽管李立三、王明等人认为中共中央的宣传是正确的，而陈独秀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连远东局的领导人雷利斯基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在自己的信中相当聪明地抓住了中央的一些错误。”^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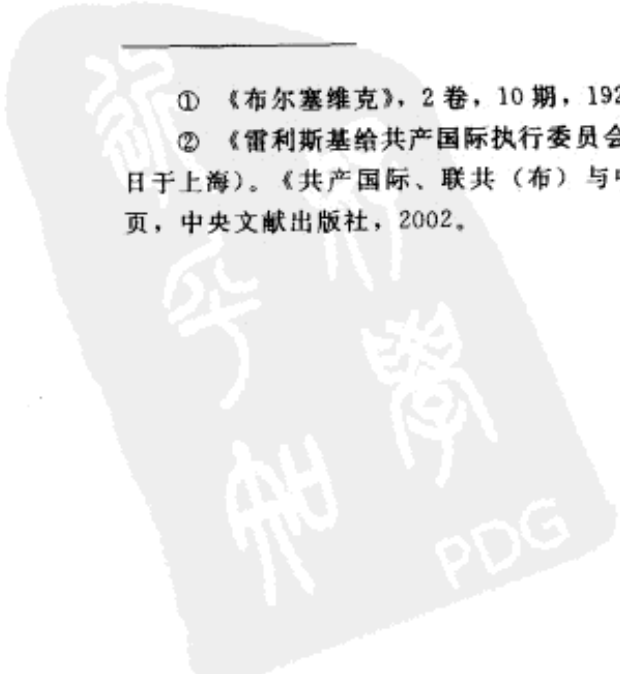
远东局：陈独秀表达了反革命的观点

中共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是在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导下进行的。

这里人们不仅要问：既然在中共六大时共产国际已决定不再派代表来中国，为什么此时又冒出个共产国际执委会远

^① 《布尔塞维克》，2卷，10期，1929年9月1日。

^②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9月3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东局呢？

原来，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部长库丘莫夫在给斯大林等人的信中，曾表示了对中共中央工作的不满和担心。他认为，中共中央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因此他建议：

(1) 绝对有必要尽快派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不采取这个措施就无法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使中央委员会和党团结一致，尖锐的党内冲突就必然会迅速扩大，这会损害党的健康发展和削弱党在争取群众斗争中的阵地。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应该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3) 作为可供选择的派到中国来的人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提出泽连斯基、列普谢和米夫同志。

(4) 鉴于即将举行日共代表会议和决定朝鲜方面的问题，远东部建议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便指导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工作并同它们进行联系。^①

根据库丘莫夫的建议，经斯大林等人批准，1929年2月，共产国际决定派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来华^②。代表团的成员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共代表雷利斯基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12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1929年2月27日皮亚特尼茨基给托夫斯图哈的便函中说：“政治局监察机关有人问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事。现在我可以告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已经委派。”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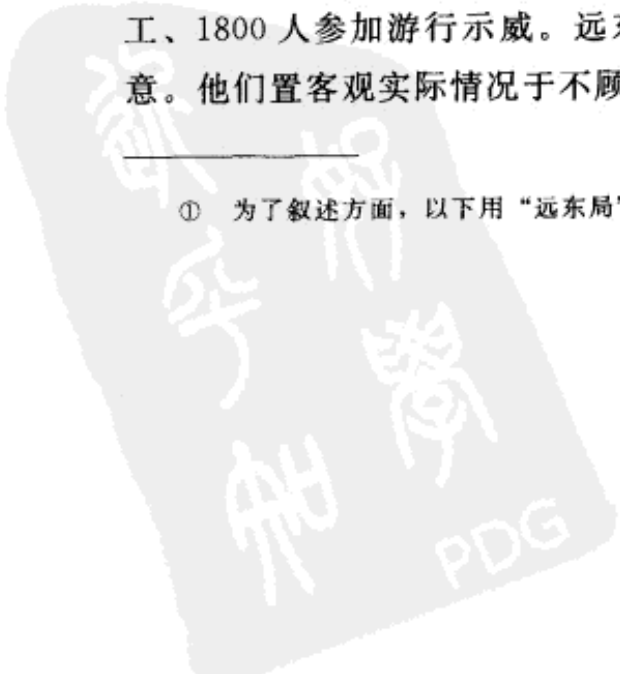
(领导人)、埃斯勒，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兼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马西。这个代表团同时也是研究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共产党工作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①。远东局虽说是指导远东地区的工作，但由于机关设在上海，对中共的指导就自然是其工作的主要方面了。

这样，共产国际实际上改变了不再向中国派驻代表的决定。而且，此时在上海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的机构，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分部。从1926年始，这个负责组织联络和转交经费的机构，即在阿尔布列赫特的领导下在上海开展活动。

1929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政治局面的情况下，远东局本该对中共给予正确和有利的领导。然而，遗憾的是，远东局成员中除乔治·哈迪外，其他人以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没有研究过中国，也没有同新的中共领导人接触过。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是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随时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和命令。所以总的来说，他们对中共的指导是“左”倾的，而且也是盲目的。

远东局在中国工作伊始，不顾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要求中共中央在8月1日组织罢工和游行示威，制造“拥护苏联”的政治气氛。后来，中共组织了7000名工人罢工、1800人参加游行示威。远东局成员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他们置客观实际情况于不顾，简单而草率地作出如下决

^① 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用“远东局”。



定：必须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将来更加大胆地开展保卫苏联和反对压迫中国劳苦群众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日常群众性运动。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在中东路上继续推行的政策，今后会造成帝国主义者从中国一侧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应开展解释性宣传活动，要善于解释中东路上的全部冲突；在作坊、工厂、协会、俱乐部、农村、庄园和学校举行的每次会议，最后都要作出决议和选出委员会。委员会的名称可以各种各样，如“保卫苏联委员会”、“苏联之友委员会”等。^①

由于远东局将保卫苏联放在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要地位，对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争论就格外注意。远东局认为，陈独秀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共产国际的宣传口号。因此，远东局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观点非常不满。在远东局的一份决议中，对陈独秀作出如下评价：

陈独秀同志表达了最右倾机会主义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观点。关于中东路问题，他给中央写了几封信，还散发到党的基层组织。在这些信中，陈独秀反对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和就此问题由党组织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陈独秀以所谓中国工人在政治上不成熟和不理解这样的口号的这种机会主义理由来掩饰他的机会主义的左翼国民党观点。取代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提出了苏联和现中国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中国开展八一国际红色日情况的决议》（1929年8月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56～2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政府共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口号。^①

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对中央的建议，显然是纯粹从宣传的策略方面来讲的。但当联共（布）、共产国际希望全世界人民都在舆论和行动上支持和拥护苏联的情况下，在中共中央全力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办事的情况下，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都可能被视为犯了大忌，更何况是陈独秀这个本来就贴上“机会主义”标签的人。

陈独秀在给中央写信时，根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他更没有料到的是，在中东路问题上与中央的不同意见，后来竟成为他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之一。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1929年10月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与莫斯科决裂：投向反对派

中国出现托派组织

1924年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内在苏联经济建设、对外政策、党内民主等方面的争论日益激烈，先后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到1926年春夏，这两派结合形成了“托季联盟”。

为了对付反对派的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多数派，以联共（布）十大关于维护党内统一的决议为武器，运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权力，于1926年7月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0月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同时解除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11月，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开除出党。后来，季



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悔过，才于1928年得以恢复党籍。^①

托洛茨基由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地，托洛茨基与各国反对派分子建立了联系，继续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策。1929年1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②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斯大林多数派的诸多争论中，中国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革命失败前，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党人要不要退出国民党、要不要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等。在大革命失败后，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与任务、中国的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等。

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托季联盟”即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同年7月，他们再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从中国召回加拉罕、移交中长铁路给中国政府等主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托洛茨基曾警告：要警惕国民党的右转。这些建议均遭到斯大林多数派的严厉谴责。

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托洛茨基等人坚决反驳了斯大林等人为其中国政策所作的辩护，坚决反对依靠武汉政府，认为这将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

^① 1932、1934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两次被开除出党。1936年8月，他们因被指控阴谋暗杀斯大林等领导人被处决。

^② 托洛茨基于1929年2月到达土耳其君士坦丁堡。1933年7月移居法国。1935年6月在挪威获得避难权。1937年1月移居墨西哥，住在小镇考约阿康。在流亡期间，托洛茨基没有停止反对派的工作，他一面著述立说，出版颇有影响的《反对派通报》，一面创建了第四国际。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住地遇刺身亡。



变。他们提出要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武装。这些主张再次遭到斯大林多数派的斥责和嘲笑。

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猛烈抨击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提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认为正是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只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形势，托洛茨基的基本看法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与此相关联，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提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主阶级，农村中最广泛的极残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封建的同时又是反资产阶级的性质。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他认为在中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应当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由于目前中国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此时还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争取召开“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进行议会斗争；对外只能提出争取“关税自主”的口号。

不难看出，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看法，有其正确的一面，如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低潮阶段。但他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则基本上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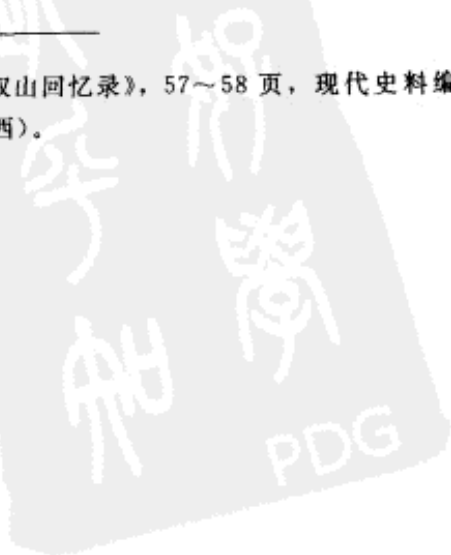
联共（布）内的争论和斗争，自然影响到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等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些在国内经历了大革命风雨和饱受大革命失败痛苦的学生，了解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派争论的具体内容后，十分赞成托

氏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的见解，对斯大林等人诿过于人，坚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做法非常反感。王文元回忆说：

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我几乎是直觉地同意了反对派。……过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怀疑的，第一，是我们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国民党发展组织，我从来就觉得可笑；第二，为什么我始终把希望寄托在高级军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骗又自愿地为另一个骗子去效劳？第三，为什么要把武汉工人的枪械缴给唐生智？为什么要压制湖南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些个怀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后来听说这都是陈独秀犯的错误，是违背了国际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编辑过了的讨论文件中，我却终于看到：无论鲍罗廷，无论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决策者乃是联共的中央，是斯大林。在中央派主张的所谓完全正确的政策，与我们在国内见到的所谓被执行错了的政策之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倒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断章取义摘引来的反对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谬的论据，根本和国内所曾实行的政策不同。^①

这样，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一批人不顾可能遭受斯大林多数派打击的危险，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开始倾向于

^① 《双山回忆录》，57～58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双山即王文元（又名王凡西）。



托洛茨基反对派，还有人秘密参加了反对派。

1927年11月7日，苏联在莫斯科红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站主席台上检阅队伍。当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中的托派学生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事前准备好的布旗挥舞着，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一时间，游行队伍中拥护斯大林的学生与托派学生发生了殴斗。紧接着，又一个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帜在游行队伍中出现，还有人大声呼喊，声援队伍前面被围攻的托派分子。

红场事件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斯大林与托派斗争十分激烈的当口，这次事件使双方的斗争白热化，从而加快了斯大林处置托派的步伐。托洛茨基先是被开除出党，后被流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而在红场事件中向斯大林发难的中国托派学生，则全部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除少数人被流放到南俄靠近伊朗的边界服苦役外，大多数人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国。

斯大林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学生非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将托派的主张带回中国，并感染了一批人，其中也包括陈独秀。

1928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上海建立。这个托派小组织的领导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史唐、陆一渊、张特、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宋逢春、萧冰洋、李梅五、徐正庵等为中央和各区负责人。

1929年4月，他们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

作为他们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机关刊物。这一托派小组织也因此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我们的话派”以上海为中心的活动，尤其是《我们的话》的刊印，使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的一些观点开始在部分非托派组织人士中传播，而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郑超麟回忆说，当他第一次从尹宽那里看到油印得并不清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他的头脑，他昏乱了，一时间竟判断不出文章中的话是对是错。但他最终还是被托洛茨基吸引住了。^①

“我们的话派”不仅将自己的刊物《我们的话》在上海等地传播，而且还通过关系拿到海参崴去散发。甚至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等学校中，也有《我们的话》在流传。这一情况很快便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的关注。

米夫随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了信。信中说，东方书记处在1929年6月7日收到了托派机关刊物《我们的话》，是从中山大学截获的。在看了这个刊物的内容后，他认为：“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他还了解到，中国托派在上海和香港有巩固的基地。他在信中指示远东局：“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②

此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托

^① 参见《郑超麟回忆录》，218~219页，东方出版社，1996。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派分子的活动。他们认为，受托洛茨基理论影响的，是一些理论水平不高，又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同志。鉴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已经将托洛茨基反对派定性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工具”，并开展了对反对派的严厉打击和批判，远东局便要求中共中央密切注意中国托派的动向，以便随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坚决肃清反对派的一切企图。

1929年6月20日至7月1日^①，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远东局成员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专门谈到托派反对派问题。纲要指出：“现在我们决不夸大反对派在党内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但应该使全党同志注意。因为全国之党内生活并不健强，因为各级党部还保留许多过去的纠纷，因为在党内还存在一些消极的悲观的不满意于党的分子，又加以一般党员之理论的低弱，使托洛斯基反对派可以利用一个虚伪的政治口号隐藏在无原则的挑拨行动中，来团结一切反对党的分子。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发展，一定会形成许多无原则的反对指导的集团，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央必须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

^① 关于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日期，目前有6月25日至30日、6月20日至7月1日、6月底至7月初等几种说法。这里使用“6月20日至7月1日”说，其根据是1929年7月8日远东局领导人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第4号信。信中写道：“6月20日至7月1日期间在我们的首都（指上海——引者）举行了中央全会，有来自5个省的20位同志参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托派在中国党内的活动是一个值得全党严重注意的问题，因为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中央今后需多向全体党员群众说明反对派理论上反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反对派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对于战胜反对派，《决议》表示了足够的信心。^①

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即开始向托派分子展开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刊出“特号”，登载了李立三的《反托洛斯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大纲》，同时还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脱离反对派的宣言》。

李立三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机会主义者转为托派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与托洛茨基是一致的。他表示：“我们想努力把这些走上了歧途的同志从托洛斯基主义泥坑之中挽救出来，使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一致的奋斗”。

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大纲》，是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写的。在文中，他认为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正确的，批评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观点。《红旗》专号在此时登载这篇文章，很显然也是为了维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威信，同时打击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脱离反对派的宣言，发表于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166~167、17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928年1月27日的《真理报》上。因为他们宣布脱离反对派，所以联共（布）中央才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红旗》刊登这篇宣言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争取中国的托派分子尽早回头，与李立三文中所说的“把这些走上了歧途的同志从托洛斯基主义泥坑之中挽救出来”的目的是一致的。

应该承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宣言》，对于中国托派分子和正准备投入托派怀抱的人，确实是敲响了警钟。他们在《宣言》中指出：“整个两年来的小组织的斗争毫无疑问的证明，不但组织第二党的道路是有害的，即便一个比较长期存在的小组织，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反对党的决议，也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宣布：“我们重新屈服于党”，同时也奉劝每一个反对派：“回转来服从党”。

“回转来服从党”，这何尝不是中共中央对中国托派分子发出的召唤！

陈独秀找到了“知音”

1929年5月，陈独秀看到了归国留学生王平一从苏联带回国的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不过，经过了几年政治风雨的磨炼后，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所遭受的精神压力，陈独秀对是否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还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对此，郑超麟有如下回忆：

我们并非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

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①

然而，陈独秀最终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思想基础，是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推卸责任的不满。自从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之中。他觉得自己身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自然对大革命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认为，莫斯科方面也有责任，是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绑在一起，并且一直不同意退出国民党，结果使共产党失去了自主权，被动地受制于国民党。莫斯科不是诚恳地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采取了诿过于人的做法，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更令陈独秀难受的是，中共中央竟然也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责，将责任全部揽下。

感到孤掌难鸣的陈独秀，终于通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找到了知音。他惊喜地发现，早在大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就反对党内合作，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这与他自己的主张竟是不谋而合！而托洛茨基所总结的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对斯大林派的谴责，也正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陈独秀不由从思想上贴近了托洛茨基。他在后来毫不顾忌地

^① 《郑超麟回忆录》，219页，东方出版社，1996。

告诉共产国际：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①

由于思想情感上与托洛茨基接近，一向特立独行的陈独秀，对于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观点，竟采取了囫圇吞枣的态度。他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见解，承认大革命失败后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其在农村的代理人富农。他也同意托洛茨基提出的目前只能争取召开“国民会议”和“关税自主”的目标。

如果说，托洛茨基远离中国，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对于有关问题的观点含有“想当然”的成分，那么置身于中国具体环境之中、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又时刻关注的陈独秀，同意托洛茨基的见解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向中共中央进言

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就中国革命问题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派理论后向中央全面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八七会议后党的失误以及目前党的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认为，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而产生机会主义政策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大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

关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陈独秀分析说，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由于不能勇敢地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个既成事实，没有采取退守的政策，反而在主观上肯定革命高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采取了直接进攻政策，使得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积极的战士因之丧失殆尽。据此，陈独秀指责道：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

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

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

关于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陈独秀指出，衡量革命是否处于高潮时期，有四个标准：

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

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

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讧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

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的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

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它到来解决，因为它就快要到来了。

根据以上的标准，陈独秀认为，现在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即处于“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首先应该铲除盲动主义，到群众中去，切实发动群众。

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陈独秀的看法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其特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其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根据这个判断，陈独秀提出：革命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在农村，则是反对富农，因为富农即农村的资产阶级，是反革命者。

关于党内民主问题。陈独秀针对中央关于“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是要相当缩小的”这一提法，结合党内组织生活的实际情况，强调民主对于党组织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论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著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

党内德谟克拉西^①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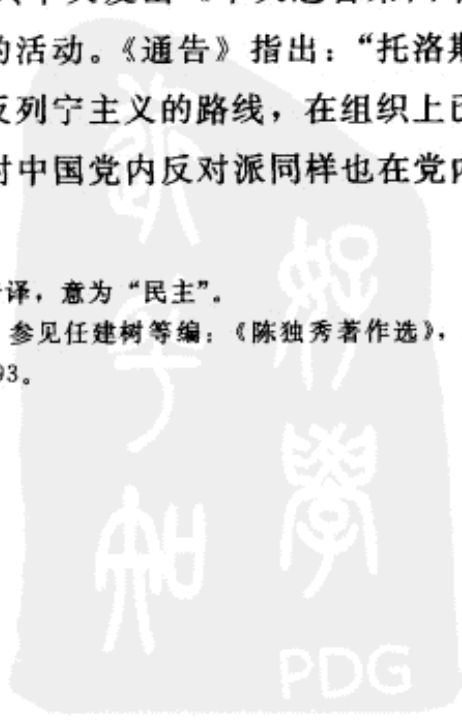
在信的末尾，陈独秀说明了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他说：“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②

中共中央没有如陈独秀所愿，将他的信刊登出来。

这时，中共中央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反对中国托派的问题上。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要求全党注意反对派的活动。《通告》指出：“托洛斯基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形成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已纯全做了反革命的工具。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

① 英文 democracy 的音译，意为“民主”。

② 陈独秀给中央的信，参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37～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

《通告》提出将所有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于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进行挽救，如劝告无效，则给予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告》要求全党将与反对派的斗争同党内反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联系起来，指出：

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故在现时中国党内斗争的路线一方面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努力于肃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且机会主义复活的企图在中国党内更有他的历史残留的根据，中国党内的托洛斯基反对派又必然要利用这一斗争，以便掩藏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扩大他自己的活动范围。因此我党在无产阶级最高原则之下，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任何小组织的活动，反对机会主义残留的复活，以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消灭反对派所能利用的党内基础。^①

这说明，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了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虽然在《通告》中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明眼人完全可以看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410～4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出来，中央所说的“党内机会主义残余”就是指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人。这样，中央已不再将陈独秀作为可以平等讨论问题的同志，而是将他作为与托派结合的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来处理同他的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开除陈独秀出党是迟早的事。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出在党内目前存在两个较为严重的问题：“第一是托洛斯基派反对派的活动；第二是独秀同志之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发表。”信中认为，陈独秀给中央的几封信，决不是偶然的，“他一向认定中央是一贯的盲动主义者，殊不知他却永远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来观察中央的正确路线”。

对于陈独秀8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央在信中说：陈独秀的见解已证明他由机会主义走到了取消主义——显然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观念无二致，借此来反对党现时的正确路线，来掩盖他过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①

从此，陈独秀的名字便与“托派取消派”、“取消派”、“取消主义”连在了一起。

米夫要求陈独秀最后表态

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他的身边便聚集起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一些人。起初，陈独秀并不打算再成立一个托派组织，因为在上海已经有“我们话派”存在。陈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415、418、4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独秀认为，“我们的话派”虽然都是些年轻人，但很有朝气和实力精神，所以他提议大家都加入“我们的话派”。

不料，那伙“有朝气和实力精神”的年轻人，并不买陈独秀等人的账。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左派”，很讨厌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当陈独秀等人提出要加入他们的组织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他们投降。还有人担心这是个阴谋，是陈独秀派想从组织上消灭反对派。就这样，“我们的话派”经过讨论，最后决定：陈独秀派只有在承认“我们的话派”为“正统”，并经过审查后，方能以个人身份加入。

陈独秀，包括他身边的那些人，当然不会接受这个“屈辱”的条件。于是，他们自动中止了同“我们的话派”的谈判。

8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找陈独秀谈话，指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批评陈独秀不应该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并且解释说，由于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公布他8月5日致中央的信。陈独秀后来在给中央的另一封信中，提起了这次谈话，他写道：

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地说中央绝对不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地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借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的公开讨论，我不责备这位代表，我只感到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

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①

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和库丘莫夫致信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托派的态度，提出“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信中指示：采取揭露和彻底消灭托派的各种措施时（中国党还不大想象得到托派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还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在党内右的危险是主要危险。党内必须加强同右派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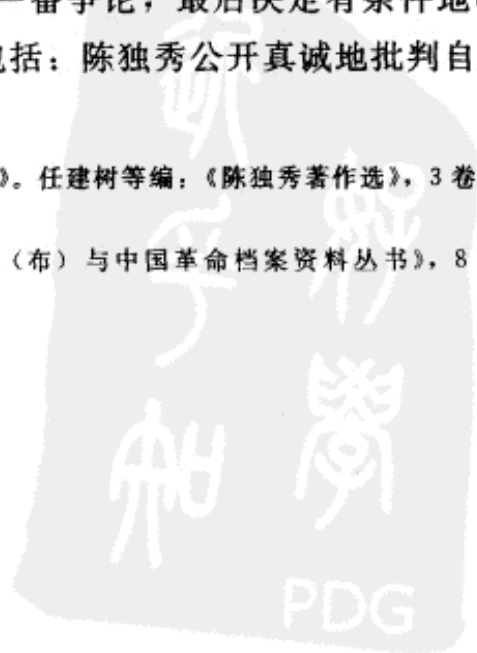
在信的末尾，米夫和库丘莫夫严厉地指出：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②

陈独秀没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劝告，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期间，托派分子刘仁静从苏联绕道土耳其回到国内，带来了在土耳其的托派茨基亲自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纲领》。刘仁静以“老托代表”自居，开始协调“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9月，“我们的话派”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有条件地吸收陈独秀派分子，其条件包括：陈独秀公开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

^① 《致中共中央的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是正确的。

当陈独秀得知“我们的话派”提出的条件后，气不打一处来，大骂了一通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子，便决定独立行动。同月，陈独秀便成立起自己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临时领导小组”，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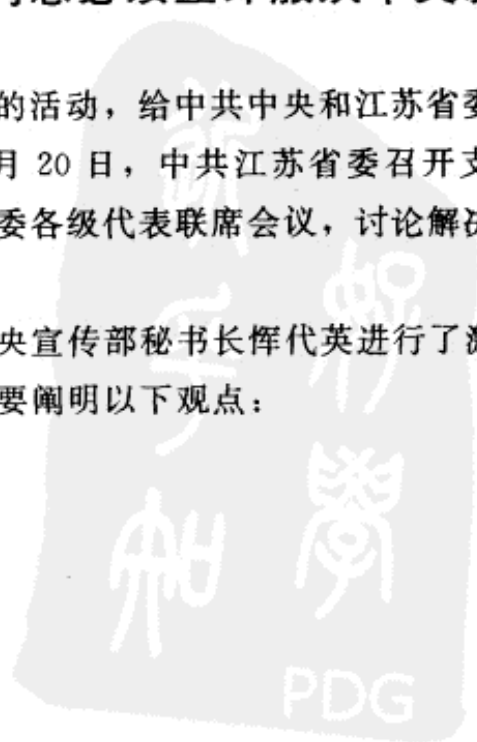
陈独秀的托派小组织刚一成立，便从宣传和组织两个方面加紧了活动。他们将油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在上海党员中散发，并把受他们影响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他们还在党的支部会上，主动发起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与江苏省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宣传托洛茨基的主张。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还着手把他们搞到手的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汇集起来，取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铅印出版。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几封信，也开始在托派分子之间流传。

中共中央：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决议

陈独秀托派小组织的活动，给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9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级代表联席会议，讨论解决彭述之、汪泽楷的问题。

彭述之在会上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进行了激烈辩论。他共发言三次，主要阐明以下观点：



第一，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中央对陈独秀的回信是过于夸张，过于吹毛求疵。

第二，陈独秀对于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是有认识的，现在已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则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继续。

第三，对于托洛茨基的理论，目前还在搜集材料，进行研究，如果自己赞成托派的主张，便要公开站在反对派政治路线上奋斗；中央所谓铁的纪律不过是官僚压迫群众的工作。

总之，彭述之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陈独秀等托派分子在上海的活动，以及由他们的活动导致的党内争论、分歧和思想混乱，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高度重视，其负责人雷利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陈独秀一直是中央的反对派，现在着手出版给中央的信。这些信件同时也会落入组织的手里。据同志们说，陈独秀同托派结成了联盟，他们一起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并将自己的活动纳入到这个组织里。安徽省委作出了反对中央的决定。上海的一个支部也站出来反对中央。在政治局看来，毫无疑问这是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分子做了工作。政治局公布了陈独秀的信件并作了答复。公开进行了辩论。陈独秀的信无疑是机会主义的，甚至是反苏的。”^①

在远东局指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5日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

^①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9月3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议》。《决议》指出：“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中央在决议中逐条驳斥了陈独秀信中的观点，指出：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其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针对托派和陈独秀的活动，中央在决议中说：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有鉴于此，中央决定：

(1) 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2) 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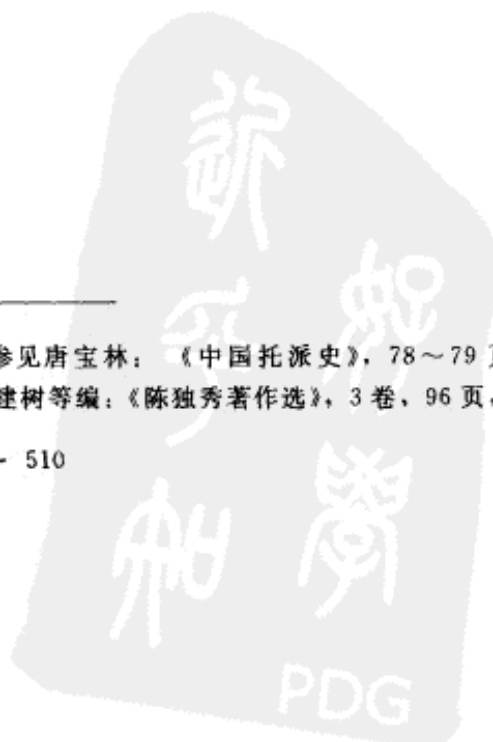
(3) 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①

中央的决议，可以说是对陈独秀和所有托派分子的一个严重警告。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495～496、505～50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0月6日，中共中央致信陈独秀，严肃地指出：党在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而你在政治上已采取与党对立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你与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有超越组织的活动。你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①

^① 参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78～79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开除与挽救：道是无情亦有情

陈独秀亮出“反对派”大旗

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警告和命令不屑一顾，反而痛惜中央不听他的劝告。在接到中央 1929 年 10 月 6 日的来信后，陈独秀于 10 月 10 日写了复信。他在信中说：“自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以后，又看见你们一些关于党内问题政治理论问题的宣传品，最近又接到你们本月六日的来信，我已经知道你们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陈独秀在信中分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犯错误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政策之错误造成的。他自己由于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当然也要负责任。

舟 夢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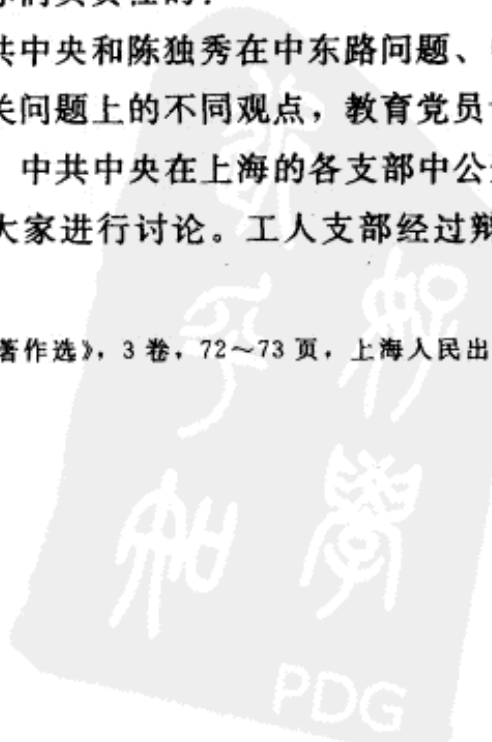
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力图纠正。

陈独秀接着指责说：中共六大后，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仍旧继续着传统的机会主义而执迷不悟，结果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中央将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中央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却只知企图掩盖自己的错误，绝不顾及阶级的革命的利益，极力拿中央的威权和组织纪律，来恐吓钳制一切同志的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公开讨论，对不同意见者实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开除党籍的处分。

最后，陈独秀态度强硬地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①

为了使党内了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有关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教育党员认识陈独秀观点的错误所在，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各支部中公开了与陈独秀的争论，要求大家进行讨论。工人支部经过辩论，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72～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其态度是明确的：不支持陈独秀的方针，认为“保卫苏联”的口号是正确的，不能用陈独秀的口号来取代。然而，学生支部就不像工人支部那样痛快。一开始，有些人提出不理解托洛茨基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也不理解陈独秀对党的任务的提法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他们要求，中央给出一定时间让他们来研究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和党内右的危险等问题。后来经过辩论，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陈独秀和托派分子，但仍有少数人支持陈独秀的主张。^①

为了尽快解决党内反对派问题，中共中央在远东局支持下，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在10月25日举行的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得以通过。《决议》指出：彭述之等人一贯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大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卖阶级的”；他们同意陈独秀信中的一切错误观点，并拿陈独秀的信在党内进行宣传，而且积极进行小组织活动，企图使党分裂。他们几个人的具体错误是：

彭述之攻击中央是盲动主义；汪泽楷向毛泽民作反党宣传，经过省委警告后，他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认为是同志间应有的事；马玉夫在上海支部、法南支部以及上海总工会和外县工作的同志中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组织；蔡振德把陈独秀的信用复写纸写好，到同志中宣传，还找省委的巡视

^① 参见《马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1月14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员谈话等。

《决议》指出：“他们完全是来攻击党破坏党，如敌人一样的向党进攻，这是列宁党的组织所绝对不能宽恕的。因此省委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他们四人的党籍，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从布尔塞维克中将这种列宁主义的叛徒肃清出去。”^①

就在《决议》通过的第2天，10月26日，陈独秀即与彭述之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中央的政策是盲动主义加机会主义，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对于中央对托派小组织活动的警告和开除部分人员的决定，他们指责为“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无理由的发狂的阻止其发表意见，并且超越党的组织路线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见，不顾支部的异议，悍然由上级机关任意开除和中央意见不同的党员，以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以保全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

陈独秀和彭述之此时已不再有任何忌讳，公然亮出自己的“反对派”身份，他们在信中宣称：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

^① 《红旗》，52期，1929年11月10日。

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说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①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斗争，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支持。

1929年10月，远东局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专门谈到对陈独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决议指出：

陈（独秀）同所有机会主义者一样，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拒绝承认党的机构的决议，拒绝参加党的工作。陈独秀和他的拥护者的错误不是暂时性的，相反，它们还在沿着反共、反党的方向发展。因此，陈和他的拥护者只有在承认和纠正他们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正确性并接受和执行党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

远东局要同一切右的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也应该继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要这样做，并且要帮助党掌握正确的布

^① 陈独秀、彭述之给中共中央的信，参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74～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尔什维克路线，从党的队伍里清除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托洛茨基主义分子。^①

远在莫斯科的米夫，也再次给中共中央撑腰。11月6日，他在给远东局的信中说：“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在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加强了活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求提供更详细的通报，以便我们能够在你们同他们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斗争时向你们提供相应的帮助。”^②

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当然知道，米夫等人关心中国托派分子的活动和陈独秀的动向，与联共（布）党内的斗争有密切关系。

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于1929年2月12日抵达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住在普林斯波岛上。在那里，他联络各国托派分子，筹划组织托派国际组织，并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开始系统发表他的理论文章。他还根据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情况，发布自己的见解，对斯大林及其联共（布）的内外政策进行攻击。

斯大林虽然在国内打垮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盟，接着又解除了与其意见相左的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但他丝毫没有掉以轻心。因为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活动，以及各国共产党内托派分子的活动，仍然是他的心头之患。

斯大林知道，在各国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批人因为对大革命时期的是是非非的评价与托洛茨基相近，故而

^{①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95～196、2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是最容易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所以，他要求共产国际的有关组织，尤其是东方书记处和远东局，密切关注中国托派分子的动向。

远东局成员从中共中央与陈独秀难解难分的争论中，看到了陈独秀所具有的影响力。他们认为，陈独秀利用自己原来在党内的威信，试图把所有机会主义分子和所有反对中央路线、反对中央领导的分子都组织在自己的周围。陈独秀现在正在成为集聚党内所有对立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心。他们明确指出：“托派本身的力量很小，没有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还不能在党内进行什么危险活动，不能充分表现出其反党和反共青团的积极性”。所以“现在党内很大的危险是以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右的危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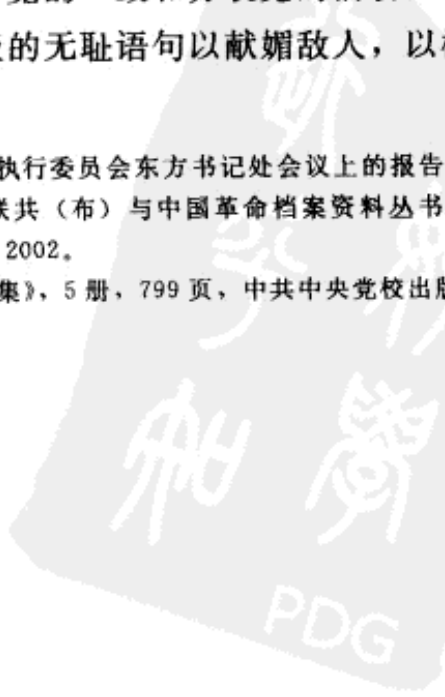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党应当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斯基派和取消派”。^②

中共中央决定对“机会主义—反对派”发动总攻击了。

11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和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一封公开信，对“机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其错误是“明显地阻挠党向敌人的斗争，站在完全与共产国际和党的六次大会以及中央现在所执行的正确路线相反地位，积极的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公开的攻击现在的党是卖阶级的无耻语句以献媚敌人，以极端民主化

^① 《马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29年11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29、2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79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讨论党的政策，提出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路线，以‘不了解’‘怀疑’的掩饰来攻击党之六次大会的路线，以捣乱式来反对讨论问题的范围与每一问题的结束而使每个会议都没有结果，绝不接受任何会议的决议，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组织内公开宣传和活动，坐在家里不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以空谈来攻击党现在的策略与行动（如对上海九一示威攻击是盲动主义）”。中央认为，“这完全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与党的纪律的行动。对于这些行动的同志公开警告他还不接受与改悔，党应坚决地予以组织上之最高原则的制裁，以巩固党的一致，决不能有半点动摇”。^①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中央为此还专门作出决议，阐述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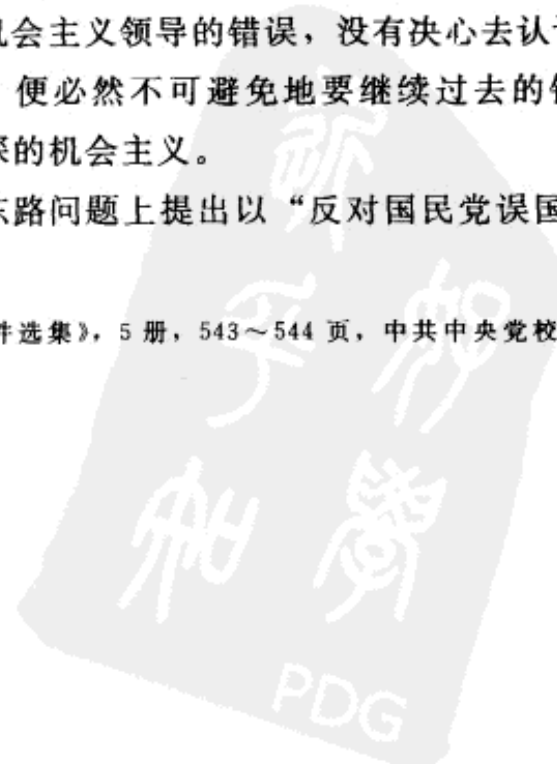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在决议中指出：陈独秀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共六大的决议表示怀疑，对大会的结果不满。

第二，多次拒绝去莫斯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堕入到更深的机会主义。

第三，在中东路问题上提出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543～54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

第四，不承认大革命的失败是他所领导的中央“不执行国际正确策略的错误”，而认为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和加入国民党”，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

第五，在对目前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看法上，反对中共六大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决议，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总的政治口号。攻击中央所领导的示威是玩弄暴动，是盲动，主张采用合法的方式。这表明他“已经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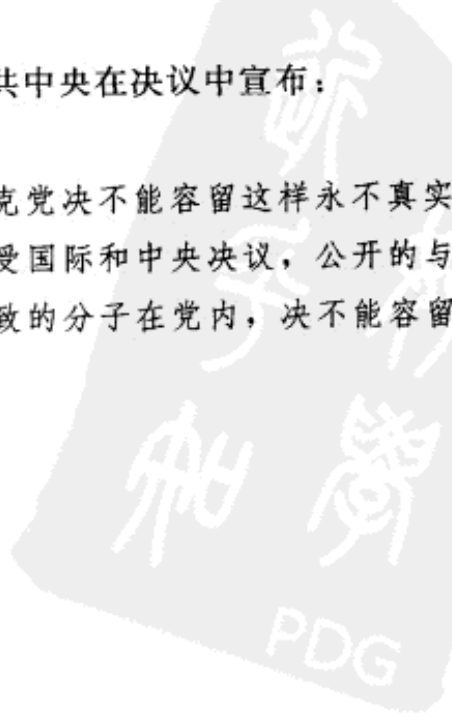
第六，在行动上，陈独秀将他给中央的信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等人“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

第七，拒绝中央的警告和挽救，拒绝中央指派给他的工作。

第八，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宣布：

布尔塞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



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

一、开除陈独秀党籍。

二、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积极作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决议。

三、各级党部须严重注意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如果发现了这样小组织的存在，须根据党的最高原则，立即予以解散。对于这种小组织的领袖分子须坚决地开除出党。参加活动或接受这样错误思想的同志，须有详细的解释和批评，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多次教育以后还固执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去。^①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党内对陈独秀等人的批判在继续升级。而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②，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明是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1927年，在

^① 中共中央决议的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册，549～55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② 原名陈绍禹。

中山大学“教务派”与“党务派”的纷争^①中，他协助米夫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权力，从而深得米夫的赏识。

1929年3月，中共中央致信米夫，希望从莫斯科派一些中国同志回国工作。米夫遂挑选了王明等十多人，派他们回国。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米夫称这批人是“有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的同志”。^②

王明等人回国后，即参与了中共中央反对托派的斗争。对于在莫斯科经历了反对托洛茨基派斗争风雨的王明来说，写一些理论文章批驳中国托派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的。不仅如此，他还把莫斯科方面将托派当成阶级敌人的政治界定搬到中国，称中共党内的反对派是“反动派”、“反革命”。

11月12日，即在中共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前3天，王明以“慕石”的化名在《红旗》第55期发表《反对派还是反动派?!》。文章指出：“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在其最后给中共中央的信上，公开的称托洛斯基为‘同志’，公开的拥护托洛斯基主义，公开的提出‘反对中央勾结改组派’的意见；在其政纲上，公开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反对‘准备武装暴动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样，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已经公开的合并了！现在的中国反对派是过去公开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加上中国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政纲证明了，他们已经不是反对派而是反动派！”

^① 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与托派活动被解除校长职务，其职务由教务长阿古尔代理。当时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是谢德尼可夫。阿古尔和谢德尼克夫在学校工作上发生严重分歧，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了进去。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在王明的协助下，利用双方的矛盾，搞垮了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从而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月27日,《红旗》第57期公布了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同时发表王明的《论陈独秀》一文。王明在文中指出: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中国革命的变节者”。他说:“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他加入工人运动的几年过程中,无论他的主观上是否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努力;但他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只是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把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资产阶级尾巴主义的服役。”

王明还挖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取消派”的思想根源。他写道:“他现在所坚持的取消派的思想,只是他的自由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的史的继续和史的发展。他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余孽在中国的统治,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不相信工农群众的革命要求与力量,因而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以‘合法运动’的口号来取消‘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以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去‘和平发展’的思想来取消‘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行动。”

经过莫斯科反托斗争熏陶的王明,在对陈独秀的批判方面果然出手不凡。他称:陈独秀公开的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公开的响应国家主义、改组派、第三党等等“国民会议”的要求,公开的附和帝国主义与南京政府的“共产党勾结改组派”的造谣,公开的拥护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小组织活动。因此,陈独秀“成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一个只

起反动作用的工具了!”

王明在文章中还警告陈独秀说：“从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开除出去了的陈独秀，如果能幡然痛悔，安心做一做他自己所谓的‘改造中国文字’工作，那么，或不至于更进一步的走向公开的反动道路上去。否则，他将走上陈公博、谭平山、托洛斯基等一样公开无耻的反革命道路！那么，不久的将来，或者中国一般社会上，又要哄传一个反革命的陈独秀！”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同党患难与共8年之后，却被党开除。可想而知，陈独秀在得知他被开除出党后，其心情是何等复杂！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独秀开始为自己准备“宣言书”，他要将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自己所反思的结果公布于世。他要告诉全体党员：大革命时期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中央开除他党籍的理由是多么荒谬，现中央的所作所为对党又是多么不利。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终于公开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

陈独秀一开始便点明：“我自从1920年（民国9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劳动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

而将自己除外^①。任何时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

陈独秀承认，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表明自己的态度是：“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致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致使下次革命又陷于以前机会主义的覆辙。”

陈独秀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中央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的得失，如确定国共党内合作策略，对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的政策，以及大革命失败前夕处理与武汉国民党关系的方针等等，认为所有失误都与自己有关，是自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他写道：“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

陈独秀认为，对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包括他自己都要承担，将责任推给任何一方都是不公正的。他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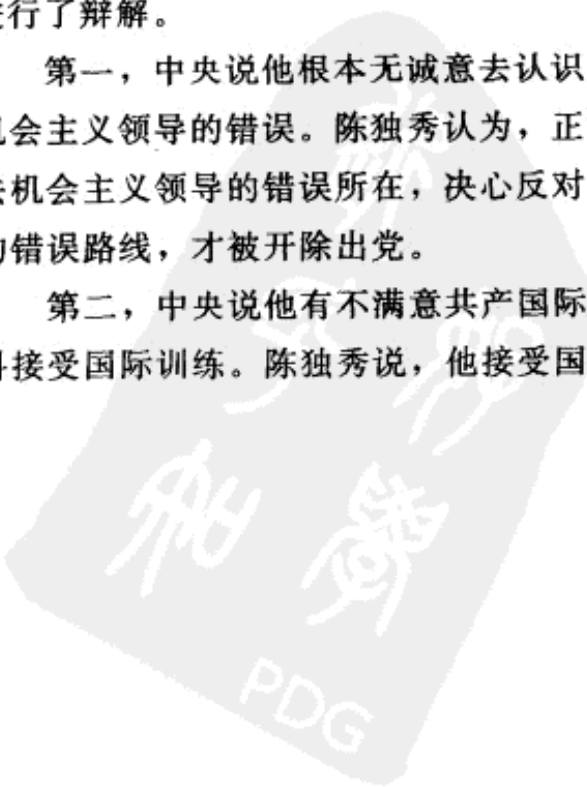
^① 原文如此。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地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像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

陈独秀认为，中央开除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并逐条进行了辩解。

第一，中央说他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陈独秀认为，正是因为自己认识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所在，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才被开除出党。

第二，中央说他有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不愿到莫斯科接受国际训练。陈独秀说，他接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



经够多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

第三，陈独秀提出，中央将他8月5日信中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对革命高潮的认识和进行合法运动等主张，作了似是而非的改动，并作为开除他的理由。

第四，中央将他10月10日的信及他与彭述之10月26日的信中提出革命处于低潮，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作为开除他的理由之一。陈独秀认为，自己信中所提的是正确的。

第五，在中东路问题上，中央认为他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并作为开除他的理由。陈独秀认为，他在信中所提出的建议正是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人心。

第六，陈独秀认为，他给中央的几封信都涉及党内严重的政治问题，但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他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已无可能，便不再为寻常纪律所约束，也不再阻止同志们传播他的信稿。这也成为中央开除他的理由。

第七，陈独秀指出，八七会议后，中央不许他参加会议，也未曾派他工作。直到10月6日，中央才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即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认为，中央这样做只是为了准备开除他的手续，而他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如何能说出和自己意见相反的话。这便成为中央开除他的理由。

第八，陈独秀表示：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中，“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斯大林派李立三对于我们的造谣，便可证明）”。陈独秀说，因为他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他“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他开除了。

陈独秀指出，以上中央开除他的理由，都是“勉强制造”的“无理的理由”，是“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陈独秀认为，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其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故”。

陈独秀基于他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对于中央的现政策多有指责。关于革命的性质，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以便指责说：由于中央和共产国际认为目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将来的革命途径上反对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留恋和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显然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而且比它更加深入，从而必然造成将来革命的更可耻的，更悲惨的失败”。关于革命的形势和口号，他认为目前革命处于低潮，只应用“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推动广大群众，待革命高潮时，再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批评说：中央错误地认为革命已到复兴时期，将“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行动口号，以命令强迫罢工、示威、暴动等，所以“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

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陈独秀对中央不接受他的意见深为不满，对中央开除他出党更是愤懑不已。他说：“无论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盖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的威权，钳制党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他提出，任何有责任心的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陈独秀在信中还以列宁为例，为他组织托派小组织找到了根据。他写道：

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

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①

《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对中央决定开除他党籍的直接反应。不难看出，他的反应是极为强烈的。

“八十一人”政治意见书

在陈独秀推出《告全党同志书》5天之后，另一篇经陈独秀修改定稿的东西也“隆重”登场，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如果说，前一篇主要是陈独秀针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为自己辩护，是被动应战；那么，这后一篇则主要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主动宣战。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分子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而且他们在行动上也效仿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模式。当年，托洛茨基派为了与斯大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册，349～3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舟
PDF

林展开斗争，曾发表《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四人宣言》（1927年5月）、《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如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发表了有81人签名^①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意见书》共分五个部分：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意见书》的火药味还是很浓的。《意见书》一开头，即将矛头直指斯大林等人，指出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机关才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的表现是：

在政治上，以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同上层领袖谋妥协的策略代替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策略代替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

^① 所谓81人签名，只不过是壮壮声势，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人。郑超麟说：“我们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署名的八十一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虚构的）。”参见《郑超麟回忆录》，286页，东方出版社，1996。另据任建树《陈独秀大传》：1988年9月25日，任建树在访问郑超麟时，郑说：“81人的名单是我同老先生（指陈独秀）两个人，在老先生家里拟的，事实上签名的只有三分之二是真的，其他三分之一是造的，假的，为着表示我们的人多。所谓假有两种情况，一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名字是造的，例如第一名王阿荣。中国的习惯，注意第一名，责任大，弄个假名字，是陈独秀的意见。二是本人不知道，但被作为托派的发展对象，当本人知道被签名之后，也没有加入托派。”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4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舟
魂
PDG

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正是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而失败最惨的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

《意见书》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国际的错误指导之下。先是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继而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使党的组织残破不堪；六大之后，更是在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交错指导之下，使党不能前进一步。

在谈到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时，《意见书》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斯大林对内向农村富农和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妥协，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在中国问题上，则是向帝国主义及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是：“不敢彻底侵犯帝国主义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惟一的只在消灭(?)‘封建残余’，因而不要无产阶级太露头角，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不要退出国民党而真正独立起来，直接领导群众，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及其将军领头做革命；因为要让这些将军们领头，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吓跑资产阶级，抑制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谓‘革命军人’的财产；极力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提议，反对推倒国民党的领导，以免侵犯资产阶级专政。”

《意见书》宣布：他们是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他

们表示，将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下列目标奋斗到底：

一、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对派，释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等地的联共及其他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斯基同志的领导工作。

二、公布五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文件，公布列宁遗嘱及其他被斯大林派隐藏着的列宁遗著。

三、重新审查五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

四、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并立即公开的讨论根本政治问题。

五、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六、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意见书》的出台，表明以陈独秀为首托派分子高扬反对派的旗帜，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坚信自己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真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团体。正像郑超麟曾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

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伟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①

中国的托派分子认为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然而，事实却不是中国托派分子自认为的那样。如同其他国家的托派组织一样，中国的托派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拥护，它永远只能是一个难以发展的小组织；中国共产党也视其为“敌人”，而不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派别。

共产国际：给陈独秀一个申诉期限

中国共产党开除自己的原领袖陈独秀出党，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件大事，不可能不通报给共产国际。当中共中央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报告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后，瞿秋白于12月30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了汇报。政治委员会得知此情况后，于当天的会议上作出如下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把这个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并给予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②

^① 《郑超麟回忆录》，234页，东方出版社，1996。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0号记录》（1929年12月3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3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这个决定还没有向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又收到中共中央的一封来信。信中在申述开除陈独秀出党的理由时，这样写道：“中央不止一次试图教育他，但他丝毫不考虑中央的批评，并更变本加厉地从事派别活动，成立中共反对派执行局，不接受中央责令他停止派别活动的警告，并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他完全脱离了列宁主义，表明他走上了公开同党作斗争的道路。”“当远东局邀请陈独秀谈话时，陈公开反对中央和共产国际路线并没有丝毫掩饰地承认在搞派别组织活动，说这是‘迫不得已’。毫无疑问，这次谈话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表明，陈独秀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放弃了在共产党中的地位。甚至远东局的同志也说‘陈独秀再也无法挽救了’。这次谈话后，陈及其一伙的反党活动更加活跃了……陈及其一伙在群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公开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这清楚证明，他们已由党内反对派变成了阶级敌人。当然毫无疑问，陈独秀被立即开除出党。”^①

1930年1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来信，听取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报告，决定由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和瞿秋白组成委员会，起草给陈独秀的电报。

1月18日，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飞行表决”，批准了委员会起草的给陈独秀的电报。电报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其内容是：“共产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331、3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应不晚于两个月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通知您关于主席团这一决定的同时，建议您尽快通过中共中央给予答复，您是否打算参加审议关于开除您出党问题的会议。”“如您拒绝参加或两个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①

看来，在处理陈独秀的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态度还是慎重的。他们虽然同意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但仍给陈独秀申诉的权利，并且再次表示希望陈独秀能够去莫斯科。

2月8日，陈独秀收到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转交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给他本人的电报。中共中央在向陈独秀转交这封电报时，向陈独秀提出，希望他在一周内对共产国际的电报给予书面答复，以使中央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在一般人看来，去莫斯科为自己申辩，这或许是陈独秀挽救自己政治命运的一个好机会。然而，陈独秀却不这样认为。2月17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约3000字的回信。信中首先对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申诉感到不理解。他写道：“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地宣布我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你们在去年10月26日给他们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

^①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飞行表决结果作的第24号记录》（1930年1月1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册，31~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革命年代
PDG

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

陈独秀在信中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表示了严重的不满。他说：

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在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的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然而国际的领导机关却轻轻地把这个失败几乎简单地归过我个人。如果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关于我个人当然用不着说什么；但若以个人的责任问题掩盖了全部政治问题，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实不可恕！

陈独秀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妥协退让，以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央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批评共产国际“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候，教中国党胡乱地拼命”，结果不但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而且现在正使党失去群众的基础。

陈独秀在信中提出，托洛茨基指出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正在一步步由事实证明了出来，“可是你们却把托洛

斯基放逐到苏联以外，把他交到阶级的敌人之手中，即土耳其的蒋介石之手中，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他质问：“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去，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道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陈独秀这样说，是不是担心他到莫斯科也会遭到与苏联托派同样的下场呢？他的真实思想就不得而知了。

陈独秀认为，他的问题，决不简单的是个人问题，而是事关全局的政治问题，是对中国革命整个指导思想的认识问题。他在信中发议论说：

政治问题，尤其是涉及世界革命命运的问题，应该从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托洛斯基同志关于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许多文件，你们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驻中国的国际代表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只凭他们片面造谣；同志中有提出疑问的，立即被指为“暗藏的陈独秀派”，开除出党——这样便算解决问题吗？你们如果有诚意解决问题，你们备有一切权力与方法，否则一切问题就只有凭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一道去解决。^①

就这样，陈独秀断然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挽救，决心走上不归路！

^① 《答国际的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159～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根据陈独秀的表现和他2月17日给共产国际的信，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共产国际应尽快发表批判他的正式声明。”^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对此也表示赞同。

3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上，东方书记处请求批准将陈独秀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在报刊上予以公布。经过讨论，政治委员会的决定是：“在不削弱对陈独秀的思想斗争的同时，必须遵守给陈独秀的考验期限。”^②

这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此时还是希望能够争取陈独秀回心转意。

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这一态度，可能源于联共（布）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处理。联共（布）在处理托派问题时，并没有一下子将他们开除出党，而是在着重于同他们进行思想和理论斗争的同时，对其采取适当的组织处理。如对于托派头子托洛茨基，先是撤销其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来才开除出党；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处理，也是分步进行的，而且当他们二人表示悔改后，又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共产国际认为，对陈独秀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应该给他改正错误和回到党内的机会。当然，这也只是猜测而已。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3月3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册，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册，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中共中央闹到共产国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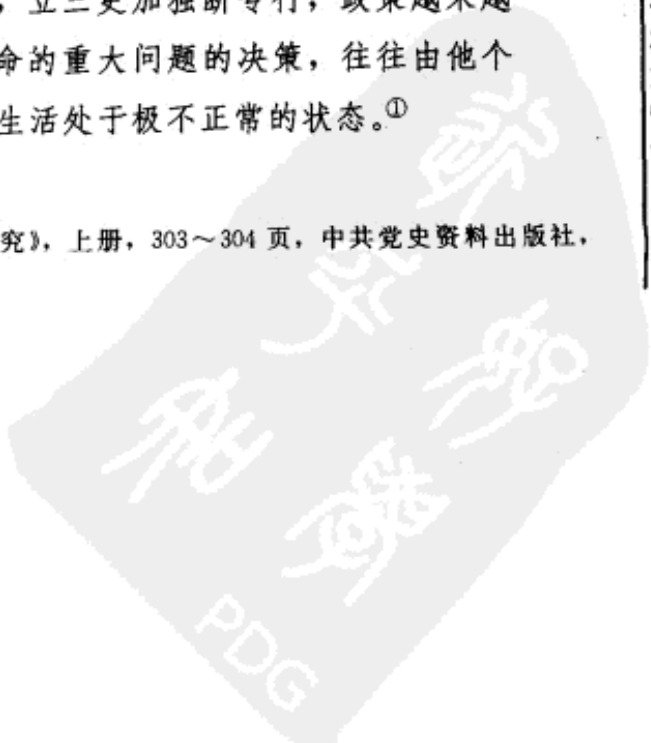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不理解共产国际希望给陈独秀留有余地的想法，结果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陈独秀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执。

1928年7月，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蔡和森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同年11月，蔡和森被撤销职务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取而代之，成为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鼓动部部长。这样，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李立三5人组成。

关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情况，李维汉有过这样的评价：

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工人出身，理论水平不高，缺乏独立见解，项英负责职工运动和长江局的工作，政治局的决策人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而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都有争论。(1930年)3月，恩来赴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①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303～30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远东局在1930年1月3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也谈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情况。信中写道：“政治局主要的政治领导人是李立三。我们已经几次写信跟你们谈了他的情况，他是一位很活跃、很热情、有首创精神的同志，但他同时有许多书呆子习气，多少有点搞烦琐哲学，没有搞群众工作和我们策略的实践。”^①

从1929年8月开始，对付陈独秀给中央的信件和处理陈独秀问题，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李立三作为宣传鼓动部部长，在与陈独秀的思想斗争和理论较量中，在对于陈独秀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中，自然承担了重要角色。而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陈独秀问题上向远东局的挑战，则成为他最终被撤销职务并受到严厉批判的原因之一。

实事求是地讲，在对陈独秀问题严重性的估计上，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认为应该坚决与之斗争。惟一不同的是，远东局不同意中共中央急于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做法。

其实，对于中共中央在处理同志组织问题上的做法，远东局早就有所不满。那是在对蔡和森问题的处理上。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远东局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遂向中共中央提出：今后凡是要把某个同志开除出党或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先向全党充分说明这个同志的错误，在党采取一切措施帮助这位同志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册，46～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改变错误立场而无效之后，才能进行组织处理。^①

当中共中央于1929年11月15日宣布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后，远东局为这一决定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批评了中共中央，说这件事做得太不谨慎。李立三等人不同意这样的批评，并解释这样做的绝对必要性。但远东局成员依然认为：“开除陈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事先做更长时间的工作就更好了。”他们还援引了联共（布）对托洛茨基采取的处理办法，认为不应该一下子就将陈独秀开除出党。中共中央领导人则争辩说：“陈独秀已经变成了阶级敌人，这就是他与当年的托洛茨基的区别所在。”^②

远东局虽然对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但鉴于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远东局还是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在1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远东局表示：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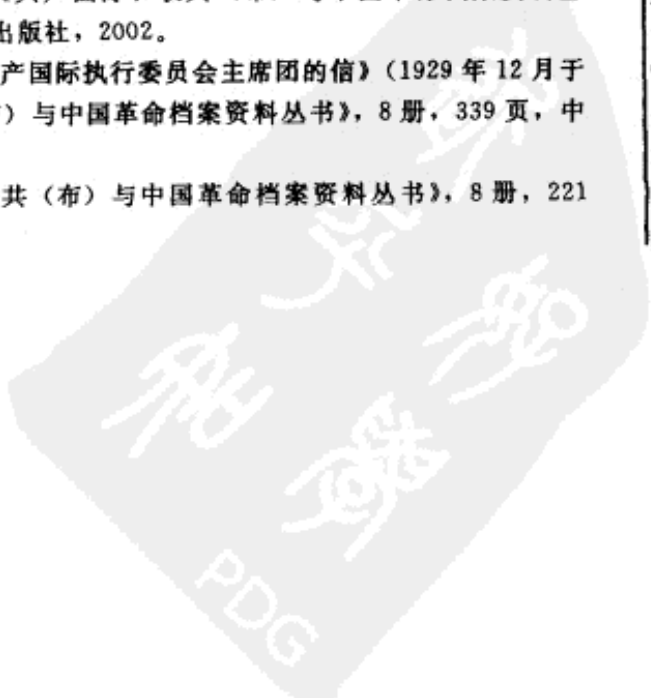
远东局希望暂缓开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是吻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陈独秀两个月的期限进行申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中共中央却认为，远东局在陈独秀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并借着对远东局一个决议的不同意见，将远东局推到“被告”席上。

1929年7月3日至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十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月3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册，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参见《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9年12月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3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③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次全会。会议的文件传到中国后，远东局于10月通过了一个《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在《决议》中，远东局针对中共党内的情况，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然后指出：“陈（独秀）和他的拥护者只有在承认和纠正他们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正确性并接受和执行党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决议》还表示：“远东局要同一切右的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也应该继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要这样做，并且要帮助党掌握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从党的队伍里清除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托洛茨基主义分子。”^①

很明显，这两段话的主旨是表示要同陈独秀等中国托派分子进行斗争，同时向他们提出警告，指出只有承认错误才能继续留在党内。

然而，当远东局将《决议》送给中共中央进行讨论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远东局的《决议》。参加会议的有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李维汉、温裕成、罗登贤。会议对远东局的决议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

具体到陈独秀问题上，不知为什么，李立三等人忽视了远东局的《决议》是在10月作出的，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则是在11月15日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认为远东局的《决议》表明：远东局对陈独秀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对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195、1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取消派抱有幻想。下面是与会者的发言摘录：

项英：这个决议总的精神确实不好。它主要强调了中央错误，但没有谴责中国取消派的错误。它只字未提取消派，并且幻想陈独秀将留在党内，放弃自己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并执行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决议在客观上会助长取消主义危险。

李立三：在讨论陈独秀问题时，远东局说，中共内右倾不会是严重的问题。我们指出了机会主义者和托派结盟问题的严重性。可是远东局根本不理解这种同盟的实质，它完全忽略了这种危险。决议涉及陈独秀的最后一节，证明远东局还是对他抱有幻想。陈独秀及其一伙不仅实行了取消主义路线，而且成立了叛徒集团。远东局的同志同陈独秀谈过一次话，结果很失望。但是现在远东局寄希望于陈独秀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这只是证明远东局一贯坚持“右倾”方针。决议中划分了机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远东局不明白，在中国，托派就是取消派，就是机会主义者。

周恩来：在远东局的决议中和在我们以前同他们所进行的辩论中，他们始终表露出了对中国问题的调和主义思想。……在远东局的决议中，没有一句话讲中央坚决反对右倾，而相反，决议抽出一些问题，加以夸大，并利用这种完全没有根据的材料来指出中央右的错误，同时抹杀最严重的右的倾向——中共内的取消主义。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的，

只会有助于取消派，是对取消派的调和态度。……远东局不把中央反对右倾的斗争作为前提，所以常常指出中央在一些问题上反映出了“右的”错误，而远东局自己只指出机会主义者，甚至期待陈独秀回到党内。

罗登贤：决议中涉及中国问题的部分，如果落入取消派手里，对中共没有一点儿好处，而会成为他们的很好材料。远东局不明白，陈独秀及其追随者不仅反对中央，而且也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不仅离开了党，而且还组织了另一个（党的）系统。忽视这个情况很不好。

温裕成：（远东局）始终对陈独秀没有坚定的立场。这证明，远东局是布哈林第二，是调和派。他们不仅不能帮助中共反对取消派，而且相反，充当调和派。决议证明，远东局对托派机会主义者的概念模糊不清，不了解这些取消派的本质。

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李立三提议：为了解决争论问题，需要：（1）立即同远东局举行会议；（2）起草决议，不管远东局是否接受我们指出的问题；（3）如果不接受，就立即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电报；（4）中央要立即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总报告。会议通过了李立三的提议，决定责成他起草决议。^①

会后的当天晚上，向忠发即去找远东局成员会谈，请远

^① 有关这次会议情况，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42～2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东局与中共中央举行联席会议，共同讨论远东局的《决议》。

12月10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召开。由于远东局成员事先已经看了中共中央12月6日会议的发言记录翻译稿，所以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在会议开始后首先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逐个驳斥了李立三等人在6日会议上对远东局的批评，尤其是对项英的发言极为不满。他认为项英在发言中说远东局没有搞清楚中国问题，是对远东局采取了藐视的态度，带有“反共产国际”的性质。他语气强硬地说：

说共产国际代表团未能搞清楚中国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共产国际怎么能派一个不了解中国问题的代表团呢？如果共产国际能派这样一个不了解中国问题的代表团，那就意味着共产国际本身不了解中国问题。项英同志真的认为共产国际同中国党对着干，能派代表团同中国党对着干吗？这是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他已经是第二次作这样的声明了。如果这只是项英同志个人的意见，我们可以不特别去计较，但是继项英之后，政治局书记向忠发同志、政治工作领导人李立三同志、党的三个负责同志之一周恩来同志都发了言。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项英同志。向忠发同志作为会议主席没有要求他遵守秩序。也许，项表达了你们所有人的意见，你们同意他的意见。你们是否都认为我们同中国党对着干？我们认为，你们所有人都要为项的发言负责，而不是他一个人负责。考虑到项的发言带有反共产国际的性质，我不答复这样的发言。

在谈到陈独秀问题时，雷利斯基声明：远东局并没有支持中国党内的右派。远东局对陈独秀的政策，只是遵循共产国际的方针。而在开除陈独秀出党这一点上，远东局是支持中共中央的。现在中共中央竟然拿远东局10月的《决议》做文章，认为远东局幻想陈独秀能在12月份，即中央已经将他开除出党之后，回到党内和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显然是颠倒了时间顺序。

说到这里，雷利斯基再次祭起了共产国际的大旗，他表示：“你们在陈独秀问题上的说法是在反对共产国际，而不是在反对我们。”^①

12月13日，双方又一次举行了联席会议。雷利斯基在会上再次向李立三等人发起进攻。他说，李立三指责远东局在决议中把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区别开来，而不懂得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与机会主义是一回事。而他的意见是：如果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归为一类，那么就会犯两个错误，即在思想上的错误和策略上的错误。他认为，对于这两类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利用一些论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另一些论据反对机会主义分子。

雷利斯基的讲话结束后，李立三进行了长时间的辩驳。关于远东局在《决议》中对陈独秀问题的表述，李立三仍然认为：《决议》是试图减轻陈独秀的错误，因为《决议》只提到陈独秀在对待中东路问题上的错误，而没有提出陈独秀其他严重的错误，如：反对同国民党联合，反对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主张取消“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

^① 有关这次会议情况，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49—2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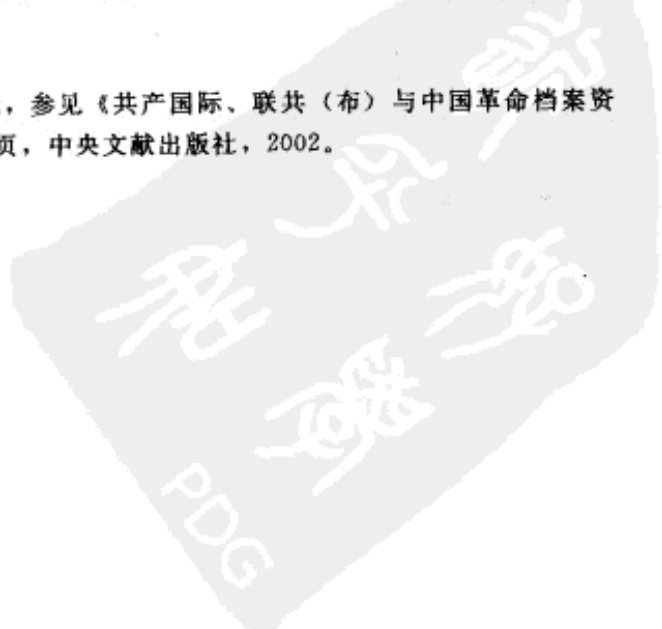
的口号等。

李立三进而指出，陈独秀因搞取消主义已被开除出党，他成立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党。远东局知道这个情况，但在决议中仍表示陈独秀在纠正自己的错误后可以留在党内。他指责说：“这显然意味着你们还相信陈独秀，并认为陈独秀还有可能回到党内。我们知道，现在陈独秀不仅是党的叛徒，而且是我们阶级的敌人。因此决议在这方面的精神，不是引导党去同取消派作坚决的斗争，而是支持对陈独秀的信任。难道这不是调和主义？”^①

会后，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信函形式，向远东局系统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远东局《决议》的意见。信中再次批评远东局在陈独秀问题上的处理是错误的，因为远东局对开除“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了摇摆的立场，是调和主义。信中要求远东局修改决议中关于中国的部分。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举行第三次联席会议。远东局方面由埃斯勒出面，他以教训的口吻指出了中共中央的错误，尤其对李立三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远东局的《决议》完全符合事实，不能去掉一个字。他说：“这次辩论表明什么呢？第一，你们不想承认在我们所指出的三个问题上的错误。这说明你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些政治问题的意义。第二，为了维护自己的错误立场和错误，你们开始阐述‘打倒任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同志们，我们非常严肃地劝你们停止这种做法。对这些问题要采取政治的态度，不要讨价还价。毫无疑问，你们已开始进行讨价还

^① 有关这次会议情况，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59～2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价，而不是进行认真的自我剖析。”

雷利斯基在会上总结了双方三次联席会议的情况，认为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分歧。他提出解决的办法是：由远东局向共产国际寄去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中国同志也可以寄去他们认为需要寄去的文件，由共产国际来做出裁决。他还强调：在共产国际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远东局的决议和决定对中共中央仍然有约束力。

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远东局成员在几次会议上的发言并没有对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做出答复。他解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对远东局提出不同意见，是为了纠正远东局的错误做法，并不等于中国党反对远东局。他特别指出，在陈独秀问题上，政治局不同意远东局的意见，原因是：“你们只指出了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口号。你们没有指出陈独秀反对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重要的东西，没有指出他和他的信徒组成了几个小派别和破坏我们的组织系统的情况。你们没有提及整个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而相反，应该反对你们的意见。”

向忠发表示，同意雷利斯基的建议，将双方的争论交共产国际解决。在发言的最后，向忠发还表现了不向远东局妥协，或者说藐视远东局权威的意思。他说：“以后，如果中国党犯错误，远东局可以给以纠正，同样，如果远东局犯错误，我们也要与之作斗争。”^①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特别会议，再次对与远东局争论的有关问题统一思想。向忠发在发言中明确表

^① 有关这次会议情况，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294～3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示：远东局从工作一开始，就有右的倾向，在陈独秀问题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其他与会者在发言中，也批评远东局犯有“调和主义错误”。项英担心地说：“他们极力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愿承认自己的调和主义错误，其结果无疑会妨碍整个工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肯定对我们工作的前景会产生影响。”

会上，向忠发提议，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与远东局的争论，同时为了解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问题，并就如何发展中国革命问题请示共产国际，政治局需要派一名有才干的同志去莫斯科。他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①

会后，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去电报，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决议的态度。电报全文如下：

政治局同意远东局在远东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虽然本应对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赋予更大的意义。政治局不同意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因为它故意不谈中央反对右派的斗争，夸大中央在失去了现实意义的广西问题上的错误，缩小陈独秀分子的错误并在同他们的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显然，这种立场是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将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详尽的报告并请求重新讨论这个决议。^②

^① 有关这次会议情况，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310～3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3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革命年代
PDG

不久，共产国际即收到了中共中央的详尽报告。在这个由李立三起草的报告中，系统汇报了一年来中共中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尤其是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进行斗争的情况。报告特别强调，中央的路线就是反右倾路线，并且表明：由于中央采取了坚定的反对右倾的路线，所以才能相应地战胜取消主义危险，战胜党内的整个无原则斗争，战胜党内的各种摇摆、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并使党摆脱意见分歧状态，使之能够更加巩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这个报告在谈到远东局的工作时，指责远东局“经常暴露出许多右的错误观念”，远东局的《决议》中关于中国部分的内容其基本精神“完全是调和主义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抹杀中央反右倾的总方针；夸大中央的右倾错误；缩小取消派的错误；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动摇。这个报告一一列举了这四个方面的错误，其中关于第三和第四点，是这样写的：

第三，批评取消派（陈独秀及其一伙）错误时，决议只指出了中东路问题和他们反对中央关于支援苏联的口号的错误，但对他们的整个取消主义路线（认为统治阶级趋于稳定，革命在消退，党必须开展争取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甚至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六大和中央的路线）都没有提及。由此可见，远东局有意缩小取消派的错误，它对这些问题还有怀疑，未敢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从任何方面看，（这个决议）到处都是错误，到处都是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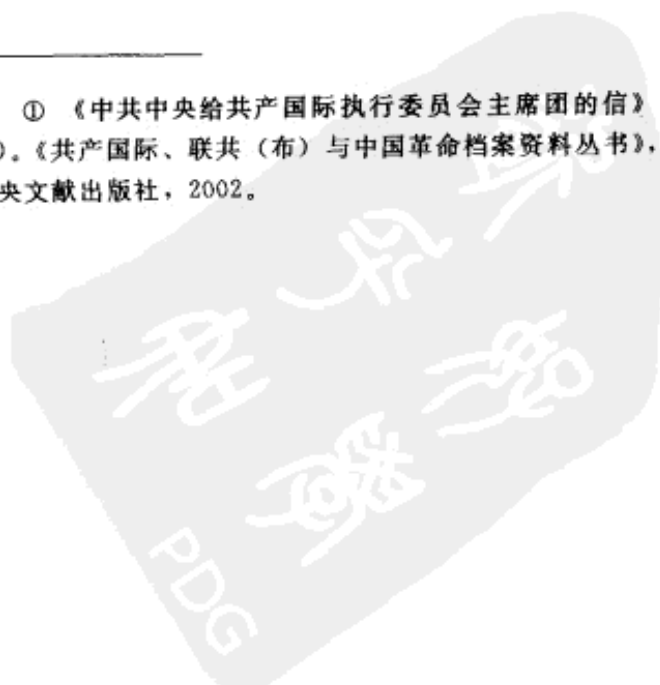
无疑义的调和主义观点。

第四，陈独秀及其一伙早就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六大，反对中央，并成立了新党的实际组织——执行局，所以中央坚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在这个问题得到了全党的一致拥护。然而远东局在其决议中却说：“如果陈独秀及其一伙想保留他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的党员名称，他们应该悔过和纠正错误……”这不仅暴露出对陈独秀及其一伙抱有幻想，而且在客观上是宣布不同意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在目前反对取消派的严重时期，只字不提中国党应该如何坚决地同取消派作斗争，同时作出了这样的动摇的决议，这很明显意味着对中央同取消派的斗争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①

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的矛盾提交给共产国际后，1930年1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专门进行了讨论，但一直未能拿出好的解决办法。双方的矛盾直到共产国际召李立三到莫斯科，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后，才无形消散。

至于陈独秀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直到1930年3月仍然希望争取陈独秀去莫斯科，说明它并不完全支持中共中央的意见。

^①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9年12月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册，342～3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批判陈独秀： 从“机会主义”到“投降主义”

莫斯科批判“陈独秀主义”

1930年1月，在共产国际刚刚决定给陈独秀两个月期限来莫斯科申诉后，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就于1月25日召开会议，开展了对陈独秀的批判。

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批判的靶子，是斯大林与托派斗争的需要。此时，斯大林派虽然从组织上将托派打得落花流水，并且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但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肃清托派的影响。不仅如此，托洛茨基的理论竟然在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内开始传播，这当然使斯大林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虽然已经靠边站了，但他在党内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不仅在中国公然成立托派组织，而且还向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发起了挑战。这对莫斯科方面来说是绝对不容许的。于是，在“托洛茨基主义”一词频繁出



现于联共（布）政治生活之中的同时，一个比“机会主义”含义更明确、更广泛的词便被制造了出来，这就是“陈独秀主义”。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的批判陈独秀会议，命名为“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专门探讨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思想及其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这可以说是直接的具体的追究陈独秀个人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肇端。

这次讨论会虽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的名义召开，但从发言记录来看，出席会议的人员并非都是专家学者，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领导人、大革命时期的莫斯科驻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中国留苏学生等。

显然，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组织和安排的讨论会。会议既要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又要追究驻华代表的责任；既要考验瞿秋白、张国焘等犯过错误的人，又要警示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讨论会以王稼祥^①的报告开始。留苏学生王稼祥，在会议上担当了重要角色。虽然从业已公布的会议记录中反映不出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具体分工，但会议以他的报告始，以他的总结终，可见他的角色非同一般。

王稼祥在报告中指出，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错误的认识，因此他对国民党的认识也存在偏差。他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是为了谋自由，农民有可能参加革命，也有可

^① 化名科穆纳尔。

能不参加革命。革命领导权将由资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胜利后的政权将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它同时保卫几个阶级的利益。”王稼祥指出，这种认识无疑是孟什维克的观点。

至于“陈独秀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关系，王稼祥说：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一种是极左思潮，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如对中国革命性质、土地问题、国共合作问题等，双方的观点并无实质区别。王稼祥最后的结论是：

陈独秀是一位资产阶级教授，热衷于欧洲文化，难怪他向诸如实用主义思想家美国哲学教授杜威、英国社会党人罗素学习。……陈独秀来自知识界，总以为他们只要以民主主义方法就能解决种种问题，并且能达到共产主义。他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孟什维克。陈独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产生了严重后果，1925—1927年革命中我们之所以犯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陈独秀的理论造成的。

现在，陈独秀提出取消主义纲领，这不足为奇。陈独秀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孟什维克。他始终是这样的人。他来自知识界，所想的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会把诸如陈独秀这样的同路人清除出党。

继王稼祥发言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在中国工作过的维经斯基、鲍罗廷，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萨法罗夫，留苏学生沈泽民等，都发了言。

留苏学生沈泽民^①的发言是很有针对性的。他在对“陈独秀主义”进行了批判之后，又将矛头对准瞿秋白、张国焘等人，他说：“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可是，业已高涨的中国革命要求每个党员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有通过对自己以往的机会主义错误作无情的自我批评，才能持久地保持下去。这对于在此发言的中共负责同志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同志曾是中共的负责人，目前也还是负责人。”

沈泽民还着重批评了鲍罗廷的发言，认为鲍罗廷的发言是“奇谈怪论”，并有针对性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继他之后，一些人也将发言的矛头对准了鲍罗廷。当然，这只是会议的插曲。

在会上，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张国焘和瞿秋白批判陈独秀的发言。

张国焘：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六大后，张国焘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曾经长时间追随过陈独秀的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希望与陈独秀另组政党的人，经过在莫斯科一年多的学习和锻炼，尤其是耳濡目染

^① 化名吉德科夫。

了联共（布）党内激烈的斗争之后，已经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在对陈独秀以及“陈独秀主义”的批判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斗争的第一线。

1月25日，出席学术讨论会的张国焘^①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

张国焘在发言的一开始即表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反对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无疑是一位声名显赫、激进的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陈独秀作为自由资产者参加反帝运动，显然是不彻底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帝斗士。

至于成为共产党人之后的陈独秀，张国焘作出如下评价：

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他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就反帝运动而言，是一位举世闻名的革命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思想严重不纯，夹杂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

张国焘指出，陈独秀在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认识上有重大缺陷。在讲到陈独秀对统一战线的错误认识时，他举例说：“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初试叛变，陈独秀未能与之斗争。在武汉时期，他一味指责工农运动过火。1927

^① 化名张彪。



年，当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时，他坚决反对。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话值得大家深思。他对这位同志说，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

其实，张国焘应该清楚，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主张对蒋介石让步的并不是陈独秀，而是当时在广州全权处理此事件的布勃诺夫。陈独秀在武汉时期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一开始还是积极支持的，只是到了国共关系即将破裂时，陈独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为维护统一战线，才不得不限制工农运动。不过，这些情况即使张国焘是清楚的，在批判“陈独秀主义”的氛围内，他也不会为陈独秀辩解。

张国焘在发言中不同意将陈独秀定为“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另外创造了一种提法。他说：“陈独秀是殖民地国家的孟什维克的典型代表人物，其观点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他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左翼，而这个左翼是托洛茨基主义借以建立的基础。他完全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惯用左的漂亮言词。”

张国焘的发言是不是违心的？陈独秀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看一看20多年后张国焘在香港撰写的回忆录，这些问题就清楚了。张国焘在回忆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时，对陈独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

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而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不是一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①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为什么张国焘对陈独秀的评价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张国焘本人才能解释清楚。

在莫斯科批判“陈独秀主义”的声浪尚未消退之时，1930年冬，对李立三“左”倾冒险和反共产国际错误的批判又在莫斯科掀起。此时，已经厌倦了莫斯科的生活，希望尽快回国的张国焘，在同别人的谈话中得知，共产国际愿意让他回国，但并不了解他现在是否拥护国际路线，回国之后会不会像陈独秀、李立三那样反对国际。这个消息使他迅速行动起来。在批判李立三的大会上，张国焘“诚恳地”承认了自己所犯的全部错误。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1册，92～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不仅如此，1930年12月4日，张国焘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递交了自己的声明，承认自己犯了六条错误，第一条就是同陈独秀一样的“机会主义”错误。他写道：

在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时期，由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政治是陈独秀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孟什维克主义的翻版。陈独秀主义的性质可以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弄清楚。所有当时参加领导机构工作和没有进行系统的反对陈独秀主义的根本斗争的同志，在客观上都是陈独秀主义的组织成分。虽然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曾不断地进行过反对明显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因此我和这些同志后来较容易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和转到共产国际路线方面来，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抹掉这些同志，特别是我在这个时期所犯的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8月7日的会议^①对于中国党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党被从机会主义泥坑中挽救出来，走上了革命的康庄大道。同时，这次会议对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和陈独秀机会主义分道扬镳了。在这个转折的时刻，我的错误在于未能彻底摆脱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残余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又显露出来了。

^① 指1927年的八七会议。



张国焘在声明的最后表示：“只有在共产党内开展两条战线的不调和斗争，才能彻底战胜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集团，也才能消除对他们的调和主义态度。”^①

声明交上去之后不久，张国焘就被批准回国。许多年后，对于自己的这份声明，张国焘有如下表白：“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我曾遇见一些人，公开热烈拥护斯大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这也许是独裁政治必然滋生出来的毛病。”^②

瞿秋白：陈独秀始终是孟什维克

作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之一，瞿秋白对于“陈独秀主义”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1月29日，瞿秋白在讨论会上作了长时间的发言。他指出了1月25日王稼祥报告的不足，并且全面阐述了自己对“陈独秀主义”的看法。

从在中共党内的资格来看，从对陈独秀了解的程度来看，瞿秋白完全有理由指出王稼祥报告的缺陷。因为，从1923年起，瞿秋白就开始同陈独秀打交道，他同陈独秀一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也同陈独秀一起品尝了蒋介石反共、汪精卫分共和大革命失败的苦果。由于同鲍罗廷的特殊关系，他可能还是中共党内第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册，521～522、523～5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449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一个得知莫斯科方面将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的人。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在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时曾有所提及。他说：

（1927年）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①，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廷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地区回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兹^②，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鲍罗廷告诉他，罗明那兹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廷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

① 瞿秋白是同鲍罗廷一同上庐山的。时间大约是1927年7月13日。

② 又译罗米纳兹。



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①

张国焘的回忆是否完全属实，暂且不论。但说瞿秋白确实是中共党内最早知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将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的人，可能还有几分道理。

实事求是地讲，瞿秋白在罗米纳兹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之后，对陈独秀还是尊重的。在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所作的决议中，都承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没有点出陈独秀的名字。这说明，当时瞿秋白等人在追究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这个问题上还是慎重的。

然而，在经历了中山大学派系斗争的风风雨雨，因未支持米夫、王明一派而受到共产国际批评之后，在批判“陈独秀主义”已经成为斯大林派打击托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时，置身于莫斯科的瞿秋白在对陈独秀错误的认识上，就不能不发生变化。而一旦他投入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必然会有更深刻的理论分析。

其实，早在大革命失败前，瞿秋白就写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并于中共五大会议期间在与会代表中散发。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就是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错误。瞿秋白的小册子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重视，会议对陈独秀等人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陈独秀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改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2册，273～27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新平船學
PDG

变党的领导机构和思想路线，但瞿秋白毕竟抓住了党的领导机关错误的要害。

这次在批判“陈独秀主义”的讨论会上，瞿秋白更加系统地分析了陈独秀犯错误的根源，指出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错误的，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以亲身经历回顾了“陈独秀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认为“陈独秀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整个世界观业已发展到背叛、反革命的地步，发展到直接激烈对抗、敌视党和共产国际的地步”。

与其他发言者不同的是，瞿秋白特别指出：陈独秀在位时，对党的领导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然而当陈独秀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时，就强调民主而反对集中。瞿秋白说：

他（指陈独秀）就是党！因此，我们把这称之为家长作风。到1927年年中为止，全体党员一直把陈独秀的言论和文章奉为圣经，谁也没有表示任何怀疑。“他怎么说的，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办。”但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遵照他所写的那样去做的。……凡是派往各地的人，他认为，都具有领导当地革命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搞革命。

但是，请不要认为他是一个彻底拥护中央集权制即集中的人。当他发现他的权力和威望开始下降时，便转到另一方面，转到所有反对者颇感兴趣的民主这方面。他高谈所谓民主并主张，既要实行民主，就得让每个党员、每个共青团员都按自己的观念行事。这时，党的任何纪律对他来说早已不复存

平
和
PDG

在，因为他认为“纪律影响党的发展”。……

这种家长制式的组织纪律以及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都是陈独秀主义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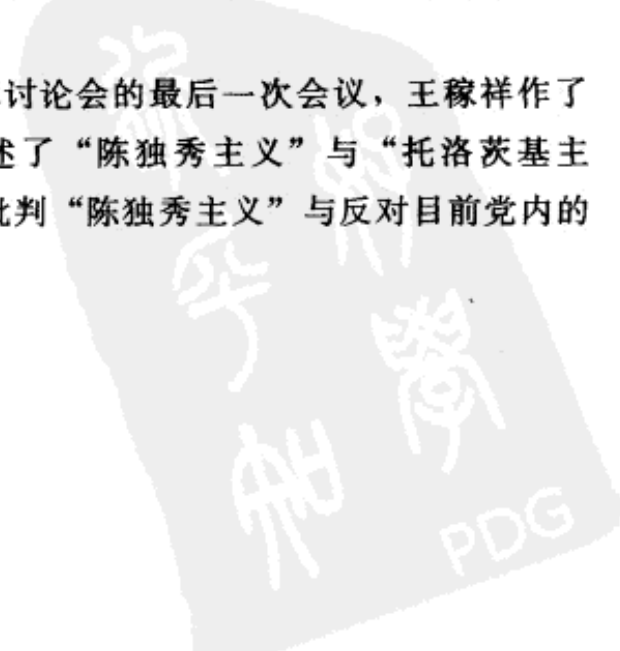
很显然，瞿秋白对陈独秀拒绝到莫斯科，写信批评中央的有关政策，并要求中央公开发表自己的信，以及最后发展到投入托派组织等一系列言行，是非常不满的。

在发言中，瞿秋白明确表示：“陈独秀是我党的创始人，然而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孟什维克。”既然陈独秀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那么他怎么会成为一个孟什维克呢？为了解释这自相矛盾的现象，瞿秋白说：党虽然是在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起初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小组。这就是说，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时，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孟什维克”。

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并不赞成将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完全推到陈独秀个人身上。他在发言的最后强调指出：“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然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以便更有效地、更好地清除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障碍。”

在莫斯科当时的气氛中，瞿秋白能提出这样的看法，还是难能可贵的！

2月6日，是学术讨论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王稼祥作了总结发言。他重点阐述了“陈独秀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要求将批判“陈独秀主义”与反对目前党内的



“右倾”结合起来。他提出，对陈独秀和“陈独秀主义”总体评价应该是：“陈独秀虽然由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者即资本主义捍卫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他加入中共之初起，实际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①

中共党内的批陈之风

在莫斯科组织有关人士批判“陈独秀主义”的同时，中共党内也开展了对陈独秀的批判。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一书。李立三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提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是“机会主义”者，在大革命失败后则是“取消主义”者。他还分析了“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联系。他指出：“实际上托洛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根本思想的错误是一样的，所以无论在主张上、在组织上，他们都可以联合起来，这是毫不足怪的。……从机会主义到托洛斯基主义，并没有什么根本思想的改变。尤其到现在，已经共同的走到取消主义的时候，更是丝毫的分别都没有的。”^②

2月，李立三在向党内作《党史报告》时，比较系统地

^① 有关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情况，见《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② 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共党史报告选编》，3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PDG

回顾了从党成立到1927年12月广州起义这段历史，指出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机会主义”则是产生取消派和右倾的摇篮。他说：“独秀之取消派是有历史的根源，其根本思想是不认识无产阶级力量之伟大，只看见资产阶级之力量。机会主义者眼光中看不见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自加入国民党后是严重问题，但在广东时期尚未成严重问题。在武汉时期，是机会主义统治的时期。八七会议对机会主义有严重的批评。八七会议以后，许多党内斗争表现机会主义之复活，不但是取消派，在党内仍是有右倾的危险。……不但现在，即在将来对机会主义斗争是很严重的，一天不能停止对机会主义之斗争。”^①

2月19日，李立三化名“伯山”，在《红旗》第77期发表《自由运动与革命运动》一文，对陈独秀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取消派陈独秀们，与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之们，他们也提倡所谓人权运动，也以争自由的旗帜来号召。可是他们的政治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他们根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国民会议。他们并不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而只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妨害他们议会政治的实现；他们并不是要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充分表现他们的思想只是现在统治阶级的一派（陈独秀回复与胡适之合作，决不是胡适之的进步而只是陈独秀回复到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了）。”

在李立三的带动下，一时间，中共中央出版的所有报章上，批判陈独秀的文章和社论比比皆是。“机会主义”、“取

^①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276～27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消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名词，成为党的报章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词汇。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批判，成为1930年到1931年间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随着联共（布）内斗争的不断发展，“陈独秀主义”的含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1931年9月，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将“陈独秀主义”的含义进行了充分扩展。他写道：

陈独秀主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廷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什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蔡和森认为，“陈独秀主义”有着三个不可分离的机会主义同盟，它们是：彭述之主义、鲍罗廷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他指出：“彭述之主义早已丧失其独立的影响，因为一方面他早已融化于陈独秀主义，另一方面鲍罗廷主义又摄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现在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实成为陈独秀主义左右之手。假若陈独秀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共同点在忽视土地革命，忽视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及不了解工农民主专政；那么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廷主义的共同点就在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领导，轻视中国革命之内部的阶级力量，

及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解为隶属于资产阶级——自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的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与陈独秀主义的坚决斗争，同时就要求打击他的左右手——托洛斯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

陈独秀攻击红军

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和“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对陈独秀的思想并没有太大的触动。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于1930年3月1日同拥护他的一帮托派分子创办了《无产者》，作为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

不可否认，以笔作刀枪，是陈独秀的拿手好戏。当年，陈独秀正是以《新青年》杂志作为阵地，唤起了一代青年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今，他要以《无产者》为喉舌，宣传托派观点，与他亲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展开论战。

真是时过境迁，人事皆非呵！

陈独秀和托派的积极活动，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伤脑筋，以致当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中央在国内再选拔50名学生到莫斯科国际学校学习时，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派人去莫斯科学习，其理由之一就是：从莫斯科归国的许多人因为受拉狄克影响而成了取消派和托派。

当远东局得知中共中央这一决定后，于1930年3月27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去信，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远东局认为，许多归国学生成了取消派和托派，当然很糟糕。但这并非全是受苏联托派的影响。这个问题是同中国工人阶级缺乏

经验和传统分不开的，也同归国学生的社会出身分不开。远东局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处心积虑构筑的政策理论，它背离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不仅使中国学生，而且使一些建党更早的政党的领导人发生了动摇。即使拉狄克可能是对某些归国学生产生过影响的人之一，你们还应该记住，中国的主观因素对不够坚定的人有着很大影响，这一点或许在某些逃兵身上甚至陈独秀身上也表现出来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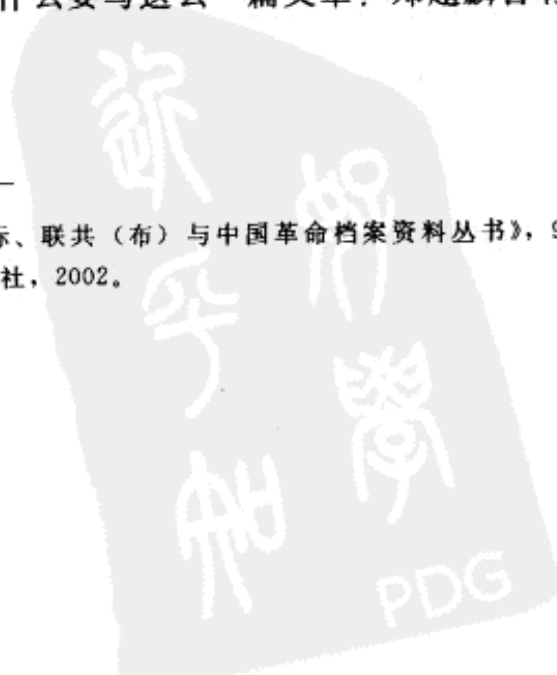
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多变的时代，令人眼花缭乱。对形势的发展做出错误估计、对新生事物缺乏了解的，大有人在。

从1927年7月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到1930年初，陈独秀虽然长期间生活在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并且密切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但他毕竟没有亲自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他转为托派之后，其政治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更多了一些情绪化的因素。所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农村和山区创建并逐渐发展时，以陈独秀原有的思想基础和现有的观察能力，已经很难理解和接受。

于是，一篇令所有人反对而只有蒋介石之流称快的文章，被陈独秀炮制出来，刊登在1930年7月1日的《无产者》第2期上。这就是《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陈独秀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文章？郑超麟曾有过这样的解释：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册，85～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红军”不是中央或国际有意造成的。初起时，中央对于“红军”不感兴趣，因为认为没有前途。在李立三时代，共产党还没有决心完全放弃大城市工作。可是，那小小的军事核心居然能够发展起来，朱毛居然继叶贺为人所称道；他方面共产党在大城市也渐渐不能存身了，即使在城市工人中做工作，那也只是运动工人准备响应“红军”的，如同当初响应北伐军一般。我们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候，全党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下。我们和其他的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得政权，要国民会议做什么用呢？……

我们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会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①

这或许就是陈独秀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陈独秀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放弃城市，而到落后的农村和山区去靠纠合“土匪”、“游民”等来发展力量。陈独秀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决定；

红军是工人取得政权后的军事组织；

^① 《郑超麟回忆录》，230页，东方出版社，1996。

农民虽然在农业国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们从来不能有独立作用及独立的成功。

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人都还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之下被压迫着动不得，我们的党不把力量集中在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的在离开政治中心的乡村中，纠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业农民，冒称红军。想用这样的红军来“产生”革命，而忘记了真正的红军乃是革命产生的。

陈独秀机械地理解“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概念，他想象不出在城市工人阶级斗争已经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在偏僻乡村的红军怎么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他在文章中写道：“城市中既然还没有群众的组织，党的组织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未能团结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在党的周围，在这样状况之下，怎样会有工人革命高潮来领导农村暴动？怎样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有共产党的领导吗？离了工人群众的组织，共产党还有什么？”

陈独秀还对共产党员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大为怀疑，认为“这不仅如几粒盐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变成咸味，并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也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流寇化了”。

陈独秀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人称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叛徒”；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称为“土匪”、“流寇”。他断言：“游民无产阶级（土匪和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能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陈独秀预言：“没有城市工人革命领导的所谓‘红军’，其前途不过是：（一）统治阶级的内部战争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打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讧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在文章中，陈独秀仍不忘攻击斯大林派。他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是按照斯大林派的旨意行事。将来“红军”运动失败了，斯大林派的共产国际又要归罪于中国党，说未能遵守国际的训令。他写道：“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的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陈独秀这篇攻击红军的文章，发表于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生死搏斗的情况下，无疑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据说，蒋介石见到这篇文章后，如获至宝，将其大量印刷，在江西等与红军作战的地区四处散发。

陈独秀的文章在中共中央批判“陈独秀主义”的热潮之时发表，更加激起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极大的愤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等，连续发表文章，对陈独秀的观点进行了严厉驳斥和反击，指出他的文章“没有一句话不是

反革命的”，陈独秀在文章里“尽量的表现出他对待中国革命的凶恶和丑态”。“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现在又干起了“帮统治阶级宣传的无耻的勾当”，起着“反革命的工贼作用”，自然应该遭到全党共诛之。

陈独秀文章中的错误观点是很明显的，就连一些对立三中央不满的人，也对陈独秀写出这样的文章表示了不理解，认为他“老糊涂”。而与陈独秀有着相同托派观点的一些人，则写信给托洛茨基告陈独秀的状，说“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在攻击红军。

在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最初与陈独秀有着相同看法，支持陈独秀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怀疑起来了。尹宽甚至公然表示，陈独秀的文章“措词不好”。

从“机会主义”到“投降主义”

30年代前期，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对于陈独秀的批判，集中使用了“机会主义”、“取消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托陈取消派”这些概念。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还是后来的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一方面批评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提出“丝毫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认为“一九二七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

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联系，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非常重视吸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经验教训。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曾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要大家引以为戒。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时，一些共产党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以致出现了一些右的倾向，如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作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对其反共阴谋丧失警惕，结果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有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这个概念。他指出：“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尽管毛泽东此时已经使用了“投降主义”的字眼，但他在后来的讲话和文章中，还是将“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混用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说：“在六届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

11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的过程中，讲到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问题时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认为“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从1937年至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前，除毛泽东之外，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多采用“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1937年12月，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稿《大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在此稿中，张闻天使用的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说法。他指出：“当时中共领导机关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错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当追随资产者的尾巴，丧失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当资产者表现其变节的动摇的时候，陈独秀机会主义不能拿定立场去防备它这种变节，不能把工农利益的发展与国

民革命的发展结合起来，不能发展革命力量来保卫革命的力量；反之，却事事迁就资产者变节的企图，分裂国民革命与发展工农利益的关联，而在革命最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却解除自己的武装，表现完全没有办法，临阵脱逃。”

周恩来在谈到陈独秀的错误时，则使用“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如1943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时提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三个事件上向国民党右派作出了大让步。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在闭幕的当天，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谈到大革命的历史时指出：“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

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尽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词仍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和学术著述中出现，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提法，开始广泛被人们使用，并一直延续下来。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沿袭了六届七中全会的提法，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大革命时期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研究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开始重新审视和研究大革命的历史，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其中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经过 20 余年的不懈努力，大多数研究者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身上，或者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大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下进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它们决定后在中国实施的。有研究者专门作过一个统计：从 1923 年至 1927 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 122 次会议，作出了 738 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时注意什么问题，等等），都有所涉及。研究者通过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三大事件的深入探讨，认为将这三次事件说成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大让步，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将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是不公正的。研究者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犯的 error，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犯的 error。这些 error 不具备“投降”的性质，陈独秀本人也没有投降国民党右派的动机。

2001 年和 2002 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和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相继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两部著作吸收了上述意见，在提到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再使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爱国者被诬为汉奸： 莫斯科“反托”之冲击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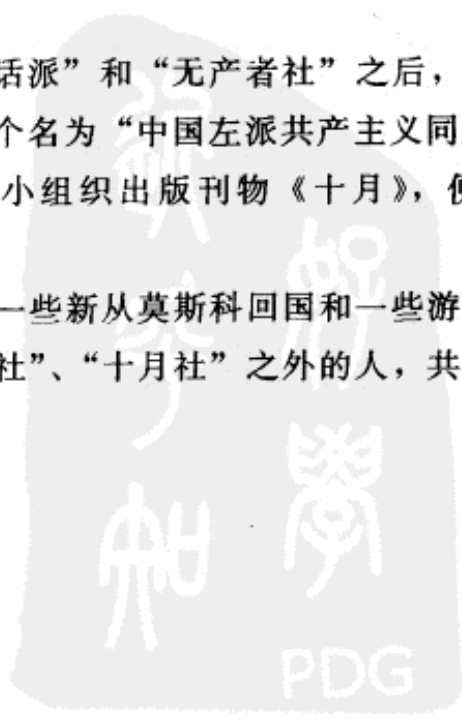
陈独秀：我何罪之有！

陈独秀自从转向托派后，一直都在为托派组织内的重重纠纷、互相攻讦而苦恼。

“陈独秀派”在与“我们的话派”联合失败后，便自行拉起一个托派小组织，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且办起了自己的刊物《无产者》。这样，他们这一派又被称为“无产者社”。

继“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社”之后，1930年1月，刘仁静又拉起一个名为“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派小组织。由于这个小组织出版刊物《十月》，便被名为“十月社”。

这年夏天，一些新从莫斯科回国和一些游离于“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之外的人，共同组成一个托



派小组织，称为“战斗社”。

这样，中国就有了四个托派小组织。为了取得正统地位，这几个小组织之间不仅发生了激烈争吵，而且都纷纷给托洛茨基写信，以取得其他的支持。

经过托洛茨基的斥责、批评、劝慰和陈独秀的积极工作，1931年5月，中国的托派小组织才最终实现了统一，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或叫“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实际上是沿用了“陈独秀派”的名称。

由于托洛茨基的支持和信任，陈独秀被选为托派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陈独秀本想借此机会“大展抱负”。然而，中国的托派组织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因为他们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国民党，故而为两党所不容，既受到共产党的打击，又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同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种境况使托派组织举步维艰，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最多时也只有500余个成员。

托派组织内部的状况也很糟糕。其成员良莠不齐，一些人品质恶劣，个人主义严重；一些人贪生怕死，不惜出卖组织和同志以换取自己的高官厚禄。1931年5月，托派统一大会刚刚开过，在选举中失利的梁干乔即伙同陆一渊主动跑到南京，向国民党投降，并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梁干乔、陆一渊投降后，便开始对托派做瓦解工作，结果一大批对托派事业失望的人被挖了过去，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特务。

就在托派统一大会开过不到20天，5月25日，由于马玉夫的出卖，托派中央遭到破获。中央常委5人中，除陈独

秀因马玉夫不知住址而幸免外，其他4人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均被国民党逮捕。托派成员何资深、江尚师、楼国华、濮德志也同时被捕。

托派中央才刚刚开展工作即遭如此大劫，使陈独秀十分沉痛。他只好重整旗鼓，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参加中央工作。不料，由于叛徒的出卖，托派中央在8月份再次蒙难，正在开会的尹宽、宋敬修等七八人全部被捕。

接连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托派组织元气大伤。一些人渐趋消极，只有陈独秀、彭述之极少数人勉强支撑着托派中央的门面。而彭述之与陈独秀又常常意见不和，个人关系也开始紧张。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陈独秀拿出十二分的力量来推动中国托派的“事业”。他创办了中央机关报《火花》和内部理论刊物《校内生活》，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宣言、决议和通告，向世人昭示中国托派的立场和观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鼓舞，创办了《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他撰写了大量的短评和文章，抨击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起来抗击日寇侵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陈独秀虽然苦撑门面，却干劲十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托派发展成为能够对中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组织。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诸东流。不仅托派组织没有发展起来，他自己也被国民党逮捕，投进了监狱。

1932年10月15日，由于知情人的出卖，正在开会的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王兆群、谢少珊被捕。谢少珊被捕后，供出了陈独秀的住址。当天夜里，正忍受着病痛折磨的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逮捕。10月

19日夜，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人被押往南京。

这已经是陈独秀一生中第五次被捕了。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应安徽都督柏文蔚的邀请，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同年8月，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柏文蔚出走，陈独秀也从安庆逃到芜湖避难。当地的驻军龚振鹏曾是柏文蔚手下的一个旅长。陈独秀到芜湖后，见龚振鹏滥杀无辜，便对其行为进行了痛斥。龚振鹏不仅不认错，反而恼羞成怒，将他捆绑起来，投入监狱，而且还扬言要枪毙陈独秀。后来，经过柏文蔚等人极力周旋，龚振鹏才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期间。1919年6月，为了支持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又亲自印成传单，然后约了高一涵等人一起去散发。6月11日，陈独秀等人正在新世界游戏场散发传单时，被埋伏的暗探逮捕。后在多方抗议和营救下，陈独秀在9月16日获得自由。

陈独秀第三次被捕是在他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不久。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从广州回到上海，专门主持党的工作。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突然闯进陈独秀的家，逮捕了他和他的夫人高君曼，当时正在他家的柯庆施、包惠僧、杨明斋也一起被捕。巡捕从陈家搜出了《新青年》等印刷品。陈独秀被捕后，国际代表马林鼎力营救，孙中山等人也利用与法租界领事的关系为陈独秀疏通。10月26日，法庭判决所查抄书籍一律销毁，《新青年》禁止出售，陈独秀罚洋一百元，交保释放。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是1922年8月。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积极活动，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极大关注。

8月9日，巡捕房在陈独秀家搜出《新青年》等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刊物，并将陈独秀逮捕。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一些进步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提出强烈抗议。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人也通过书信，营救陈独秀。8月18日，中法会审公堂开庭审理陈独秀案件，判决陈独秀犯有“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罪，罚洋400元，交保释放。

对于陈独秀来说，有了以上四次被捕的经历，他起初并没有把这次被捕当回事，也没认为坐牢有什么可怕，只不过以前坐的是北洋军阀和外国人的监狱，现在坐的是国民党的监狱而已。然而，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被捕坐牢，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要他的保金，却将他监禁了近5年的时间！

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独秀进行了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在第三次审讯时进行了抗辩。他的《辩诉状》慷慨激昂，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分表达一个爱国者的情怀。他宣布：

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①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① 原文为“标”字。

共产党
PDG

陈独秀向世人宣告：“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陈独秀痛斥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膝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的行径，抗议给他加上“危害民国”、“叛国”的罪名。他慷慨陈词：“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①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②

1933年4月26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宣布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审判结果是：“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

坐牢，陈独秀是不怕的。但以“叛国罪”坐牢，对于这位爱国者来说，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污辱。于是，陈独秀愤怒了。他当场抗议：“本人乃叛国民党，并非叛国，以此不公之裁判强加于人，吾人定会上诉，以明是非！”

6月15日，陈独秀亲自撰写了上诉状。他历数了国民党统治十余年来中华民族的灾难，国破家亡、民不聊生、饿

^① 原文为“括”字。

^② 陈独秀：《辩诉状》。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315～3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殍载道的悲惨境遇，以及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寇侵略，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爱国者诬为“叛国”之罪等种种事实，指出国民党、国民党政府根本代表不了中华民国，所以他反对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并不是“危害民国”，并不是“叛国”。

6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驳回陈独秀的上诉，指斥陈独秀的上诉状“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①。

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陈独秀等人作出终审判决。当天，《中央日报》公布判决结果：“原判决关于陈独秀彭述之及王武、濮一凡、王兆群、郭竞豪之褫夺公权部分，均撤销。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裁判确定羁押日数，均以二日抵徒刑一日。关于陈独秀彭述之之供犯罪所用之文件书籍均没收，其他上诉驳回。”

《中央日报》在公布此结果后，还特意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系经江苏高等法院判处徒刑十五年，现上诉结果已减轻七年。”

此时陈独秀年已经55岁，坐牢8年意味着当他出狱时就已年过60！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也许活着出狱的可能性是很小了。生命对于陈独秀，固不足惜，但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时候，他却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时光，这无疑是对他民族良知的一种扼杀！

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陈独秀的命运也是变幻莫测。当陈独秀被监禁4年之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轰到了南京。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

^① 《火花》，2卷，1期。

件的压力下，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才同意司法部设法开释陈独秀。

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呈文政府主席林森，称：“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人监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盖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借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①当日，国民政府即发出第1844号指令，宣布：“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八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8月22日，《中央日报》刊登了国民政府上述指令，同时发表一篇题为《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的文章。

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在被监禁4年又10个月之后，被释放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即于8月25日致函《申报》编辑部，针对国民政府称自己“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发表了意见。他写道：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

^① 国民政府司法院档案呈字260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迨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①

陈独秀出狱后，各界的反映都很热烈。

《大公报》发表短评说：“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

一些与陈独秀有过交情的人，也纷纷前去看望。胡适、周佛海等则希望陈独秀参加与他们为伍，替国民党效劳，并以参加“国民参议会”为首选。然而，这一“诚邀”却遭到陈独秀坚决拒绝。陈独秀对他们表示：“蒋介石杀死了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3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对于儿子延年、乔年的死，陈独秀在公开场合从未表露过自己的真情实感，以致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父亲。这种判断显然是违背人之常情的。即使陈独秀在得知儿子们牺牲的消息时，没有表现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这也并不表明他的心没有流血。从他上述的一番话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对两个儿子的痛惜和怀念之情。谁又能否定，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生风雨，但在陈独秀心灵的深处，一直有一个地方是留给延年和乔年的？

后来，胡适又让人传话给陈独秀，说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拟请他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则声言：我的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拉拢陈独秀，要他出头组织一个“新共党”，并以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为诱饵，甚至还提出请他出任劳动部长，都被陈独秀一一拒绝。

此时，陈独秀已将近60岁，而且体弱多病。但他那一颗爱国心非但没有因命运的磨难而蒙尘，反而更加赤热。当他看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景象时，他的热血沸腾了！在和友人的赠诗中，陈独秀奋笔写道：

莫气薄大地，
憔悴苦斯民。
豺狼聘郊邑，
兼之怨尘频。

悠悠道路上，
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
龙性岂易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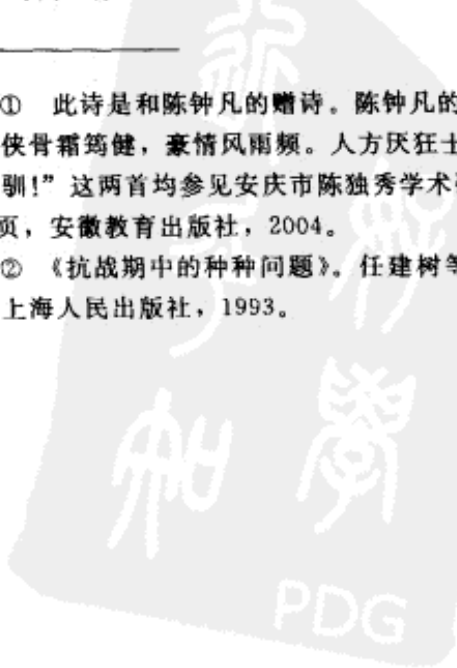
当《抗战》周刊的记者问陈独秀：“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对！不对。这是大公报记者听错了我的说话，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那位记者问我，是不是打算参加实际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里面的行政）工作，我说，这于我不太相宜，十五六年时，我也没有担任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②

就这样，陈独秀开始以自己的所能，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陈独秀出狱后即离开南京来到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了知识界和舆论界的热烈欢迎。他奔走于武汉的一些大学之间，向青年学生进行演讲，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他积极向武汉各大报纸撰文，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① 此诗是和陈钟凡的赠诗。陈钟凡的赠诗云：“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这两首均参见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110～11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②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4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人们似乎又看到了这位“老战士”当年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的风采。

陈独秀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反对投降卖国行为。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他也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比如，他认为解决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应采取以下两个办法：“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则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①

这就是说，共产党不要与国民党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陈独秀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不过，在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事实面前，他对国共两党的看法还是有了转变。

中共中央与陈独秀探寻合作之路

中共中央看到了陈独秀出狱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的活动，并且注意到了他的抗日主张与托派的区别。1937年12月21日《解放》杂志发表评论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①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著作选》，3卷，444～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主持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则向罗汉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早在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陈独秀就与罗汉等人有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想法。现在，中共中央对陈独秀态度的改变，促使罗汉利用在南京与叶剑英等接触的机会，表示希望中共与陈独秀等人合作。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考虑，提出了与陈独秀合作的三项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①

这三项条件由毛泽东和张闻天共同签署，发给了正在西安、住在林伯渠家的罗汉。林伯渠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在陈独秀领导下工作过，深知陈独秀的个性。为了说服陈独秀接受这三项条件，林伯渠对罗汉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与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在办事处工作的王若飞，感情上更是陈独秀的同情者。他也语重心长地对罗汉说：“党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或与第

^① 叶剑英、董必武、博古给《新华日报》的信，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勿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

中共中央向陈独秀敞开了大门，但陈独秀无法接受其提出的“迈进门槛”的三项条件。不错，陈独秀在与董必武谈话中，在发表于报刊的文字中，都隐隐约约表达了自己已与托派没有任何联系，表示“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但要陈独秀明确表示接受三项条件，这显然不是他这种个性的人能够接受的。

就在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继续接洽之际，王明、康生却挑起了一场诬蔑陈独秀为日本“汉奸”的风波。

王明：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身亡。此案成了苏联大清洗和大镇压的导火索，其间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和大批无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及一些群众遭到了灭顶之灾。

同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案件的通报，称刺杀基洛夫的凶手为一个名叫“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由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成。不久，又公布了这个组织的最终目的是要暗杀斯大林和其他联共（布）领导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①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日报》，1938年4月24、25日。

1935年1月，联共（布）中央向全党发出秘密信，要求彻底清除党和人民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场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的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1936年8月至1938年3月，苏联政府先后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右派和托派联盟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等人一大批苏联党政军领导人被处死刑。

在审判过程中，为数众多的骇人听闻的托洛茨基和托派的所谓“罪证”被制造了出来，其中之一就是1935年12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中心”的一封信，信中指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一“罪证”在中国公布后，成了中国托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罪证”之一。

正是在苏联审判所谓“右派和托派联盟案”期间，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带着苏联大清洗和大镇压斗争的硝烟回到延安。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报告中，王明对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批评，要求“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还讲到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说“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指责中共中央团结陈独秀等人一起抗日的政策是对托派的实质认识不够，忽视了托派的危险。

这个早在1935年就发表文章将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诬为“汉奸”的王明，在经历过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之后，更是积极追随在斯大林的反托派旗帜之下，对中国的托派和陈独秀

大加讨伐。他在会上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王明还扬言陈独秀是日本间谍，每月领取日本 300 元津贴。当会上有人提出这不是事实时，王明却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王明不仅反对与陈独秀合作抗日，而且夸大中共内部的异己力量，强调对托派的斗争。他说：“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合作问题。会后，王明等即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到长江局工作。

王明到武汉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主张，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与此同时，在由他控制的《新华日报》上刊登系列文章，介绍苏联大清洗的进展情况，号召开展反右倾、反托派、反取消派等斗争。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3 册，422、423、424 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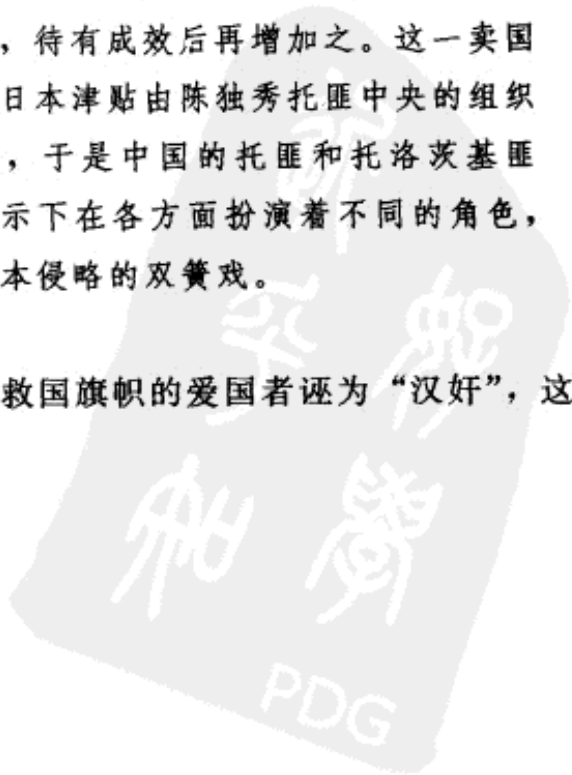
陈独秀是汉奸吗？

与王明有着同样思想基础的康生，在王明举起反托派大旗的时候，立刻与王明相呼应。就这样，一篇奇文就被康生炮制了出来。这就是《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这篇文章被炮制出来后，刊登在1938年1月28日、2月8日《解放》周报第1卷第29、30期上。

康生在文章中指出：“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侦探机关最得意的工具”；“托洛茨基匪首给他在中国的徒子徒孙们的指令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接下来，康生就捏造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写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组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的双簧戏。

将一个高扬抗日救国旗帜的爱国者诬为“汉奸”，这使



一些对陈独秀有所了解的人读了康生的这篇文章后很是不解和愤慨。

3月16日,《大公报》以《为陈独秀辩诬》为题,登出傅汝霖、段锡鹏、高一涵、陶希圣、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张西曼、林庚白9人写给该报的信。信曰:“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惟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全国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体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特此函请贵报发表为荷,并颂撰字。”

这9人的联名信还发表在《武汉日报》、《扫荡报》以及一些杂志上。

就在《大公报》登出这封信的当日,9人中之林庚白即致函《新华日报》称:“本日大公报为陈独秀辩诬一函,列有贱名,查该函于友人持示时,经告以陈独秀为倡导新文化之有功者,吾人本中华民族和平,宽大之精神,与东方政治家之立场,对于其人格,予以维护,原则上自可赞助,惟该函措辞,颇涉于共产党所指为托派者之语气,非国民党同志应有之口吻,当提出修正文句,迺顷读该函,并未更易一字,本人生平在政治上之主张,态度,素极坦白,雅不原苟同!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

不负任何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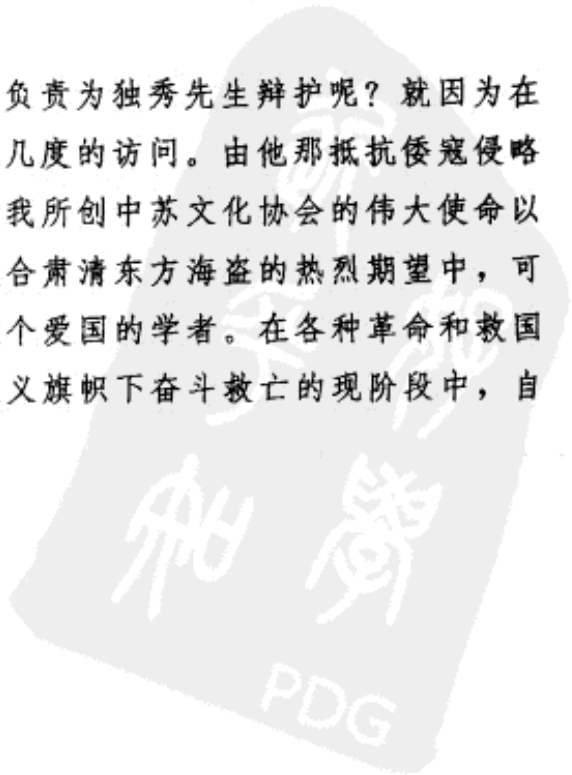
3月17日，《新华日报》以“来函照登”刊出了林庚白的这封信。同时发表一篇短评，其中这样写道：

今天想要证明陈独秀非汉奸，首先就要证实陈独秀确已脱离托派汉奸组织，而陈独秀是否已经脱离或正在准备宣布脱离托派汉奸组织，首先须要陈独秀本人的公开正式声明，否则抛开托派汉奸组织的主题不谈，而空洞的声明陈独秀非汉奸，或者陈独秀自己不声明其政治立场，而只由别人来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和中国民众对此问题已向陈独秀有一个简单明白的要求，就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

这就是说，只要陈独秀宣布脱离托派组织，就不是汉奸，否则就是汉奸。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

3月18日，《新华日报》的“来函照登”又刊出在9人联名信中另一署名人张西曼于3月17日给该报的信。在这封信中，张西曼回顾了签名的经过后表示：

我为什么敢负责为独秀先生辩护呢？就因为在他出狱后，作过几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在各种革命和救国力量集中三民主义旗帜下奋斗救亡的现阶段中，自



然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除证据确凿的汉奸巨恶应由国家法律和民众力量痛加制裁外，断然要力求避免一切无谓摩擦和误会，方可群策群力应付时代的危机。现在倭寇已囊括我资源富庶的十省，民众的牺牲痛苦早非人境，分化宰割，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这是我频年最诚恳的希望和努力之点。至于当此民族解放战争关头，不许再有黄公度，缪斌一类卖国汉奸的产生，自是全国革命群众的公意和加紧防范的工作。

《新华日报》在发表张西曼之信的同时，还针对这封信发表了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短评说：

陈独秀虽然是一个文化人，但是并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文化人就不会当汉奸。判断每一人，我们要从他的言论，思想，行动为出发点。如果一个文化人，他的言论思想行动与日寇汉奸托派相联系，他必然要堕入叛国的奸细，从陈独秀堕入托派的泥坑后，他已出卖了中国的文化，侮辱了中国的文化。如郑孝胥者，他不是研究中国古学的人吗？他不知盲目的忠君，所以他必然要堕入“满洲国”的汉奸集团。……又如布哈林何尝又不是文化人，但他的思想行动从来是反对列宁主义的，自他堕入德日奸细的罗网后，他不是丧尽了人类的天良，进行暗杀，破坏，阴谋，侦探的工作，而成为叛国的

奸细吗？陈独秀能否挽回他的文化人的资格，这要看他的思想与行动能否公开脱离托派汉奸的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的行动，如果他本人不这样做，那么别人为他惋惜也是无益的。

看到这个短评后，陈独秀再也不愿保持沉默了！当天，他即提笔给《新华日报》写了“公开信”，其内容是：

我在去年9月出狱之后，曾和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又单独和剑英谈过一次。到武昌后，必武也来看过我一次，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①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拉拉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

^① 原文如此，疑为“日”。

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况且现在并非无政府时代，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以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拉拉队，真是想

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①

陈独秀的这封信刊登在3月19日的《武汉日报》和20日的《扫荡报》上。《新华日报》没有发表陈独秀的这封信。

3月20日，《新华日报》登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于3月19日致该报函。函中回顾了他们三人与陈独秀见面的情况及各自的态度：

（1937年）9月初，陈氏出狱后托罗汉来谈：陈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我们因陈为中国托派之领袖，事关重大，应与中共中央商谈决定，故嘱罗汉赴陕。罗离京后，陈又托李××先生来谈：陈氏已与托派决裂亟欲一见，我们以陈未公开表示政治立场，认为未便。李××先生说：陈氏正欲面向我们声明政治立场，故有博古剑英与陈氏之见面。当时我们要求陈氏表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及脱离托派。并告以托派已成为汉奸，如不公开反对托派一切谈不上。陈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对托派不明确表示态度。事后陈又托人来说：因李××在座，未便无顾忌的说话，要求剑英再和他见一面。会见时，剑英曾要求陈氏公开向全国表示三点：对抗战的态度，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及公开的反对托派之理论与行动。但陈始终不曾

^① 《扫荡报》，1938年3月20日。

实践。罗汉在陕及返京时，两处均以中共中央的三条件书面交罗。这三项条件是：“（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践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并说明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且再三向罗汉说：托派已成日寇工具之汉奸组织，陈罗必须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作为先于一切的条件。当时陈已赴汉。必武在汉见陈亦为督促陈氏实行此项条件。然而，陈氏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在刊登这封信的同时，发表短评《关于陈独秀来信》。短评说，陈独秀虽然在来信中表示他已与托派无关，但他的言论还是托派的那一套，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的行动，所以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短评指出：

陈独秀如果要表白自己不是托派汉奸，拜托别人越来越俎代庖固然不行，就是自己仅仅闪烁其词的说未参加任何党派亦还不足；必须要明白的表示其政治的立场，这首先应该回答：他对今天抗战采取什么态度，他对国共合作采取什么态度，他对苏联及其党政的领导者采取什么态度，他对苏联托季

布^①联盟的叛贼们采取什么态度？他对印发《斗争》《胜利之路》等汉奸刊物的托派伙伴及门徒们采取什么态度？他对这些托派刊物上称国民党之领导抗战为“只见过去血污叛卖政策之继续”，说“英法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代表蒋介石一贯就是日本在中国进行无底止战争的帮凶”，号召群众准备实力推翻领导抗日的国民政府，咒骂共产党咒骂中国一切进步势力等等言论采取什么态度？

如果陈独秀已经与托派组织无关，那么明白确切的回答这些问题想已可无顾忌了吧！只有坦白公开并表示政治立场才能取信于中国人民，否则，隐秘政治面目，不敢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不愿公开反对托派汉奸的行动，绝不能在政治上取信于人的，因此，在今天陈独秀开始声明他与托派汉奸无组织关系以后，我们企待他进一步在实际上表现他反对日寇及其走狗——托派汉奸的具体言论和行动。

王明、康生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做法，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怀疑，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一些报刊就此事发表文章，指责他们“不择手段，肆意污蔑”，“强拉栽诬”，“鬼鬼祟祟，玩弄手段”。

他们对陈独秀的诬蔑还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有人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正是争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这一事件的发生，

① 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

显然不利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周恩来为消除王明等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劝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就这样，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

但受到伤害的陈独秀，始终对这一事件耿耿于怀。他后来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气愤地写道：“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①

谁也没有想到，随着岁月的变迁，陈独秀是否汉奸这件事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翻了出来，并大做文章。更不可想象的是，在王明、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汉奸之时，绝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而当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重提的时候，竟然有那么多的人相信陈独秀确实是汉奸！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有良知的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彻底澄清了这桩冤案。

历史是公正的。陈独秀九泉之下有知，是否会感到欣慰？

^①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6月20日）。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江津》，10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孤叶飘落鹤山坪：恩怨何时了

悲苦的落难士，执著的爱国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仅1年时间，日寇铁蹄从华北踏到华东。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又成为日寇进攻的目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关急急迁往重庆。

陈独秀此时也在考虑自己去向问题。6月中旬，当陈独秀正准备与包惠僧去重庆之际，他的大姐一家7口身上挂着难民条子，从安庆来到武汉投奔陈独秀。“卅年未见姊，见姊在危颠。”陈独秀不忍心撇开姐姐一家，便推迟入川。

6月下旬，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以及大姐一家共9人乘坐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包轮，由汉口启程前往宜昌，后又转“民权轮”去重庆。就这样，陈独秀与姐姐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①。

据当时与陈独秀同乘民权轮赴重庆的尉素秋回忆说：当时陈独秀一家没有买到铺位，便在大菜舱外面打地铺。陈独秀穿着一套中装短衫裤，顶上灰白的头发，剃去周围，只留中间像茶壶盖样的一片，蓄有三四寸的长发，向后梳着。他的眉宇之间表现出一种爽朗刚健的气象，令人体会到古人所说“乾坤清气得来难”的含义。吐词琅琅如山泉松风，表现读书人的气概。^②

7月2日，陈独秀到重庆。

1938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寄居在重庆上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上房间里的陈独秀，回顾一年来日寇猖狂侵略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艰辛，真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遂提笔写下《抗战一年》。

当时日本侵略的战火已经烧遍了大半个中国，许多人都对能否战胜日寇缺乏信心。但陈独秀完成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满怀对祖国的热爱，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文章中宣布：“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

陈独秀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目前的抗日战争。他提出，抗战一年来，日本在四个方面遭到了失败：

第一，日本虽然强大，但并没有击倒中国这个“病夫”。

^① 陈独秀：《挽大姊》。1941年7月15日，陈独秀的大姐患中风病逝于四川江津的油溪镇。陈独秀悲痛不已，遂写此长诗。参见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5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② 参见尉素秋：《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台北，《传记文学》，30卷，5期。

中国的反抗证明，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

第二，敌人虽然占领了中国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但却没有征服人心。一年来，他们还没有得着一个有力的汉奸去为他们效劳。

第三，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行动得到了世界的同情，提高了国格和人格。而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

第四，热衷战争的，只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和军事资产阶级，广大日本民众是反对战争的。随着对华战争的延长，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在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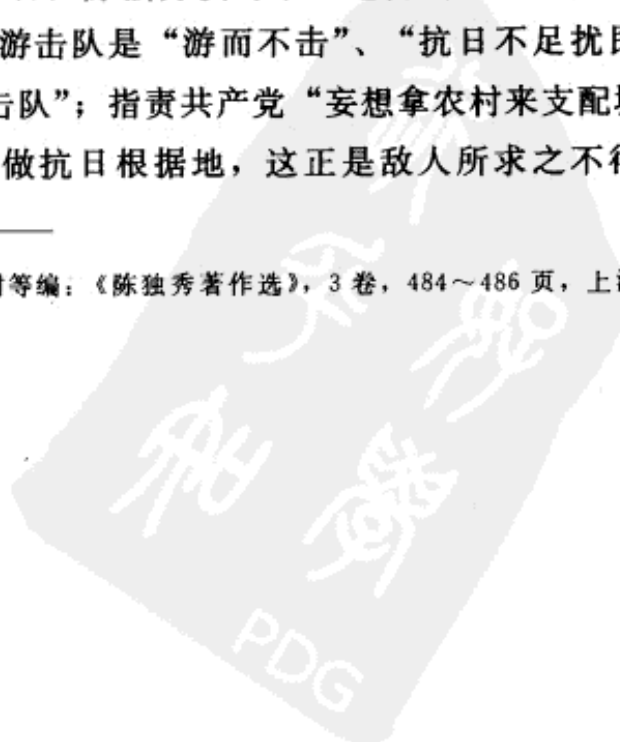
“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陈独秀向国人鼓劲。

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一年来的抗战，暴露出了我们的缺点。勇敢地承认缺点，认真地改正缺点，比轻浮地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他提议：要利用一切对我国有利的因素；在野党要援助政府抗战，不应该有保存实力和趁火打劫的企图；政府要决心解除人民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政府要下决心惩治腐败。^①

陈独秀在鼓舞人们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攻击。

7月21日，陈独秀撰写了《论游击队》一文，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指责共产党“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484～4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他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不理解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以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军在武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①

陈独秀不仅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抗战见解，还应邀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抗战中川军之责任》；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总之，他没有因身世沉浮而放弃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何况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

陈独秀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应他的同乡、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好友邓初的邀请，于8月3日与妻子潘兰珍移居江津。

邓初又名邓仲纯，在江津县城黄荆街83号开有一家诊所，名“延年医院”。因楼上有多余的房间，便邀陈独秀迁来居住。

不料，陈独秀到江津的那天，邓初不在家，其妻却不接纳。陈独秀和妻子在延年医院门前守候多时，没有结果。陈独秀本想立即返回重庆，但又因为携带行李多件，致使进退为难。后来幸亏在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秘书的安徽人方孝远，陈独秀与妻子才住进了一家闷热的小客栈。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493～4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江津东门内郭家公馆的房东孙茂池得知陈独秀的情况后，甚为同情，便腾出一间楼房，邀陈独秀夫妇去住。

此时，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折磨着陈独秀。时势艰难，居无定所更增加了他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然而，他思想的火花并没有熄灭。他没有停下书写的笔，《我们为什么而战？》、《“八一三”》、《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国际形势的幻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尤其是高血压带来的头晕目眩等不适，仍然以一个“老斗士”的姿态，写下了这些文章，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这年冬天，经过邓初的劝说，邓妻才同意将陈独秀夫妇接到延年医院来住。

1939年春，周恩来、朱蕴山先后来延年医院拜访陈独秀，劝陈独秀去延安。但陈独秀予以拒绝。他对朱蕴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陈独秀还说，他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①

也是在这年春天，蒋介石根据已经投奔国民党的张国焘的建议，指派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去江津访问陈独秀，企图从他嘴里搜集到对国民党有利的言论，以作反共宣传。为了取得陈独秀的好感，胡宗南和戴笠临行前，还特意找到1938年3月16日的《大公报》，因为那面上登载有段锡朋等9人因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而为陈独秀辩护的声明。

^①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5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陈独秀接待了这两个不素之客。当得知他们是奉蒋介石之命而来后，陈独秀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是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胡宗南一面向陈独秀出示他们带去的《大公报》，一面挑拨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沉思良久，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大状，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①

^①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207～21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约在1939年5月底，陈独秀夫妇离开延年医院，搬到离县城30里远的鹤山坪。先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到石墙院杨宅。

从此，除了偶尔进江津县城小住、去重庆看病和外出会朋友外，陈独秀就居住在石墙院内，直到离开人世。

与托派决裂

1932年陈独秀等人被捕入狱后，中国托派组织一时群龙无首。后来，上海的托派小组织勉强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但因其领导人意见不和而几近塌台。

在狱中的陈独秀，不忍见托派组织如此混乱，便通过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化名吴静如）与托派组织建立了联系。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托洛茨基指责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遂宣布与第三国际决裂，指示各国托派组织不再使用“党内反对派”的名称，而要另建新党，以便建立第四国际。为了指导中国托派组织的工作，托洛茨基派出美国托派组织成员格拉斯来华。

格拉斯到中国后，化名李福林，名义上是美国在上海出版的英文版《密勒氏评论报》的副主编，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联络员。在李福林的积极活动下，中国托派才有了主心骨。

陈独秀自入狱后，便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反思，结合中国托派分子在与他的论争中对中国革命有关

问题的阐述，陈独秀开始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完美性”产生了怀疑。

陈独秀认为，在“不断革命”论指导之下，中国托派实际上成了一个极左派的小集团。他们一味强调所谓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利用任何和平的手段从事工作。他们鄙视民主主义的口号，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做做改良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之下夺取政权。他们不了解民主主义不仅可用在反革命时期打击军事独裁，并且还可用在革命时期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对“民众政权”、“国民会议”的口号，对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都一律表示怀疑。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托派的路愈走愈窄。

当然，陈独秀这一时期对托洛茨基理论的反思还是初步的。但他迈出这一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而且随着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和苏联问题的思考，随着中国托派在歧路上愈走愈远，他的思想离托派也愈来愈远。

1933年11月，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率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陈独秀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民族矛盾上升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便提出：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现左倾。在这种情况下，托派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如抗日与倒蒋。他还认为：“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

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①

陈独秀将自己的上述看法发表后，托派临委不仅认为他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而且对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怀疑。

1935年1月13日，托派临委史朝生、胡文华等召开了上海代表会议。会议根据托洛茨基关于组织独立的托派新政党的指示，决定将中国托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由刘家良（任书记）、史朝生、胡文华组成常委。

这次会议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战线的意见“乃斯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队伍中的说客”。会议决定：对他们作最后一次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意见，还是同志。否则，应立即开除出党。

陈独秀从陈其昌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他在信中表示：“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的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钳制异己，像这样分裂组织的行动是不允许的。”

陈独秀在信中反对李福林干涉托派事务，他指出：“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②

但托派新的中央并不买陈独秀的账。1月25日，托派

^① 《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斯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13期，1935年2月8日。“雪衣”为陈独秀化名。

^② 《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13期。

舟子 2025
PDG

中央给陈独秀写去回信，在历数了他的“四大错误”之后指出：“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如‘等国际来信’或‘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

紧接着，托派中央即宣布开除陈其昌、尹宽党籍，并要求陈独秀和另外几个托派分子表态。陈独秀当然表示反对。

就这样，陈独秀被托派中央开除出党。

然而，托洛茨基还是看重陈独秀的。他于8月10日致函李福林，其大意是：中国托派与陈独秀在思想上的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但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是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中。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所以，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可以而且应该有陈独秀的位置。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陈独秀同志无疑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我们如果抛弃了与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①

在托洛茨基的干预下，托派中央才重新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在演讲和文章中都表示了拥护“国共合作”的态度，这与托派“倒蒋反共”的主张是相违背的。因此，托派临委斥责他为“军事投机”、“拉拢投机政客”。

陈独秀非常不满意托派临委，认为他们这种宗派做法

^① 参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203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没有出路。所以当有人提议他去上海时，他予以坚决拒绝。

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在给陈其昌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托派的态度。他写道：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①

陈独秀宣布自己“已不隶属任何党派”，并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障人耳目，是实实在在的，是表明他已从组织上同托派决裂了。

但陈独秀对托派事业还是关心的。尤其是对于托洛茨基，陈独秀还是十分敬重的。托洛茨基在陈独秀处于被托派排斥打击的困境之中时，力排众议，多次支持了他。1937年8月，托洛茨基曾担心国共合作之后，会杀死陈独秀，指示李福林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同年12月，托洛茨基又给李福林写信，要他帮助陈独秀到美国或墨西哥，并

^①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473~474页，新华出版社，1987。

说：“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来说则是一个有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1938年2月，托洛茨基再次致函李福林，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去，他写道：“如果苏联参战……到那时我们所有的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①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好处。”^②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在中国抗日战争问题上采取了极左的立场。1938年，当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建立第二次合作，以便共同抗日之际，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局于这年8月作出《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表示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9月23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国托派分子，指示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③

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中国托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政策是“彻底投降”，“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扬言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① 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②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24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③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349、353页，春燕出版社，1947。

陈独秀对于托派的主张自然不能赞同。他知道，他对于托洛茨基的敬重之情，不能代替政治原则问题。于是，1938年11月，陈独秀写信给托洛茨基，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托派及其理论的看法。

陈独秀在信中说，中国托派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但这却不是自己的任务；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与其他党派合作。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需要联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的情况下，托派干了些什么呢？陈独秀在信中写道：“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陈独秀接着气愤地指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陈独秀在信中指出，目前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阶段，如果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投降，就会走到反共的老路上去。托派只有在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在政治宣传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的斗争，才能重新创新无产阶级政党中心的势力。他警告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然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①

陈独秀在信中虽然只批评中国的托派分子，但他还是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且十分显明地表示自己仍然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

12月23日，陈独秀在给郑学稼的信中明确表示：“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②

陈独秀在思想上与托派彻底决裂了！

在政治党派的斗争中搏斗了20多年之后，陈独秀此时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然而，陈独秀并不怕孤立。胡适称他为“终身的反对派”，他欣然接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表示，之所以成为“终身的反对派”，“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

^{①②}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530～532、5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不得不如此也”。^① 在《寒夜醉成》这首诗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孤桑好勇独撑风，
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
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形健，
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
醉乡老子是元戎。^②

探讨斯大林问题

陈独秀与托派的决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同托派在对斯大林评价上的分歧。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对斯大林拿他做替罪羊十分不满，故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怨恨。他投入托派的怀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从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开始，随着政治风雨的洗涤和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斯大林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而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阶段。随着对苏联有关

^① 《致S和H的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5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②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5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陈独秀
PDG

问题的分析，他对斯大林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最初的朦胧混沌到最后的清晰明了。

陈独秀是民主的斗士。他早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到了晚年，他仍然倾心于民主，向往在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他此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民主性的理解更趋于理智。他曾在《孔子与中国》这篇文章中写道：“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孔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也是在这篇文章，陈独秀讲到了民主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民主可以激扬人们的热情，解放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感。他指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①

陈独秀是从探讨民主的问题入手，开始接触到斯大林独裁这个敏感话题的。

起初，陈独秀只是注意到，自从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随着联共（布）党内斗争不断激化，斯大林个人独裁现象在不断加强。他认为，这与十月革命的精神是相矛盾的。1934年5月15日，陈独秀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中曾这样说：“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

^① 《孔子与中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386、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在。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我们不应该仅仅组织一个新党，还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①

从1936年开始，苏联开始了大清洗。到1938年，苏联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平民百姓被逮捕、监禁甚至枪杀。陈独秀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更加关注苏联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当时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全部怨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斯大林大加攻击。而他在中国的追随者，托派临委的一帮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都认为苏联大清洗是斯大林个人品质的问题，是斯大林独裁野心恶性爆发的结果。

然而，陈独秀没有盲从。他经过冷静的思考，认为把一切过错都归之于斯大林，是唯心派的见解。他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②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由此断言：“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344～3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② “无产阶级”之缩写。

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①

陈独秀在谈到苏联的政权性质时，使用“无产阶级独裁制”，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他将这个政权称之为“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认为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②

陈独秀探讨了苏联独裁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是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选择了独裁。他说：“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陈独秀想不通，苏联已经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强化“专政”的功能。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

^① 《陈独秀致西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504页，新华出版社，1987。

^② 《我的根本意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5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①

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问题的探讨，是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苏联的对外政策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他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要沦为独裁专制。一个居于乡村陋舍、重病缠身的六旬老人，能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见解，确实令人惊叹！

然而，正如陈独秀自己所说，他“绝对力求偏颇”。他无疑将对斯大林专制独裁的探讨推到了极端，从否定独裁制出发，便进而否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将它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显然是错误的。

风灭孤烛了残年

陈独秀的晚年是很悲苦的。

1939年5月，陈独秀住进石墙院后，虽然有发文章的稿酬，还有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但他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十分贫困。

陈独秀一生中交了不少朋友。但战乱时期，能来探望他

^① 《陈独秀致西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505页，新华出版社，1987。

的人并不多。没有老友可以畅谈，对于这位思想和感情都十分丰富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门前冷落鞍马稀”，陈独秀每每感此，总是悲叹不已。

嫩秧被地如茵绿，
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
不觉辛苦乱离中。

陈独秀的这首诗，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他晚年的生活情景。

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折磨着陈独秀，他不得不经常服药打针，以减轻病痛。病稍轻时，他就提笔写点东西；病情加重时，他只好搁笔。尽管有潘兰珍悉心照料，但病情时好时坏，常常使他丧失了康复的信心。凄怆自顾，他无不备感忧伤，以至夜不能寐。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了。这首《病中口占》，就是他心境的写照：

日白云黄欲暮天，
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雪销难尽，
愁似池冰结愈坚。
斩爱力穷翻入梦，
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
乞取深卮疗不眠。

陈独秀的病体支撑到 1942 年春，就再也支撑不住了。但这位至死不渝的爱国者，仍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他用颤巍巍的手拿起笔来，写下了他一生最后的两篇文章：《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陈独秀是个民主的斗士，他一生为民主、自由而斗争，此时仍然关心着民主、自由的命运。当时尽管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有许多健康的人已经丧失了取胜的信心，而陈独秀这位将不久人世的病翁，却不相信法西斯会统治全世界，而坚信民主、自由一定能够实现。

陈独秀是个至死不渝的爱国者，他一生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此时仍然牵挂着被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将走向何方。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孤立的民族政策，都是没有前途的。它的惟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帝国主义旧世界。

思想的火花在闪烁，它穿越了长空，超越了时代：

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

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相互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

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大结集，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①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孤独中与世长辞。

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
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②

陈独秀去世了！在陈独秀64年的人生岁月中，与莫斯科有20多年扯不断的关系。从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欢呼，到对斯大林的专制独裁进行反思，他是经历了何等曲折的心路历程啊！

陈独秀去世了！然而，他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恩恩怨怨，与斯大林、托洛茨基，与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米纳兹等人的恩恩怨怨，并没有了断，只能由后人来评说了。

^①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3卷，605～6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陈中凡：《陈独秀先生印象记》。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6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主要参考书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998。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
5.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6. 《斯大林全集》，9卷，人民出版社，1954。
7.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
8.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9.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1.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12.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3. 《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4.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6.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
17.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8. 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
19.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0.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1. 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江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2.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
23.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24.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
25.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26.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7.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28.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29. 《瞿秋白文集》，5卷，人民出版社，1995。
3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1. 《关山渡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32. 张国焘：《我的回忆》，1~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33.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
34.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
35.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
36.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香港，前卫出版社，1972。
37. 《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38. 荣梦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39. 《孙中山全集》，11卷，中华书局，1986。
40. 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下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
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出版社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42.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43.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44.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45.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6.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87。
47. 李新、陈铁健主编：《北伐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8. 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0。
49.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50. 姚金果等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二、主要参考报刊

《政治周报》、《向导》、《人民周刊》、《党史研究资料》、《文史资料选辑》、《申报》、《党的文献》、《党史资料》、《时事新报》、广州《民国日报》、《国闻周报》、《国际共运史研究》、《炎黄春秋》、《布尔塞维克》、《红旗》、汉口《民国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传记文学》（台北）。

后 记

十多年来，我一直潜心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了一大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我的研究工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陈独秀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浓厚兴趣。经过数年的辛勤努力，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林茂生先生。他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在病榻上与我讨论有关问题，给予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和启发。

我还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李天兵先生，他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大量工作。

我现在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井冈山如诗如画的优美风景给了我许多写作的灵感。我非常感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如此良好的条件。

著 者

2005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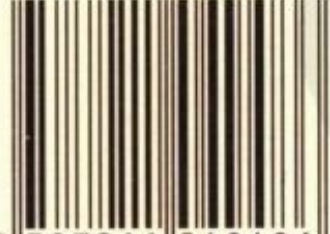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

PDG



责任编辑 李天兵
封面设计 黄 勤

ISBN 7-211-04948-0



9 787211 049486 >

ISBN 7-211-04948-0
D·427 定价：32.00元

数字图书馆
PDG